

第一章 面向发展：发展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解答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

——马克思

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但是，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要真正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就会在发展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应该虚心地向“晚年马克思”请教，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发展的论题在那里得到了完整的“沉淀”和较为系统的表述，形成了具有科学形态的、富有独立意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大纲”。

一、发展问题的突现和发展理论的兴起

作为一个特定问题的社会发展——广大的第三世界如何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是 20 世纪以来的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形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学科——社会发展理论，这是 20 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难点问题。

（一）发展问题的突现

发展问题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只有在 20 世纪，它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构成了 20 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题。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向，这就是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41—342 页。

了现代社会 这样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代化。“从字面上来看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变成现代的意思,而且由于‘现代’的中心内容当然要包含现代技术及现代经济这一重要部分,所以,我们能够把现代化理解为将产业化作为一部分包含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概念。”^①这里的产业化也就是工业化。这就是说,由于西方社会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就成为了先进的国家;而东方社会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就处在了落后的境地,进而形成了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的局面。这样,东方社会能否也 同样实现现代化,就成为了东方社会能否摆脱殖民奴役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风起云涌,这些国家在摆脱了对殖民帝国主义的依附后,纷纷取得了独立,这样,就使得殖民帝国主义体系终于分崩离析了。但是,尽管这些亚非拉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割断自己与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脐带”因为由于自己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 他们在经济上依然要依附这些过去的宗主国。这样,在 20 世纪的政治格局中就形成了这样的态势:民族独立国家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取得社会的全面进步,进而重新确立自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这样,现代化问题就再次被突现出来了,而且获得了全新的意义。社会发展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谓的社会发展问题(可以将之简称为发展问题)也就是指这些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如何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现在世界

[日]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5 页。

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那么 ,为什么将发展问题看做是现代化问题 ?为什么将发展问题限定在南北问题上呢 ?为什么将南北问题的实质看做是经济问题呢 ?这样 ,就要求我们对发展问题的特征做出进一步的把握。

(二) 发展问题的特征

发展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一个持续性的社会过程。具体来讲 :

第一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 发展问题是与现代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它主要指的是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开辟了世界发展的一个新纪元 ,现代化凭借大工业之上的一系列的过程成为了现实。在这个过程中 ,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大工业、世界市场、殖民扩张的方式 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全球的范围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局面 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的局面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 ,原本在地理上所区分的东西方社会就获得了经济社会方面的含义。由于处在地理上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 从而就成为了在经济上领先的国家 成为了‘现代社会’ ;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 ,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 ,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② 这样 ,西方社会就是指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 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313页。

家。而在地理上处于世界东方的国家仍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 类似于西方现代化之前的社会——“传统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由此来看，东方社会之所以最终沦落到了落后、挨打的境地 这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当然 这是从其自身方面讲的原因 此外 还有外在方面的原因，这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的掠夺和侵略。为了摆脱依附、落后、挨打的局面 东方社会必须尽快地将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而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就是发展经济的一条基本的道路，即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样，所谓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尽快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就其实质来看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发展、现代化看做是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 为了强调其特殊性 我们用发展来专指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

第二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作为发展问题表现形式的东西方问题与作为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东西方概念又是完全不同的；而是与南北问题一致的。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首先得益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在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同时 也开启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这样 国际政治版图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 在全球性的范围内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立的局面 形成了“一球两制”的格局。由于社会主义是首先在位于世界东方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因此，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东西方概念就获得了政治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西方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是指社会主义。另一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 又形成了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与原来殖民帝国主义对立的格局，随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这一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由于原来的宗主国位

于地球的北半球，而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都位于世界的南半球。因此，就用“南北问题”来称呼这一格局。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命运的，他们从武装颠覆、和平演变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着攻击；同时，老牌的帝国主义也是不甘心自己在南方的失利的，在南北之间也展开了较量，而南方国家是否能够最终摆脱依附，关键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仍然是能否能够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种东西南北交叉的局面就形成了现时代的主题。因此，我们所讲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同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意义。这样，所谓的社会发展问题，从历史上来讲，就是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从现实情况来讲，就是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第三，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来看，东方社会由于自己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南方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他们被归入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不可能是同步的，东西方社会之间（南北方国家之间）的现代化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的。这样，就有了发达和不发达的区分：“发展是为了通过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和合理的社会组织，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而引进新事物的社会变迁过程。依据社会经济指标，世界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部分。”^①这里，发达国家是指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北方国家），不发达国家是指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东方社会（南方国家）。显然，“不发达”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歧视的意义，而东方社会（南方国家）的实际是：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欠发达）将来却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后发）现在正在谋求发展（发展

[美]埃弗里特·M. 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08—309 页。

中)。因此,将他们称为发展中国家更为恰当。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程度不同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经济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只能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上,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逐步纠正它们的片面性。发达程度较低的经济受其他经济的支配,它们的结构时刻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并且至少是在某些领域内,存在着一种使支配着商品、服务和信息交换的种种条件被单方面固定下来的趋势。”^①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换算”成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这可能更接近事物的实质。

第四,从现实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利益对垒和阵营来看,广大的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正日益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 从而使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分化 出现了“第三世界”。尽管用这一概念很难将所有的东方社会、南方国家包括进来,但是,“世界上的穷国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做一个大致的界定。这些相似的特点包括:(1)拥有的农业生产力量通常超过工业;(2)一般都依赖出口一定数量的原材料;(3)饮食较差,文盲率较高;(4)都有过殖民地的经历。”^②这就是说 第三世界不仅是一个反映国际政治关系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表达国际经济关系的用语。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所讲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化 发展 问题 也就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问题。

这样,我们就对作为时代主题的发展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所谓的发展 社会发展 是指东方社会(南方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 欠发达国家 后发国家)第三世界 的现代化问题 而现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3—14 页。

② [英]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7—8 页。

代化就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变迁过程。由于后几种情况是 20 世纪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是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来表示这类问题的。

（三 发展理论的兴起和整合

既然实践的发展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摆上了历史发展的日程，那么，理论就必须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以便能够更好地促进实践的发展。由于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在一系列的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点，这样，就需要对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这一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由此，在整个全球性的范围就掀起了一场“发展理论”热潮，形成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发展理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发展理论的热潮主要地表现为出现了一系列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为主题的学科，它们集中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问题，由此形成了 20 世纪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趋势和特点。主要的发展学科有：

第一，发展经济学。人们最早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限定在经济领域中，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坦途。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简化为增长，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草拟出几种宏观经济增长的模型，这些模型都用静态的方式，参照产出曲线、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描述了出现平衡增长的点，这个点位于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的交汇处但是，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充分考虑用利率变动或流量调节矫正某种不平衡状态的自发必然性，也没有考虑到分部门分析和储蓄与投资的结构化引起的“并发症”。这样就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的出现。可见，“这个增长概念，对于制定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被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经济政策，总

的来说并不是个坚实的基础，这一概念出于建立模型的需要而选择和突出的经济现象方面，如果脱离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就会同为富国制定一项战略的任务毫无相干，更不要说为穷国制定战略了”。^① 在一定的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就是这种理论影响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问题，因为它将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占有、国际依存和规模收益递减等内容引入了发展经济学家；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一是它仍然无法解决总量生产函数问题；二是它并没有在生产理论上取得突破（仍然以固定因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三是它强调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制度创新的问题；四是太过于数学化，学理化的色彩太浓。^②

第二，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的典型的形态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它用社会变迁理论解释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理论的意义在于，说明不发达是发达的前夕，第三世界可以向现代化迈进；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由于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人们缺乏商品经济的意识和向上进取的精神；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激化，因为它使得社会变迁的节奏加快了；在工业化的威力面前，不仅第三世界，而且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都要走上西方先进国家的老路；西方经济将会进一步增长，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景象。显然，“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发展理论，它缺乏两点基本内容，一是充分的理论阐释，二是足够的结构分析。从历史角度说，它忽略了大量的历史证据，这些证据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用现代的价值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 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第8页。

② 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家的新发展》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577—586页。

观念和制度去取代传统的东西；从结构角度说，现代化理论没有揭示诸如引进技术或扩大市场这类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如何受到现存社会关系的制约。并且，构成社会关系的社会权力与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在现代化理论中只字未提”。^①显然，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将现代化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化；并且，它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是一种线性的因果进化论。

第三，发展政治学。最初的发展政治学将政治的现代化看做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突出了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和大众参与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它片面强调西方民主政治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意义，按照这种理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输入西方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却致使自己国家长期处在了内乱之中，军人干政、腐败政治严重地干扰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于是，发展政治学就开始转向政治秩序问题，强调政治变革的作用，要求政治制度化（指政治系统有组织有秩序地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同时，这种理论也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把世界文明划分为了几种类型，将现代化的过程看做是西方文明最终取得主流和主导地位的过程。因此，发展政治学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义的领域，遭到了人们的普遍批评，这是由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强调它们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它们不谈落后国家缺乏发展；相反，这些理论却集中鼓吹通过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扩散资本主义与技术这样的解决办法。理论家们注重第三世界以便炮制出一项不发达问题的理论。”^②正因为这样，发展政治学就迫切需要一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8—39 页。

② [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2 页。

种新范式。

显然，发展理论的发展要求发展理论自身也必须要发展，这就是要从离散走向整合、从分科走向综合，形成一门统一、系统的发展学科——社会发展理论。这在于 第一 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都是社会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分别考虑这些因素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总体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第二，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理解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更不要谈从总体上的把握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对发展做出一种全新的理解，这样，发展哲学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哲学将发展看做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理论的范式（参见表 1—1）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综合上和内生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问题，是对发展学科的一次综合，有助于形成一门统一的发展学科——社会发展理论。

表 1—1 新的发展研究的内容

1	2	3
概念	内容	形式化
发展	(a) — 演进 — 各种结构 — “活度”	(a') — 与不可逆时间中各个部门的增长速度相联系 — 随之引起结构上的改变
整体的	(b) — 世界整体 — 它的各个方面	(b') — 各个集团 — 各种空间 — 划分 — 拓扑学
内生的	(c) — “从内部”自力更生	(c') — 人的各种因素 — 权力
综合的	(d) — 结构间的相互联系 — 结构的稳定性	(d') — 权力 — 系统研究方法 — 控制论

（参见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年 第 180 页。）

但是，对发展问题的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把握只是为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论上的选择，它没有充分考虑到世界观的问题，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其实要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做出选择。即使在方法论方面，它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一是它所讲的整体，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特性；二是它所讲的内生，没有充分考虑到‘世界历史’（全球化）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正面影响；三是它所讲的综合的只限于结构方面，而没有看到内容和结构的辩证法。所有这些情况，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社会发展理论给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遭遇”到的发展难题

现在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不能绕过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或者是赞成或者是反对，总要做出表态。在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也发生了这种‘相遇’的情况。这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情况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外部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影响。其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1960）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另一种形式是欲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来解决发展问题，但是，却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诘难”。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下面，我们就仅以后一种情况为例来简略地分析一下发展理论是如何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的。

（一）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含义

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没有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反而陷入了不发达的境地？这是战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

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一切发展理论都必须对之做出自己的回答。而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于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形成的。

面对上述发展难题,巴兰、弗兰克、桑托斯、卡尔多索、阿明、沃勒斯坦和伊曼纽尔等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将理论斗争的矛盾直接指向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社会学中的线性进化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的矛盾,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由于这些探讨亚非拉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都有一定的了解,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此,有人将他们划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同时,这些理论家也借用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心——边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不再注意考察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问题,认为这时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于是,他们将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专门对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问题进行了自己独到的探讨,认为第三世界已经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部分,其工业化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帝国主义甚至在缺乏通常的殖民统治的情况下,也以各种负面的方式对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产生作用。通过这样的分析,他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样,就导致在社会发展理论中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将社会发展理论中这一流派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们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特点。大体

来说,1.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新马克思主义将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农业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作为了自己的研究重点。2.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视野出发,将帝国主义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将第三世界也看做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3.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阶级结构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是惟一革命的阶级;而新马克思主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贵族化了,农民才是最革命的阶级。4. 从研究的结论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经济的必然性,强调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新马克思主义突出了革命的主观选择性,尤其是突出了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能动性意义。

这样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所“突破”而且鲜明地将自己与西方的发展理论区分开来了,为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二) 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到一系列的因素和问题,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不发达、依附性、世界体系、非资本主义等几个方面探讨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说明第三世界的可能的发展前景的。

第一,关于不发达发展的问题。要制定恰当的发展理论以便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必须要注意不发达的问题,即要对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作出分析和说明。在结构主义者普雷维什那里将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划分为了“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中

心是指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外围是指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中心具有支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便发展中国家为其利益服务，而外围只能起辅助的作用；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在此基础上，弗兰克从对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外围地区的不发达的矛盾的分析出发，对不发达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1. 不发达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2. 二元结构的观点是虚假的，因为在统一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同时形成了发达的先进的地区和不发达的落后的地区；3. 中心——外围（宗主——卫星）的结构广泛存在于一切领域，在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这种结构；4. 外围国家在战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但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发达；5. 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是那些过去同宗主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是最大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和资本的来源。这样，弗兰克就建立起了“不发达的发展”的理论。而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伊曼纽尔的“不平等的交换”进一步对不发达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第二，关于依附性的问题。依附是用来进一步分析和说明中心对外围的支配、外围对中心的依赖而形成不发达状况的一个术语，由此形成了“依附论”这样一种特定的发展理论。依附论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分析和说明依附的一种范式，依附论本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参见表 1—2）。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表 1—2 对依附的看法

非马克思主义 反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 反帝国主义
1. 发展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以及民族主义的自主发展(普雷维什,富尔塔多,松凯尔) 2. 国内殖民主义(冈萨雷斯·卡萨诺瓦) 3. 发展极(安德拉德)	1. 垄断资本主义(巴伦与斯威齐) 2. 次帝国主义(马里尼) 3. 资本主义的不发达的发展(弗兰克,罗德内) 4. 新依附(多斯桑托斯)
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 (卡尔多索)	

(参见美 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第 314 页。)

1. 依附的定义。依附是用来反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统治和隶属关系的一个范畴^①,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 但是结果某些国家 统治国 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 而另外一些国家 依附国 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① 总之,依附是一个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一个总体性的概念 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的方面。

2. 依附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依附形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第 2 版 第 302 页。

式依附大体上经历了“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三种形式(多斯桑托斯)。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依附存在着“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三个层次(阿明)。

3. 依附形成的原因。针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寻求不发达的原因,将不发达归结为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将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看做是一个步西方社会后尘的做法,新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说明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弗兰克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矛盾”出发来分析和探讨了依附的原因。他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如下三种矛盾:一是经济剩余被攫取和占有经济剩余的矛盾。在垄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交换体系中,必然会出现宗主国攫取卫星国经济剩余的结果;二是宗主和外围两极分化的矛盾。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给少数的宗主国带来了经济发展,而给绝大多数的卫星国造成了不发达;三是在上述的既定的结构中变化的持续性的矛盾。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虽然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和剥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统治和剥削却依然持续地存在着。这些矛盾就是造成依附的原因。而多斯桑托斯则从内外因两方面分析和说明了依附的根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是服从于一种同时具有国际性质和国内性质的结构,因而依附是由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体系的既有的方式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结构”。

4. 摆脱依附的方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从对依附的分析和说明中发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认为第三世界应该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既要追赶资本主义,又要超越资本主义,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和发

展理论是不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割断与宗主国的联系，按照独立自主的方式来实现的工业化，才能最终摆脱依附。阿明指出，这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性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过它。”^①而多斯桑托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变革自己参加国际体系的方式和国内的经济结构，才能摆脱依附，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变革参加国际体系方式和国内经济结构的先决条件。这样，“在经济增长和建设世界性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是不会存在矛盾的。”

第三，关于世界体系的问题。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要割断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针对依附论的上述缺陷，沃勒斯坦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概念，用以分析和说明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

1. 所谓的世界体系是指由各种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因素推动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社会体系，分界线、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等就是这样的要素。
2. 在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层次；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边缘国家（指那些以原料生产为主、缺乏强大的资产阶级、具有单一文化结构的农业国家）构成了世界体系的两极，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兼有双重特征。
3. 世界体系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层次，存在着不合理的分工，构成了其经济层面，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就是这种分工的表现，这种分工是不断变动的；在政治上，世界体系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

^② [埃及]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329、331 页。

阶级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也存在着这些集团内部的政治；而在文化上，宗教、科技、教育和法律对中心国家的发展具有最大的意义，但他们对边缘的影响不明显，反倒表现为西方化和现代民族主义的矛盾。4. 在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三种连续的矛盾，一是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它表现为中心对边缘的冲突关系，支配国家对被支配国家的冲突关系；二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会导致资本的危机，还会引发生态危机，使阶级矛盾尖锐化。5.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只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取代它的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这种生产方式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在全世界的层次上实行“计划”消除了世界贸易中的不平等的交换。

可见，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的呼声，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看法，具有明显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他们划入“马克思主义”阵营。

（三）新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尽管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他们的理论是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性的，其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们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诘难。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是无效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停留在竞争性的问题上，而没有涉足垄断问题。例如，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分析，仍然依赖于竞争经济的假设，他们没有试图应用暗含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运行的原理和运行的规律去探讨垄断支配的后果。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就试图以垄断为中心来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

运行的规律。其实，不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为完全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而且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动向。

第二，他们强调贸易和交换，而忽视了对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分析，在一定的程度上模糊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本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割裂了这种辩证关联，而把贸易和交换等非生产性的领域看得比生产性问题还重要。例如，伊曼纽尔认为工资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先于其他事物；同时，交换也比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重要。这种看法之所以会模糊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就在于利润的来源不是交换，而是在生产领域对劳动力的剥削。事实上，是生产决定分配和交换而不是相反。

第三，在对不发达和依附的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新马克思主义只注重地区剥削而忽视对阶级剥削的分析和说明，将发展中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希望寄托在了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身上。在对不发达和依附形成的原因和实质的剖析的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只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从对“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矛盾或者是“中心——边缘——半边缘”的三元结构矛盾等外部的地区因素上来分析和说明不发达和依附的社会性质，没有揭示出其阶级实质。尽管阿明也提出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概念，但他没有从生产资料的占有的角度来揭示阶级的实质，而只是从分配着眼来考虑问题。与此相应，在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让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来充当领导者，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这样，他们就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

第四，在对摆脱依附方式的看法上，新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外围

(边缘、半边缘 与中心的断裂 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辩证关联。新马克思主义揭示出了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垄断的实质，认为这是造成不发达和依附的基本原因，于是就得出割断的结论，鼓励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他们就从一极跑到了另一极，没有充分估计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正面影响，没有充分估计到全球化所突出的对外开放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价值，没有充分估计到生产力移植、科学技术移植、教育移植和管理移植在缩短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诘难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做出明确而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有社会发展理论吗？假如存在着这样的理论的话，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于今天的发展问题是有效的吗？假如这种理论是有效的话，那么，应该如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推进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对这些挑战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进程、构成和系统性

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问题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一问题是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紧密相关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突现出来的。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关于东方社会的性质、结构、现状和前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系统性学说 它恰好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同等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广泛地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 是隶属于马克思两个最伟大的科学成果的 是马克思揭示出的

“两个必然性”的具体、生动的体现。同时，它又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专门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晚年，更是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集中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将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东方社会的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大纲。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到特殊、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早期阶段（4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世界历史”的概念来分析和说明现代社会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没有超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没有注意到对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的研究。

第二 中期阶段（50、60年代）。马克思主要以英、法、德等先进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和解剖的对象，运用哲学思辨和经济学分析的手段，探讨了西欧的历史发展、现实的资本主义状况、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方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统一性和必然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由此，在奠定科学的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基础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由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系统发生、协同演进的，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情况出发，马克思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景象。这样，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科学分析和说明，例如，马克思在发现唯物史观、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联，密切关注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猛烈地抨击了西方殖民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特定的概念来

规范着东方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科学地说明了所有制形态更替的不同形式和过程。

第三，晚期阶段（70、80年代）。随着实践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认为对社会发展问题必须进一步做具体性的分析和说明，应该从客观性和主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选择性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应该看到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70年代开始，马克思凭借着对人类学成果的敏锐的哲学洞悉、对东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材料的深刻的经济学把握、对东方学成果的独到的民族学领悟、对世界历史步履的广泛的史学追踪，把视野投向了广大的东方社会，主要以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和广大地区的东方社会为背景和解剖对象，尤其是以俄罗斯为典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东方社会的性质、结构、现状和前景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揭示了东方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跨越式的社会发展的设想，这样，马克思就在与史前社会理论的互动中，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东方社会理论。正是由于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和探讨，因此，马克思反过来才进一步科学地发现和说明了一系列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问题，如，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有制的形式和演变、社会结构的共性和个性，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展开，原始积累的国内外形式，殖民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剩余价值的扩展，垄断、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非西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道路、方式，等等。

这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后，就建构成为了一种科学的艺术的整体。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从多个方面展开了对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规定，最终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这样一个专门的领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了一个科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的。具体来看：

第一，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第一个层次和第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社会发展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由社会形态的更替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进步过程，“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将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新的基础上开始。”^① 这里理解的社会发展是最广义的，是社会进步的同义语。在这个层次或部分中，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要探讨了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进步的道路和方式问题，科学地规定和揭示了社会主体、社会客体、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活动、社会的阶级构成及其分化和斗争等一系列因素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说明了社会进步表现出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5页。

一次科学、系统地说明了广义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条件、动力、方法、矛盾、演进、途径、机制和方向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在对社会发展的把握中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事实分析），注意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和特征（矛盾分析），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形态的更替（系统分析），注意区分社会的物质因素和意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结构分析），注意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阶级分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了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为具体的或特殊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发展理论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神圣家族》（184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1857）和“序言”（1859）、《资本论》的“序言”（1867）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系列著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代表作。

第二，史前社会理论。人类社会的最初状态本来是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的（史前社会），那么，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史前社会理论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实证材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不适当地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不确定科学的史前社会理论，我们就既不可能走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处，也不可能确定东方社会发展形态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性。史前社会理论就是关于史前社会（原始社会）的历史、性质、结构和演化问题的学说。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发展，人类学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人们认识史前社会提供了较为翔实、可靠的材料，从而打开了一扇进入史前社会的大门。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所有制形态的更替问题进行过深入的专门研究，但是，科学的史前社会理论的基础是由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1879—1882）中首先奠定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部分地完成了其科学化和体系化的工作。史前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它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这就是，只有科学地把握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的逻辑，进而才能为找到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同时，它也为分析和说明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解剖学”的对象，因为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在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没有史前社会理论提供的互补性作用，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东方社会理论。

第三，西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所谓的西方社会理论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背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为解剖对象，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质、结构和未来的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它主要是以经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凭借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的方式，一方面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运用，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的“实验室”中也得到了全面的检验和发展，使它更加科学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以哲学和经济学相交织的方式，不仅科学、系统地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质、现状和发展的方向，而且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进一步科学、系统地说明了广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动力、道路和方式以及“两个必然性”等一系列的一般社会发展理论问题。这在于，马克思是在事物发展的典型形态上对事物进行分析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

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 这样，这种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就具有了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以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为起点，经过《共产党宣言》（1848）等一系列的著作，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在系统地表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科学发现成果的同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第四，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次深化和扩展，它主要以东方社会为背景，以印度、中国和俄国为解剖的对象，在探讨东方社会的历史、性质、现状、结构和演化的同时，主要研究了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现代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 40 年代，马克思主要是在研究所有制形态的演化中，开始注意到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但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趋向仍然是走向“世界历史”，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的局面，《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这个时期关于东方社会问题思想的代表作。二是在 50—60 年代，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开始逐步获得独立的意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给予了专门的关注：（1）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要求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进行专门的研究，尤其是随着波兰和爱尔兰的独立和解放问题的突现，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爆发，英国关于东印度公司问题的辩论之声的鹊起，使马克思把视线转向了东方社会，尤其是专门论述了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92 页。

和印度的社会发展问题；(2)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唯物史观逻辑的展开，在对所有制形态和社会形态更替问题的考察中，马克思在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的同时，也对南方斯拉夫、日耳曼、爱尔兰和南亚的农村公社进行了研究。这样，东方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总体中的特殊地位就开始得到确立。三是在 70 年代以后，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为了有效地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深化《资本论》的逻辑，使唯物史观进一步成为一个科学的和艺术的整体，马克思开创了东方社会理论这个专门的科学领域。它是以两种形态表现出来的：(1)东方社会理论的人类学形态。马克思经过对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成果的专门研究（1879—1882）形成了篇幅浩繁的科学巨著“人类学笔记”（又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对东方社会村社的历史、性质、现状、结构和演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2)东方社会理论中的俄罗斯问题。在回答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以俄国为例，要求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了东方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景，提出了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设想。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一系列的通信和札记中。这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在根本上得到了确立。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大纲。这是最狭义的或最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理论。

第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问题的科学学说，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实现这一广义社会发展大势的主题。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简称为

“巴黎手稿”开始经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到晚年的《法兰西内战》（1871）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都是论述这一重大的广义社会发展趋势问题的。

只有把东方社会理论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中，我们才可能确立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从而才可能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价值导向。这样，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尤其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在回答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诘难”、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就具有了典型的意义。

（三）马克思晚年思想在其东方社会理论中的总体地位

所谓的“马克思晚年”不是一种人物活动历史的自然分期，而是马克思在 70 年代之后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理论和实践的断代。它表明马克思在自己生命活动的最后几年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新的发展。马克思晚年思想就是这种空前高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成果的高度的科学的总结和深化，同时，又指导着科学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明前程。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疾病严重地折磨着马克思，他没有什么像《资本论》那样的鸿篇巨著公开发表，于是有人就将马克思晚年看做是一个等待死亡的过程，甚至有人断言马克思晚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困惑，对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在实际生活中的胜利产生了动摇。但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马克思晚年一系列著作手稿的发现和公开发表，这些神话都不攻自破了，全世界又面临着一个马克思重新“降生”的问题。在马克思晚年的生涯中，思想不仅没有枯竭，而且思绪如激情般地喷涌而出，他研究的领域

和范围进一步扩展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篇章，东方社会理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的。

从实践上来看，70年代之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发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实践结果，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在这时的主要实践活动有：1. 为巴黎公社出谋划策，科学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之后，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马克思在对公社经验的总结中，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一伟大的科学著作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特征进行了科学的概括。2. 继续领导第一国际的活动，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一步的蓬勃发展。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和推广的过程中，马克思继续领导着第一国际的活动，同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马克思就使国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3. 指导各国的建党活动，推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马克思对德、法、英、美等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指导，对各种错误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评，在领导德国党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又撰写了一部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科学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阶段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她要经历初级社会主义和高级共产主义两个阶段，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并科学地展望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趋势。此外，马克思还参加了反对杜林的斗争，参与了《反杜林论》（1877—1878）的写作，扭转了“非常法”期间造成的党内的混乱，为

党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尤其是巴黎公社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的问题，要求马克思进一步做出科学的回答如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等。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的特有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规定性。

从理论上来看，70年代之后，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化《资本论》逻辑展现唯物史观的科学的艺术的整体性的过程中，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马克思晚年的主要的理论活动领域和科学成果有：1. 继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的同时 将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为重点 开始关注俄国社会问题，集中地论述了自己的第二个伟大的科学发现。除了继续撰写《资本论》后几卷外 马克思在批判讲坛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撰写了《评阿·瓦格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1880），更为集中系统简练地阐述了自己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同时论述了劳动、价值和自然等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问题。2. 关注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独立的数学研究，继续探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密切注意着自然科学的新进展 阅读了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地质进化论、有机化学、电学、农学等广泛领域的科学著作 电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实用成果 高压输电线路 更是使马克思感到由衷地喜悦 同时 马克思还独立地进行了高等数学方面的研究，《数学手稿》（约1878—1882）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3. 借鉴和吸收了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成果，开拓了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新领域 深化、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通过摘录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

和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就形成了“人类学笔记”这样一部篇幅宏大的科学巨著。《人类学笔记》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的，“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主要是论述史前社会问题的，构成了马克思的史前社会理论的主干；“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菲尔笔记”是论述东方社会问题的，是以人类学形态表述出来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晚年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4. 潜心研究了世界历史，进一步揭示了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完善、丰富和发展了私有制社会的理论。科学巨著《历史学笔记》（1881—1882）构成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个辉煌的篇章。这一笔记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第一册论述的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14世纪初的1400多年的历史，包括从奴隶制和罗马帝国到意大利封建制度形成时期的历史；第二册论述包括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前70年左右的约170年的历史，考察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衰落动摇的过程；第三册是论述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70年代的历史的，考察了资本主义因素是如何在封建社会中萌发和进一步发展的；第四册记述了16世纪的最后25年到17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重点考察了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反对教皇势力和封建制度的“三十年战争”。可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①所有这些就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和逻辑的规定性。

在实践和理论的这种平行发展的同时，又有另一种类型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7—8页。

会发展的问题摆在了马克思的面前。这就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俄罗斯的社会发展问题也成为了马克思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晚年的“俄国社会问题札记和通信”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主要是指：1. 针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 马克思撰写了《给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 提出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 2. 为了答复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的请求，在四易其稿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1881) 中阐述了东方社会走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和方式等问题。 3. 马克思利用俄罗斯官方的材料和其他作家的著作 考察了俄国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情况 形成了《关于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1881—1882)。 4. 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1882) 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东西方革命的互补对于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制约性问题。而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就是其晚年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将这四个重要的科学文献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看 就可以发现 东方社会理论的完整轮廓已经显现了出来，它们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狭义）的大纲。可见 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既延续、发展了自己 70 年代之前的思想 也成为其晚年思想整体中的一个内在的环节。

这样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就形成了一个科学、艺术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参见表 1—3）。作为狭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是现代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表 1—3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和构成及其系统性

			马克思著作			恩格斯著作	
			早期	中期	晚期		
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	原始公有制	史前社会理论		1.《〈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资本主义生产前的各种形式》 3.《资本论》	1.《摩尔根笔记》 2.《梅恩笔记》 3.《拉伯克笔记》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奴隶社会		1.《德意志意识形态》 2.《资本主义生产前的各种形式》 3.《资本论》	《历史学笔记》第一册		
		封建社会		1.《德意志意识形态》 2.《资本主义生产前的各种形式》 3.《资本论》	《历史学笔记》第一、二册		
		资本主义社会	《巴黎手稿》	《资本论》及其手稿	1.《历史学笔记》第三、四册 2.《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社会理论		1.《德意志意识形态》 2.波兰、爱尔兰、中国和印度问题评论 3.《资本主义生产前的各种形式》 4.《资本论》	1.《柯瓦列夫斯基笔记》 2.《菲尔笔记》 3.“俄国问题札记和通信” 4.“晚年东方学和其他民族问题笔记”	《论俄国问题》及其“序言”、“跋”	
		未来公有制	社会主义			1.《法兰西内战》 2.《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主义	《巴黎手稿》	1.《共产党宣言》 2.《资本论》	1.《法兰西内战》 2.《哥达纲领批判》	
一般社会发展理论			《巴黎手稿》	1.《德意志意识形态》 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	1.“人类学笔记” 2.“俄国问题札记和通信”	1.“历史唯物主义通信” 2.《论俄国问题》	
社会发展的动力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数学手稿》	《自然辩证法》	

四、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 社会发展理论的“契合”

在确定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具有的社会发展理论意义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在方法论上要确定东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以下几个疑问：一是在有些论者看来，不能将俄国社会作为东方社会的典型和代表，因为俄国根本不具有印度和中国那样的特点，因而，将马克思的俄国社会问题的论述作为东方社会理论的典型是不能成立的。二是在这些论者看来，也不存在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问题，因为东方社会理论割裂了“世界历史”的完整性，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在这些论者看来，承认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归宿的普遍意义，似乎承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就是要否定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样，既然东方社会理论都成为了一种“主观的虚构”，那么，就不能将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作为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同等意义的东西了。事情果然如此吗？在我们看来，上述疑问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我们在确定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社会发展理论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必须要对上述疑问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一）俄国问题在东方社会问题中的典型地位

马克思的俄国社会问题的理论能够作为东方社会理论的典型吗？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俄国是一个东方社会国家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按照东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历史、现状做出回答，而不能用以以后历史发展的状况来超历史地进行解释。我们知道，

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总是通过解剖典型对象把握研究的客体的，进而来考察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问题。在研究西方社会发展问题时，马克思是以英国作为典型对象的。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时，马克思是以俄国作为典型对象的。在马克思看来，通过对俄国问题的考察、分析和说明，就可以打开通向东方社会的大门。

第一 从历史状况来看，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社会结构上具有同构性。

所谓的东方社会也就是指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结构的社会。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其内含却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由此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存在村社制度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只要在社会结构上具有这三个特征，那么，它就是东方社会或东方国家。而俄国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的前后基本上具有这种社会结构。1. 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东方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存在着土地私有制。马克思在 1853 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东方社会的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①。而通过对俄国社会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同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晚年指出：“俄国较为完整地保持着公社土地所有制，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仅仅考察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么一看就很清楚，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② 2. 从社会制度来看，东方社会存在着村社制度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在 1853 年论述印度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从远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 第 2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8 页。

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① 在俄国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这就是由村社制度造成了公社之间的孤立和封闭，“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②。3. 从政治制度来看，东方社会存在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马克思在 50 年代指出：“在埃及、厄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③。这样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宗法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君权统治的局面。在俄国，沙皇更是将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极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④ 同时，沙皇也成为了“世界宪兵”。由此来看，俄国的社会结构与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同构的。当然，俄国和他东方社会在社会结构上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社会形态上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尽管从历史上来看，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独立的或平行的，但是随着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扩展，不管是俄国还是其他东方国家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来了。在其他东方国家，由于西方的侵略、对外贸易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绝大部分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形成了依附的格局。例如，在印度，随着英国当局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1 页。

行所谓的马德拉斯制度(土地重新登记制度)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就在一定的程度上瓦解了“,结果使外来分子,大多数是城市资本家,侵入了农村公社”。^①同时,也使得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被瓦解了“,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②而中国则成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俄国没有成为外国的猎获物,但是,它通过农奴制改革,使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的强制性的作用,不可能‘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③这就是说,其他东方国家以一种被迫的方式开始被卷入到了‘世界历史’的格局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的程度上开始解体,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灾难前景;而俄国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以一种主动的方式开始了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开始了解体,也同样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资本主义灾难前景。两极相通,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它们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都面临着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即从传统社会中走出来,在经受工业化的洗礼的过程中,迈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社会形态的问题上,可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经受资本主义的‘磨难’和‘耻辱’,走过‘卡夫丁峡谷’,或者是在仍然保留的传统公有制的基础上,大胆、主动地吸收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取得的物质成果、技术成就,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而它们究竟走哪一条道路,都取决于内外因素的互动,单纯地强调‘世界历史’的作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99、30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很容易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倒向“外因论”；而一味地突出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也是片面的。

可见，俄国社会就是东方社会的缩影，不能因为它在地理上位于欧洲就将它划入西方社会的范围中；也不能由于资本主义在以后的俄国社会中得到了比其他东方社会较快的发展，而否定其当时具有的典型意义，不能用现实去强制历史，更不能用未来去强制现实；也不能用列宁的思想去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使马克思的思想“列宁化”。我们只能从当时的俄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去理解俄国在分析和说明东方社会过程中的典型意义，也只能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实际出发来考察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一些理论家的看法可能要更为中肯一些。例如，有人认为：“俄国在马克思总的战略中的地位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其焦点在于俄国特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形态。马克思同时代的俄国人——不仅是马克思在俄国的信徒们——都极其清楚地认识到：在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要比当时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大得多。在一切现存的社会中，不论它们的经济水平如何，都存在着各阶级间的利益的不一致，而俄国也存在着一种相类似的结构，但它并不取代阶级间利益的不一致。就国家制度而言，马克思认为，俄国问题的最直接的表现是这个国家作为欧洲秩序的巨大支柱的地位，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搬掉这个支柱。同时，由于在马克思时代，俄国实际上缺少有影响的工业无产阶级，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不得不考虑到提出革命的俄国可能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和他所希望的西方无产阶级最终要走的道路不同的道路。马克思在处理俄国问题的这两个方面（而“官方俄国”和“非官方俄国”方面）中逐渐形成的战略，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务实的革命家的

灵活性。”^①当然 西方学者是从资产阶级的‘西方中心论’来看这一问题的。

（二 东方社会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独特地位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意义吗？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东方社会能够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道路吗？在一些学者看来，是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社会发展之路的 因为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 东方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这个总体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承认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就是要否定‘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就是要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其实，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大的曲解，因为马克思在考察任何一个问题时总是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②这就是说，马克思在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在注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是十分强调要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的。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思更是如此。

第一，马克思要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东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反对运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来套用东方社会的实际。

针对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将东方古老国家的公社土地所有制

^① [澳]伊恩·卡明斯：《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8 页。

的瓦解看成是与西欧封建化同样的过程的做法，马克思根据事实材料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认为这些地区的土地所有制瓦解的过程不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化，不能将二者做简单的类比。柯瓦列夫斯基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来看待东方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认为在墨西哥和秘鲁进行的定期分配土地的做法开始了不动产的封建化过程，印度农村公社的解体也达到了西欧中世纪的发展水平，印度在 8 至 18 世纪实行的赠军功田（采邑制）公职承包制、荫庇制（依附制）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对此，马克思指出，柯瓦列夫斯基对东方社会所谓的封建化过程的描述显得非常拙劣。菲尔在论述东方村社中的家庭和公社的关系时，把东方的公社和社会的关系看成是封建主义，马克思讽刺地说：“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①这样，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社会性质决不是封建主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封建主义呢？马克思揭示出了封建主义的三层含义：一是从土地所有制关系来看，在西欧，在承认全部土地归封建主所有的前提下，实行领主逐级分封；二是从社会的基本组织来看，在封建领主所有制的基础上，封建庄园代替了农村的马尔克公社和自由农民的家庭组织，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三是从社会的政治结构来看，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把政治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而为一，封建割据加强，中央权力被削弱。而在东方社会却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是从土地所有制来看，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例如，“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②二是从社会的基本组织来看，农村公社是东方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

社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在欧洲与东方不同，代替了实物贡赋的是对土地的支配——耕作者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沦为农奴或劳工”^①，在东方，在村社制度下，人民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贵族阶级的首领们的权利之争主要是争夺卡查里—塔比尔的控制权”。^② 三是从社会的政治结构来看，在东方社会不存在分封权力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专制主义是东方社会特有的现象“，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③ 显然，在欧洲封建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地逐级分级制、领主庄园制和分级割据状况的现象，同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特殊社会结构，不能做简单的类比。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可能是雷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套纷繁复杂多变的实际，不能不加分析地就用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来分析和说明东方社会的实际。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应该充分考虑到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当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道路的问题就已经在理论上得到确定了。

第二，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是持十分严厉的批评态度的，强调对“世界历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也应该做出具体的分析。

“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在西方社会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殖民主义手法不断地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处处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因此，“世界历史”在整个

①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4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274 页。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输入和冲击，破坏了东方社会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封闭性、停滞性和落后性的特点，造成了东方社会发展史上一次惟一的革命，从而结束了民族的历史、封闭的历史。另一方面，世界历史是凭借殖民主义等卑鄙的方式进行的，在刀与火的洗礼过程中，尽管可能会给东方社会带来新的生机，但是，它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靠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也凭借这种方式维系着自己的霸主地位，形成了“中心——外围（“宗主——依附”）的结构。这样，它在东方社会又开启了灾难的历史、耻辱的历史。因此，东方社会在对待“世界历史”（全球化）的问题上就应该抱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抵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培植的大小土地私有制是真正荒唐的经济实验。他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政治和财政的考虑，任意歪曲公社的性质，蓄意破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做法。梅恩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为英国的殖民主义辩护，把由于殖民主义的侵入造成的公社所有制的衰落看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而事实上，由于殖民主义的侵入和破坏，严重地损害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荒年更加频繁，灾情更为严重。同时，殖民主义也破坏了当地尚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使人民无所适从。由此可见，西方的殖民主义行为使东方的人民处于了水深火热之中，不是使他们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他们是造成东方人民备受苦难折磨的罪人，是造成东方社会衰落的罪魁祸首。马克思主义正辞严地批判了梅恩的伪善面孔，认为他是在为英国的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的辩护士，是不惜伪造历史的“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

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① 后来，马克思仍然坚持了对梅恩的这种批判。1881年2月至3月间，马克思在给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写到：“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② 这决不是浪漫主义主观情绪的流露，而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洞悉而揭示出来的一个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世界历史（全球化）”就不能抱全盘肯定的态度，对之也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了极个别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借口，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全球化的“陷阱”。当然全球化还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发展。

第三，马克思在社会发展理论方法论的层次上，已经考虑到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十分强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的问题。

马克思看到，由于东西方社会结构和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不尽一致的，因此它们的发展是各具特色的，因此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0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的。例如，马克思在反驳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时指出：“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在于，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放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灵魂，而且应该从对矛盾特殊性的把握中来寻求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样，我们就不能教条主义地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意义，将它作为包医百病的万能药方，而是应该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要求我们应该注意：“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这就是说 承认社会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41—342、342 页。

发展问题上的特殊性、确认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可能性，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 不论是西方社会 还是东方社会 最终都要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经过社会的全面进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所谓的东方社会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处在“世界历史”环境中的东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选择方式。由于这种选择是在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因素的坐标系中进行的，因此，它与西方社会的方式就是不同的，如，保留传统的公有制和人道主义因素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选择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取得的先进的生产力成就、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的经验，跨越作为一个剥削制度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和需要的基础上，通过革命的方式（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及其二者的互补），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上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总之，东方社会理论不仅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没有东方社会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抽象的历史哲学，而不会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东方社会理论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先导地位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发展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吗？在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之后，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相一致的？二者在研究的范式上是相同的吗？我们

认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事实上已经奠定了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的基础。

第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 从我们前面对“东方社会”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概念的分析来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基本上是重合的，换言之，二者研究的问题是基本上一致的。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着眼于发达和不发达的矛盾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或者是从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出发来考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来考察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以及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的。这就是说，二者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重合的。

1. 马克思所讲的东方社会就是现在所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东方社会在南北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历史上的东方社会演化发展的结果。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历史与现状的关系。 2. 历史上的东方社会之所以处在了落后的境地，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造成的；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造成的。不论是落后还是贫困 都是在“世界历史（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当然 这并不是要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坚持“外因论”。 3. 历史上东方社会摆脱落后的方法在于发展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没有建立起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仍然面临着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问题。当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仍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或本质上的区别的，但是，这种差距或区别不是表现在研究对象内含或外延上的差距或区别，而是表现在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式上的不同，马克思

认为东方社会摆脱落后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现代化，同时要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而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或者将资本主义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或者是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依靠力量。

撇开上述这些因素 最保守的看法也应该是“俄国农民公社问题因而被马克思用来作为一种工具，以考虑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那一代人来说是崭新的；而今天人们则会很轻易地认识到 这些问题关系到‘发展中社会’、‘现代化’、‘依附性’、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在整个‘边缘’地区的不平衡传播。在马克思的新的认识中包含了这些内容 但是没有一个得到充分的解决。”退一步来讲 即使马克思真的没有充分地解决这一问题 也是由当时的时代发展的实际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来解决现实问题。

第二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就在于它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一系列的转换，这种方法论上的转换为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供了可行的工具和途径。而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革命性的成果，它是作为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的转换在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具体来讲：^①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已经改变了过去只注重抽象性研究的做法 而是转向了实证性的研究 力求将理论抽象和实证研究统一起来。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恰好开启了这种

① [英]特奥多尔·汕宁：《晚期马克思与俄国的“资本主义边缘”》，《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十五辑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第 259 页。

研究的先河。马克思晚年是这样概括自己的研究方法的：“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①具体到东方社会理论上，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时，一方面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审视东方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十分重视实证科学的成果的应用。而马克思晚年之所以注重对人类学、统计学、史学和东方学成果的运用，就是要弥补单纯理论抽象研究的弊病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东方社会问题的科学成果。

2. 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已经改变了过去只重视演绎性的做法，而开始转向归纳性的研究，力求将演绎和归纳统一起来。而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因为他将作为归纳和演绎基础的个别和一般的关系看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时，一方面十分重视作为整体的东方社会的一般规定性，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的一般性的分析范式对各个东方国家做出了统一性的把握；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看到了各个东方国家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尤其是突出了俄罗斯不同于其他东方社会国家的特点。这就是，其他东方国家是被西方社会以殖民主义的方式纳入到‘世界历史’中的而俄罗斯却避免了这种后果。

3. 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线性进化论的模式，转向了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告别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开始向辩证思维复归。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已经在哲学上确立了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意义，“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

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 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① 在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所强调的“世界历史”问题就是这种系统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同时 马克思将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看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变迁过程 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但是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仍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将资本主义仍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前景。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具有的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又超越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可见 马克思‘晚期的著作尽管没有完成 但它的内容丰富 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的方法被用于探索世界图景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它的不那么资本主义的伙伴，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一些被我们的时代认做属于自身的问题和疑虑”^②。

第三 从研究的基础来看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尽管没有彻底摆脱唯心史观的影响 但是 在社会发展理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 他们开始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审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基础上的。

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统一的过程。 1. 在现代化的起点问题上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已经认识到 现代化不一定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自己的历史进程，它也可以在部族集团、城邦社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农民社会开始自己的历程 也就是说 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9 页。

② [英] 特奥多尔·汕宁：《晚期马克思与俄国的“资本主义边缘”》，《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十五辑 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第 260 页。

可以开始于发展程度和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①。这一切当然是由“世界历史”的出现造成的。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恰好就是从“世界历史”出发来看待现代化的起点的，肯定了具有特殊社会结构的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前景和可能性。

2. 在实现现代化的方式问题上，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不再一味地强调实现工业化方式的划一性，而是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特殊的制约性问题，“工业化是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但它对各个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并不相同”；目前在某些国家内部发生的过程已经阻碍了其工业基础的发展，特别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以，“研究一个社会本身的特点对其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②。而马克思所强调的东方社会的跨越式工业化的可能性，就早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3. 在现代化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方向上，一些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不再十分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意义，而是认为现代化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种现代化模式都有自己的价值。尽管这种观点仍然有“趋同论”之嫌疑，但它毕竟承认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成为可能和现实的，但是，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的前景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只有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才是有希望的。这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进一步超越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总之，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在研究的范式上是与现代社会

^① 参见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发展理论‘契合’的并且超越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弊端 成为了惟一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可见 事实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卡尔·马克思及其亲密追随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诠释家们，在考虑当时的不发达国家问题时决不是一清二楚的。他们观察的主要领域和思考的主要历史题材是英国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最初在欧洲大陆上所采取的形式。只有很少一些著述、一些短篇论文和研究报告涉及到印度和中国”；可以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夺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性的抨击，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什么贡献’^①。这种看法不是出于偏见，就是出于无知。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狭义）它在分析和推进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那么，就让我们走进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深处吧！让在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去完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去推进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吧！

^①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68、79 页。

第二章 东方社会：马克思 晚年思想的走向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

.....

.....这时马克思却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上，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已经大大扩大了。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①

——恩格斯

在继续领导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过程中，马克思在晚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毕生从事战斗的“第二个战场”他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实际和人类知识进步的趋势，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研究内容 使自己理论研究的深度进一步加深了、广度进一步拓广了、高度进一步提高了；“晚年马克思”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新篇章。而探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确立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地位 就是整个“晚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 第 399—400 页。

一个重要的趋向。通过东方社会理论这个“窗口”，马克思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而独特的前景。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践动因

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理论决不是一种纯学究气的探讨（如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梁赞诺夫认为“人类学笔记”具有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也不是他对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失望或绝望的情绪，而将希望寄托在了东方社会的革命上。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的，仍然是为了有效地推进“两个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趋势。这在于整个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东方社会的响应和支持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而东方社会的革命又成为了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和突破口。马克思晚年就是从东西方社会及其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的高度来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

（一）回答巴黎公社的难题 探讨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在总结公社经验的过程中，关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尤其是国际范围内的同盟军问题被突现了出来，马克思晚年就是在回答巴黎公社提出的这个难题的过程中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

1871年3月18日英勇的巴黎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革命成功之后，巴黎公社履行了政府的职能，宣布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主要有：废除了旧的

行政的和司法的官僚政治，建立了一整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行政机构 废除反革命的旧军队 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武装——国民自卫军 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各级领导人大都由普选产生 公职人员对选民负责 不称职者可以随时被撤换 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活动方面得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宣布政教分离 取消公职人员的高薪制 领取与工人同等的工资 采取了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措施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如免缴部分房租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对工厂实行民主管理，将资本家丢弃或封闭的工厂交给职工会。更为重要的是，公社委员会将重要的职务委任给数千工人。由此可见 这是一次全新的革命 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巴黎工人阶级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尽管国际没有去动一个手指头 但是 巴黎公社革命确定无疑地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产物。这在于 第一国际成立之后 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一些先进的法国工人开始认识到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巴黎公社正是这种影响的产儿。同时，公社成立之后，马克思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马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洞察力充分地估计了巴黎公社的伟大业绩，批评了对巴黎公社的错误看法。在许多国家里，马克思成功地发动了支持公社的广泛活动。马克思为公社的事业殚心竭虑，为公社的前途和命运思索着，与恩格斯一起向公社提出了不少自己的建议。马克思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与公社的领导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但是，1871年5月6日，法国资产阶级外交部长与普鲁士口头签订了合伙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秘密协定。马克思通过在德军方面的内线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通知了公社的军事领导人。

1871年5月21日 巴黎公社面临着紧要关头 凡尔赛军队开始大

举进攻巴黎 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奋战之后 公社于 28 日失败了。尽管公社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十天，但是，公社的原则却是永存的！

正当各国资产阶级、欧洲各国政府和各种反动报刊利用公社的失败大做文章，肆意诽谤污蔑国际工人协会和公社战士的时候，国际总委员会于 5 月 30 日发表了由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通过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法国“国防政府”和梯也尔卖国投降、挑起内战的实质和经过，歌颂了巴黎工人阶级在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谦虚、勤劳和忘我的高尚品质，使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科学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纲领性文献之一。

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过程中，一些新的重大的实践课题摆在了马克思面前，要求马克思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回答。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突现出来的。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看，尽管导致公社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同盟军是导致公社失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而这里的无产阶级同盟军已不能再局限于一国的范围内来理解了，而应该着眼于全球的范围中来考虑。早在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根据 1848 年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如果建立了工农联盟，就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合唱，否则的话，就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巴黎公社革命不仅证实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且提出了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具体来看：一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要唤醒农民，没有农民的支持和配合，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在巴黎之外的外省爆发相应的革命，公社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其

实在公社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提醒公社应注意争取外省和农民支持的问题，以便避免孤立无援的状态。二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配合和支持，否则，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不可能成功。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①。其实，在公社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马克思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建议公社领导人除了要搞好国内的事情外，还应在国外进行必要的工作，以争取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你们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快做你们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②。而这里的“一切事情”就应该起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世界范围内的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三是从公社失败的直接原因来看，正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和普鲁士的联合镇压才导致了公社革命的失败，而在这种联合镇压的过程中，德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并没有出来阻止反革命的镇压活动。而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就在于公社没有在国外进行相应的工作。这样，巴黎公社不仅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再次突现了出来，而且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程中，之所以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由“世界历史”的整体格局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在大工业、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等因素的促进下，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 and 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在一国的范围内形成了农村从属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 第 18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第 226—227 页。

城市的局面一样 在世界的范围内 形成了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落后民族从属于先进民族、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的局面 由此 世界整体的格局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它也影响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和方法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古老的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一旦接触之后，二者必然会发生矛盾、对抗和冲突 这样 这种矛盾、对抗和冲突发展的结果 就会极大地促进“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进程不仅会影响和决定着东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命运，同时反转过来也会进一步影响西方社会，也就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样会影响和决定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命运。这样一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就交织在了一起，西方社会同东方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这样 不仅民族矛盾的解决要取决于阶级矛盾解决的历史进程 而且阶级矛盾的消除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要依赖于民族矛盾的解决程度。这就是“世界历史”格局中的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之间的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正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以便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过程中，马克思为了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开始在“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将理论的视野转向了东方社会。马克思客观而具体地对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走向进行考察和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正是要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进行理论上的准备。当然，东方社会的未来和命运就是这个过程中的必要的一个环节，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就是这个整体中的特殊性。

（二）解答东方革命的疑难 探讨东方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巴黎公社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了迅速而较为广泛的传播，俄国革命也在有声有色地发展着。这种情况就引起了马克思的沉思，为什么会在反动的俄国形成革命的可能性？如何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东方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呢？这是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又一个重大的实践动因，而俄国问题就是一个“窗口”和“突破点”。

第一 当时的俄国处在整个世界发展的“火山口”上 内外矛盾的交织将俄国推进到了革命的前夜。这就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去思考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及其在整个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一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1861年，俄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 但是 这次改革并没有使俄国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反倒加剧了社会矛盾。这在于“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 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 并且从那时候起 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 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 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 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 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① 由农奴制改革引起的社会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67—768页。

盾的激化 就在俄国形成了革命一触即发的态势。

二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俄土战争使这一矛盾更为激化，使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为了继续争夺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地区，俄国和土耳其于 1877—1878 年再次进行了由来已久的俄土战争。这次战争使俄国处于了内外交困的状况之中 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由于土耳其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 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 沙皇、王位继承者和其他六个罗曼诺夫) 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因此 马克思在 1877 年 9 月 27 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满怀希望地说：“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向是欧洲反动秩序维护者的俄国爆发革命可能性的问题、这种革命对西方革命影响的问题进行探讨 就成为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就在俄土战争爆发之前 马克思在 1877 年 4 月 21 日给白拉克的信中向他建议，在德国工人报刊上发表几篇关于东方政策的详细文章，并坚决反对德国政府支持俄国东方政策的计划。俄土冲突发生后，马克思加紧了对东方问题的研究，阅读了斯雷德的《土耳其和克里木战争》一书以及其他著作。马克思的夫人在给左尔格的信中 向人们讲述了马克思当时研究东方社会问题的情况：“至于我的丈夫 他现在正认真研究东方问题，并且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对于所有那些在关于暴行问题上进行投机的基督教骗子们和伪君子们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②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第 275、468 页。

第二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俄国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这种情况促使马克思去思考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与东方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情况来看，《共产党宣言》是不少人平时喜爱的读物，《资本论》也是一切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 特别是《资本论》的出版在俄国的革命青年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刚问世不久，在柯瓦列夫斯基的图书室里就入藏了此书。俄国经济学家季别尔在其著作《李嘉图的价值和货币的理论》中引用了《资本论》的材料 另外 在他关于西方工人状况的文章中 也引证《资本论》。而俄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逊(1844—1918) 则积极主动地为促成《资本论》译成俄文而四处奔走。1872 年 3 月 27 日(俄历)，《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彼得堡出版 印数为 300 册 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资本论》第一卷这么快就传到了反动的俄国 并且译成俄文出版 连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想到 他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说：“几天以前 彼得堡的一位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 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 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①。其实 马克思这些著作在俄国的传播过程 就是一个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俄国广大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正是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普列汉诺夫(1856—1918) 和列宁等人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第 554 页。

这样开始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涯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反动的俄国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进一步沉思，去研究俄国的社会历史、现实矛盾和未来发展。

二是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来看，也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便是民粹派在俄国政治舞台上开始扮演着重大的角色。70年代，俄国革命者同沙皇专制制度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组建了一些新的革命团体和小组，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到了1876年，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全俄的、集中的、极其秘密的组织，不久以后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土地和自由社”。在俄国革命问题上，这个组织痛恨资本主义制度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俄国的农民是深信公有制的，是天然的革命者，在本能上和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因而，他们的这种思想被称为民粹主义，这一组织被称为民粹派。1879年8月，由于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个派别又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表达了要求摆脱农奴制残余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他们继承了其先驱和导师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革命力量的信念、以革命方法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方法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早在70年代之前，马克思就与拉甫罗夫（1823—1900）、洛帕廷（1845—1918）和丹尼尔逊等俄国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成为了马克思的朋友和通讯员。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还结识了民粹派人物加特曼（1850—1908）、莫罗佐夫（1854—1946）和查苏利奇（1851—1919）。马克思很珍视同俄国革命者建立起来的联系。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民粹派的革命活动步履维艰，马克思对他们抱有深刻的同情。他曾经以自豪的心情把民意党执行委员会1880年11月6日的来信拿给朋友们看。在这封信中，民粹派以深切的敬意谈到了马克思在科学上的功绩、他对

俄国革命活动的重视，并请求马克思向西方舆论界报道俄国革命斗争的性质。为了表示同情、友谊和支持，马克思把附有自己本人签名的两张个人照片寄给了他们。当然，马克思早已意识到了民粹派的局限性。1881年3月1日，民意党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革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革命处于了十分艰难的环境之中，因此，马克思对他们采取了比较有策略的态度，并尽量减轻他们在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策略中所遭受的痛苦。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他们的批评是比较隐讳的。其实，马克思在事情的一开始，对民粹派就抱有这样的态度。针对俄国大学生在反对沙皇斗争中的鲁莽行为，马克思在1877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就说过：“俄国大学生的愚蠢行为仅仅是一个预兆，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预兆。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①但是，当沙俄政府审判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参与者时，马克思却给予了密切的关注。那么，在村社的基础上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能和民粹主义融合吗？这些就成为了摆在马克思面前的新课题。

三是从马克思同俄国革命者的联系情况来看，要求马克思对俄国的革命给予具体的指导。早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就担任过俄国通讯书记。这表明，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就在俄国革命者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作为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经常帮助俄国的革命家，与他们定期通信，把国际的情况和总委员会的决议告诉他们，给他们寄去必要的文件，竭力引导他们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支部的吴亭等人一直同马克思保持着亲密的来往关系，并亲自拜访过马克思；他们将马克思给国际所写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译成俄文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人数不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的俄国支部也在积极地活动，它的巨大贡献就是坚决支持了国际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俄国已如爆发前的火山。正因为这样 马克思在致斯拉夫人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的致辞中认为，俄国公社已是为时不远的了，“当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大屠杀而陷于失败的时候 胜利者决没有想到 为时还不到十年 在遥远的彼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引者注）它经过斗争 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 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是东方社会的革命前景。

总之，首先必须从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这样一种“品格”出发 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价值。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根本没有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基本的主题。

二、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论动因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在马克思晚年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也没有脱离这两个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 完善唯物史观、深化《资本论》的逻辑 构成了马克思晚年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深刻的理论动因。

（一 完善唯物史观 进一步展现其科学的艺术的整体性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将社会历史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270 页。

奠定在了科学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就是被历来的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竭力掩盖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在满足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的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之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文化活动。这样看来，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国家、法律以及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就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唯物史观的发现就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了，成为了科学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但是，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一样，唯物史观也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考问”。在 70 年代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起了这个科学体系大厦的基础和框架，唯物史观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丰富和发展。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关系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这部以天才的透彻和鲜明的语言而描述新世界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私有制、阶级、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私有制、阶级、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产生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没有剥削和阶级的社会，这就是原始社会（史前社会），这样，就要求唯物史观不仅要确立私有制、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起源问题，而且需要进一步确立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问题。正如恩格斯在 1888 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一个注释中指出的那样：“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 1847 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

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加以探讨”^①。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恰好是执行马克思晚年“遗言”的一个科学成果。为了解答阶级社会的发生之谜，就要求马克思走向东方社会理论，因为东方社会理论为把握史前社会提供了一个“解剖学”上的比较对象，二者在社会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经过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的实证性研究之后，马克思后来才做出了阶级的存在是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科学结论。

第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关系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篇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经典表述的著作中，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地域性的概念上升为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位置，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一概念起码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矛盾。一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特定单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矛盾。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具有如下社会结构的社会：在土地的所有制问题上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实行村社制度，在政治制度上采用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一个社会只要将这三者集于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注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的社会结构，那么，这个社会就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这样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矛盾 这就是 在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怎么会出现政治制度上的专制主义呢？因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当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本身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二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容易引起纷争的概念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位置，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存在着专制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吗？“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呢，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生形态”的概念 可见 将存在着专制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升到了“原生形态”的位置 同样面临着一个阶级、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起源问题。可见 马克思当时没有将史前公社 原始公社 和东方村社 农业公社 这两种具有不同性质的公社区分开来。正因为这样 马克思晚年才开始走向了东方社会理论 通过对人类学和东方学的研究 以俄国社会问题作为典型 马克思将史前公社和东方村社区分开来了。

第三，关于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问题。在唯物史观创立的起初，由于主要的任务是发现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突出了出来 而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得不够，一些人借此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那样：“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 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 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

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① 这样，为了展现唯物史观的科学的艺术的整体性就必须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进行专门的研究而东方社会就为研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因为东方社会的上层建筑过于强大，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东方社会的结构中，血缘宗法制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的力量，这是造成东方社会封闭、愚昧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同时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社会生产只做了简单的理解而对将社会生产是一个由不同的生产构成的系统物质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同样都是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构成部分缺少注意。这样就要求马克思走向东方社会理论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做出全面的把握。正是在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确立了人自身的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笔记”后而撰写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那样：“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物、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26页。

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① 这样，在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通过人类学的互补性的作用，不仅解决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问题，而且唯物史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由上可见，完善和丰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晚年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论动因之一。

（二）研究土地问题 进一步深化《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又一次回到了书房，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成为了他晚年科学生涯的一个不朽的乐章。为了再版而修订《资本论》第一卷，为了进一步武装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而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外文版和普及版，撰写《资本论》的后几卷，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成为了马克思这时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解剖典型是马克思研究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在研究《资本论》后几卷的有关问题时，马克思越来越注意俄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将他们作为了研究后几卷问题的典型形态

来研究。在深化《资本论》理论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自然而然地走向东方社会理论,同时,东方社会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形态。

第一,土地问题在《资本论》中的位置和俄国在其中的典型性地位。

土地问题在《资本论》的后几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对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就是不完善的。为了保证《资本论》科学体系的完整性,70年代以后,马克思对地租和土地问题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

为此,马克思很注重对土地理论的研究。1876年2月中旬,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论》后几卷的有关问题时,对凯里的“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这一庸俗见解做了评述。1878年11月,马克思研究了许多有关土地史的著述,其中有汉森的《农奴制的废除》、亚契尼的《伦巴第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人口》以及恩舒特的《论市场协作社的权利……》和《1871年土地管理总局委员会年度报告 华盛顿》等书。1880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后几卷的过程中,阅读了关于土地所有制、地租和农业问题方面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重写了第二卷的第三篇。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早在1868年7月4日,马克思在给德国和美国工人活动家迈耶尔的信中,就请他帮助搞些美国报纸并经常寄来,尤其是要注意搜集有关美国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认为这些材料对自己是特别有价值的。1876年4月,马克思写信问左尔格,能否花钱搞到美国的书目,以便了解1873年以后在美国关于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方面是否出版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比利时的土地问题。一部分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反对贵族于1869年成立了一个土地改

革协会，他们用最美妙的色彩来描绘小所有制，津津乐道于比利时的土地所有制，好像这个国家的农民生活在天堂里。为此，马克思于 1870 年 1 月 24 日给比利时工人活动家巴普写信，要求他寄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目：“既然我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研究土地所有权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卷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比利时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和比利时的农业是有益的。可否劳驾您把我应当熟悉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著作书目告诉我。”^① 巴普很快就满足了马克思的这一要求。

在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比利时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和地租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由于俄国的土地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形态（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保留了下来，按照村社的集体生产的原则进行耕作，等等），马克思就对俄国的土地问题给予了专门的注意，以便对土地和地租问题能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俄国问题在《资本论》的后几卷中就获得了英国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那样的地位。正如马克思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我打算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由于对俄国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典型性的研究，这样东方社会理论就成为了《资本论》理论逻辑的一种补充、完善和发展。这在于，不对东方社会的土地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资本论》中的有关理论就不是完善的，就难以科学、全面地说明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这是马克思晚年走向东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动因。

第二，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土地问题和社会经济情况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第 629—63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第 549 页。

俄罗斯的土地关系和公社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研究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问题过程中的一个重点。70年代以后，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俄国问题在《资本论》研究中所占的地位开始越来越重要。

在《资本论》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非常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晚年集中精力研究了俄国的土地关系和公社所有制等问题。1873年3月22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请求他介绍一下契切林和别利亚耶夫就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起源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如果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契切林对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发展的看法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别利亚耶夫的论战的情况，我将非常感谢。关于这种占有制在俄国历史地形成的途径问题，当然是次要的，它和关于这个制度的意义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像柏林教授阿·瓦格纳等等一类的德国反动分子，都在利用契切林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武器。同时，历史上一切类似的现象都说明与契切林的看法相反。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①这样，俄国的土地关系和公社所有制就以一般和特殊相交织的意义，将土地关系和公社所有制问题突现了出来，成为研究包括俄国社会发展在内的东方社会甚至是研究一般社会发展的要害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研读了大量有关俄国土地所有制的著述：1873年4月2日，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来了俄国土地关系史的书目；这一个月，马克思研究了俄国的土地关系，阅读了《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赎买土地困难吗》一文和阿·谢韦尔策夫对契切林的著作《俄国的农村公社》的评论。5月底，马克思又收到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77页。

尼尔逊根据他的请求寄来的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状况的大量综合材料和图书资料。7—10月，马克思研究了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阅读了谢尔盖也维奇的《市民会议和公爵》、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劳动组合》等书籍。1875年5月，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的土地制度，它的产生和1861年它在立法上的确立》一书。1875年9月20日—10月，马克思又紧张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问题，特别是用了很多时间研究了俄国的土地关系。1876年5月中旬，他又研究了俄国的土地关系特别是地租。1877年，马克思阅读了瓦西里契柯夫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第1—2卷，涅鲁切夫的《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和索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大约在1876年至1878年期间，阅读了索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等。1878年3—4月，他阅读了考夫曼发表在《开端》杂志上的《俄国的农业公社》一文，并作了大量摘录。1882年1月，马克思阅读了米纳伊科的小册子《农村土地公社》。1882年秋天，又阅读了民粹派政论家恩格尔加尔特的《乡村来信》，并作了大量的批注。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问题，马克思开始对俄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各种统计材料和文献汇编进行研究。在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时，马克思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通过对统计材料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的研究，来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运用了这种方法，在研究俄国问题时，他采用的仍然是这种方法。通过俄国友人，马克思获得了大量的有关俄国问题的统计材料和官方文献汇编，1875年11月23日前后，他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十卷《税制委员会报告书》。这年的11—12月，马克思研究了俄国总参谋部于1871年出版的《军事统计汇编》第四册，并写了详细的笔

记；1875年12月—1876年2月他研究了丹尼尔逊寄来的十卷《税制委员会报告书》和《省农民事务厅意见汇编》；1879年3月17日，丹尼尔逊应马克思的请求寄来关于最近15年来的俄国财政政策的详细报告。这年的7月26日他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俄国财政和农业状况的详细情况，其中摘引了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同年9月，马克思根据从丹尼尔逊那里得到的材料研究了俄国的财政；1880年，他收到了卡布鲁柯夫从彼得堡寄来的一本卡氏自己的著作《1877—1879年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马克思根据《税制委员会报告书》做了有四十多个印张的四大本笔记。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研究，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研究就建立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因而对俄国的发展方向有了清楚的认识，正如他在1877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①。这样，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和俄罗斯的公社所有制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深化《资本论》逻辑的需要了。

正因为俄国和美国问题进入了《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因此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持有一种更为严谨、认真的态度，而推迟了《资本论》后几卷的出版工作。正如他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所讲的，“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②。

当然，马克思在进行这些新的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中断《资本论》的写作工作，同时也在进行着《资本论》后几卷的撰写。1875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347页

年 5 月至 8 月 为了举例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进行了广泛的计算 这些计算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的基础。他写于 1876 年 2 月的《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成为了《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四章的一个构成部分。1870 年 11 月—1878 年 7 月 马克思准备付印《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1880 年 马克思写作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是第三卷的新文稿。另外 马克思着手写作了《资本论》后几卷的部分章节。

这样 俄国问题在整个《资本论》后几卷中的典型性地位就开始得到确立了。所有的这一切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 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 1861 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 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总之 离开了马克思在科学上所作出的两个伟大发现的“科学品格”我们同样也不可能理解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意义和深层的价值。

三、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论准备

在实践和理论双重力量的推动下 马克思不断地走向东方社

会理论。而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决不是一种主观情绪的显露 而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一种科学的结论。马克思晚年对俄罗斯社会问题、文化人类学、世界历史、东方学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为其东方社会理论地位的最终确立做了必要而充分的理论准备。

（一）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俄国问题的突现是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它预示着落后的俄国将打破先进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领头羊”的局面 破天荒地成为世界革命的突破口。为了适应这样急剧变动的现实状况 揭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一历史之谜 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大是大非，使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真正成为全面的、实践的、科学的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垂暮之年 对俄国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从而为回答东方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为了全面、详尽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通过俄国友人的关系，70年代以来，整箱整箱的俄文书籍往返于彼得堡和伦敦之间，以便马克思进行研究。马克思在1881年为自己开列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的书单中就涉及到120多种材料，这还没有完全包括他在工作中使用过的文献资料。马克思逝世之后 仅仅在他阅读过的俄国统计资料方面 恩格斯就开列出一大堆 其体积超过了2立方米。除了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史、统计资料外 马克思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俄文。在马克思看来，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他学习外语是抱着学以致用为目的进行的。马克思能阅读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 在年过半百的情况下 又开始学习俄文。他学习俄语主要是为了直接掌握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学习俄语

期间,马克思正在生痲病,但他不顾痲痛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一头扎入了书中。他先是简单地看看俄文的字母和单词,然后便开始直接阅读俄文的原著了。在阅读俄文原著时,他在不懂的地方通过字典标出意思,前面标出的地方还比较多,但越到后面标出的地方就越少了,这说明他已开始掌握了俄语。辛勤的汗水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没有多长时间,马克思就能自如地阅读俄文书籍了。正如他在 1871 年 1 月 21 日给迈耶尔的信中所说的那样,“1870 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在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列罗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以后才开始的。同时我也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七年前他因此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证明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第二,马克思对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繁荣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在马克思看来,俄罗斯文学艺术不仅是美学欣赏的源泉,而且它们是反映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因此他总是将俄罗斯的文学艺术看做是研究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具体而丰富的材料。马克思曾津津有味地阅读过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果戈里和谢德林的作品,知道诗人涅克拉索夫和舍夫琴科,在马克思的家里经常播放俄罗斯的古典音乐,收藏了从俄国寄来的格林卡的歌剧的钢琴曲,弹奏俄国流行的抒情歌曲。库格曼的女儿弗兰契斯卡转述了马克思对俄罗斯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77—178 页。

家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屠格涅夫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俄国人民的特性和他们那种斯拉夫民族的深沉的感情。他认为，对于自然的描写未必有哪一位作家能超过莱蒙托夫，具有这种才华的人是寥寥无几的。”^① 总之，正如弗兰契斯卡所说的，在俄罗斯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没有一种艺术使马克思不喜爱。

第三，马克思非常重视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知道了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经济学上的独到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此，马克思特别留意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请求俄国的朋友们将有关的著作寄来。1871年6月13日前后，他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中有《论土地私有制》。1872年8月15日左右，马克思收到了丹尼尔逊寄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稿子《没有收信人的信》。马克思把第一封信全部翻译成了德文，对其余的信都作了提要，并且作了许多摘录，设法将稿子出版。同年的12月12日，他请丹尼尔逊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材料寄来，以便撰写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希望引起西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情。1874年年底，马克思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卡芬雅克》，并重新仔细研究了1874年在苏黎世出版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进行这样专门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这位俄国革命家的战斗的民主主义、对人民群众的深信、对沙皇制度和农奴制的极端仇恨，做了应有的评价，肯定了他通过人民革命同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做斗争的纲领。当然，马克思也看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局限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制度而

①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伟大的马克思二三事》，《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

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肯定了他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探讨的价值 认为他的思想中不乏真知灼见 如集体主义和协作社的精神、在农村公社中使用农业机械和科学成就等 但是 他的思想具有空想的性质 他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看到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的社会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全家都很熟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和政论著作、文艺作品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曾发表专文评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成就，将他称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作家。

第四，马克思对民粹派的著作和其他出版物也很熟悉。1875年2月 马克思阅读了拉甫罗夫寄来的俄国流亡者的出版物 并且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指出 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前进》杂志中的“祖国情况”栏目上的材料 尤其是洛帕廷评论作为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形式之一的俄国教派的文章《寄自伊尔库茨克》。1876年，马克思收到了拉甫罗夫寄来的他本人的著作《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此外 他还阅读过民粹派的秘密机关刊物《土地和自由报》、《民意报》。正因为这样 马克思后来对民粹派的批评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的。

第五 马克思对俄国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现实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研究，阅读了一批俄国经济学著作。1873年年初 马克思阅读了戈洛乔夫的《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一书 并开始研究斯克列比茨基的著作《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1875年11—12月 他阅读了帕特拉耶夫斯基的《1700—1762年俄国金融市场》。1881年上半年，马克思研究了俄国改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汇编 专题论著和研究性著作 阅读了一些俄国学者的著作 并作了笔记 还研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 根据这些信编写了《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的摘要。这年的1—2月 当阅读了丹尼尔逊在《言语》杂志上发表的《我国改革

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一文后,马克思于2月19日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向他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照我的意见您下一步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上层阶级在农业中的代表地主的债务的惊人的增长并且要指出他们是怎样在‘新的社会支柱’的监督下在社会蒸馏器里面‘结晶’的。”^①另外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还以俄国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停滞和收成的周期性。同年的3—4月他阅读了阿利索夫的《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和德拉歌马诺夫的小册子《俄国的暴君被刺案》并写了评语。1882年年底还阅读了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正因为知道马克思对俄国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丹尼尔逊于1880年8月21日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撰写一篇关于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文章;9月12日马克思在给他的复信中以健康状况和急需完成《资本论》后几卷为借口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马克思建议丹尼尔逊发表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编制统计表和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事实已经全部都做了。如果您要推迟发表您的著作那是很遗憾的,我自己就急切地等待着它的发表”^②

总之,马克思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所涉及的科目是繁多的,材料数量是浩瀚的,这反映出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从而保证了他的俄国问题理论的逻辑的严谨性和结论的科学性。正如他本人指出的:“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当这种思潮刚刚兴起时，马克思就高度敏锐地意识到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转向的重大意义，认识到这些思想对于解答上述理论和实践难题的重大的、内在的价值。因此，他在年迈体衰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研读了大量涌现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进行了详尽、认真、科学的摘录和评注，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人类学笔记》这部回答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的科学巨著。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主要由以下五个笔记组成：

第一，“柯瓦列夫斯基笔记”。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马克思研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写下了《马·柯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有制 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柯氏笔记）。

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是俄国民族学家和法学家。他根据美洲印第安人、印度、北非等地区的土地资料，说明了土地制度的发展过程。早期是氏族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由氏族公社分化出了家庭公社。他着重研究了农村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和定期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根据南方斯拉夫人和高加索等地的大量资料，提出父系家庭公社是母系氏族制的群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由父系家庭公社发展为作为氏族瓦解形式的农村公社。他的主要著作有：《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原始法权》（1886）、《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1890）等。

马克思和柯瓦列夫斯基在70年代认识并成为了学术上的朋友。《公社土地占有制》出版后，柯瓦列夫斯基于1879年夏天将它赠给了马克思，并题有“卡尔·马克思——以示友谊和尊敬”的题词。柯瓦列夫斯基的序言写于1879年6月15日，马克思在同年的9月19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就提到了此书，马克思从10月开始写作“柯氏笔记”。

柯氏笔记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研究柯氏原著中前两章关于美洲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上的土地政策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柯氏原著中第三至第七章有关印度的土地占有制问题的，第三部分是研究柯氏原著中最后两章关于阿尔及尔的土地占有制和法国的殖民土地政策问题的。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让柯瓦列夫斯基看了“柯氏笔记”。

马克思很重视柯瓦列夫斯基的学术贡献 翻译、摘录了他著作中的有价值的材料 同时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通过考察东方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揭露了殖民当局对印度和阿尔及尔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歪曲，指出这些地方在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土地关系属于公社土地占有制。针对殖民主义者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强制瓦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做法，马克思考察了这些地方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之前的土地关系 肯定农村公社是土地的主人 否定国君是土地的惟一所有者。马克思还指出，殖民当局的做法不仅不会带来任何进步，而且只能使这些地方陷入沉重的苦难之中。

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将亚洲、非洲、美洲的古老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同欧洲的社会发展进程做机械的类比的作法，强调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柯瓦列夫斯基将印度在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和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的土地关系改变的性质看做是“封建化”，马克思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印度的土地关系不同于西欧的中世纪，印度集权的君主制阻碍印度的土地关系向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发展。

马克思研读《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过程 不仅仅是一个通过具体实证科学获得材料的过程，而更是一个用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辩证思维影响人类学发展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柯瓦

列夫斯基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开始自己的人类学研究的，这正如他本人所讲的那样：“我去莫斯科当教授后 两年来几乎每个星期和《资本论》的作者的交谈便结束了。起初我们还间或通信 夏天我到伦敦的时候 又恢复了我的拜访 时间通常是在星期日 每一次会面都再一次推动我去研究西欧的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假如没有和马克思认识，我很可能既不会去研究土地占有制的历史，也不会去研究欧洲的经济史，很可能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因为这类问题本来就是我所讲授的课目。马克思熟悉我的著作，并且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停止出版我的第一部关于法国行政司法、特别是关于法国的赋税立法的巨著，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对我的著作评价不高。他更主张我揭露农业公社的过去，或者根据比较人种学和比较法学史来阐明远古以来的家族制度的发展。”^① 马克思重视实证科学在自己社会发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否定辩证思维在研究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指导作用 事实上 在马克思晚年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总是强调实证研究和辩证思维的统一性和互补性的。他向柯瓦列夫斯基强调了辩证思维的重要性。柯瓦列夫斯基对此回忆说：“马克思曾强调地对我说过 只有按辩证的方法才能合乎逻辑地思维，即使按实证论的方法也不能合乎逻辑地思维。在我看来，马克思常常采取的并且用以证明他的自信的那种口吻 是由于他确信 他从黑格尔哲学中 从它的激进信徒 包括有名的费尔巴哈）对它的解释中所得到的思维方法是无可反驳的。”

第二“摩尔根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第一次去美国旅行时带

^① 柯瓦列夫斯基：《回忆卡尔·马克思》，《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63—64、67 页。

回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 马克思从柯氏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并从他那里借阅了此书 于 1880 年年底至 1881 年 3 月初抱病写下了《路易斯·亨·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以下简称为摩氏笔记)这一笔记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干部分。

摩尔根(1818—1881)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 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通过自己长期的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证明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父系氏族是后生的)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 揭示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发展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未来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公有制复归。这样 摩尔根通过自己的实证的科学研究达到了唯物史观的水平，从而证实了唯物史观并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发展。他的主要著作有：《易洛魁联盟》(1851)、《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古代社会》(1877)、《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881)等。由于他的杰出成就 摩尔根于 1875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学会成员，1879 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这是美国科学界给予一个人类学家的最高荣誉。

从结构上来看，“摩氏笔记”与“柯氏笔记”有很大的不同。“柯氏笔记”的结构与原著是一致的 马克思仅仅把原著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加上了用数字和字母作标记的题目。这表明马克思是赞同柯瓦列夫斯基的观点的。而“摩氏笔记”改变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结构。在摩尔根的原著中 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在马克思的摘要中 这种结构被改造为 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此外，马克思还略去了原著中的第一编

第三章《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这样,“摩氏笔记”的结构为:一是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的发展,二是家庭观念的发展,三是财产观念的发展,四是管理观念的发展。这种改变决不仅仅是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而是表明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成果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使摩尔根的体系更富有连贯性和逻辑性。更为重要的是,这当中是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蕴的。他纠正了摩尔根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彻底性,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原始社会建立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之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导致了氏族制度的灭亡。

当时整个欧洲和美国一部分官方科学根本不提摩尔根的科学成就,而马克思对摩尔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见诸于文字的直接评价,但《人类学笔记》表明了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热情。他喜欢《古代社会》一书,做了详细的摘要,补充了必要的资料,写下了多段评语。在这些评语中,马克思采纳了摩尔根关于氏族组织及其公有制、婚姻和家庭发展形式等重要论断,也对摩尔根进行了批评。马克思打算运用唯物史观来写作一部阐述摩尔根研究成果的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就与世长辞了。

第三,“梅恩笔记”。马克思于1881年4月至6月研读了梅恩的著作,写下了《亨利·萨姆纳·梅恩 古代法制史讲演录 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梅恩笔记)

梅恩(1822—1888)是英国比较法学家。他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了法律的发展。从法律进化的观点来看,一系列的阶段是连续出现的:亲属组织进化到地方组织,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地位进化到以个人为主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让与的土地关系进化到可以出售的土地关系,民法进化到刑法。但他根据希腊、罗马和东印

度都属于父系，就否认从母系到父系的发展过程，将父权制家庭看做是最早的家庭。他的主要著作有：《古代法》（1861）和《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等。

马克思在叙述梅恩著作的同时加了大量的批注 这些批注反映了他在研读了摩尔根著作之后所得出的一些结论。针对梅恩否认从母系制发展到父系制历史事实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梅恩完全不了解氏族是怎么一回事，对母权制一无了解。梅恩尽管承认古代存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但他将之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的个人中心主义对立了起来 将公社看做是暴力的化身 马克思认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是虚伪的表现。梅恩企图将国家权力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国家观，指出国家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梅恩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是精神 马克思批判了他的这种抽象的人性观点 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的首要的决定的力量。梅恩从法律的观点为英国的殖民主义辩护，马克思对之进行了批判，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在爱尔兰的罪行。

第四“拉伯克笔记”。1881年3月至6月 马克思在研读拉伯克著作的基础上 写下了《约·拉伯克 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一书摘要》（以下简称为拉氏笔记）

拉伯克（1843—1913）是英国政治家、博物学家和人类学家 是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根据民族志的材料，用进化论的观点叙述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等一系列问题 主要考察了婚姻、家庭和宗教等问题 认为人类早期实行群婚制 后被个体婚取代 外婚制起源于抢劫婚 母权制先于父权制；将宗教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偶像崇拜说明人的智力发展到了一个比动物崇拜和天体崇拜更高的阶段。他的主要

著作有：《史前时代》（1865）、《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等。

马克思对拉伯克基本上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在“拉氏笔记”中，马克思指出，拉伯克混淆了群婚制和淫婚制，力图使内婚制和外婚制的区别合理化，这些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肯定了拉伯克的无神论立场，但反对他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庸人观点。

第五，1881年6月至9月，马克思在阅读菲尔著作的基础上，写下了《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以下简称“菲尔笔记”）。

菲尔（1825—1905）是英国法学家，曾在印度和锡兰等地担任过法官。他在这些地方先后生活了十多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在《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中，描述了孟加拉和锡兰农民的农业、村社和家庭的机制情况，也反映了农民同地主、高利贷者、政府捐税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在“菲尔笔记”中，马克思把菲尔的原著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孟加拉现时的农村生活；二是锡兰的农业经济；三是印度雅利安社会和土地制度的演化。由于菲尔用一些十分具体的材料描述了雅利安人村社的基本轮廓（如家庭经济账目、地产登记册、税务表格和财产目录），因此，马克思主要是从菲尔那里撷取了一些关于东方社会的具体材料，同时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菲尔对村社情况的描述令马克思满意，但马克思批评了他将西方的社会发展方式机械应用于东方的做法，反对他将村社的结构看成是封建的结构，突出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上述这些笔记就构成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生前是不可能将之系统化后公之于众的。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只是在“摩氏笔记”的基础上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世人只知道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著作进行过研究，此外，人们对马克思

《人类学笔记》中的其他笔记就一概不知了。只是到了 1972 年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将这些笔记用原文的形式第一次公开发表 并冠之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题目。由于这些笔记探讨了社会形态的问题，又被称为“社会形态笔记”也有人将之称为“古代社会史笔记”。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一是从理论内容来看，《笔记》涉及到了一系列的领域 在纵的历史方面，马克思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问题，史前社会理论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横的跨度方面，马克思探讨了人类文明的东西方的差异和共性问题，东方社会理论被突出出来。二是从学科范围来看，《笔记》在形式上是对文化人类学著作的摘录 但事实上探讨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 它具有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理论的意义；而在文化的范围内，它又涉及到了技术、宗教、道德、哲学等众多的问题。三是从研究方法来看，《笔记》绝非是马克思读书时随手写下来的笔记，而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 马克思由此开始从“人体解剖”转向“猴体解剖”强调二者的关联和相互依赖，使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出来，同时，辩证思维的方法得到了有效的运用，《笔记》事实上成为辩证思维方法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应用、检验和发展的场所 因而，《笔记》是马克思潜心研究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的结晶。四是从研究意义来看，《笔记》绝不是马克思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进行的学究式的研究，而是具有很强的实践目的和意义的。在史前社会问题上，马克思再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更高的形态上向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归；在东方社会问题上，马克思揭示了东方革命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可见，《人类学笔记》极大地丰富、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社会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东方社会理论的确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对世界历史的研究

研究世界历史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的乐章。在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进行潜心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从 1879 年年底至 1880 年年初，马克思阅读了柯斯托马罗夫的《历史专题论文和研究》并作了有关斯切潘·拉辛起义的评注性的摘录。马克思还研究了罗马史，阅读了耶林的《罗马法精神》、朗格的《古罗马》、弗里德兰德的《罗马风俗史概述》和布赫尔的《纪元前 143—129 年的奴隶起义》等书。

从 1881 年底到 1882 年底，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考察了从公元前 1 世纪初到公元 17 世纪中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整理了欧洲历史的材料以及亚洲和非洲一些民族的历史材料，留下了约 105 个印张的四大本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笔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的手稿，在这四本笔记上加上了《编年摘录》这一标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学笔记》的又一马克思晚年留下来的重要手稿。

第一，《历史学笔记》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史学问题的科学结晶。

《历史学笔记》首先是建立在大量地收集文献、有比较地选择文献和认真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的。除了一般的通史性的著作外，他注意的是意大利、英国以及俄国等国家的国别史。在通史方面，他选择了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 18 卷本的《世界史》；在意大利史方面，他利用的材料有意大利历史学家博塔的《意大利人

民史》 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 在英国史方面 他主要选择了下述著作 激进主义者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 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的《英国史》 格林的《英国人民史》 值得注意的是 俄国史问题也在《历史学笔记》中占有一席之地 马克思利用的材料主要是 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 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这样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笔记》主要涉及了上述八部史学文献。可见,马克思晚年研究世界历史典型地坚持和体现了“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这一科学方法论原则 是作为唯物辩证法首要构成要素“观察的客观性”在史学研究上的具体运用,从而保证了马克思史学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泥沙之中。他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完全不受材料的左右和影响。《历史学笔记》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所研读的史学著作中的材料 而是表达了马克思本人对各种历史现象和事件的认识与理解,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是渗透、内化于其中的。在研究某一历史阶段或事件时 马克思首先选择某一历史学家的著作作为脚本,按年代顺序和事件的历史进行摘录 同时又作了大量简短的评述 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他所关心的问题 都用注号在笔记中标出。从内容上来看 这种注号可分为两种:一是摘引或标出了他所关注的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有关的文献的详细原文;二是注出进一步参阅的文献以强化所关注事件或问题的主要意义,或者是用进一步参阅的文献来纠正正在研读的文献的不确切或错误之处。这些注都以附录的形式收在了每一册的后面。通过这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马克思正是要分析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从而“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可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是贯穿、渗透于马克思晚年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之中的 从而保证了马克思史学研究成果在结构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严谨性。

这样，马克思就从走进了其中的历史文献中又走了出来，因而尽管《历史学笔记》在形式上是一部编年史摘录，却有十分丰富、具体生动的历史学内容，获得了独立的科学价值。

第二，《历史学笔记》的社会发展理论价值。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文献，这不仅在于它研究动机的深刻性、研究方法的辩证性和研究内容的广博性上，更表现在它通过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如何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展示社会演进的具体过程，从而使社会发展的整体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是捍卫、丰富、深化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大课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从私有制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通过下述实证的方法证实和揭示了这一社会发展的整体的历史进程：一是通过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揭示和证实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的大势。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在以后的系列论著中进一步揭示了“两个必然性”。而《资本论》则通过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更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二是通过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揭示和证实现存的私有制是从原始公社中发展而来的，而共产主义则是在更高的形态上向原始公有制的“复归”。资本主义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不仅从它的发展结果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它的起源来看也是这样。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马克思充分运用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成果，研究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发现“财产产生了人类的奴隶制作为生产财产的工具”^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77页。

由此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私有制社会，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私有制发展进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已。这样，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也就昭然若揭了。马克思晚年的另一部重要手稿《人类学笔记》正是进行这方面工作的重大科学成果。这样，在整个社会历史形态演进的链条上，就只缺少对第二大环节的实证研究了。即私有制社会是如何通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也就是说如何找到《人类学笔记》和《资本论》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成为马克思晚年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历史学笔记》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因此，运用世界历史的材料来研究私有制社会如何通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为马克思实证地研究社会形态的第三种方式——历史学的方式。而这正是马克思晚年写作《历史学笔记》的深层动因。

《历史学笔记》是架起《人类学笔记》和《资本论》的桥梁，从而以实证的形态再现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历史学笔记》开始的地方正是《人类学笔记》结束的地方。它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公元前 91 年。罗马城建立后过了六百六十五年即公元前 91 年。”^①为什么要略过罗马城建城的前 650 年而从公元前 91 年开始呢？这在于所略去的 650 年的历史正是罗马史上的“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奴隶制，《人类学笔记》已原则上解决了这段时期的问题，而公元前 91 年却是奴隶制罗马帝国经过“同盟者战争”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重要标记。因此，《历史学笔记》是《人类学笔记》的延伸和继续，它的历史起点正是原始公有制瓦解后产生出的私有制在奴隶制下的典型形态。而《历史学笔记》结束的地方正是《资本论》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分析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而对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这一历史起点的过程却

没有进行系统研究。《历史学笔记》的第四册以三十年战争为重点再现了这个“羊吃人”(圈地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三十年战争起初具有封建战争的性质(英国封建贵族的两个上层王室为争夺王权而进行的战争)而结果却是导致了旧的封建贵族的消灭和新的封建贵族的产生而新的封建贵族却以“羊吃人”的方式开辟了私有制发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历史学笔记》就是这样以史学的实证方式展现和揭示出了私有制从奴隶制和封建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进程的从而在《人类学笔记》和《资本论》之间架起了桥梁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三,《历史学笔记》的重大意义。

《历史学笔记》在展示和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特点做出了科学揭示。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主要关心和注意的是政治事件但他也常常研究政治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他的研究表明:历史不是偶然的千变万化的事件和人物的堆积,而是既反映历史进程的一般趋势,又反映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个性的一系列有内在规律的事件。这事实上是一个必然和偶然相统一、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过程。他的研究也证明:社会发展规律绝不是作为某种命定或先定的使各种现象划一化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一个富有戏剧性情节的活剧由于人们的选择和活动普遍规律常常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事实上是一个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客观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过程。他的研究还证明: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因素但也不能忽视政治、文化和科技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角度来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图景但是也不能对这些因素等量齐观,最为关键的还是经济因素。社会发展的过程事

实上是一个诸因子协调与离合相统一、决定与制约相统一的过程。这样，马克思在展示封建社会从封建关系产生到封建制度解体、专制君主制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画卷的同时，揭示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图景。

总之，《历史学笔记》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问题研究所取得的大量史学成果，而且也体现了他对历史进行哲学沉思的观点和方法，在实质上是一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的科学巨著。

（四）关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 开展东方学的研究

70年代以来，马克思还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其他的东方国家，研究了广大的东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一，对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研究。

土地的公社占有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还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撰写《资本论》后几卷中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时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

德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格·毛勒（1790—1872）对欧洲的马尔克制度进行了历史考察，证明欧洲各国的古代社会也曾存在过公有制，这种土地公有制的遗迹在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欧洲各国的土地私有制就是在瓦解这种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毛勒就这个问题写了大量的著述。马克思对这些著述是很重视的。早在1868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毛勒的著作，阅读了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并进行了详细的摘录。马克思对毛勒的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

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①。马克思为在自己的家乡发现马尔克制度非常高兴：“恰好在我的故乡 即在洪斯吕克 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 我现在还记得 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哩！”^②1876 年 马克思再一次阅读了毛勒的著作 主要有：《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史》、《德国领主庄园制度史》和《德国乡村制度史》。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也很关注东方国家的公社所有制和土地关系的状况，大量地阅读了这方面的著述。在 1876 年至 1878 年期间 他阅读过了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此外 1876 年 4—5 月 马克思打算研究匈牙利的土地关系 通过弗兰克尔得到了德文的相应资料。这年的 5—6 月 马克思开始紧张地研究各民族尤其是斯拉夫民族的公社占有制的原始形式，除了其他的资料外，重新阅读了毛勒的《领主庄园史》和《乡村制度史》、汉森的《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德梅利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族公社》等。

第二 对殖民地和东方社会现状的研究。

马克思对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史和处境十分关心，对东方社会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有：

一是印度和南亚地区。印度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重点，1876 年 12 月，马克思阅读了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在 1879 年 10 月—1880 年 10 月 马克思编写了《印度历史编年大事记（664—1858 年）》 他特别注意英国人征服和奴役印度的历史 史料主要取自罗·修厄尔的《印度分析史》和蒙·埃耳芬斯顿的《印度史》；1881 年 2 月 19 日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 向他谈了印度的状况以及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人民及其财富的惊人的剥削和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第 51、52 页。

掠夺，认为印度正在酝酿着革命和起义。1879年马克思阅读了罗塞尔的《孟加拉的地籍志》。1881年8—9月马克思阅读了乔马尼的《爪哇》一书。

二是阿拉伯地区。1882年2月20日—5月2日马克思在阿尔及尔疗养期间，经常同龙格的朋友、当地的民事法庭法官费默（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被流放到阿尔及尔）会晤。费默在同马克思的交谈中，介绍了阿拉伯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条件和土著人遭受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殖民压迫的情况。这一年马克思还大量阅读了有关埃及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凯的《对埃及人的掠夺。根据蓝皮书编写》、彼得·奥特舍尔尼克的《在埃及的掠夺者。国际危机的解决》。为了了解英国在埃及的财政政策，马克思还阅读了迈·乔·马耳霍耳的著作《埃及的财政》。

三是中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研究。1881年8—9月他阅读了埃·雷·于克的《中华帝国》一书，并作了摘录。

这样，马克思晚年对主要的东方国家都基本上进行了研究。在注重典型的同时，也突出了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全面性。

第三 对东方革命的高度评价。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评价东方革命，看到了广大的东方国家的革命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对东方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波兰问题上，明显地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东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

1875年1月23日在纪念波兰1863年1月22日起义的会议上，马克思发表了演说，高度赞扬了波兰这个“世界性的革命战士”的功绩。他和恩格斯的演说由恩格斯录写成文章，以《支持波兰》为题发表在了3月24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在这篇演说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波兰解放与欧洲革命的整体关联，认为“欧洲的工人

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①。这样 马克思就把民族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联系起来马克思之所以对波兰问题给予了这样高度的关注 主要在于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出于对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同情 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 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权利。二是由于波兰在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方面具有特殊的特点 只有在波兰民族的解放过程中 才能拆散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联结起来的锁链，从而扫除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的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三是由于波兰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是惟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的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在高度评价波兰这个全世界的革命战士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强调指出，在革命的问题上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被压迫民族首先必须争得民族的解放。这在于，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 而只能陷入瘫痪状态 因此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心血、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 争取民族的解放。二是民族革命成功之后，会进一步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 民族革命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世界革命“，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 它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②。这样 民族革命同时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三是在进行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必须与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民族革命才能获得成功。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其他的阶级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考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 第 630 页。

虑波兰问题的 而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将这一问题处理好 因为无产阶级将解放全人类的任务放在了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历史进程中 将二者高度地统一了起来。因此“，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①。这样，马克思就突出了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关联 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 使之成为了东方社会谋求解放和发展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1875年12月3日 拉甫罗夫请求马克思在由符卢勃列夫斯基主持的定于12月4日举行的波兰大会上发表演说 马克思由于健康的原因 婉言谢绝了这一请求 但他同时强调指出 自己和以前一样 认为‘波兰的解放是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②。再次强调了民族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恩格斯也给符卢勃列夫斯基发去了内容大致与之相同的信件。

1880年11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和列斯纳联名给11月2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国际大会寄去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波兰的优秀儿女在世界革命过程中做出的伟大的贡献，尤其是高度评价了波兰革命流亡者在捍卫巴黎公社伟大事业过程中的重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在自己的祖国以外 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战士”。当看到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争取波兰解放的斗争蓬勃开展时 马克思希望这种斗争‘和我们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来’^③。这样，马克思就进一步深化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7页。

号召，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是要求全世界的无产者要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之间要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晚年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总之，马克思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东方革命和西方革命的互补性的（即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互补性）将民族革命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来考虑，这样，马克思就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他看来，东方社会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取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之长以补自己社会发展之短，在自身的基础上通过革命的互补，在与西方革命的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过程中，就可以实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跨越，向社会主义过渡。

四、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逻辑展开

在适应革命实践要求、完善科学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经过精心的研究，在回答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勾画出了一幅东方社会发展的辩证图景，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确立了东方社会理论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为我们今天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研究东方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晚年，尽管俄国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现出来，马克思抓紧了对俄国问题的研究，但是他一直是处于收集和资料的过程中，没有从正面系统地论述自己的看法。尽管马克思看出了民粹派的局限性，但他一直是以一种隐讳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批评的。而到了1877年，事情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米海洛夫斯基在自由主义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

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对《资本论》进行了曲解 希望俄国以农村公社为支点来走向社会主义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错误看法 马克思于 1877 年 10—11 月写了《给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篇文章中 马克思以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为例，论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马克思又为什么要对他进行批评呢？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是俄国的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 社会学中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拥护者，为《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个杂志的编辑之一。针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茹柯夫斯基在自由派报纸《欧洲通报》上对马克思的攻击 米海洛夫斯基毅然地站出来捍卫‘热血男儿’马克思 反驳了自由派对马克思的恶毒攻击 在《祖国纪事》的第 10 期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反驳文章 但是 他是站在民粹派的立场上进行这种‘捍卫’和批评的。米海洛夫斯基只承认《资本论》的逻辑感召力，而否认《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在俄国的有效性。他认为，《资本论》表明了马克思的罕见的逻辑力和渊博的学识 由于它的逻辑的严谨性和完整性而充满了诱惑力 因而在《资本论》面前应该有所保留这就否认了《资本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其他的民粹派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希望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毫无根据地否认俄国存在着资本主义。马克思一看完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 马上用法文写了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对米海洛夫斯基进行了批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

围绕着如何评价民主主义和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的问题 马克思突出了将‘观察的客观性’作为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首要原则的重要性。米海洛夫斯基在《资本论》中找不到支

持自己的论据 就抓住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中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1812—1870)的一段批评性的插语不放,认为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者所寻求的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努力是并不同情和支持的。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马克思批评了赫尔岑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中发现了所谓的俄国的共产主义,并希望用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来使腐朽的旧欧洲获得新生。显然,马克思是不同意从书本上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的,而要求人们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是不同意从反动政府的帮凶的书中寻求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而要求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根据自己的研究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①。

而事实上,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者寻求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努力和尝试是持同情和赞成态度的,尤其是马克思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因为马克思在看到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特点的同时,还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超越性的特点。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曲解,马克思提到自己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以高度的尊敬谈到了俄国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可以具有自己的方式,他集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39页。

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他自己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显然，这里讲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超越性的问题，超越决不是无条件的超越，而是要以一定的条件为补充的，俄国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以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为前提条件的，因此，马克思表示自己赞同车氏的看法。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①。

那么，在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呢？马克思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俄国自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来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旦它通过掠夺农民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受到铁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②。正由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揭示也同样适用于俄国，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产生出了否定自身的因素，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给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这样，实际上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可见，《资本论》可以适用于俄国的地方在于：“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40 页

律的支配'^①。

事情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具有一般的意义。马克思反对无条件地将自己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运用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不承认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由此来看，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并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固定化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多样性的特点说明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同样的社会发展进程却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后果。例如，在《资本论》的许多地方，马克思就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受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但在罗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与其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这样，终于有一天，一方面出现了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所有财富的人。结果，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这些人比过去美洲南部的“白种贫民”更为卑贱。正因为“极为相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1—342页。

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因此，千万不能将社会发展理论固定化，而应寻求具体的社会发展之路。

最后，马克思特别提出应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思维原则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一般方法论确定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思维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在探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在对俄国的社会发展作了上述具体的阐述之后，马克思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发展理论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这就是要求我们不能教条主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而应对具体的历史条件多加分析和把握，通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最终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即应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这就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选择好发展的参考系和坐标系，找准发展的基准点和突破点。

就这样，马克思在纠正米海洛夫斯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曲解时，将理论和实践高度地结合了起来，从正面第一次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俄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站在一般和个别相统一的辩证思维高度，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事业。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42页

（二）东方社会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在实际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充分运用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根据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探讨了东方社会走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沃龙佐夫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查苏利奇等人讨论了这篇文章，结果形成了两派意见，大家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代表后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致信马克思，请求他谈谈对俄国历史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公社命运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并引发了在革命者中间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当时在俄国，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作为一种古老形式的农村公社注定要在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面前（历史、科学社会主义）灭亡。针对这种情况，查苏利奇向马克思建议：“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①她还表示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一本小册子来回答这些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就写一封信。

马克思一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后，就着手准备回答她提出的问题，在四易其稿的基础上，1881年3月8日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了信。将这四个稿子综合起来看，马克思对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57页注释392。

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看法。

从结构上来看，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共由五个部分构成，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论述了以《资本论》为核心和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否普遍有效的问题。这是四个稿子都探讨了的问题，是复信的重点。在初稿中，马克思就这个问题谈了两点看法，一是指出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分析只限于西方；二是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在西方是将一种私有制变为另一种私有制，而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它们的私有财产。

第二，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这在第三稿中也有所涉及，成为复信的立论的根据。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存留的原因和后果。在历史上，在西欧各地都普遍存在过公社，但西欧的公社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都消失了，惟有俄国的公社存留下来了。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公社没有能够摆脱其原始的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的范围内发展起来。这在于，俄国不是脱离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这就是说，俄国的公社已经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中来了，它既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就，以发展壮大自身，而又不需经历资本主义的磨难，与公社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危机；同时，它避免了殖民主义之苦，保持了自身的相对稳定性。农村公社作为未来社会的新生支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是合理的。假如农奴制改革不破坏它的正常发展的条件的话，俄国的社会发展就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公社的可能命运，马克思对农业公社和

原始公社进行了比较。在总结自己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两类公社进行了区分。农村公社不同于原始公社的地方主要在于，从公社的社会基础来看，原始公社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的；而农村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狭隘的联系，扩大了公社成员之间的交往从公社的物质基础来看，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在农村公社中已经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了；而在原始公社中，共有的房屋是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从分配原则来看，在原始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而在农村公社中，作为共同财产的耕地却要在公社的成员中定期进行分配，每个农民奋力耕种分配给自己的田地，将产品留为己用这样，马克思就将原始公社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剥离出来了，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正确把握农村公社的性质。

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既保留了公有制的因素，又出现了私人占有的情况，这就使得农村公社的发展具有了多种的可能性。由于农村公社保留了公有制及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这就会稳固公社的基础，同时，由于私人占有了房屋、园地和产品耕地分成小块耕种，这就使与原始公社不相容的个性获得了发展，所有这一切就可能成为公社新生的支点。另一方面，由于动产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使农村公社成为了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公社的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这样，农村公社的发展就具有了多种的可能性，或者是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从理论上讲，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上，“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5页。

在分析了农村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将社会发展规律的跨越性的问题突出出来，强调了俄国农村公社在自身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即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指出，由于在俄国的农村公社中存在着土地公有制，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适合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俄国社会又有义务给农民提供必要的垫款，加上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 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 因此“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①，这就成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新生支点。马克思肯定了社会进化的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他向“社会的新栋梁”反问到 如果你们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那么，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俄国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一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你们怎么能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呢？

当然，马克思也看到了公社的消极性及其后果。农村公社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的孤立性，公社同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这种孤立性又造成了公社的软弱性；最后，由于人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就容易使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

第三，马克思通过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现实状态，就俄国如何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理论上讲，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新社会的支点，但是，在现实中，俄国的农村公社却正在走向衰亡，这就是农奴制改革使公社处在了不正常的条件之下。从农奴制改革以来，国家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5页

借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公社成为了国家财政搜刮的对象；像商业、地产、高利贷等这样的外来力量侵入了公社内部，肆意地盘剥公社；社会的新栋梁靠吮吸公社的血液来使自己发财致富。在这种破坏性作用的促进下，农民的地力已经耗竭，农民的贫困日益加剧，丰年被荒年抵消。这样，公社走向衰亡就是自然的了。况且，即使单纯是由于动产的私有化的发展，就会打破公社内部的利益格局，最终导致公社的瓦解。

只有生存才能发展 那么 如何才能拯救公社呢 这里 决不能利用西方的发展方式来解决俄国的发展问题，“甚至仅仅从经济观点来看，俄国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① 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才是可行的出路

当然，这种跨越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首先，实现跨越要有经济上的需要。所谓经济上的需要，也就是要把公社置于正常的条件之下，使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由于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使用比较原始的工具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地力，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其次，实现跨越要有进行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显然，在公社内部不存在设备、肥料和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但公社与资本主义的同时并存恰好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只要公社大胆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成就，就可以用大机器农业代替小地块农业。最后，要挽救俄国还必须要俄国革命。“一方而，‘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

境 另一方面 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 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 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 这是实现跨越的社会保证。

第四 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两类公社 认为原始公社衰亡的原因是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不同的。

马克思将公社划分为多种类型，认为如地质的层系构造一样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公社本身也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的 公社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等一系列的类型。根据粗浅的研究就可以看出 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都要强大得多。致使原始公社衰亡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超出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提醒人们，在阅读资产阶级学者撰写的史前社会理论时 必须要有所注意 因为这些人是不惜伪造历史的。例如 梅恩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人们相信 政府为维护公社做了崇高的努力 只是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才失败了。这样，马克思就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史前社会是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但研究史前社会问题的人却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进行自己的工作的 因此 对待他们的史前社会理论成果必须要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第五 马克思在进一步考察了俄国公社的现有处境后 再次强调了革命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正受着国家的搜刮、外来力量的剥削，致使地力耗竭、农民贫穷 当这种盘剥超过一定的限度后 农民就

再也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了，但心怀叵测的国家和社会的新栋梁们却将群众推入了灾祸之中，并以嘲弄的口气说公社所受的创伤正是它衰老的征兆，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马克思在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上仍然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并且认为 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 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 那么 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的同时，突出了社会革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的的作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主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选择作用和能动作用。

当然，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回答还是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仍然十分强调两个必然性这一社会发展的大势对个别国家发展的规范性。他之所以强调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作为新生的支点 就在于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的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文明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 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这样 马克思不是就事论事 而是综合了自己自 70 年代以来的理论研究成果 并在这样广阔背景下 回答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但马克思对之并不满意 又在这个稿子的基础上 起草了复信的第二稿。第二稿的核心问题是新增加了对资本主义暂时性的分析，论述了俄国公社在世界历史的情况下实现跨越的可能性。而没有直接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三稿则由两个部分组成。在叙述

上比较凌乱 因此 有人怀疑这一稿为第二稿 而第二稿其实是第三稿。

在这三个草稿的基础上 马克思于 3 月 8 日正式给查苏利奇复信 用简练的语言回答了她的问題 就俄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必然性的分析是针对西欧而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就是说 由于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不同于西方 因此 不能用以西方为对象的社会发展理论来解决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而 在一般的意义上 由于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多样的表现形态 因此 要根据不同的发展对象来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社会发展理论应该着力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

第二 造成对《资本论》的这种限制的原因是 东西方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 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 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 在俄国农民中 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于俄国公社的特殊性（包括自身的状况和所处的环境）因此 俄国可以在公社的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进而 在一般的意义上 社会发展的常规往往是通过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渐进性是通过跨越性表现出来的 这样 社会发展理论的重点应该是着力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渐进性与跨越性的关系。

第三 不能将《资本论》机械地照搬到俄国 它既没有提供俄国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俄国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马克思根据自己对原始材料的专门研究深信不疑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 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的影响 然

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① 俄国实现跨越要凭借一系列的条件 在内部要有经济上的需要和物质上的改造条件以及社会革命，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它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则为跨越提供了外部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千万不能盲目冒进，首先应该为社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散力为合力，可见，社会发展理论的生命就在于为具体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智力支持。

许多人通过收信人查苏利奇知道了马克思复信的内容，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得到了复信的一份抄写件。这样，马克思的俄国社会问题理论就在俄国革命者中间得到了传播，为俄国革命者寻求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 根据自己自 70 年代以来的潜心的全新研究 在科学地回答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 解答了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的难题 系统总结和概述了自己 7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是在理论上 他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和事例阐述了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不仅丰富、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而且使社会发展理论得以具体化和实践化 使东方社会理论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品格 预示着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降生。同时 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二是在实践上，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提供了锐利的战斗武器 为广大的东方国家参与世界历史进程 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共产主义曙光的必然来临！

（三）从农奴制改革看俄国社会矛盾的激化

俄国在 1861 年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在经济上，改变了原有的野蛮落后的自然经济，建立起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体制上，开始向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转变。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使俄国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反倒加剧了社会矛盾。这样，1861 年农奴制改革的原因、实质和结果，就成为马克思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在系统地整理和概括自己所积累的材料的基础上，于 1881 年年底或 1882 年年初，写下了《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这是马克思研究俄国的统计资料和其他第一手材料、俄国社会经济材料后形成的科学成果。这篇札记除了引用收集在许多笔记中的材料外，还引用了已经系统化了的实际资料，对俄国 1861 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做出了重要的结论。

马克思全面地考察了改革后的农民和农村的状况。他发现农民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经常由于地主的掠夺而吃糠咽菜，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比农奴主更为严重，而高利贷者和富农更是抓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加上农业歉收，农民常常忍饥受饿直至死亡。而专制国家不仅不帮助农民脱离苦难，而且将繁重的赋税和债务转嫁在了农民的头上，政府从解放了的农民身上得到了众多的好处。这说明，农民在经济上的贫困是同他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无权地位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农民的反就是对顺理成章的了，“1861 年 2 月 19 日（3 月 3 日）的解放诏书颁布以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他们认为诏书是虚假的、伪造的文件，武装镇压开始了，在‘诏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内农奴普遍遭受了鞭笞”^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53 页。

马克思揭示了 1861 年改革的实质。通过对改革和改革后的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马克思认为，俄国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实不过是一个掠夺农民的过程，因为俄国统治者采用了半保留农奴制关系的所谓的暂时义务状态的办法来长期地维持农民的不自由的状态。由于农民要用赎金来换得人身自由，因此，赎金是用法律的手段将对农民的掠夺固定下来了，沙皇在改革的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而给农民的尽可能少一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改革的掠夺性质：“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原先的地主。”^①由此来看，这场改革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沙皇也决不是什么“解放者”。

当然，马克思也看到这场改革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将 1861 年的改革看做是工业新纪元的开始，他密切注意着俄国工业的发展、新工厂的建立、市场的扩大、铁路的延长，特别重视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的增长。马克思清醒地指出，改革后的俄国存在着多种的经济成分，公社所有制的遗迹、农奴制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最终会引发社会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所谓的改革不能解决东方社会的问题。

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这一篇札记，这在于他不愿意在还不完全成熟的形态上就将之公之于众，严谨是他一向的作风。

（四）东西方革命的互补对于东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第一次将自己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思想公之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63—464 页。

众的是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882年1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为在日内瓦出版的、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作了《共产党宣言 1882年俄文版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要走一条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是，俄国革命必须要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只有在东西方革命的互补过程中，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起初，马克思对民粹派的另一个组织——“土地平分社”是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早已过时的无政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关于放弃政治的主张影响了土地平分社的观点和策略，土地平分社成员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企图靠翻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①。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自己应该进行的工作，他竭力帮助俄国革命者消除内部的分歧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当马克思于1880年12月收到通过莫罗佐夫转交给他的邀请信，请求他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时答应为他们决定出版的著作专门写一篇序言。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就是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一种出版的。俄文第一版是由巴枯宁翻译的，1869年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在当时的西方被看成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随着世界革命的发展和俄国形势的变化，这种看法是不可能再有了。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拉甫罗夫将他们为俄文《共产党宣言》新版所写的序言交给了该版的翻译者即作为土地平分社领导人之一的普列汉诺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3页。

莫罗佐夫是这一重要事件的促成者和见证人。但他在从伦敦返回俄罗斯后即被逮捕，直到 1905 年释放之前，他对自己和马克思商谈的事情的进展状况一无了解，而到了 1930 年他才看到了马克思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 这就勾起了他对这件事的如下回忆：“他还答应我 只要我们把准备出书的译文的最初清样寄给他 他就给我们写一篇序言。在 1905 年底被释放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和马克思商谈的那件事结果怎样。后来也不知道 直到 1930 年 我在别人寄给我的政治苦役犯协会出版物《民意党文献》中突然看到马克思给《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 这篇序言收入我参加创办的《社会革命丛书》)这才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我想起了和马克思父女的会面，想起了我在仓促离开日内瓦去俄国的时候 曾把他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准备译成俄文的书籍交给留在那里的一位编辑《社会革命丛书》的同志 好像是普列汉诺夫)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在马克思的那篇序言中谈到了如下的话：‘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 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 被禁锢在加特契纳 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一字不差 这正是我们分别时他对我说的话。”

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 世界历史 和俄国问题的交汇点上 以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为准绳，说明东西方革命的互补是俄国土地公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起点的前提条件 对 70 年代以来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探讨进行了一次综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分析了自 40 年代以来俄国性质的变化。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 俄国和美国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维

护者和支柱，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的后备军；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甚至连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惟一救星 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 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到俄国。但是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估计到了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奋斗的目标 揭示这一社会发展的大势就是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的和核心的论题。但俄国的情况与西欧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就是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存在着特殊性，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外，俄国的大半土地仍然归农民公共占有 这样 俄国社会发展的的问题就是：“俄国公社 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 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② 这就是说，俄国的社会发展是遵循着渐进性的方式进行呢，还是遵循着跨越性的方式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补，是俄国社会走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全世界都成为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 俄国和美国一样 既向欧洲提供原料 又成为了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参与到了这个整体中了 若再考虑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危机的话 那么 俄国在自身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

具体发展阶段，就可以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但这种过渡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种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应发挥社会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而革命就是这种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体现。但不能在一国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因此，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它回答了在广大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在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渐进性特点的同时，突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动性和跨越性的特点，不仅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问题的思想以及 70 年代以来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思索和研究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推进了俄国革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这样，通过上述四个重要的文献，在东方社会理论获得独立品格的过程中，马克思事实上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大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1 页。

第三章 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 具体构成和规定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

——马克思

社会结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论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从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促进社会发展，这决不是主观人为设定的，而是由于社会有机体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作为社会结构基础层次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使社会形态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凭借自身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结束了史前时期（广义）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工业国和农业国的二元世界格局。在这种特定的格局中，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西方工业国迅速走在了世界发展的前列 相比之下 广大的东方农业国日渐落后 处在了被动挨打的位置 因此 农业国如何尽快地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就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社会发展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而所谓的社会发展问题, 其实就是东西方之间、南北之间的一种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问题, 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结构跃迁的过程。一般来讲 它表现为“在政治上是从现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开始, 接着又推翻统治这种现代国民国家的绝对王权制 市民社会 而实现民主主义 在文化上是由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革命横扫非合理主义 又由从洛克、休谟到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等启蒙思想的普及 把合理主义推广到政治、经济、社会的领域 在社会结构上 是赋予农业社会特征的父权家长制的、村落共同体性的秩序在产业化过程中走向崩溃 核心家庭化、功能群体化 法理社会化 和城市化伴随着产业化而向前发展。”^① 也就是说, 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因此, 在研究和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从社会结构入手, 这样 建构一种不同于史前时期 广义 的新社会结构就成为了现代化的主题, “现代化表现出两个密切关联而又相互区别的方面。首先是形成一种社会结构 它既包含着各种结构的分化和变形 又包含着持续变化的结构形式、活动和问题 以及持续变迁和制度变革的倾向。但是 仅仅是这些倾向的发展本身 并不表示能制定出一种制度结构 从而以相对稳定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变迁的问题 并同时保证文明秩序的维持。因此, 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 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 换言之, 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 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

[日]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12页。

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①。马克思晚年在坚持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分析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突出了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具体性问题，要求人们从社会系统构成的角度来全面地实现社会发展。

一、马克思的一般社会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一般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就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同时奠定了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结构分析，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决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活的机体——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组成的整体——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社会系统的组成、结合方式，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指的就是社会系统中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讲，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的总和，其核心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②。

[以] J.S.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25 页。

（一）社会结构的含义

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各个要素的基本的结合方式和方法；这种客观的社会结构为对社会系统进行结构分析提供了可能，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马克思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论。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社会结构是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社会结构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结构，它是由于社会系统中内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因此，它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然的强制性。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这种强制性，来源于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社会过程中一种既得的力量“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关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社会结构就具有了层次性，它基本上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1—72页。

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总之 社会有机体就是在这两种矛盾、三个层次的互动中，不断地在开放中建构自身的。这样，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分析就超越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结构的狭隘理解，成为了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的世界观基础。

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为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结构分析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 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析法 它为认识和分析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重复性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客观性的原则，这是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结构分析的首要的要求。这就是 在认识和分析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区分清楚社会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并且始终要看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因此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首先应该是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 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来寻求社会的全面繁荣和进步，使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这样，就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获得了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 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 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因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2页。

言而喻 没有这种观点 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①。这里 列宁强调的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所具有的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与结构主义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 因为它始终强调 社会结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构 必须要区分清楚社会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 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的过程就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矛盾分析的过程,要不遗余力地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主题。

(二 社会结构的系统性

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内在的关联在总体上是不可分割的,由此使社会结构获得了各个层次所不具备的性质和功能,社会系统就是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所形成的这种必要的张力中形成的 因此 系统性成为了社会结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个系统中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层面 但是 只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 这种区分只是为划分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根据)而普列汉诺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就进一步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五个子项,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以下五项因子构成的“(一 生产力的状况;(二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 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

《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9页。

种思想体系’^①。这样，就要求人们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社会结构，在对社会有机体的分析中应该将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统一起来，也就是要看到社会结构总是社会系统的结构，而社会系统总是由社会结构构成的。社会系统的构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应该从多种角度划分社会结构。

一方面，应该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活动的系统性来认识和分析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不是一种无人的‘死’结构，脱离人尤其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结构只能是一种主观上的虚构，社会结构就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正是由于人类活动本身是具有内在的结构的，因此，才使得社会有机体具有了结构。而人类的活动是多姿多彩的，马克思将人类的活动划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种类型，并且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与此相适应，技术生活和生态生活也是人类的基本生活内容，它们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越来越具有重大的作用，技术活动和生态活动日益成为了人类活动的重要的形式，从而将人类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技术生活和生态生活等几个方面。

另一方面，可行的方法应该是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相统一的角度对社会结构做出区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是与社会形态对应的。由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中的能动的、活跃的因素，而其他社会结构要素是建立在这个要素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一要素的变动必然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可见，社会结构的变更和转换的过程就形成了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就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得以更替的，并且获得了新的内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这个进程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因此，必须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社会有机体。事实上，在社会结构方面，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社会形态还可以区分为“科教的社会形态”、“生态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的社会形态”等等。可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也难以反映社会结构的全貌。

其实，上述两种划分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人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必然要随着人的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形态就是社会结构全面变迁的结果。因此，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可以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经济的社会形态）、科教结构（技术生活、科教的社会形态）、生态结构（生态生活、生态的社会形态）、政治结构（政治生活、政治的社会形态）和主体结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文化的社会形态），当然，这不可能穷尽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但是，可以避免单纯结构分析的局限性。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33

（三）社会结构的具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在“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双重变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科学的、艺术的整体。在认识和分析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的同时，还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造成了社会形态的更替，而作为社会发展起端的现代化就是在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作为“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结束史前时期，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在于它确立了机器生产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嬗变，“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②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全面的变迁过程中，就形成了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落后民族从属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页。

于先进民族的“世界历史”格局，由此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社会发展的问題就这样提了出来，即如何从传统社会跃迁到现代社会的问题、从农业社会跃迁到工业社会的问题。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就是从传统和现代的对比中来看待现代化的。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在 1873 年之前尤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是以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英国作为典型进行的在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社会结构的同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阐明了一般社会结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指明了社会结构变迁形成的现代化的一般社会发展过程，主要论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因素及其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在事物发展的典型形态上对社会结构进行的分析和把握，可以将之称为对社会结构进行的“人体解剖”。尽管如此，它却具有一般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先进性和典型性决定的。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展示出来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广大的东方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普遍的规范意义。

但是对广大的非西方非工业非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需要进行具体的工作。这在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它们的现代化又是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进行，在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同时，它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来加速自身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可见，“人体解剖”并不能完全代替“猴体解剖”，在对待东方社会、农业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进行“猴体解剖”——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对东方社会、农业国的社会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对东方社会、农业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反效应要有充分的估计。即使在进行典型的“人体解剖”的时候，马克思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

可见，“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代表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两个互补的维度：前者是典型性的分析，后者是发生学的考察。离开后者，前者就会丧失其普遍性，而离开前者的后者就会缺乏科学性。因此，我们只有将它们统一起来才可能对社会结构做出一种历史的、整体的、具体的认识和把握。正是沿着这种思路，马克思在1873年以后借助于文化人类学和东方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进一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了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将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对照起来进行研究，揭示了史前社会结构和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突出强调了非经济因素、人自身的生产、主体的选择等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展示出了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可能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从发生学意义上进行的这些工作，就是对社会结构进行的“猴体解剖”。除了一般的社会结构理论外，马克思晚

年的社会结构理论事实上是由史前社会结构理论和东方社会结构理论两个方面构成的。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人体解剖”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这一从“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探讨东方社会、农业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使社会发展理论从设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结构分析的传统同样是由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有一个结构主义方面”，因为马克思把属于现实的‘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①。

二、马克思晚年的史前社会结构理论及其科学价值

社会结构决不是一种僵死的结构，而是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不断地建构的一个过程。在社会结构的重组、新生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在不断地变化。同样，在社会形态的嬗变过程中，社会结构又进行着新陈代谢。因此，只有对人类社会的史前状态有了科学而准确的把握，才可能科学地说明作为“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暂时性，才能为东方农业社会找到一条既保持自身的合理传统又吸收西方工业社会现代化成果的社会发展之路，历史唯物主义也才可能成为科学而全面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样，确立科学的史前社会理论（探讨原始社会及其向私有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就成为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当务之急。这一问题终于在马克思晚年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① [瑞士] 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7—88页。

（一）从两种生产出发来分析史前社会结构

两种生产并存的局面决定了史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史前社会结构理论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在史前社会结构问题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从两种生产出发来分析史前社会结构的方法论要求。

史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前社会结构理论的特殊性。要解开史前社会之谜，必须要把握婚姻和家庭等血缘亲属关系，因为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地区，作为社会结构基本单位的社会制度是受两种生产制约的，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由之产生的社会关系，二是人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及其由之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人自身的生产同样是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血缘亲属关系同样是物质性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史前社会的总体的社会结构图景，也体现了史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因此，在研究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必须要运用好两套概念系统并要将它们统一、协调起来：一方面，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的角度来审视史前社会的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对史前社会的特殊结构进行具体分析，要看到人自身的生产、血缘亲属关系在史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的作用。只有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协调起来，才可能科学地说明史前社会的特殊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关于人类的史前社会的状况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关于私有制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问题的怀疑、对于其暂时性的论证只能是一种道德上的方式，由此，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确立。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成为了影响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例如，关于阶级的产生和分化问题是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个基本的主题，而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和确立史前社会理论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还没有彻底地、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断定：至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大量的实证材料表明，在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私有制社会产生之前，还存在过一个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就是从之发展而来的。这样，阶级社会和私有制社会是如何从无阶级、公有制的社会产生的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千古难题。这样，不确立史前社会理论尤其是不确立史前社会结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的这一难题。而这就要求我们对史前社会必须做出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只有对社会结构进行‘猴体解剖’以后，其内在的构成及其方式才是真正可理解的。

马克思晚年经过对文化人类学成果的深入研究，通过对文化人类学成果的批判吸收，在创立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开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领域的同时，也创立了科学的史前社会理论，提出了应该综合地运用两套概念系统来分析史前社会结构的方法论要求。这从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结构的批判性改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摩尔根的原著中，是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马克思‘古代社会笔记’的结构为：一是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的发展（生产力）；二是家庭观念的发展（人自身的生产）；三是财产观念的发展（经济基础）；四是管理观念的发展（上层建筑）。这就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原始社会是建立在两种生产的基础之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私有制（经济基础）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上层建筑）；导致了氏族制度的灭亡（从史前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可见，马克思的

“人类学笔记”决不仅仅是一种阅读的笔记，而且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是科学的史前社会理论创立的标志。马克思在对史前社会结构分析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猴体解剖”的手术刀，这是我们打开社会发展秘密的一把宝贵的钥匙。

（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仍然是分析史前社会结构的科学方法论

在分析和把握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必须从分析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入手，来寻求社会结构发生和嬗变的秘密，应当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史前社会就存在了，因此，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仍然是分析史前社会结构的科学方法论。

生存是人类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它在史前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在于，作为感性存在物的人具有吃喝住穿等一系列维持生命的需要，而在人自身中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人就必须将自己的需要对象化，引起自身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而劳动正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摩尔根在考察史前社会的过程中，正是首先从考察由各种发明和发现而来的智力的发展（生产力）开始的，在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认为：“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

相应一致的关系”^①。尽管这种表述不尽准确，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发现和证实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普遍有效性：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史前社会中也是如此。这正是摩尔根科学成果的价值所在。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还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依据，把史前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个时代，以发明和技术为界标，每一个时代又可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这样，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划分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就能大体上描绘出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完全照搬摩尔根的看法，但是，《人类学笔记》基本上采用了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并用极其明确的语言描述了每一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后来，恩格斯将摩尔根和马克思所划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的特征做了如下简要的概括：“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②。可见，生产力在整个史前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就以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面貌存在了。

同时，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生产关系在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在采纳摩尔根分期法的同时，还考虑到了原始共同体演进的形式在史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因为史前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血缘纽带联结下的整体性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这样，人类共同体就成为了史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前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史前社会分期的客观依据除了生产力发展的线索外，还应注意生产关系的变化轨迹。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对之做了动态的考察。这就是，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在它之后产生了母系氏族，形成了氏族公有制的社会结构，史前社会进入了它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血缘纽带联结下的整体性生产者同日益增多的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直接结合，通过氏族的集体劳动，生产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此时，在给个人或小集体分配社会产品的过程中，除了以他们是集体成员资格作为依据外，还考虑到了他们参加创造产品的个体劳动因素。这样，公有制就由血缘原始群单一结构发展成为了个人、氏族、部落的多层结构。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母系氏族为父系氏族所代替，史前社会便进入了它的解体阶段。私有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阶级和国家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这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基础上，就产生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思想观念存在的同时，产生了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矛盾。

在研究文化人类学成果、分析史前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深刻地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始终将生产力看做是第一位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亲属制度和古老形式的氏族组织是一起被发现的，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低级的形式发展到了高级的形式。与之相反，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正是根据这种情况，马克思指出：“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

律的以至一般的哲学的体系 都是如此’^①。同样，梅恩不了解国家产生的经济必然性 将它看成是道德影响的结果 而马克思根据史前社会的实际指出，作为社会结构组成成分的道德和国家一样都是第二性的 它不能成为国家产生的原因 国家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私有制——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必然会为一种新的公有制所代替 在那个时候 国家必然会趋于灭亡。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 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 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②。总之，尽管史前社会的结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但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却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这种结构存在着一个从潜在到突现、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 毋庸置疑的是：“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 这不仅表现在发明的数量上 而且也表现在由这些发明造成的财产种类和总额上”，财产的增长是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个文化时期的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增多以及社会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的’^③。

（三）人自身的生产在史前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分析和把握史前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还必须要注意到史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要充分估计到人自身的生产在史前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的作用，对氏族的起源和发展的考察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的。

史前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 而不是家庭 这是史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史前社会中，不管家庭的发展形式和程度如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354、646、378 页。

何，都是一半在氏族之内，一半在氏族之外，丈夫和妻子分属于不同的氏族，这就是说，夫妻双方并不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集团中，所谓的家庭只不过是传统和习惯所认可的一种男女婚配的范围。这样，家庭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而氏族却与之不同，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维系它的根本纽带是内部禁止通婚。摩尔根的研究表明，氏族起源于最早的血缘杂交集团，它以母权制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它一开始就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存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明确地揭示出了氏族产生的前提，“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旦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面生长出来，而不会更早。氏族的前提条件，是兄弟和姊妹（嫡系的和旁系的）已经从其他血亲中区分出来。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的变化”^①。氏族制度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因此，氏族社会的组织情况，其实就是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具体体现。由于氏族社会是在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的，而血缘亲属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正如柯瓦列夫斯基指出的那样，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氏族公社，其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耕地，并用共同的收益满足自己的需要”^②。概括起来讲，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为：一是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上实行原始的公有制，二是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实行集体生产，三是在产品的分配方式上实行平均分配，四是在氏族成员的社会关系上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五是在氏族社会事务的管理问题上实行原始的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499 页。

② [俄]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2 页。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人自身的生产在史前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被日益削减，而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被日益突现了出来，私有财产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氏族的解体。摩尔根对导致氏族解体的物质因素把握得不够，而马克思不仅充分估计到了物质因素在瓦解氏族中的作用，而且揭示出了这一解体过程的历史必然性：“氏族酋长等人由于财富等等已经和氏族的群众处于内部冲突之中 这种情况 在存在着与专偶制家庭相联系的房屋、土地、畜群的私有制的条件下 乃是不可避免的”^①。摩尔根认为 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氏族社会在地域上不稳定了 而马克思则指出：“不管地域如何 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此外，与土地和牲畜一起，货币资本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具有了决定的意义。”^②这样一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一跃而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导结构。既然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历史过程 那么 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社会最终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原始公有制复归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 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 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③这样 马克思就不仅将“财富（社会生产力）和”人性（自由、平等和博爱 作为了评价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尺度 当然 前者是第一位的 后者是第二位的）而且将铲除“异化”的人性和合理化作为了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基本的要素。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517、522、398 页。

（四 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的生产的制约性

在分析和把握史前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两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要看到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的生产的制约性，要看到人自身的生产之所以在史前社会结构也居于了主导地位，是由于物质生产的不发达造成的。

尽管氏族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但是在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是物质性的东西决定了史前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方向。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否定氏族的血缘关系基础，认为氏族只是观念地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认为“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而马克思指出：“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①这就是说，人自身的生产同样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血缘亲属关系同样是一种客观性的关系。其实，物质性的东西不仅是氏族社会的基础，而且也是决定氏族社会发展方向的客观力量，氏族社会的解体就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原始公有制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反映了人自身的生产对所有制形态的制约。但同样的是，史前社会的公有制也是生产力高度不发达的结果。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同自然界的斗争极其艰苦，没有协作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生产。这样，通过共同劳动的中介，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制上就确立公有制的形态。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游动的而不是定居的远古群的状态下，在只以渔猎为生的氏族中，财产还不存在‘不动产’的最古老形式是财产共有制，因为他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没有协作是不行的，他们只有靠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向自然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03页。

争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 [产品本身作为共同产品都是群的财产]。^① 当然，协作本身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可见，人自身的生产之所以能够在史前社会结构成为决定性的东西，同样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在分析和研究史前社会结构时所运用的两套概念系统就协调了起来，这就是，由于史前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就决定了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使人自身的生产成为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另一种力量；而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的地位开始消退，而生产力的决定性的、主导性的地位开始突现。

可见不能将“人体”的结构简单地套用在“猴体”上，“猴体”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人体”的结构就是在“猴体”结构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史前社会是通过强有力的血缘纽带维系的，其基本的单位是血缘亲属组织、氏族等，而人自身的生产是其决定性的力量，并将人性化和合理化作为了基本的结构层次（这是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分配的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由此成为史前社会的基础性的结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中开始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步地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力成为了基础性的结构。这就是史前社会的基本结构

通过对史前社会结构的分析，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确定下述社会结构因素在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了，具体来讲：其一，尽管史前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下，物质财富的匮乏造成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有限性；但是，史前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人道性要素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渗透在社会结构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210 页。

各个层次和方面 当然 这些观念是公有制、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等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灭亡固然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 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还源于它是一种剥削制度 追求剩余价值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运转的轴心，由此造成了不人道甚至是反人道的后果，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又为铲除“异化”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可能性。其三，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和必然的归宿 这不仅在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当然，这是第一位的和主要的)而且也在于共产主义将复活史前社会固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充满了人性化的要素，将再度确立公有制、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等史前社会合理化的生产关系 并会将之确立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实，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将这些因素建构为自身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

可见 马克思的史前社会建构理论 不仅弥补了过去理论的一些漏洞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确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前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这样就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科学的艺术的整体。

三、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结构理论及其科学价值

具体之所以是具体 是因为它是多样性的综合。同样 假如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与东方社会的实际发生关联 那么 它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就是存在局限的。马克思也看到，尽管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结构理论自然包括在内 经过了科学的检验 对于东方社会也是有效的 但是 由于自己没有对东方社会进行过专门的实际研究 因此 不能把《资本论》作为绝对的教条 而应该在《资

本论》提供的方法论范式的指导下 去着力把握东方社会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这样，确立科学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成为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进一步完善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晚年在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史前社会和东方村社的社会结构的对比和研究的过程中 揭示了东方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阐明了它们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能性 从而描绘出了一幅社会发展的整体图景。

（一）分析东方社会结构的方法论要求

东方社会在社会结构问题上与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相似性决定了其结构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东方社会结构理论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在东方社会结构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从土地所有制形式、劳动组织方式、政治制度结构等生产关系的要素来分析和把握东方社会结构的方法论要求。

70年代之前 马克思主要以英、法、德等先进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和典型 探讨了西欧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现实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状况、走向共产主义未来的方式和道路等问题，由此揭示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和统一性等问题。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将这种社会发展理论看成是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样，他就将落后的东方社会看做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看成是东方国家未来的征兆。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 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地域性的概念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位置。但是，马克思在70年代之前对东方社会的结构和发展问题的认识是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和检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揭示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亚细

亚生产方式'是指 将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村社制度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三者集于一体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那么，在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怎么会出现政治制度上的专制主义呢？其二 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容易引起纷争的概念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位置 没有将史前公社（原始公社 和东方村社 农业公社 这两种具有不同性质的公社区分开来。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晚年开始把视野进一步投向广大的东方国家 对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和考察 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 当然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动因，必须站在'两个必然性'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有待商榷 但它的内涵却在一定的程度上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由此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论框架。这就是，不能一般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角度来泛泛地分析和研究东方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方向，而应着重从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劳动生产组织的结构和方式、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形式这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东方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方向。马克思就是在运用这一概念框架对东方社会的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解剖和说明的过程中，更为科学地揭示出了东方社会的秘密。这就是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 使得土地所有制和血缘宗法制这两个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位置，而事实上 在形式上的公有制下掩盖着极端的私有制 由此才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最终才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和落后。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世界历史'的情况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东方社会、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嬗变。这种结

构上的冲突使得它们的社会发展具有了选择的可能性。这就是说 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 从东方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出发 应该充分估计到土地所有制形式、劳动组织方式、政治制度结构等社会结构要素在东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只有在经过对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这样的具体分析之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才进一步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才可能成为分析和说明社会有机体的科学的、普遍的工具。这就是说，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社会结构理论）是从矛盾的特殊性角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 必须要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

（二 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结构的特殊性

在分析和把握东方社会结构的性质和演化的方向方面，必须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藩篱 要看到东方村社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封建化的过程，东方社会土地私有制结构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其社会发展过程可能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东方社会在社会结构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最大的差异。但是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却存在着一个分化的过程，造成了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混杂的复杂格局，而这是由于其内部要素和外在环境、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的矛盾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从东方社会的内部因素和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公社所有制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内在的经济因素的发展 逐步产生出了土地私有制。柯瓦列夫斯基以印度为例对公社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马克思赞同他的看法。总的来讲 公社的发展经过了以下五个阶段：一是最初实行的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

氏族公社。二是氏族公社按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划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土地所有权的不可分割性和土地的共同耕作制在这里最终消失了。三是由继承权(即由亲属等级的远近)来确定份地因而份地大小不均的制度。战争、殖民等等人为的情况改变了氏族的结构,从而也改变了份地的大小;原先的不均等日益加剧了。四是这种不均等的基础已不再是距同一氏族首领的亲属等级的远近,而是由耕种本身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的占有。这就遭到了反对,于是,产生了第五个阶段。五是公社土地或长或短定期的重新分配制度等等。起初重新分配的只包括宅院(包括毗邻地段)耕地和草地,继续发展的过程便是导致将宅旁土地(包括毗邻住所的田地)变成私有财产,接着又将耕地和草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这样,从古代的公共所有制中作为美好时代的遗迹保存下来的,一方面有公社土地,另一方面有共同的家庭财产,但是这种家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的个体家庭了。公社土地所有制随着经济因素的增长而瓦解的过程,就使自身的结构具有了公有和私有的二重属性,这样,就使得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化方向具有了特殊性。

最后是从东方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处境来看,旧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已经被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为因素瓦解了,由此产生出了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政治和财政的考虑,任意歪曲公社的性质,蓄意破坏公社土地所有制,英国在印度执行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进行土地的重新登记(即所谓的永久性土地管理办法)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英国在印度于1826年实行了“马德拉斯制度”这样西方殖民主义给东方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有害结果,导致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主要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被破坏了,结果使外来分子侵入了公社,与农村毫无关系的城市高利贷者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致使高利贷在农

村大为盛行；高利贷者还极尽挑拨之能事，在公社成员中造成新的纠纷和矛盾，而自己直接从中坐收渔利。另一方面是把公社土地按区分割，削弱了公社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而这正是关系到氏族团体生命的原则。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和破坏，是在许多自古以来除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外不知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村社中，终于确立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农民都被迫成为了依附于地主的佃户阶级。由此来看，“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土地所有制”；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这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①。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开始在东方社会结构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东方社会的私有制的发展最终会促使自身的瓦解，东方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尽管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形成了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的局面，但是，由于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使得东方社会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可能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

（三）东方村社和史前公社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东方村社和史前公社在社会结构上具有一系列的差异，只有史前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而东方社会则是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形态。因此，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必须要将两类公社区分清楚。

在总结自己人类学和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公社（原始公社）和东方社会的公社（农业村社）进行了区分，进一步确立了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原生形态和东方村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位置。

首先，公社是存在多种多样的类型的，而只有史前社会的原始公社才是社会发展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从社会结构上对作为社会形态特殊形式的公社进行了区分，认为公社是存在多种类型的，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对原始公社应该作同样观，“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①。这也就是说，由于由于其构成方式的不同（社会结构的差异），公社本身也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的区分）。大体说来，公社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等一系列的类型。这样，马克思从社会结构上对公社性质的区分，就为从社会形态上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根据。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原始公社的性质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出了两个基本的断定：“（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2）它们衰落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越出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今日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②。马克思之所以断定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是要比其他社会的生命力强大得多，就在于，尽管原始公社的所有制形态和人道性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不发达的基础上的，但是，它们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在社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71、771—772页。

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复活公有制的所有制形态和人道性的价值取向。然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图式仍然是适用于史前社会的，是经济因素的增强导致了史前社会的解体，这种历史环境是和东方村社的历史环境是不同的。这样，马克思就确立了原始公社作为社会形态的原生形态的位置。作为社会形态的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东方村社和原始公社存在着一系列的差别。东方村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具体来讲，其一，从公社的社会基础来看，原始公社是建立在公社成员的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而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狭隘的联系，扩大了公社成员之间的交往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这就使它成为了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这样，它就有了比较广阔的发展余地。其二，从公社的物质基础来看，在原始公社中，共有的房屋和集体住所是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而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人财产了。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地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其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其三，从分配原则来看，在原始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共同的产品是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的。这种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是由于单个人的力量太小造成的，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而在农村公社中，作为共同财产的耕地却要在公社的成员中定期进行分配，每个农民奋力耕种分配给自己的田地，将产品留为己用。经过这样的比较，马克思就将原始公社从

“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进一步剥离出来了，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正确把握社会形态的原生形态和农业公社的性质。

最后，村社只是公社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是从史前社会的原始公社向现代私有制社会的过渡阶段。在与其他类型的公社的比较中，马克思以俄罗斯的村社为例，对农业公社的性质做出了明确的断定，认为农业公社是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形态：“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① 这也就是说，村社是一种在所有制的结构和形态上既具有公有制的因素、又具有私有制的因素的特殊的结构和社会形态。公社之间之所以存在着进化形态上的差别，是与其内在结构的不同紧密相关的，而俄罗斯村社就是这个进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的特定形态，“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② 即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从原始公社到私有制的过渡形式是不同的，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路径。另外，尽管这里将俄罗斯的村社看做是相当于日耳曼公社的一种公社，但是，二者存在的历史环境却是大为不同的，“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历史环境的不同就决定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也是不同的，“俄国吸取这种生产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50、448 页。

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①。在总体上，由于东方村社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便具有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在东方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得到了科学的扬弃，一是将史前社会的原始公社确立为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二是从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公私混有的特殊情况出发，揭示出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东方社会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负面后果，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四 东方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东方社会在社会结构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解体方式的多样性，但是在参照史前社会结构、西方工业社会结构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走向共产主义仍然是东方社会的发展方向，共产主义在东方社会仍然具有自己的历史必然性。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东方村社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二重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具有了二重性，一是按照渐进式的社会发展方式，沿着私有制的路径演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经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二是按照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方式，在吸取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使自身内部的公有制因素和人道性因素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东方社会到底何去何从，关键的问题是在观照世界历史的同时，根据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选择。

马克思以俄国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就第一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44 页。

可能性来说，大家都在崇拜资本主义，力求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 而经历危机的欧美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 却正在力求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 以合作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 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 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① 连资本主义都要向公社的最高类型——共产主义复归 那么 东方农业公社何必又要画蛇添足呢 就后一种可能性来说，东方社会在自身所固有的公社的基础上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揭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说明了公社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生支点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假如俄国的农村公社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获得西欧在几个世纪获得的经济成果 那么 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就是必然的。但是 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同于西方的原始公社，它不仅在全国的范围内将土地的公有制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而且它处在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形成的‘世界历史’的体系中。因此 俄国就可以大胆地吸收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成果，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改造为共产主义的公有制 这样 俄国的社会发展就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可见，马克思否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由此造成的种种的异化 而不是否定它所取得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成就 马克思肯定的是原始公社的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和人道性的价值取向，而不是肯定它的不发达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作为人类社会发必

然归宿的共产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极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造成的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向原始公有制的复归，要将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和人道性的价值取向新的基础上在社会有机体中得到新的确立和发扬光大。所有这些肯定性因素的互动，就是要在东方社会结构的嬗变过程中，进行社会结构上的创新，以此来实现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向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迈进。

四、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方面来认识和推进现代化

在社会结构问题上从“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的发展从西方社会到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说明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社会结构理论凝固化，而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同时对社会结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从社会结构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来寻求社会发展之路，将社会发展看做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成长的过程。因此后发展社会、后发展国家、后发展民族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就是在传统的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现代的西方的社会结构的冲突、较量中在保存和光大史前社会的合理结构、选择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建构一种融会贯通的社会结构，以此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的社会结构理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给予我们的基本提示和启示。具体来讲：

（一）在社会结构的重构、调整和建构中来实现现代化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社会本身是不存在所谓的结构的。在他们看来，社会结构是人们在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诱惑下，为了

控制以无限的偶然性和变动不居性而存在的社会，按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编造出来的概念模式；在转向后工业的过程中，应该对社会进行解构。其实，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之所以能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在于社会本身是一个由于自身内在的客观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构成的一个自组织系统；社会结构其实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展示。因此，在把握社会结构时，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突出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①。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欲图消解社会结构的尝试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其解构社会的观点，因为广大的非西方非资本主义非工业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有效地实现现代化，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的问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从社会结构上来寻求“异化”的根源，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系统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等交换性要素，有人、财、物构成的实体性要素，有生态关系、人际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891—892 页。

系、个人关系构成的关系性要素,有生产劳动、科学实验、阶级斗争和社会管理等活动性要素,有知、情、意等精神性要素,有真、善、美等价值性要素。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构成的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是说,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会促使社会有机体进一步分化,产生出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结构。可见,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划分社会结构,而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则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待社会结构的。“所谓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各种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的层次(微观层次)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宏观层次)划分出若干阶段,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社会阶层、国民社会。在这些阶段的哪一个层次上进行结构分析,这是社会结构概念化时的层次选择问题,作为结构概念本身,在哪一层次上来研究,完全是随意的。”^①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才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社会结构。

(三) 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

社会结构的多维性决定了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科教、生态、文化和政治等等一系列因素的整体过程,因此,应该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

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必须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待和审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马克思在考察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现代化是由一系列的原因促成。早在《德意

[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

志意识形态》中他就对这个过程进行了揭示“在 17 世纪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 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 18 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 1640 年和 1688 年的革命 法国 1789 年的革命。）”^① 在马克思看来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开启现代化的先河 是由经济（工业和商业 自由竞争）政治（资产阶级革命）科技（理论力学）等等一系列的条件促成的，但最为根本的是经济的条件促成的。后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典型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过程，进一步说明现代化构成的系统性 涉及到经济、科教、生态、文化和政治等一系列的因素。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涉及 尤其是在第三、四册中 通过对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分析，马克思追寻了资本主义因素是如何在动荡衰落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萌发和发展的。从系统性的角度来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也已经成为了国外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共识。例如，有的学者在揭示现代化的特征时指出：“从使用人力、畜力转移到使用非生物动力 从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机器作为进行生产活动的基础 就意味着财富增长、技术多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13 页。

化、分化和专业化 从而导致一种新型的劳动分工 以及工业化和都市化；这些是作为现代化的特征而被所有的学者接受的。对国家政权的支持者 从超自然的神转为世俗力量 权力日益扩散到更大的居民阶层 法律高于其他调节系统 这些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样 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角色派定 从归属原则转变为按个人的成就与功绩的原则 从质的方面改变了用人的基础 从而也改变了社会结构，这一点也被看做是现代化的特征。社会团结原则的主要转变是 建立在先定的、分散的、单一因素论基础上的‘机械性’团结转变为建立在契约的、专业普遍性基础上的有机团结 这一点也被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化的特征。学者们还认为 现代化过程意指从信神、注重来世、反对变化的观点转变为世俗的、现世的、向前看拥护变革的观点。学者们还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理性主义、人道主义、适合时宜性 以及改善今世而非来世的人类生活条件的必要性 构成了现代化文化观的标志。’^①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过程 当然是第一位的和主要的方面)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科教、生态、文化和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整体过程，是在社会结构的全面的嬗变过程中而建构起来的一个系统。

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体 因此 源于社会结构嬗变的社会发展只能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只有在经济、科教、生态、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因素都发生了转型之后 才能实现现代化。社会系统就是由这五个方面构成的 其中 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系统 科教结构是社会的支柱系统 生态结构是社会的保障系统 主体结构是社会的目标系统 政治结构是社会的控制系统。因

引自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2—33 页。

此，在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应该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建设，在极大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要注意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应该将这些要素匹配起来，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

（四）在社会结构的嬗变中实现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

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广大的后发展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将各种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的过程。在社会系统的全面的变革中，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嬗变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

在当前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就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相比之下，更显示出了第三世界的欠发展，这样，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再度提了出来，这就构成了第三世界的发展难题。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却可以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参照系中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方式和道路，它可以在几种不同的发展坐标系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位置，一是可以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成就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来加速自身的现代化；同时，它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进行选择，避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二是可以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现代的社会结构对接起来，充分利用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公有制的形式和结构、集体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公正的分配方式以及其他人道性的因素，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含义；同时，要抛弃其低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与这些传统的负面因素实行彻底的决裂。三是可以总结和利用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将西方现代化的有益因素和东方的优秀传统因素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 第三世界又具有了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发展优势，这个意义上，他们只是在发展的时间上显得滞后，一旦发展起来则可能走在发展的前列。只要后发展国家和民族保持自己的发展优势 化解自己的发展难题 他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发展，而这正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建构、重构和解构统一的过程。那么，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综合上面的分析和说明 我们认为 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过程 其实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的：一是在经济的社会结构层面 建构起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 从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建构起社会发展的基础系统。二是在科教的社会结构层面，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变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来 要实现生产的知识化和集约化 建构起社会发展的支柱系统。三是在生态的社会结构层面，要保障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化 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 建构起社会发展的保障系统。四是在文化的社会结构层面 要以实现人道化为目标 从而实现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合理化，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建构起社会发展的目标系统 五是在政治的社会结构层面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 应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从而为经济的现代化提供宽松、适宜和民主的政治环境，建构起社会发展的控制系统的。这五个方面的互动就构成了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广大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只有从这五个方面努力 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在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就将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

第四章 工业化和市场化：建构 社会发展的基础系统

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马克思

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才日益成为了“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现代化就是由此成为现实的。同样，东方社会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也应该首先从经济着眼，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来抓。因此，现代化的过程首

先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发展（狭义）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提供的框架内运行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现代化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建构适宜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结构的问题。

一、社会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生产力只有在适宜的经济结构中才能得到发展，因此，说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主题，也就是说，这首先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问题，是一个使社会生产力能够在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结构中获得充分、有效发展的过程。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含义和构成

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指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的构成方式，或者是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实现方式。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生产力得以活动的框架和舞台，社会系统的基础结构就是由此构成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经济结构具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狭义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生产方式，这是广义上的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首先是指人们借以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各种关系（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关系）的总和，它规定了其他层次的结构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以及这种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和比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

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社会经济结构就是由此成为了社会总体结构中的基础结构的。从生产关系的构成和演化来看，社会经济结构具体是指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由于二者的结合方式的不同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②作为社会系统基础结构的社会经济结构就是由此推进社会形态的演化和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它只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生产关系各个构成要素的结合的方式和方法。这是狭义上的社会经济结构。

同时，社会经济结构也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仅表现为通过生产产生的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不同方式（生产力）还表现为同人和自然的关系相适应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不同方式（生产关系）。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第44页。

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① 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是生产方式的同义语，它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包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的。这是广义上的社会经济结构。

其实 社会经济结构的这两种含义并不是矛盾的 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的。这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其实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首先表现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同时也就是作为生产关系构成要素的劳动者，二者不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者，正是由于二者的同一性 才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 假如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和作为生产关系构成要素的劳动者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者，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构成一种现实的矛盾 就不可能使社会系统向前发展。因此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其实最终总要表现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归根到底又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技术结合方式，一种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方式，由此，社会的经济结构便可以区分为技术性结构和社会性结构两个部分

马克思认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 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 在有分工

的条件下)的方式”^①。这样看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就包括两种类型或者说存在着两种方式,一是其技术性的构成方式这是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二是其社会性的构成这是人们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就是通过这两种结构实现出来的。

社会经济结构的技术性构成是指,劳动者是以什么样的技术方式来实现自身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使用和制造生产资料的。也就是说,劳动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的高度上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是如何生产生活资料的。正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技术性构成方式的不同才使得社会形态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②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技术性结合方式的不同就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化造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就使得社会系统中的经济领域进一步出现了结构上的分化形成了社会的产业结构,这样产业结构就成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技术性层面中的基本的方面。所谓产业结构,是指按产业部门的分工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是各产业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产业结构体现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技术性结合方式,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技术性层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以产业结构的变迁为特征的,在使得农业、工业和商业等产业部门的社会分工明确化之后,促使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到了现代的工业社会,从而彻底摧毁了旧有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分工“，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①。这样就使工业化成为了现代化的首要的特征和要求。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就是由此提出来的。

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性构成是指，劳动者是以什么样的社会性方式实现自身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技术结合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如何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性构成方式的不同，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的不同，才使得社会形态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在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在确立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技术性构成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以什么样的社会方式来实现这种技术结构，也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方式结合的问题。这样，经济体制就成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性结合方式中的基本的方面。所谓经济体制是指社会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形式不同（如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形式、经济管理方式、经济运行方式等等）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体现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方式，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社会层面。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以经济体制的嬗变为特征的。在摧毁了自然经济的束缚之后，使商品经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有效的形式，它为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4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3 页。

现代化成为可能提供了广阔的经济空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①。这样，市场化就成为了现代化的另一个基本的经济特征和要求，如何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同样是东方社会实现自身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将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看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两个基本构成部分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工业化和市场化就构成了现代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两个基本的层面或基本的特征。

（二）工业化和市场化促生了现代化的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揭示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首先是一个经济结构嬗变的过程，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工业化），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市场化）在此基础上才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嬗变，使现代化成为了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互动过程中，凭借资产阶级的手，人类社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现代社会。这就是现代化的开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②这就是说，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的经济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10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3 页。

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涉及，尤其是在第三、四册中，通过对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分析，马克思追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是如何在动荡衰落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萌发和发展的。一是进一步考察了圈地运动对社会发展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大影响，“羊毛价格的上涨又推动了农业的改颜换貌”，这种变化就是小块耕地的合并、大规模养羊业的产生。促使这种变化的是商人阶级的日益增长的财富”^①。这样，圈地运动就为发展大工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马克思考察了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导致的实业阶级人数增多的情况，“工场手工业的雏形也反映在爱德华四世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许多保护性的法令中……实业阶级人数众多”^②。实业阶级的出现和人数猛增，就不仅为大工业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劳动力，而且促进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的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动力。三是马克思考察了对外贸易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当时的英国国王“放眼外界”，爱德华四世“这位做生意的国王的名字在意大利和希腊各个港口尽人皆知”^③。对外贸易的发展就促进了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巩固了这种适宜于大工业的社会交往的格局。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

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经济规定性在现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进步的回应例如，有的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在纯粹经济领域（这些演变具有以牛顿以来的科学为基础的）高度工艺技术发展的特征，并为知识的系统运用（知

①②③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244、242页。

识的寻求已成为专门科学机构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初级的天然物生产业相区分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工商业和服务业)所推动。换言之,这些演变表现为一种工业体制的发展,而其又是以高度工艺技术、经济角色和经济运行单位——生产、消费、交换的日益专门化,以及产品、劳动力、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为基础的。”^①这样,就要求我们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意义上来看待工业化和市场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的作用。将工业化和市场化作为现代化的基本的课题来解决,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

(三) 东方社会应该走跨越式的工业化和市场化道路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东方社会可以跨越常规的社会发展方式,但是,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的可跨越性是有条件的,必须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作为前提条件,应该使工业化和市场化有机地统一起来。

东方社会要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首要的任务也是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马克思晚年在勾画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图景的过程中,也为东方社会的经济现代化指出了具体的实现道路和实现方式,从而为东方社会的经济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晚年以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为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即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指出,由于在俄国的农村公社中存在着土地公有制,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适合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俄国社会又有义务给农民提供必要的垫款,在加上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

[以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页。

度正经历着危机 因此“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①，这就成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新生支点。当然，这种跨越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社会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 必须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 实现跨越要有经济上的需要。所谓经济上的需要，也就是要把公社置于正常的条件之下 使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其次 实现跨越要有进行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显然 在公社内部不存在设备、肥料和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但公社与资本主义的同时并存恰好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只要公社大胆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成就，就可以用大机器农业代替小地块农业。最后，要挽救俄国还必须要有俄国革命 要扫除专制主义 并且要从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进行东方社会的革命。

可见 所谓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 根据东西方社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矛盾、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 以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深刻的哲学洞悉为框架，而设想的一种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式。这其中充满了可跨越与不可跨越的深刻的辩证矛盾。所谓的跨越是指跨越作为一个完整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社会之所以是可以跨越的 就在于 与东方社会共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表明了自己的历史暂时性 因为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 是与社会化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极度不相容的；而与之相对的东方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些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一致

的因素 如公有制、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等 而只有公有制才可能为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提供一种适宜的所有制结构。但是，这种跨越又是有条件的，由于东方社会的生产力及其产业结构、经济形式极度不发达，因此，它又不能绕过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他们要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又必须在自身所具有的公有制、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基础上，吸收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形式，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它们有机地匹配起来，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里，马克思既考虑到了东方传统社会结构中 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方面，也注意到了它在社会发展上的停滞性；既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上的暂时性，又充分估计到了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在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中来实现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设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他向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上持有渐进论立场、主张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社会新栋梁”反问到：“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要否认现代农村公社上述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 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① 这里 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 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经济上必须要具备两个必备的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要实现工业化，要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发达的工业生产力，以改造自己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结构（俄国为了获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6页。

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在实现工业化方面，东方社会的步伐可以迈得大一些 直接奉行“拿来主义” 否则就会拖延自己的社会发展进程 二是必须要实现市场化，建立起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体系 以改造自己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 [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面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 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在对待经济形式方面 东方社会切忌冒进，欲图在商品经济还极端 不发达的情况下就从自然经济就直接走向产品经济是行不通的，而应脚踏实地地培育市场机制 这就是说，东方社会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 不仅不能跨越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结构(经济阶段)而且 必须将它们作为自己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支点。

可见，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首先是实现自身经济现代化的问题 而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当务之急，因此，东方社会不边过工业化和市场化这两道门槛，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现代经济结构 从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现代化。

二、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和对策

尽管工业化不是取得经济发展的惟一可能的方式 也不是最好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但是，在我们考察现代化的经济开端时，我们不得不追溯到工业化，工业社会是现代发达国家的原型，而广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则是农业社会。因此，东方社会只有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才能彻底地改造自身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样，实现工业化也就成为了东方社会现代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经济规定性。在全力以赴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在遵循工业化的

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东方社会必须同时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为此，就必须采用切实可行的工业化的对策。

（一）工业化及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般作用

所谓的工业化是指，社会的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的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结构过渡，确立机器生产的大工业的社会生产方式。现代化就是由此开启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场真正全球性的社会大变革的过程。

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革命的生产方式。具体来讲：一是从发展的环境来看，大工业使现代化成为了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过程。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这样，能否开辟世界市场就成为了制约工业化的一个关键，而大工业只能在由自己开创的“世界历史”的环境中运行。离开了世界历史的环境就不可能存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二是从发展的机制来看，大工业使社会生产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自觉运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从而将社会的生产方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②。这样，没有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高度物化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三是从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

展的速度来看，由于大工业使社会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技术的自觉运用的过程，因此，它使社会发展的速度极大提高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①。自从大工业以来，社会的发展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的，它彻底摧毁旧的社会形态，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纪元。四是从发展的方向来看，大工业造就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使工人阶级本身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为最终瓦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了阶级基础。“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②。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成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的桥梁。

由此，工业化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在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是制约东方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一个严重的障碍。“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14、114—115页。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有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① 因此，工业化在东方社会的实现除了可以发挥其一般的作用外 还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具体来讲：

首先，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并可以带动贸易的发展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东方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西方社会属于现代的工业社会，因此，东方社会要实现自身的发展，首先必须在经济上使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嬗变，使自己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而只有工业化才可能将之成为现实。马克思以在东方社会修建铁路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是修建铁路可以促生大 工业生产方式。这在于 铁路是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重要的技术经济基础，它以集成的方式体现了大工业的一切进步的成果，铁路的发展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372—373 页。

的工业产业的发展 因此 修建铁路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铁路的普及过程也就是现代大工业的普及过程。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 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所需要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 而这样一来 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① 二是随着铁路的修建和普及而建立起来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必然会瓦解东方社会的传统的社会结构 促使东方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在于 作为全新生产方式的大工业会在经济上会产生一系列联动的效应，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使传统农业社会的分工体系日趋瓦解和消亡，形成新的社会分工体系。而分工本身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项基本的内容。马克思指出：“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② 三是铁路的发展可以相应地带动贸易的发展，而获得了发展的贸易反过来又会使自身成为大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作为全新运输体系的铁路是社会发展的—种重要的动力 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大大方便了贸易 而贸易形成的市场又为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需要和动力，尤其是蒸汽机机车的发展为大工业的新的发展提供了腾飞的翅膀。马克思晚年在《关于俄国—八六—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70—771、771 页。

分析和研究了在俄国修筑铁路引起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后果，他用一系列的统计数据说明，俄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促使铁路的收入逐年增加“其结果是贸易大为发展”^①。而现代大工业的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经济基础就是贸易的空前发展，二者的互动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定。可见，在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首先在经济上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东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

其次 在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 在社会生活方面 可以瓦解东方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 促进普遍交往。孤立性和封闭性也是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东方社会的这种孤立和封闭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社会共同体内部不同的公社之间的孤立封闭，另一方面是缺乏与世界大家庭其他成员的交往在这种状态下就根本不可能形成现代化的格局，现代化只能是普遍交往的结果，反过来又可以推进交往的普遍化。随着铁路的修筑，东方社会在地域上的孤立状态就被打破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造成了新的交往的需要 并使之成为了可能。“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 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 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 却残留下来。农村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 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农村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农村人几乎没有来往 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 不列颠人把农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情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② 铁路只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一个缩影，普遍交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70 页。

其实是整个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它可以促使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种重要的机制。“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 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普遍交往，一方面 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 最后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

最后 在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 在政治上会激化东方社会的社会矛盾，从而会促进东方社会的社会变革。尽管东方社会内部矛盾重重 但是 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停滞性，在社会发展上表现为它的落后性。而能在这块顽石上打下缺口的只能是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方式。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了东方社会 这样 东方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西方社会先进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激化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最终会改变东方社会停滞性的特点 促使东方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在分析鸦片战争的社会后果时指出：“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 国家濒于破产 大批居民赤贫如洗 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 进行反抗 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 更糟糕的是 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富有的现象 要求重新分配财产 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86页。

全消灭私有制。’^① 这样，大工业就成为了推进东方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基本的动力。可见，在“世界历史”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形成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的条件下，东方社会的社会矛盾的发展就使得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交织在了一起，最终成为了推翻东方传统社会的力量。

总之，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将使东方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决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式的变革，而是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变化。

（三 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对策的选择

马克思总是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角度来对待社会发展问题的，在工业化的问题上，马克思所持的立场也是如此。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的探讨来看，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可能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首先 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国际环境和运行机制来看 东西方的社会结构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这就决定了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业化的特点，使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具有了特殊性。

尽管工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进程 但是 东西方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条件和环境是各不相同的。在西方，工业化是一种原发的、累积的、自生的过程 它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通过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积累而逐步孕育出来的 在英国 工业化起源于“圈地运动” 凭借农业的发展和积累 建立起了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方式 然后 凭借世界市场使工业化开始在全球的范围内扩展 这样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第264页。

自发地开始了。而东方社会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面临着众多的发展难题，但同时却具有一系列的发展机遇。具体来说：

一是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和客观的存在。对于东方社会来说，西方工业化的成功和失败都是自己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的宝贵财富，它没必要去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它完全可能在吸收西方工业化的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新的工业化之路。例如，西方的工业化是建立在掠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具有极大的不人道性，“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①而这些问题在东方社会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应该得到避免。

二是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来看，西方的工业化已经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民族之间的孤立、封闭的状态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被打破了。在普遍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工业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输入到了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东方社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工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01 页。

业的生产地区。’^① 这种“中心——外围”的国际格局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分工的不合理性，是造成“发达——依附”矛盾的根本性的原因。但是，也为东方社会自身的工业化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是从工业化的社会运行机制来看，西方工业化是在封建社会的逐步解体的过程中不断萌发和发生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对工业化的严重威胁，西方的工业化只能在解构封建社会的结构、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来实现，而东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因素或方面，其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解体过程也不同于西方的封建化过程。所有的这些情况就构成了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后发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限定了《资本论》中对工业化分析所得出科学结论的范围和条件。他指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②。这是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反复强调的问题。这就是说，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具有自己特殊的道路和方式，不能将西方工业化的模式完全地照搬到东方社会中来。

从工业化的实际经验来看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系列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但政治上的独立并不会直接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进步，发展的问题成为了这些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面对工业化的成就和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494—49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74 页。

惑，这些国家将工业化都作为了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些国家急于求成，对自己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将西方工业化的模式直接运用到本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靠掠夺农业和农民的方法来进行工业化的积累，结果造成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使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总结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经验的过程中，一些发展学者从揭示工业化的代际的角度出发说明，随着历史或国际条件的变化，工业化的模式及其发展机制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可见，现实不是对马克思晚年的设想进行了证伪，而是证实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科学性。这就是，尽管工业化存在着一般性的规律，但是，东方社会要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跃迁和过渡，必须要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这在于“工业化过程是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多样性的。缺乏可视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普遍’原则的某些因素，似乎并不一定减损前提条件这个概念的启发价值……在一个国家可能起了前提条件作用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工业化‘原因’的因素，在另一个国家则似乎是工业化的结果”^①。

将这些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适合东方社会实际的工业化之路。

其次，由于东方社会的工业化是一种后发的、跨越的和外源性的工业化，因此，工业生产方式的移植可能会成为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与西方那种原发的、累积的、自生的工业化不同，东方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工业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范围内的现实存在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从外部提出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0 页。

的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它可以直接吸收西方工业化的成就而不必重蹈西方工业化的覆辙。因此，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可能是一种后发的、跨越的和外源性的工业化。这样，如何有效地将西方工业化的成就移植到本国中来，就成为东方社会实现自身工业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怪物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可以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地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① 这里，马克思其实就提出了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一种具体的途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移植——将西方工业化的成果移植到东方社会中来，以实现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移植是生产力移植的一种特殊的类型，是一种工业化问题上的“拿来主义”的方式。所谓的生产力移植是指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定的方式。这就是：处于生产力发展的低位水平的国家和民族可以从处于生产力发展高位水平的国家和民族引入先进的生产力，以加速本国和本民族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771页。

的发展。这是狭义上的生产力移植。从广义上来看，生产力移植则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类型 既有从高位到低位的移植 也有从低位到高位 还有同一位置上的水平移植 等等。所有这些情况说明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同时也是他提出的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一种具体的方式和对策——工业生产方式的移植，也就是要东方社会采用一种跨越式的工业化道路。

所谓跨越式的工业化是一种工业化的特定的战略选择。这就是在工业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存在的条件下 为了使后发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走过的历程 迅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它们可以从处于生产力发展高位水平的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在跨越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具体阶段的同时，获得更为高新的生产力技术，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使自身在发展的梯度上得以跃迁。可见 实现跨越式工业化的战略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加速工业化生产力发展的量变过程的同时，以尽快地实现生产力发展上的质的飞跃。它不是通过量的逐渐积累来实现质变，而是通过量的巨大的堆积和叠加来冲击旧的结构从而使质变迅速发生。

其实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 生产力移植是发展的一种常规而不是例外。例如 曾被称为‘野蛮民族’的日耳曼人，在用武力征服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之后，凭借生产力移植的方式 在罗马帝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跨越的同时 实现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上的跨越 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尽管法国等其他西欧国家属于原发性的工业化国家 但是在它们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采用了移植的方式 当时的英国禁止机器出口和熟练工人的外迁 但是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仍然能够发现一些英国企业家和工匠，他们往往用走私的机器生产纺织品和机械产品，西欧国家就是在运用这种移植

方式的过程中促进了大陆的工业化，使自身跻身于工业国家的行列。而美国则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直接从英国移植到了北美洲，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跨越了许多具体的阶段，从而在工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没有经历完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东亚日本，生产力移植尤其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移植更是创造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奇迹，它先是通过“明治维新”的方式，将西方的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引进到了一个非西方的社会，从而缩短了自身的现代化的进程。战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奉行拿来主义，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积极成果都统统纳入到了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凭借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有利时机，使日本迅速跨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和典型。而日本的工业化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后发的、跨越的和外源性的工业化。这就是由于自身难以将传统性和现代性兼容起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无力从自身内部产生促进工业化发生和发展的因素，就利用外部的刺激作用，在促进内部应付外部挑战能力增强和发展的同时，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战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都是一种跨越式的工业化。当然，其中的是非得失是另一方面的问题。退一步来看，假如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移植，原发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也是同样不可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

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原发性的工业化，工业化是在内外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外力在一定的程度上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或者说成为了工业化的导火索。用协同学的一个术语来说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移植来的外力就是一个序参量——临界无阻尼的量 它可以支配时间比较短的量 从而对整个系统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依附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依附论者看到“中心——外围”的世界格局是造成国际不平等和依附、剥削的根源，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是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忽视了“世界历史”国际环境的制约和生产力移植的价值 认为第三世界要争得自身的发展 必须要割断与“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其实 这样一来 后发国家就会丧失一系列的发展时机 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覆辙，拖延自身的现代化的进程。他们没有看到：“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 特别是发明 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 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 例如蛮族的入侵 甚至是通常的战争 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 每天都在重新发明 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 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 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这个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它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

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①可见 移植是保护和扩展生产力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工业化的实际尤其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实际有力地证实了跨越式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正如一些发展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文盲众多与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培训技术工人和有能力的工程师方面的困难，通过从较先进国家移民和运用这些国家的培训设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克服。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技术知识的储备，同样也可以从国外引进。然而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落后国家有着先进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一项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②可见 问题的关键是后发国家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发优势来实现自己的工业化。

最后 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进程中 可以通过生产力移植的方式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 但是 这种移植不是无条件的 而必须在一系列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从马克思晚年的论述来看 他之所以认为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方式是可能的 就在于它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 到哪里去找呢 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 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07—108 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86 页。

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①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了国际环境和对外开放的格局、国内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政府的作用等一系列的因素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而这些也正是现代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具体来讲：

一是在东方社会采用生产力移植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的过程中 必须要在‘世界历史’的情况下进行 离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与先进的工业国的交往，这种移植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生产力的移植和采用对外开放的政策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在俄国可以实现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跨越，就在于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独一无二的 它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 而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局面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能积极主动地采取对外开放的姿态；只有在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前提下，才能融入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借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正反经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 19 世纪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有许多是通过进口获得必需的技术的，然后迅速地用于生产出口制成品；政策使得外国市场上的机会能够自由地传输给国内生产者，使国内资源能够迅速自由流动以抓住这些机会 并且通过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以补充原有的资源 这些努力都对工业化的成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9 页。

立的一些拉美国家把专门生产初级商品与其以前的殖民地地位联系起来，认为独立后必须要与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制度决裂，但是这种政策在维护民族主权和尊严的同时却延误了自身的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外向并不意味着依附，依附决不是由于外向型经济造成的，摆脱依附并不是要闭关锁国。总之，尽管世界历史格局的形成成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机遇和条件，使生产力移植成为了可能，但是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东方社会还必须要主动地介入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将自己孤立和封闭起来。只有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在参与国际社会经济的循环过程中，东方社会才可能接触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才可能进行移植。这就是说，只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才可能进行生产力移植。

二是在东方社会采用生产力移植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有适合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社会结构。在国内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地移植不仅不可能促进工业化，而且可能会阻碍和制约自身的工业化。马克思之所以强调俄国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进行跨越的可能性，就在于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认为在它自身所具有的土地公有制、合作劳动等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移植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发展上的跨越。当然，俄国社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说，假如国内不具备移植的条件，移植还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一种内在的迫切的要求，那么移植只能成为一种单纯的模仿，而不可能真正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嬗变，各种因素融合在了一起，但是这种社会结构是否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和环境，还是有待于实践检验的问题。日本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通过移植的方式获得了成功，就在于“明治维新”对其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使

其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养分，使工业化的内外因素协调、匹配了起来。而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经历了一个九死一生的过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明治维新”同时进行的“戊戌变法”没有获得成功，没有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相宜的社会结构。现实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拿伊朗巴列维的改革来看，巴列维认为只要将西方的工业移植到伊朗来，就会促进伊朗的现代化。由此，他从西方大量进口了工业化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先进的设备和机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伊朗国内自身情况对工业化的制约作用，没有对国内的社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结果是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的统治，最终使伊朗巴列维移植式的现代化以失败告终。由此来看，“应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去寻找变化的首要原因。然而，强调内部因素并不等于否定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发展成为可能的，正是内、外部因素的结合。”^① 这就是说，移植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看移植国是否具有了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可见，不进行社会方式上的革命和改革，生产力移植同样不可能获得成功。

三是在东方社会采用生产力移植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突出政府在协调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应该善于管理工业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既要干预工业化，又必须要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指出，俄国社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启动的资金。这就提出了政府在工业化尤其是在移植式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工业化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为了避免选择的盲目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性，必须要突出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假如没有政府的介入和调控 那么 工业化不仅不可能获得成功 而且可能会成为动乱之源。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还是工业化的必要的条件。在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都处于核心的地位，都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在现代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出现了经济外部的不经济性问题 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严重地阻碍工业化，而解决外部问题就成为政府服务于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明 这也要求突出政府的作用。但是 正像市场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其作用也存在着失效的问题。因此 政府在管理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掌握好介入的尺寸、调控的范围。假如政府的作用无限膨胀，尤其是在脱离市场经济准则的情况下进行介入和调控 那么 政府的作用必然会失效。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之所以没有奏效，就在于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凭借集权、专制的方式管理经济 不遵从经济规律 结果致使社会结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工业化的有效发展，反倒成为了工业化的障碍。东南亚金融风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恶果。可见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进行干预 改变市场的工作方式 如防止贪污腐化 提高福利 改善投资或生产模式’但是“政府必须谨慎地利用它们稀缺的资源。问题并不是政府调动资源的多少而是调动资源的具体方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①。这就是说，在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地介入 另一方面又要稳妥地退出 既要加强自己对工业化的干预 又要缩小自己干预的范围 要处理好有所作为和有所不

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
版 第 77页。

为的辩证关系。

通过上面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工业化问题没有像在《资本论》中对英国的工业化那样进行过系统、专门的研究，但他在探讨东方社会一般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对东方社会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方式和原则等一系列问题还是进行了涉及，而这些论述对于今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三、东方社会实现市场化的道路和对策

市场化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没有市场化就不可能存在工业化。尽管实现工业化的环境和途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西欧的工业化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前苏联的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但是 从人类社会整个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只能在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体制中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也就是说 关键的问题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将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协调起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东方社会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 必须在经济体制上实现市场化（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当然 这种市场经济应该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失效和负效应问题。

（一）市场化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一般作用

所谓的市场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类型已经完成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社会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确立为了自己的经济体制——凭借市场经济的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相对而言的，是指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是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产品怎么分配，都是按照供求规律、价值规律进行的。显然，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对而言的。从整个经济体制的实质来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完全一致的，商品经济是内容，市场经济是形式。从经济形式上来看，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高度的发展——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现代化。

商品经济之所以是不可跨越的，就在于它是社会生产力不可跨越性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生产力的进化和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济上必然要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这就是说，与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在经济类型上也必然要依次进行更替和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进化链条：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向产品经济过渡。

首先，人类最先发展出来的生产力是手工技术生产力，人类凭借自己的手创造出了劳动工具，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

了根本不同于动物满足其生命需要的活动，手工工具成为了人的能动性的最初的确证，也成为了最初的生产力的物化成果；但是，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此，在这种手工技术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产生了自然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种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是，以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生产；前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在经济类型上都属于自然经济。“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①；在这种经济中，大领地的产品和剩余产品，决不单纯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劳动的产品、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在传统组织至今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印度公社，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消灭了这种联系”^①。

其次，用机器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用机器来生产和制造机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机械生产力技术水平阶段，这是人类体力大解放的时期；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便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二种经济类型——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中，为交换商品而进行生产成为了生产目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才得到了充分、高度的发展，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阶段，这在于，“任何商品生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886 页。

展中 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 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 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是一个划时代的阶段, 就在于它凭借工业化和市场化这两胎' 主动轮' 实现了现代化。

最后, 高度发达的智能技术水平生产力构成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不仅用机器来控制机器成为了可能, 而且机器可以极大地代替或模拟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和精神活动 这是人类在精神上的一次大的解放 它必将带来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 将会产生产品经济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种经济类型; 以直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 而进行生产, 是这种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即使在向未来的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 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而是与其他因素一道作为社会发展的杠杆而发挥其固有的作用“, 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 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 但是 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②。

总之, 由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强制性和决定性的力量 而它本身又具有连续性和传承性的特点 人们只能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顺序来逐步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而不可能跨越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必经的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要求相适应, 上述三种经济形式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依次发展、顺序更替的过程 即从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中应该向商品经济过渡 而不能从自然经济直接向产品经济过渡 这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发展过程(时序) 是不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 第 4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686 页。

任意倒置或随便跨越的。可见 商品经济是不可跨越的 这是一种经济的必然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

市场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适合于工业化的经济形式，工业化就是在市场经济开辟的经济环境中成为可能和现实的。具体来讲：

首先 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结构 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成为了主导性的经济形式；而这正是大工业生产成为可能的首要的前提。从经济形式的角度来看 传统社会 前工业社会 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于交换的不发达使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成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停滞性；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关系和交换制度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的关系 这样 就促使传统社会的结构日益瓦解“，在货币关系中 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① 这样，就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扫平了障碍 现代社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造成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玻璃厂、造纸厂、炼铁厂等等 是不能以行会的方式经营的。它们要求大规模的生产、广大市场的销路、操在企业家中手中的货币财富 这并不是说 企业家创造了条件 他既不创造主观条件 也不创造客观条件 但在以前的所有制关系和以前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110 页。

产关系之下 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① 现代化就是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主导性经济形式的社会。

其次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 它和大工业一道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财富不转化为资本 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 而人们对货币的追求则是商品经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这样“货币欲”就成为了大工业发展的内在的驱动力。这在于“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1.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 2.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 是大规模的销售 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另一方面 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 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② 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就成为了现代化的内在的经济动力。这样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欲”在成为异化的根源和表现的同时，又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动轮”。于是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现代化篇章就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使现代化成为了现实。

最后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从而为工业生产方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更为广大的市场和更为宽泛的环境。在上述赚钱动机的驱使下，致富成为了人们一切活动的惟一目的 这就促进了对外贸易和殖民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是在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才使得大工业获得了持久发展的强大的保证和支持。尽管现代生产方式在其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51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365 页。

初的发展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发展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 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①。这样,世界市场本身就成为了现代生产方式形成的基础,于是,现代化就成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这样,市场化的过程不仅成为了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而且也使自身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广大的东方社会国家在被卷入这个世界历史潮流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如何从自然经济中走出来,迈向商品经济的问题。这就是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②。在这个意义上,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东方社会就成为了一种必须做出的选择。

可见,没有市场化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市场化的表现形式和物化结果,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也得到了回应。例如,有的发展社会学者认为“;经济现代化,是从资本主义化这方面来理解广义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多元性的诸侧面,着眼于所有制,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化的一个侧面。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需求和供给在市场上碰面,两者是以价格机制为媒介得到调整的系统。从这个方面看到的资本主义化,可以理解为国民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371—3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0 页。

济规模的市场的形成，和与之相伴随的价格机制的形成”^①。这里 尽管将现代理解解为资本主义化是片面的 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社会阶级的局限性 但是 他所揭示的市场化在现代化尤其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位置的观点，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二 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来看 既然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跨越的重大阶段 那么 处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东方社会，同样应该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将市场化作为推进自身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在方面。这是东方社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跨越与不可跨越矛盾的一个具体的方面。从经济制度上来看 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消除私有制、人剥削人的阶级压迫）但是 从经济体制上来看 东方社会又是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 因为资本主义将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取得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同样是东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值得汲取的宝贵财富，因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组织形式 尤其是在信用公司、股份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导致了资本的社会化；在股份公司内部 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

[日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15 页。

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 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 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的职能 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① 因此 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也应该遵循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特殊的方面来看,东方社会的传统社会经济形式也是制约东方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它是一种封闭的自然经济形式 只有打破这种封闭的状态 东方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而商品经济就是瓦解和破坏这种封闭性的强大力量。在马克思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方社会的特点自始至终都是他密切关注的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马克思发现 孤立性是东方社会结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这是造成其落后性和专制性的根本原因;而要使东方社会走出封闭和孤立的状态 就必须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 将商品经济的成果移植、运用到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 因为东方社会的孤立性是自然经济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而只有商品经济才能消除自然经济的影响。19世纪 70年代之前,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就发现 孤立性、封闭性 是东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尽管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已经造成了瓦解这种状态的态势 但是在从中国到印度的整个东方社会都还普遍存在着孤立、封闭的状态 因此 在东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②。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知道 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 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 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4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92 页

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农村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农村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农村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①。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正在将这种孤立性打破，因此，马克思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社会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是破坏，二是建设。马克思之所以对殖民主义行为有所肯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他们使东方社会卷入到“世界市场”中来了。而秘鲁印加国则是“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②。当马克思晚年将视野投向俄罗斯的时候，发现在俄罗斯依然存在着这种情况，“俄国的‘农村公社’有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少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③ 这种孤立性使得公社丧失了历史创造性，这是公社受到“诅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见，正是由于孤立和封闭才使得落后性和专制性也成为了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的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孤立性（封闭性）成为了东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呢？这是山东方社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东方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造成了孤立和封闭，自然经济是东方社会占优势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第53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6页。

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 更是占优势'^①。这就是说，孤立性只是问题的外表，而自然经济才是问题的实质。因此，要打破封闭和孤立，就必须瓦解和摧毁自然经济，而商品经济正是促使自然经济解体的经济力量。这样，在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除了可以发挥商品经济的一般作用外，还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具体来讲：

首先，自然经济是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的构成方面，它已经成为制约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因此，在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可以摧毁其传统的经济结构，加快其经济现代化的步伐。由于在东方社会的机体内部没有生长出来瓦解自然经济的强大的力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就凝固成为了东方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要使东方社会摆脱后发状态，就必须摧毁这种自然经济体系。在不可能依赖东方社会在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自动地产生出瓦解自然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况且自发的瓦解必然会进一步延缓他们的发展进程，使后发效应更为明显）外来的干涉可能会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因为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不管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融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的进程，都会对自然经济造成破坏和颠覆。马克思在谈到印度发展问题时指出：“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工业、手工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

们的经济基础 结果 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老实说也是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① 尽管西方的殖民制度是不人道、残忍的、野蛮的 但是 由于它同时也将西方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成果带到东方社会中来了，使东方社会得到了成为推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新教伦理’思想的洗礼 这样 它就可能会培植起东方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 因为‘殖民制度宣布 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②。在这个意义上 它也是一种‘革命’。这样一来 在东方社会从政治上摆脱对西方社会依附的前提下 只要它将从外部输入的商品经济的成分加以吸收和内化，就会在自己社会机体的内部培植出强大的商品经济的力量，在摧毁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同时 可以加快自己的市场化进程 从而使得自身的经济现代化获得一种加速发展的力量。

其次 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不发达和自然经济的强大影响 村社结构尤其是血缘宗法制成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成为了制约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 随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瓦解 在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可以摧毁东方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为其现代化提供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村社结构尤其是血缘宗法制既是维护东方社会的强大力量 也是致使其封闭和落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而一旦将商品经济的因素输入到东方社会中来 那么 人际关系必然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靠血缘和村社的结构来维系 而是靠经济的关系来调整 这样 随着人际关系的简单化和经济化 那么，东方社会的发展就会获得一种持续的推动力。马克思在考察对华贸易时指出 随着外国工业品的输入 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22 页。

造成了冲击“，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 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 但从 1833 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 1840 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指美国，因为马克思当时在为美国的报纸撰稿——作者注）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① 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在于，中国传统的纺织业只是一种家庭和家族范围内的手工业，是传统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外国工业品瓦解传统手工业的过程，其实就是瓦解传统社会结构的过程，使村社和血缘宗法制丧失了自己的基础不仅正常的贸易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不正当的贸易同样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因为在鸦片贸易中，一方坚持的是腐朽的“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② 这样，鸦片可能会起一种唤醒的作用，使东方社会去主动地吸纳商品经济的因素。同样，以摆脱依附为前提，在移植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必然会解体，新的社会关系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

最后，在孤立性和封闭性的基础上，专制主义成为了东方传统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基本特征，而专制制度是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因此，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可以摧毁东方社会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91—692、

统的政治结构，加快其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东方社会特有的专制主义决不是简单地由地理因素形成的（兴修水利工程）而是其经济结构上自然经济特征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到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 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 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 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① 在专制的政治条件下绝不可能完全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总是与政治上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东方社会的专制主义是其停滞不前的一个重大的原因。而要瓦解专制主义，首要的应该是铲除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这样 在东方社会中发展商品经济就可以起到在消除专制主义的同时来促进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的作用。马克思在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外国商品的输入必将会造成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这将最终导致中国的社会革命，“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但是 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 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 那末他们说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自由 平等 博爱”^②。这是从自由贸易的正面影响的角度讲的。其实，邪恶的鸦片贸易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鸦片贸易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以负面的方式输入到了东方社会的传统机体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第265页。

从而也成为了瓦解专制主义的力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惟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①看来随着东方社会将商品经济的因素纳入到自己社会机体的过程中来，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必然会解体，从而就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这样，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市场化就会成为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强大的保障。

可见，尽管马克思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从正面论述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导致的‘世界市场’扩散的思想中发现马克思对商品经济在东方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马克思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不能简单地将商品经济看做是导致人欲横流的洪水猛兽，而应当注意商品经济在社会发展整个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三 东方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的对策的选择

尽管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跨越的具体阶段，但是，由于西方社会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东方社会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机制的过程中，应该少走弯路。那么，如何着手呢？这就应该从市场经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691页。

属性出发来考虑问题了。市场经济具有三重属性，从其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具有体制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在任何社会形态（文明社会中）都是有效的。从其特殊性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又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不同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又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其个别性的角度来看，由于时代和国情的不同，市场经济又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这样，东方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在体制性的层次性上，大力发展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在制度性的层次上，应该将摆脱依附作为前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个别性的层次上，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自己的国情发展商品经济。具体来讲：

首先，在体制性的层次上，东方社会应该将发展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目标。由于商品经济是不可跨越的，因此，在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机制的过程中，就应该处理好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关系，既不能滞后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能超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东方社会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注意防止两种片面的倾向：

一是希望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来实现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要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力图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只能是一种跨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民粹主义的主观幻想。那种希望在东方村社基础上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没有看到，东方村社的经济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其基本的特点，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

起等等。’^①这种社会形态是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而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马克思晚年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一再强调指出，要使东方村社成为新社会的支点，“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②。而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反复讲的“银行”、“信用公司”和“股份公司”就是使东方村社正常发展的条件。这些因素恰好是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马克思晚年设想根本不同于民粹派的地方也正在这里。由此来看，将晚年马克思看做是民粹主义同路人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二是将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的直接过渡的进程上。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直接采用产品经济的形式来实现现代化，只不过是一种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左”派幼稚病的发作和表现。这是因为，“整个现代私人交换制度也不是自然发生的社会经济。交换不是在同一共同体内部的个人之间开始的，而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的边界上，在不同共同体的接触点上开始的”，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的结果。不过，又有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存在于交换价值控制了生产的全部深度和广度的现代世界和这样一些社会形态之间”^③。这就是说，在交换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产品经济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看来，东方村社要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必须要有实现这种过渡的条件，离开了这种条件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12页。

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晚年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时提出的“世界市场”就是实现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条件，“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①这就是说 东方社会只有在参与世界市场的交换过程中，在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借鉴、吸收过来的同时，才可能实现社会发展方式上的跨越。

两极相通，上述两种方式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表现为现代化问题上的急躁病，夸大了国家干预的作用，将计划和市场割裂开来，认为计划经济是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这在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战争突出了国家集中的重要性，也展示了集中的有效的成果，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趋向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成为战后初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理论上，拉美结构主义和西方凯恩斯主义走到了一起，主张放弃市场调节的机制，强化国家的干预；在实践上，罗斯福的“新政”英国的“国有化”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展示了骄人的经济成果。在这双重的“诱惑”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片面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实行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限制和取消私人经济，不注重发展商品经济，将发展国营经济作为

重点，逐渐形成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在动员、利用国内有限的经济资源，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否定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自然经济的因素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仍然很大，而它们又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产品经济的模式，这样就使原本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更加萎缩，使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更为残缺，结果使经济的发展丧失了恰当的体制上的保证。计划集权的经济体制逐步僵化，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发展难题愈演愈烈，后发效应更为明显。事实教育了发展中国家，他们开始认识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这样，他们就开始重新确立市场的中心地位，开始注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生活中也开始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的发展。

可见，在体制性的层次上，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加快培植市场经济机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健全，参与世界市场的循环和交流，完善商品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规范商品市场经济的秩序，加快从不发达商品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的过渡。这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制度性的层次上，东方社会应该剥离自己对宗主国和资本主义的依附。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应该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而是应该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

一是要明确经济体制总是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考虑其社会制度因素，但是，不能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

义制度之间直接划等号。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不能简单地将它们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直接等同起来。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仅经济体制不能单独地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而它本身也是处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的，它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和市场，不能决定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而事实上，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总是一定制度性因素的表现。即，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计划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资本主义结合的计划经济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市场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市场经济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制度因素的不同才使得体制因素有了差异性。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要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共识外 就是要看到“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 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① 这样，东方社会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将市场经济直接看做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由于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充分、高度的发展，因此，很多人就将市场经济看做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这样，有些人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就将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一笔抹杀了。二是不能简单地将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由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完整的计划经济模式 因此 很多人就将计划经济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经历了严重的挫折 这样 有一些人在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否定中就将计划经济的作用也说得一塌糊涂。这两种观点表面上是对立的 但是 在理论思维上 它们的实质却是相同的 这就是在绝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 将市场经济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的特征，将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特征，这是社会发展问题上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作怪。

二是要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确立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般地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后发国家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发展，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在脱离对资本主义的依附的同时，将市场经济也排斥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进程之外去。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这就是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 而且对市场经济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但是 与其说马克思是在批判市场经济，不如说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因为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造成了混乱和不公正的现象；而对商品经济在现代化大生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银行、信用公司和股份公司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都是做了充分的肯定的。马克思晚年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过程中之所以肯定了银行、信用公司和股份公司的作用，就是看到它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游离出来 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发挥作用。这样 后发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 就要进行一次制度创新 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依附”或隶属关系 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将市场经济剥离出来，使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资源配置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确立市场经济

一般‘品格’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上就要求我们：其一，在经济体制的层次上，在发展生产力、配置资源和组织经济的过程中，要认同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应该确立它们的共性，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大力培植市场经济机制。其二，在经济制度的层次上，要看到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区分它们的个性。要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一台“绞肉机”，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因此，必须要将它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让它作为“一般”的力量发挥作用。这就是在经济制度层次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造成的‘波折’和‘不幸’的真实意蕴。

三是要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的一般品格，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因此，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尤其是不与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也不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纯而又纯的。尽管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私有制已经被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随之消失，市场也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将市场经济彻底排斥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事实上，为了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应该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在于，其一，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胜利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应该服从现实，而不能让现实屈就理论。其二，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同样也肯定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可

能性 并肯定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共存是东方社会实现跨越的一个有利条件。其三 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的品格 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它可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发挥作用。反过来讲 在商品经济还极度不发达的情况下 社会主义要彻底取得胜利 只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机制 舍此没有其他的办法。

这就是说，“经济体制仅仅是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把经济体制视为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同社会体制的其他部分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的行为方式。”^① 这就要求后发国家应该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过程中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最后 在个别性的层次上 东方社会应该紧密跟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 使市场经济的体制与自己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发展市场经济的新路。马克思晚年在谈到俄罗斯的社会发展问题时 突出强调了其发展的特殊性 认为正是这些特殊性的存在，使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成为了可能。马克思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 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 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 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② 这就是说，尽管东方社会是商品经济极度不发达的社会 但是 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 却有西方社会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就是它们已经处在了“世界历史”的环境中；“世界市场”为他们提供了移植的范本和仿效的对象 在移植和仿效的过程中 它们可以避免其负效应 缩短自己的发展历程 但是 这种移

① [瑞典 艾登姆等：《经济体制》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2 页。

植和仿效必须要与自己国家的国情统一起来。这样，后发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注意在“世界历史”情况下的“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向，在自觉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的过程中，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全球化决不是人类从 20 世纪走向 21 世纪的过程中才遇到的问题，其实，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全球化的历史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将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①，从而确立了自己先进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发财致富，它们就奔走于世界各地，“世界市场”在“船坚炮利”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导引下形成了，这样，就在整个全球性的范围内形成了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农业社会从属于工业社会，落后民族从属于先进民族的格局，这样，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世界历史”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问题。这里的从属并不意味着说依附是合理的，殖民制度是人道的，而是说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遭到了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懦弱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强大的商品经济的冲击，使得落后、停滞、封闭的东方社会在外力的冲击下，在蒙受羞辱的同时，获得了在自身中还不能马上生长出来的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就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这就是在摆脱依附的同时，大胆地吸收包括商品经济在内的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就，缩短自身的发展进程，进入发展的行列。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同时，东方社会在参与“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应该避免资本主义的波折，尤其是应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19 页。

权，这在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指出：“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甚至是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①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肯定全球化的正面功效的同时，对其负效应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的。马克思是辩证地看待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大，广大的后发国家所面临的让渡主权和维护主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是我们解决这一矛盾的科学方法论。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必然要让渡一些传统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东西，尤其是全球化会削弱国家在宏观上管理经济的职能。这种让渡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依附。同时，这种让渡又是有条件的，它应该是对等的让渡，应该贯彻双赢的原则，尤其是国际社会应该有区别地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应该照顾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因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为了后发国家，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政策、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发达和后发的矛盾本来是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种具体体系。这样，后发国家就要团结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与利益，而不能形成在西方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新的依附。这就是说，应该将对等和有区别统一起来，将它们共同地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游戏的规则。

二是要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克服分割市场空间结构的二元性、支离市场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建立和健全统一的现代的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内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了全球性的主题，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各国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机制的方式应该具有民族的特点。马克思晚年在谈到俄罗斯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是只局限在西欧的范围内的，不能将它看成是超越历史和民族情况的万能钥匙。针对那些片面夸大《资本论》应用范围的人，马克思严正地指出：“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到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这里，马克思强调的就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特殊性问题，在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机制的过程中，这一原则同样是适用的。其实，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就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德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国的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美国的垄断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和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共性是自然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商品经济的萌芽早已出现，在某些国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商品经济的要素，有些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在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有些是从外部侵入或移植过来的；但是，商品经济还没有成为占主导性的经济形态。这就说明，它们在通向市场化的道路上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来讲，主要存在着两个障碍：1. 在市场空间结构上具有二元性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造成的。这种二元性结构分割了市场空间结构的完整性，致使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进而也制约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采取均衡的发展战略，消除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避免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共同富裕作为努力的价值目标。当然，在发展的初期，实行梯度开发战略还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但是，应该注意政策、经济和伦理上的调节，不能使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就是说，应该使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2. 在市场要素结构上具有不均衡性的特点。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致使人、财、物等经济资源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有序、合理地流动，导致了要素市场的不健全，尤其是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市场、金融市场。结果是使得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人力资源、货币资源外流。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大力发展要素市场，要重视开发人力资源，以便形成人力资本优势，在发展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要注意金融安全，有效地化解金融风险。这样，建立和健全统一的现代的国内市场，就不仅仅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这就是要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法制体系，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没有制度创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三是要适应‘全球化’要求，在建立和健全统一的现代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应该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回应全球化的挑战的同时，促进国内的发展。全球化可能是发达国家布下的一个“陷阱”，成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发展中国家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但是，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空前发展，

使全球之间在经济上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世界市场对全球性的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后发国家与其被动地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来。在建立和健全有序统一现代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后发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鼓励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在吸引外部的资金和人才的同时，应该努力拓展自己的经济空间，发展对外投资，使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国内和国外双向流动。这就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孤立、封闭的发展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广大的后发国家只有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充分而有效的发展。这样，就要加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按照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条约进行经济活动。后发国家也可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对外投资项目。在实力上，后发国家的对外投资项目和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毕竟是后发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国际化方面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在市场的国际化方面，后发国家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使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甚至将市场扩展到了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后发国家还积极主动地参与了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中去，使自己的市场经济行为得到了规范。在这个问题上，可行的办法是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统一起来。这样，能否在后发国家之间进行经验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开展南北对话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开展南南合作，以便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来实现后发国家的发展。

总之，东方社会在实现自身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同时，还必须确立市场化的目标。这里的市场化有三重含义，一是逐步消除由非经济因素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传统习惯，而应该让市场来确认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二是

将社会地域性之间的关系也推到市场上去，逐渐克服人们之间经济联系因地域封闭而带来的种种障碍，在共同体内部用统一的市场代替地域性的市场；三是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推向市场，在健全国内市场经济机制的同时，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

四、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验和教训

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现代化在经济上的两个基本规定，也构成了东方社会实现自身的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经济目标。但是，在追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清醒的意识 既要坚定不移地走向工业化和市场化 又要充分认识到它们可能会带来的负效应问题。马克思在强调跨越式社会发展方式可能性的同时，总是以避免东方社会的发展可能会遭受的波折为出发点的 他看到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危机 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 希望东方社会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以免蒙受羞辱 同时 他还要求消除来自各方面的破坏性因素的影响 希望它能具备正常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这样，马克思事实上就提出了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其负效应的问题，也就是要注意经济现代化可能会造成的“代价”和“失效”。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就应该在工业化的问题上有“代价”的意识 在市场化的问题上有“失效”的意识。

（一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代价”问题

尽管生产力移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种可行的途径 但是 它不是工业化的惟一途径 因此 在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在全球多元的工业化格局中做出理性的选择。但

是毋庸置疑的是 移植可以为工业化提供一个新的高起点 可以缩短发展的进程, 关键的问题是在移植中要处理好移植与代价的关系。假如后发国家在移植的过程中不注意其负效应问题, 那么, 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 应该要注意移植的经济代价。移植必须要与国情结合起来, 一味盲目地移植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一是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 跨国公司的制成品在墨西哥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为 66%, 在汽车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竟高达 90%; 巴西的六大汽车装配厂几乎全部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拥有, 在 750 家汽车配件厂中, 尽管国有资本的比重达到了 3/4, 但其他工厂则为设备和技术更为先进的外国跨国公司所拥有。这样, 在经济上就会出现对“中心”的新的依附。二是债务负担过重。东南亚金融风暴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仅在 1984 年, 韩国就成为了世界上第四大债务国, 1985 年其外债额度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50%。在这个意义上, 金融风暴决不是突发的偶然事件。为了尽快地从金融风暴的阴影下走出来, 韩国不得不求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而 IMF 则提出了苛刻的贷款条件, 如要求韩国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 达到预算平衡, 加快履行 WTO 规定的各项义务, 实行进口多元化, 提高进口许可程序的透明度, 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取消对外国资本进入国内货币市场或直接进行投资的限制; 等等。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就说明,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后发国家假如不加入到国际经济的循环中来, 就要丧失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在开放和移植的过程中, 很可能会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为此, 后发国家就必须要加强国家的经济安全方面的建设, 以避免在经济上对“中心”的新的依附。

其次, 应该要注意移植的政治和军事代价。尽管殖民主义已经寿终正寝, 但是, 假如后发国家在生产力的移植的过程中要让渡国

家主权的话，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代价。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就有沉痛的经验教训。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典型的通过外向型的方式迅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创造了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奇迹。但是，正如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弗兰克所说的东亚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模式，政治因素是它们获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冷战中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香港的崛起显然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有关。新加坡是由于马来半岛上的种族问题而取得独立的。这样来看，不仅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难以效法东亚模式，甚至墨西哥、巴西也只能在国内的某个地区实施出口导向的模式。尽管弗兰克的观点带有明显的依附论的色彩，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是耐人寻味的，这就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要让渡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主权。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还必须要加强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建设，以避免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心”的新依附。

最后，应该要注意移植的生态代价。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本身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业化方式，具有明显的反自然、反生态的特征，马克思和其他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早已对之已经进行了严正的政治学——生态学批评。随着国内大众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普及和提高，这些“肮脏”的产业在国内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而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又促使他们不会让这些“肮脏”的产业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实现工业化的愿望，以人道和援助的旗号向外转嫁“公害”，将那些落后和过时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设备和项目

参见 A.G. 弗兰克：《亚洲的特殊模式》载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杂志，1982年6月25日。

向外出口。据估计 美国 39% 左右的“肮脏”产业、日本 69% 以上的“肮脏”产业已经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可见，后发国家在生产力移植的过程中如果不进行辨别的话 就很可能将“公害”也移植了进来 成为发达国家藏污纳垢的工具，这样一来，后发国家不仅不可能加速自己的工业化，而且很可能会延误自己工业化的进程或使本国的工业产业成为一种“跛足”的经济部门。这样，就要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生产力移植的过程中必须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应该将可持续发展与南北问题统一起来考虑，加强国家的生态安全的建设，以避免在生态上对“中心”的依附。

这种代价在技术上、人才上都会有所表现。这就要求后发国家在进行生产力移植的过程中，应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建构全方位的新的国家安全体系。“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第三世界工业化时必须防止：(1) 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模式来解释不同国家的变化过程；(2) 把个别国家的经验看成是普遍规律。”^① 这就是我们从马克思晚年的论述中应该自然引出的结论，它昭示着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方式和道路。

（二 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应该注意市场‘失效’的问题

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不能从绝对地肯定计划经济走到绝对地肯定市场经济，而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就是一般所讲的市场经济的‘失效’问题。一般认为 市场经济在‘外部的不经济性’、‘公共产品’和‘公平’三个方面不能发

[美]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21 页。

挥作用 造成了市场经济的失效 因此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在新的高度上来认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来讲：

首先，应该避免市场经济在“外部不经济性”问题上的失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组织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运行的 在企业的内部是严格按照价值规律、社会的供求关系进行经济活动的，尽管在企业内部也可能存在着某种不经济性的问题 但是 企业可以在内部通过一定的机制加以解决。但是 对于企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造成的外部影响 企业是不可能以自己的力量解决的 而市场经济在这方面也可能是束手无策的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性”一般是指，“某个个人或企业的活动造成其他人或企业获利或受损，但它没有在市场价格上得到反映”^①。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外部不经济性”决不仅仅等同于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也不包括某些主体故意影响其他人福利的情况。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这里所讲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其含义的后一方面，即负效应问题。例如，大气污染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外部不经济性”问题。企业排放的污染损害了居民的健康 社会为治理污染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些经济损失在企业的成本中并没有反映出来（可能是由于个别企业造成的污染在价格上为零或很低）但是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一部分确实是用于治理污染了。这样，在整个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过程中就应扣除这部分的费用（这就是所谓的绿色 GNP）在企业活动的真实社会成本的核算时 当然也应该

① 参见美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 with 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8 页。

② [瑞典 艾登姆等：《经济体制》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33 页。

将这部分费用包括在内。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价值规律没有反映这些问题 这些成本不可能出现在企业的账目中。这样就出现了外部的不经济性问题，造成了市场经济失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就在新的高度被提了出来。一般的做法是 国家运用立法、税收和补贴的方法来解决这类问题。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为了解决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 国家通过颁布“环境保护法”的方式从法律上来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 运用征收污染税的方式来补偿社会治理污染的费用 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那些主动治理污染而使企业效益受到影响的企业 等等。由此来看 西方市场经济在外部不经济性问题上的失效 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再次突现 但是 这种突现不是要复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要求政府从为市场立法的角度来解决这类问题，应该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出现 另一方面要加大立法的步伐 学会运用经济的方式来管理经济。

其次 应该避免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问题上的失效。社会生活中的有些产品是可以分配给私人的，有些则是不能分配给私人的 前者就是“私人产品” 后者就是“公共产品”。一般来讲 无论是谁 如果不对某种产品付钱 他便被排斥于这种产品之外或不享用这种产品的好处 那么 这种产品就是私人产品 假如这是不可能的 即任何买主都无法不被排斥于上述方式之外 那么 这种产品就是公共产品^①。国防安全问题就是传统的甚至是核心的公共产品。而市场经济在公共产品问题上也存在着失效的问题。例如 国防安全向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提供了服务 但是 不能通过

参见 瑞典 艾登姆等：《经济体制》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40 页。

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确定不同的社会成员需要多少安全服务并作出相应的分配。这样，就突现了国家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作用。为此，就要在政府机构中设立公共产品管理部门，国家就应该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规划和布局，对重大的公共产品问题做出决策，所以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就应该有公共财政支出。这样，就要有立法和税收等等法律和经济机制上的保证。公共产品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公共产品的范围都是各不相同的。在市场经济机制最为“自由化”的美国，国家除了在预算上对国防及其相关的科研和开发给予充足的保障，以及由国家直接控制法院、警察和消防外，公共产品包括的范围很广。美国的教育领域是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的，国家采用行政管理的方法，对教育发展的资源采取国家直接干预的方式进行配置，其他的机制只是发展教育的一种补充办法；在公路、铁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也是由国家直接出资进行建设。美国的做法说明，面对失效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在公共产品领域大有作为。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市场化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国力，确保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和支持。目前，在公共产品领域应该确定的战略重点是：

1. 应该继续将国防安全作为重点。这在于，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世界性的大战打不起来，但是由于强权政治依然横行霸道，因此，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2. 要建设一种廉洁、高效的公共产品管理机制，要尽量避免公共产品管理部门的膨胀。
3. 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关键在教育的发展，在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4. 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最后，应该避免市场经济在“公平”问题上的失效。市场经济在形式上是最公平的，因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交换是按照

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但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分配结果可能是最不公平的。这样,市场经济在分配问题上就可能出现失效的问题。这在于,尽管市场经济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但是,它是将效率放在第一位的,正是在对效率的追求中,才展示出市场经济的价值,但是,同时也可能会造成公平的丧失。这从所谓的“效率”的定义中可以明显看出:“效率在经济分析中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概念,因此它得到了严格的规定。一个经济的完善效率被界定为对生产行为的某种选择,它已达到这种水平,在一定的可用资源范围内,要想更多地生产任何一种产品而不同时减少其他产品的生产,从技术上看已无可能。换句话说,经济已处于它的生产能力的顶点。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上,考虑到消费者的偏好的消费,便会得到一个扩大了的效率定义”即“当再增加任何人的福利而不同时减少他人的福利已不可能时,就是完善的效率”^①。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所谓的“帕累托最佳状态”或“帕累托最优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资源总是稀缺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资源和消费者也总是一个定数,当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去追求效率时,大家在起点上可能是平等的(事实上个体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在终点却是不平等的,这样,大部分的资源就可能集聚在少数人的手中,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目前,作为全球性的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结果。在国际的范围内,富裕的北方同贫困的南方的对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机制的一种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长期的殖民制度的统治,使它们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出现了贫困的普遍化和腐败并存的局面(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本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主导性、自然经济的强大、专制主义的横行等社会结构),在发

[瑞典 艾登姆等:《经济体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8—149页。]

达国家内部 尽管绝对贫困的问题正在消失 但是 相对贫困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这样 发展中国家在反贫困的过程中 在追求公平时，就应该自始至终进行国际和国内双重的战斗。具体应该注意以下问题：1. 要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斗争，不仅要在政治上摆脱依附 而且也要在经济上摆脱依附 在解决南北问题的过程中来实现反贫困的目标，从而为国内的反贫困提供一种适宜的国际环境。2. 在国内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在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 完善分配的调节机制 出台和完善收入调节的经济和法律措施；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事业。3. 加强国内的制度创新，杜绝和铲除消极腐败的制度根源，建立和加强以民主和法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 为反贫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 应该按照理性的精神发展商品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体制。总之 不可能设想在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来实现现代化 同时 发展中国家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和国力的经济现代化的道路。

第五章 知识化和集约化：建构 社会发展的支柱系统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①

——马克思

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的“母机”。现代化将知识尤其是系统性的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第一次明确地突现了出来，使经济的发展变成了一个自觉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可以将这一趋势和过程称之为知识化的过程）；这样，使重视人财物在数量上投入的增长转变到了重视人财物投入的结构效益的增长（可以将之称为集约化的过程），正是社会发展方式发生了知识化和集约化的变化，现代化才成为了现实。同样，东方社会要摆脱后发状态，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要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

道上来，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化的方式上来，促使社会结构向知识化和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科教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没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创新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生产力创新发展的活水源头在于科学技术、教育的创新发展（当然从根本上来说，科教活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但是，它们一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力量，就反过来成为了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因此，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主题也就是要将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点。这样，就必须明确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社会科教结构的含义和构成

科学技术和教育最初不具有独立的形态，只是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所导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化的过程中，它们才成为了社会分工中的特定领域，成为了生产力创新发展的源头。而所谓的社会科教结构就是指由科教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定层次，是作为社会系统构成因子的科学、技术、教育与社会系统的结合方式，是科教活动自身的组织方式，社会发展的支柱系统就是由此构成的。科教活动之所以成为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的层次，是由其内在的属性和在一般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

首先，认知性是科教活动的基本属性和特征。这里的认知性是指，作为社会分工一个特定领域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对世界的认知，是精神生产的重要的形式。具体来讲，1. 科学的认知性表现在它是以直接认识外部世界为目的的，主要回

答外部世界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它是以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形式表现出来的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对它的评价只能采用真与伪或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事实性的认知是科学的基本内容，发现外部世界存在和运动的客观规律是其基本任务；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性的成分，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文明具有重大的影响。

2. 技术（不同于工艺）也是一种认知性活动，主要回答的是做什么、怎么样做的问题。是以发明的专利、设计报告和说明书、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实用性的知识体系。对它的评价采用的是好与坏、可行与不可行的标准。它直接体现了人的功利目的性，是一种基于事实性的价值认知活动，以发明为基本的任务。

3. 教育首先是人类科学技术和文化认识成果的一种传播、保存和更新的过程，具有事实性认知活动的特点；同时，它也是人类价值观念和精神文明成果的一种传播、储存和创新的过程，还具有价值性认知活动的特点。其成果形式是以培养和造就具有一定的德、智、体、美、劳等一系列素质结构的社会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它的评价必须采用综合的标准。总之，科学、技术和教育都是人类的基本的认知活动，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基本方式，因此，马克思将他们称为“一般社会知识”。

其次，经济性是科教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属性和特征。这里的经济性是指，科学技术和教育也具有生产力的功能，是一般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科学技术和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生产力，就在于它们最初是作为实现和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出现的，而手段是比目的更为尊贵的东西；单纯的需要满足之后就消失了，而手段作为人的能动性的确证却被保存下来了，它反过来成为满足需要的强大的力量。同时，由于科教发展具有自身特有的规律，它们的发展一般具有累加的效应，是同前一代人流传下来的知识量成正比的，是同周围环境中存在的知识水平呈正相关态势的，即使在

最普通的情况下，也是按照几何级数发展的（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失传的问题）；因此，一旦人们在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方式和方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重大的推进作用。因此，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教育也能生产生产力，“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① 这从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而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正在使科学技术和教育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说科学技术和教育具有了经济性，获得了生产力功能，这是基于客观事实做出的一种客观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科学技术和教育称为“一般社会劳动”。

最后，社会性也是科教活动的一个基本的属性和特征。这里的社会性是指，科学技术和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是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具体来讲，从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这种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社会的需要。随着整个社会进步历程的加快，社会的需要成为了科学技术和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②。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31—732页。

在现代，是否满足社会的需要成为科学技术和教育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2. 从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环境机制来看，这种发展愈来愈使它们成为了一种全社会的事业。科教活动最初只是一种个体性的活动，而随着解决任务难度的增加，面对的对象复杂性程度的提高，就将协作攻关的重要性日益地突现了出来。要求将科教事业直接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事业来发展（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这样，就促使科学技术和教育成为了一种集体性的、要求有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活动。

3. 从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来看，这种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投入。科教活动要高度依赖物质性的设备、仪器、教具、场地和环境，只有凭借这些物质保障，它们才可以运行起来。尽管科教活动具有生产力功能，但是，这是一种整体的、长远的功能，因此，其价值补偿机制就不同于具体生产力，必须要依赖于社会从外部的投入。因此，在现代，政府在公共财政上对科教事业的投入，已经成为其一项基本的职能。

4. 从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社会后果来看，它们日益成为了导致社会革命的力量。由于科教事业的发展是按照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会导致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变革世界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劳动者的方式发生质的飞跃，引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而科技和教育又具有生产力功能，这样，上述三种革命必然会导致产业革命，引起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最终会推动生产关系的革命，引发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纱机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更为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可见，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同时具有认知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属性与特征，因此，它们如同语言一样，不专门隶属于社会结构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哪一个具体的层

次，将科学技术和教育划入哪一种社会结构都是不合适的。这样，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就成为了社会结构的一种专门的结构层次。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总体上产生了整体的关联，我们可以将社会结构中的这一特定的层次称为社会的科教结构，将上述三种活动通称为科教活动。在社会结构的这一特定的层次上，又可以区分为认知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体制结构）三个层次。

（二）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化是在近代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由哥白尼和牛顿导致的科学革命使人们能够客观地把握宏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为人们驾驭自然界提供了科学依据；由纺织工具机和蒸汽机导致的技术革命，则直接促使工业成为了替代农业的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现代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则使教育成为科技成果普及和推广、创新与发展的一种基本的机制和方式。这样一来，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科学技术和教育对于生产力产生的推动作用，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一个自觉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从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了现代化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教活动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支柱系统。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现代化得益于科学技术成果的移植和传播。在中国这个古代的发明大国中，人们没有试图发掘四大发明的实际的产业价值和应用前景。而这些发明一传到西方，其命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强烈的功利主义欲望的驱使下，它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催化剂，变成了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扩展市场、传播新教的工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

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变成了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系统地揭示出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及其实质。在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涉及，追寻了科教因素是如何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

首先，火药的军事应用为西方社会革命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在英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强大，他们日益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希望通过掌握政权而为生产力的发展铺平道路。但是，封建贵族却拼命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样，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就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在英国，是通过“蔷薇战争”（1455—1485）将这个矛盾激化和突现出来的。以经济落后地区为依靠对象的兰开斯特家族（以红蔷薇作为族徽）与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封建主以及新贵族和市民阶层为依靠对象的约克家族（以白蔷薇为族徽），展开了争夺王权的战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萌发并逐渐成长起来的。而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炮兵，在消灭封建贵族的社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在中世纪，一个有权势的贵人就能掀起一场可怕的起义。那些自耕农和小藩臣有一个出谋划策的人，骑士们就披上铠甲，几天以后，大军压境，王位就岌岌可危了。这时如果没有炮兵力量，是做不倒的。”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方面的变革即火药的应用，对封建主们，同样对军队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玩意儿。”^②这就进一步说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

②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了，而资产阶级却在大炮的浓烟中坚强地站了起来，作为“致命玩意儿”的火药成为了资产阶级完成社会革命的武器，成为了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其次，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促成了西方扩展世界市场的行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全球性的生产方式，它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而大工业本身又只能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加以发展，世界市场为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而航海业就成为扩展商品市场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正是凭借着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地理学成果在航海中的应用（地球是一个球体，无论是从东还是从西都能到达航海的目的地；地图的发明和航海图的制作）才导致了地理大发现，而“世界市场”正是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说，没有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而没有地理大发现就不会有完整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没有世界市场的形成就不可能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专门开辟了“美洲的发现。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一节对之进行了研究，“1497年11月20日抵达好望角，离东非海岸不太远，驶往印度，抵达德干高原的卡利卡特那儿有葡萄牙人建立的一个印度帝国。葡萄牙人认为从海路进入‘黄金国’印度是自己独有的权利。他们不准外国人用他们的航海图，也不让人们知道他们使用了航海指南针。在华斯哥·达·伽马时期。人们已经想到地是圆球形的，所以不仅向东走，而且向西走，都可以到达遍地是钻石珠宝的印度这片奇妙的国土。”^①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黄金的大量输入导致了西方的价格革命。同时，西方世界也将殖民地制度推向了全世界。这就是说，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使自己成

^①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3册 红旗出版社 1992年版 第61页。

了扩展世界市场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印刷术使新教伦理在大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了可能。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内部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与资本主义反对王权的斗争相一致的。由于罗马天主教成为了维护封建王权的顽固堡垒，因此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就成为了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继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加尔文认为，凡是内心信仰上帝的信徒都是上帝的天然的“选民”。信徒选民必须排除一切障碍，艰苦奋斗，实现上帝赋予的“天遣使命”。而选民在人间力尽职守、勤俭生活而发财致富就是对天遣使命的完成。而英国的清教新教就是用加尔文教“纯洁”国教的结果。清教徒为了完成天遣的使命而掌握了英国的工商业，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而新教之所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迅速传播，就在于传教工具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了印刷的成本，并且使大规模的、成批量的印刷成为了可能。这样就为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插上了翅膀。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考察了印刷术在英国的传播过程。这样一来，印刷术就成为思想革命和价值观念更新的强有力的工具，同时也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作为传播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载体的书籍再也不是一种什么昂贵的东西了。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没有科技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就不会有经济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

参见《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 红旗出版社 1992年版 第246—247页。

了科教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的作用。马克思从科教方面对现代化做出的规定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也得到了回应。例如，有的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在西方的 17 世纪发生从伽利略的《天文对话》（1632）到牛顿的《真理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67）的辉煌的科学革命。洛克以后经孔多塞到圣西门和孔德的启蒙主义的合理主义潮流，是这场科学革命的直接产物，而科学革命向实用主义方面的应用，就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生产技术革新”^①。

（三）东方社会应该将知识化和集约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方向

既然科教活动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对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那么在“世界历史”的情况下，东方社会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发展也必须要将科教的发展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应该全力实现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现代化。况且，东方社会的实际也要求这样做。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东方社会的落后是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落后造成的，要摆脱“后发”的状态就必须改变科教落后的状况。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晚年以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为例，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指出，东方社会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起码必须要具备经济上的需要和物质上的条件。而这两样东西的获得，也就是一个使社会的生产方式向知识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首先，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要有经济上的需要。而这里

① [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15 页。

的需要包括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实行公有制、在劳动组织方式上实行集体劳动和在生产资料上采用大机器生产等一系列的因素。其中，前二者可以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因为在村社内部就包含着这些因素，现在的要求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来采用新型的公有制和集体劳动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西方社会由于将科学技术成果自觉地应用到了生产过程中，在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工业社会，因而提前成为发达国家。而科学技术在东方社会的发展就缺乏如此的社会环境，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东方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停滞，这样，就使得人们的生产活动成为了一种简单的经验积累和释放的过程，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落后，最终使东方社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落在了不发达的境地。具体到作为产业结构基础的农业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已经使农业成为了大机器生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俄罗斯村社的农业仍然停留在小农业的阶段，采用的是比较原始、落后的农具，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不仅俄罗斯的村社是这样，其他东方社会的落后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例如，马克思晚年在“菲尔笔记”中就记述了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印度的表现 这里的‘村民需要的铁制品很少’，大体上有‘少量的钉子 犁尖、锄头 库达利)钩刀或劈刀’等器具，而“所有这些物品都由村社铁匠制造或修理。他的铁料储备主要是他（或别人替他）在附近城镇弄来的英国铁箍，这些铁箍是捆扎进口货包而运入印度的’^①。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印度不仅还不可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77 页。

能建立起来现代意义上的钢铁业，而且铁的使用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用这样落后的生产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农业就构成了东方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生产方式。这样，在生产资料上是否采用了大机器的生产方式，就成为造成东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势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这也正是发达之所以为发达，后发之所以为后发的关键。而实际上，东方社会的农民连小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农具都得不到起码的保证。在农业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尤其是随着农奴制改革的发展在造成对农民剥夺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农民与劳动工具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由于农民缺乏起码的劳动工具使得社会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只是停留在维持简单的生存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保障农民获得起码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在此前提下，还应该想方设法地使农民告别使用比较原始工具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向使用大机器的现代生产方式过渡。

马克思指出：“关于经济上的需要 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 就是说 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 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 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 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 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 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 10 倍，他们的状况会变得好些吗？^① 这就是说，就生产资料方面的情况来看 农业公社所采用的比较原始、落后的农具的生产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了，它必须使自己的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9 页。

从小农业向机器大农业过渡。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都要求俄国的农业应该向机械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在农业中采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是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式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①而采用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将科学技术的成果自觉地应用于生产的过程，而能够操作大机器的劳动者又必须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劳动者。这样，就要求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科教文化素质的轨道上来 因为“ 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 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 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②

可见 将知识化作为东方社会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面 不仅仅仅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简单的回应，而且是源于其内在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同时，走跨越式发展道路还要有进行改造的物质条件。无论是从理论上来看 还是从实际上来看 社会生产力中科技含量的大小和科技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因此在从小农业向大农业过渡的过程中 必须要提高生产力中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而用现代大机器装备农业就是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建立在大机器基础上的大农业生产方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 它既要求具备气象学、土壤学、水利学、植物学、农艺学等一系列的科学知识 也要求具备工具、设备、肥料、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505页。

力和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物质性的条件。而物质性的条件既是科学知识的凝结，是科学知识的物化成果；又是生产得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的核心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一种基本的机制和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因此，能否获得进行大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性条件，就成为了走跨越式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显然，在公社内部不存在设备、肥料和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大农业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资料 那么“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②这就是说，尽管东方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比西方社会低下，使自己处在了不发达的状态；但是，这种不发达只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现象 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 只要公社大胆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可以用大机器农业代替小地块农业，最终实现社会发展方式上的跨越。这样看来，所谓的不发达只是后发效应的一种暂时体现。

这里，马克思在事实上就提出，实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的关键是采用生产力移植的方式，而这种移植首先应该是将科学技术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2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9 页。

移植作为重点。只有在进行科学技术移植的过程中，东方社会才能缩短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弥补生产力发展的不足和差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社会工业化所走的历程。科学技术移植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创新发展中的决定性的地位决定的，科学技术不仅是以往一切生产力成就的精华，而且随着其加速度发展能够持续地引发生产力革命。东方社会在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从西方社会移植进来的同时，就可以使自己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 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① 这样在剥除了科学技术应用的资本主义实质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自觉应用就在一般的意义上成为了集约化增长方式的源头。

而这里的科技移植既包括先进的科技成果的移植，也应该包括高素质的科技人员的移植。而后一个方面的移植可能要比前一个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尽管科技成果的移植也会在引发输入国进行模仿的同时导致其创新性的行为，但是，只有将具有创新素质的科技人员移植过来，才可能为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源泉。因为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是死因素，只有人才是积极的、活跃的因素，而从事科研生产的科研人员就是先进生产力的‘生产者’；劳动具有科学性 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 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

是一个主体 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①。尽管这种情况只有在“自由劳动”成为主导性生产方式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但是 其端倪已经在科技生产力的代表身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在他发挥主体能动性作用的过程中 就可以持续地引发科技的创新发展。同时，科技人员的移植还可以为东方社会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本实力提供有益的经验 尽快使东方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方向转变。物质资本是决定传统经济发展的力量，而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和实力。一定数量的人口（人力资源）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经过投资教育而加以开发和训练的专门人才——人力资本，才能成为经济增长之源。而科技人员是人力资本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在科技人员移植的过程中 就可以使科技活动的主体同将科学技术成果自觉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主体统一起来，使生产主体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普遍的提高“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 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 这个过程就是 知识的 运用 实验科学 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② 这样 通过科技人员的移植 东方社会在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方面 就可以缩短探索的路程 从而会加快自己的社会经济进步的进程。

可见，正是由于科技和教育的不发达才造成了东方社会创造力的普遍萎缩 致使其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 因此 科教水平就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瓶颈” 东方社会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就必须以此作为突破口。而这又是由东方社会的整体的社会结构决定的。这就是说 孤立、封闭、落后的生产关系反过来成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 第 113、226 页。

为制约生产力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样看来，对科技和教育状况的改造是与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来推进东方社会的科教现代化的水平，只有将生产力领域的革命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统一起来，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才可能真正促进东方社会的科教现代化。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科教观根本不同于当代西方技术决定论的地方。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晚年对科学技术和数学进行了独立的专门性的研究。这就是说，尽管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不等于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但是，要真正把握住一般社会发展的真谛和规律，必须要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自觉的专门的应用，已经将一般社会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化。因而，在研究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狭义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予科学技术以专门的关注，应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破旧立新中的重大作用。总之，只有在使生产方式知识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的过程中，才可能实现现代化。

二、东方社会建立知识化生产方式的对策

尽管现代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一个历史过程，是由众多的因子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但是，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正是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自觉和大规模的应用，使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而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农业社会是一种经验型的生产方式，工业社会是一种知识化的生产方式。今天，东西方社会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现在这个地方，后发国家之所以处在了后发的境地，就

在于没有使自己的生产方式知识化。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尽快地建立起知识化的生产方式，是关系到能否彻底摆脱后发状况的一个具有关键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一 现代化是一个建立知识化生产方式的过程

从生产方式中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来看，可以将人类社会中的生产方式区分为两类，一种是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一种是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前一种生产方式是凭借人类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扩散而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是以不自觉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科学技术只是以渗透性的方式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进步是缓慢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是很有限的。而后一种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的，科技革命导致了产业革命；生产过程成为一个自觉的、大规模的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过程，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成为了经济增长之源；科学技术和教育不仅从生产力中分化了出来，作为独立的力量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推进作用，而且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由此，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大体说来，前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属于前者，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开启了后一种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大工业之所以能够结束史前社会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在于它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知识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变到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了，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大规模的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过程，使科学技术和教育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具体来讲：

首先，从劳动资料方面来看，近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彻底地改变了劳动资料的结构和面貌，尤其是使得用机器来制造机器成为了可能，这构成了知识化生产方式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①。这在于，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系统；劳动者利用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等方面的属性，让他们按照人类的目的、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去作用于其他的物体。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生产方式的差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样进行生产，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生产

第一，从劳动工具方面来看，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手工工具是主要的劳动工具，是人的肢体的直接延伸。而在知识化的生产方式中，大机器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工具，极大程度地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部分地解放了人的脑力劳动。这一历史进程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中。在当时的英国，如何提高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和突破口。在这个过程中，从凯伊发明飞梭（1733）经过珍妮精纺机（1764）和骡机（1779）的发明到卡特莱特发明织布机（1784），这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在纺织业中就促成了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机器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在棉花加工业、棉布印染业中也开始了机械化的过程，出现了轧棉机、梳棉机、卷扬机、漂白机、整印机等多种多样的机械发明，实现了棉纺织业整个部门的机械化。随后，在其他产业领域中也先后实现了机械化。而没有力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技术发明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产业领域的整体机械化就建立起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5页。

生产方式使劳动工具成为一个机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工具机部分，它使得用机器来制造机器成为了可能，这样，它所抓住的劳动对象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事物了，理性的狡计扩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抓住了人为事物，使生产变成了一个直接应用知识的过程，创造了第二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①。继这之后，1794年，英国发明家莫兹利发明了移动刀架机床，开创了近代机械制造业的先河。这样，大机器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从动力系统来看也是如此。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人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动力，自然力只是在其现成的形式上被简单地利用，这种动力只能简单地维持简单生产的进行。而知识化生产方式则大为不同了。在英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纺织工业的机械化带动了所有工业部门的机械化，工作机的技术革命，大机器的运转，都需要超人力的驱动力，这样，就将动力机的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单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也就是说，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②蒸汽机就是由此应运而生的。1765年，瓦特发明了带有单独冷凝器的蒸汽机，对蒸汽机进行了最为关键性的改进。1781年，他发表了第二个专利，描述了把活塞的直线运动转变成圆周运动的种种方法。1782年，他发表第三个专利，解决了单向作用气缸变双向作用的问题，并且增加了飞轮，使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413页。

运动更加均匀。1784年，他发表了第四个专利，认为蒸汽机是在大工业中普遍应用的动力机。这样，改进后的蒸汽机就达到了实用化的水平，带动了煤炭、冶金、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使工业产业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支柱产业。这样一来，知识化生产方式的动力系统就成为了一个将自然力人为地集中、转化和释放的过程，并且极大地提高了能源的利用和使用的效率。而没有热力学、机械力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总之，“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陈规”^①。

这样，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就代替了经验型的生产方式，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而且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次，从劳动主体的情况来看，近代科技革命成果在生产中的自觉和大规模的应用，形成了全面的物质变换关系，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有高度科技文化素质的全新的劳动者成为知识化生产方式的关键。在一般的意义上，人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是积极的活跃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生产力，其实也就是人的生产能力。但是，人的这种主体作用的发挥，又是受一系列因素和条件制约的，主体同时是一个在生产力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建构的过程。主体性的一般历史进程是这样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

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 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和情况既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制约主体性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一种力量。科技进步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主体性弘扬的过程，人的主体性弘扬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大工业开始将这三者逐步地统一了起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第一，从普通劳动主体的情况来看，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由于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低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成为维系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还没有形成生产只是经验的简单积累和释放知识是游离于生产之外的。由此造成了全面的奴役状态，社会发展的水平十分低下。而在知识化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大机器这种新型的现代劳动工具将科学技术并入了生产过程当中，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起点，使物质变换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样随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的力量，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传统的生产方式就被彻底推翻了。这就不仅对劳动者的知识、技术、技能和文化水平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且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提出了全新的衡量标准，由此要求产生出一代社会新人。而一旦这种新人——工人阶级形成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革命性的力量不仅如此他们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直接的强大的生产力。这样，在科学技术的促进下，在人的主体性得到弘扬的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104 页。

时 社会生产力就获得了一种持续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量 三者的统一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知识化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随着财富的发展 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 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 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 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 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 既是财富的产物 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 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① 当然，这种状况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 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应用 同样也使它成为造成人和自然双重异化的帮凶。这样，要使人主体性的第三种形态展示出来，我们就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才能真正成为造福于人类的强大的力量，那时的生产方式将是知识化和人性化的高度统一。

第二 从科技主体的情况来看 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 由于科学技术还没有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特定领域出现，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科学技术人员 这样 就根本不存在科技主体 科技主体同社会主体 生产主体处在一种混沌的统一状态中 社会分工状态的不发达造成了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和滞后。而在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当中，一方面 按照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特定的领域，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独立的力量 科技人员在从生产主体 社会主体中分化出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 第 34—35 页。

同时，成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劳动者——科技主体。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是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应用的，在价值规律的驱使下，在科学技术本身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甚至是核心的和推进的部分），科学技术人员也从与生产的游离状态中摆脱了出来，而直接进入了生产过程中，发明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这样，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知识和生产在新的基础上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知识化的生产方式。

可见“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 and 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① 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凭借一般主体的知识化和科技主体的产业化的交互作用的机制形成的。

最后，从劳动过程或产业结构的构成来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自觉和大规模的应用，使得整个生产过程都成了科学技术化的过程，社会的产业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的改造，这就必然带来整个产业结构的重大的变化，不仅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性的产业，而且使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也直接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领域。这就是知识化生产方式的整体的显现。由于科学技

术已经自觉地渗透在了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当中，彻底地改变了生产力要素的构成和性质；这样，科学技术在提高产业的生产水平的同时，就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分化，最后实现了整个产业结构的知识化。

第一，从农业产业的情况来看，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农业是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产业，尽管农学等与之有关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凭借人们经验的积累和释放进行的。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游离，造成了农业社会的极度不发达。而在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当中，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自觉、大规模的应用，大机器使得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化，不仅形成了工农业的分离，而且使农业成为了隶属于工业的产业领域，形成了第一、二产业的区分。在大工业时代，农业产业再也不是单纯的经验生产过程了，而且也成为一个人自觉地、广泛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例如，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的肥力状况是影响农业生产率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而肥力是随着自然科学和农艺学的发展而变化的，这样，化学、地质学、土壤学、机械学就成为了农业的专门的基础的科学。可见，“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第二，从工业产业的情况来看，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只存在简单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尽管人们也应用了一定的科技成果，但是，一般只是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技术凭借着师傅传徒弟的经验方式得以扩散和传继。在知识化的生

产方式中 大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的产业领域 而工业的发展完全是依靠自然科学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机器的传动机构的职能是调节运动,在必要时要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周运动,而这就需要几何学和力学的知识;把运动和动力要传送和分配到工具机上,这就需要研究摩擦运动的规律;动力机要固定和利用自然力,就需要热力学等科学知识。这样一来 工业产业就真正成为“一种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大工业的原则是 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 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 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 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 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① 这样,就要求对劳动者进行专门的教育和培养 从而突出了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来看,在经验型的生产方式中,人们只是在简单地利用现成的自然力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交通运输方式(车船舟楫)和通讯方式(烽火台、驿站)其能力和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还根本不可能形成专门的产业领域。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展,旧有的交通运输方式和通讯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将交通运输和通讯扩展到全球性的范围内成为了时代的迫切要求。而这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恰好为之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交通运输方面,凭借瓦特蒸汽机和热力学的成果,1807年,美国工程师富尔顿用蒸汽机做动力制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533 页。

的轮船试航成功；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逊制造出了第一台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车。这样，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也成为了现代科技成果的自觉应用的结果。在通讯技术方面，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为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有效的新的方向，预示着电信时代的来临；1837年莫尔斯等人发明了电报机和电报代码，创造了人类通讯史上的一个奇迹；1876年美国贝尔发明了电话。这样，现代通讯体系就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已显露出了其雏形。可见，“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①。不仅如此，随着铁路、远洋轮船、电报和电话的发展，使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成为现代社会的专门的产业领域。产业结构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重组就建立起了现代的生产方式——知识化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说，由于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强大的自然科学并入了生产过程中，它必然会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最终建立起了知识化的生产方式。换言之，知识化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二）东方社会建立知识化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停滞性和落后性是东方社会的固有的特点。这是马克思在揭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问题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种状况又是由东方社会落后的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

产方式造成的。在东方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中，生产的发展是凭借经验的自发的积累进行的，在一定的意义上，生产劳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样，低劳动生产率只能导致一种普遍的贫穷，“后发”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技术的低下还造成了社会分工的极度不发达，不发达的社会分工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贫穷和落后的状况。这在东方社会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首先，在东方社会，还没有形成农业这样一个专门的产业，农业只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而这是由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少、科技水平低造成的。

农业是东方社会传统的生产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尽管东方社会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形成了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对自然生态环境没有造成破坏性的冲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所讲的集约型生产方式中的集约化）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效率极其低下，还根本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需要。况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生产方式是凭借经验的积累和扩散维系的，还根本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应用。由此导致的普遍贫穷使东方社会处于停滞和落后的境地。

在俄罗斯的村社中，生产效率的技术要求让位给了原始公平的社会原则，农业生产尤其是土地的划分和使用是按照所谓的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农艺学的原则和方法被排斥在农业生产之外。马克思晚年在肯定俄罗斯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在向未来社会过渡中的重大价值的同时，尖锐地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与农艺学的原则相矛盾的，它导致了生产要素的浪费”，“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课程，可是他们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

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块地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①这就是说，为了所谓的‘公平’而牺牲了效率，根本没有考虑到要按照农艺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组织农业生产。说到底，这还是生产中的科技水平低下的一种表现。生产要素的浪费就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形成了落后的生产方式。

而在其他的东方社会中，原始、简单的经验更是成为了农业生产中的主导性的力量，由此造成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普遍低下和落后。这种状况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僵死的社会体制。例如，马克思晚年在‘菲尔笔记’中对印度和锡兰的村社中的这种停滞、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在印度和锡兰，不仅还没有英国那样的纯农业阶级，’^②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而且整个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都十分低下。人们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男主人的带领下进行农业劳动，一张犁和两头牛就是全部的农业生产工具。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作为主要农具的犁，在技术水平上不仅根本不可能与蒸汽犁相比，甚至都落后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工具——铁犁，因为印度和锡兰村社中的“犁是最简单的木制工具，除犁头的尖端之外完全不用铁，形状很像一只细的锚，一根锚爪插入土中，另一根锚爪几乎与之垂直，作为耕者的扶手，锚杆就是犁身，套在牛的后边。没有犁刀或犁面，尖头只是掀动泥土，并不翻转泥土。整个工具很轻，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扛在肩上。’^③这与其说是生产工具落后，倒不如说是科技水平的落后。铁犁在中国的汉代就达到了定型化的水平，那时就已经有了铁制的犁壁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2页。

③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373页。

置这一装置 可以将翻土和碎土的功能合二为一 从而能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 在东方社会 由于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极其低下 不仅很难做出重大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有任何历史创举性；而且连一些简单的生产技巧都难以掌握，当时的孟加拉人“绝对没有能力独立地画出一条直线或规则的曲线 他们犁过的犁沟，他们那一小块一小块耕地的边缘，他们种下的稻子的行列等等，都像是蘸上墨水的蜘蛛腿在一张纸上留下的痕迹”^①。这说明当时的劳动者连起码的几何学知识都不具备，而不规则的土地根本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见，这种生产方式比俄罗斯村社的生产方式更为原始和落后。

总之 在科学技术极端不发达的情况下 落后的生产资料尤其是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愚昧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使生产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 在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只能造成贫穷和落后 使社会发展保持在停滞的水平上。

同时 东方社会中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科学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几乎不存在的，还没有形成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当然，这是与农业社会的整个结构和水平相一致的。

第一 从手工业的情况来看 东方社会中的手工业是隶属于农业的，是农业社会经济的一种简单的补充。而手工业的基本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简单的手工劳动过程，徒弟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而获得了基本的劳动技巧和技能，将这种生产方式延续了下来。它还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在当时的印度和锡兰，铁匠铺就是主要的手工业行当。马克思在“菲尔笔记”中描述了这种以铁匠铺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所谓的铁匠铺也只不过是一个草棚，杂乱地堆放着一些散碎的旧铁和新铁；泥地板的中央是一台小小

^①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69—370 页。

的铁砧紧靠火炉。火炉是在地面上挖洞而成的。十分简陋的风箱的喷嘴也安装在地下。铁匠坐在一个矮凳子上，或者就干脆蹲着，他一只手拉动绳子使风箱鼓动，另一只手拿着铁钳夹着铁在火中烧来烧去，然后，不动座位而转向铁砧。他右手拿着一把小铁锤，指点徒弟或助手把铁块锤打成型。而徒弟或助手也是蹲着干活，随着师傅的指点而抡动大铁锤进行着锤打的工作。在这种铁匠铺中，铁匠使用的工具也是十分简陋和原始的，铁锤的锤头是长的，只固定在锤把的一端，没有对称的东西与之平衡，而铁砧又非常狭窄。^①从这种落后的劳动工具身上，可以看出其科技水平的低下，也反应出了整个社会发展程度的低劣。另外，日常需要的手工业制品也很少，种类很有限，大体上有铜铁器皿、竹木器和陶器等。

第二，从交通运输的情况来看，东方社会的交通运输还极端不发达，这不仅表现在路况的简陋上，也体现在交通运输工具的单一性和原始性上。根据‘菲尔笔记’中的记载，当时印度和锡兰的交通运输状况极差。从路况方面来看，几乎没有大路，只有少数几条联结着首府和各地区城镇的主要交通路线，剩下的就是不整齐的小路，就是这样的道路，有的可以在上面行车，有的只能在旱季使用，有的则根本不能行车。旅行和货物运输只能凭借天然形成的水道进行。这里使用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有船只、人们的头顶、小公牛和极其粗糙的竹制小车，而有钱人的出行就乘坐小轿和肩舆。而所谓的船只也只不过是小船而已，由于居住在河道周围，每年都会遭到水淹，因此，这是一种必备的工具，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农民才拥有这种交通运输工具。而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政府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大量的车、船就被调集过来，甚至是强征来的，这样，这些交通运输工具就被锁在那里，经过多少天多少星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77 页。

期才用得着。这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路线的堵塞，而且也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这说明，当时当地的科技水平还不能有效地装备交通运输，不发达的科技水平造成了交通运输的不发达。而不发达的交通运输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东方社会的封闭性和孤立性，因为“村与村之间，一个农业区内此地与彼地之间几乎没有交通联络手段”^①；每个地方的当地交通运输在数量上是很少的^①。当然在殖民地制度下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铁路和轮船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引入，对东方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是，殖民主义绝不是为了促进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进行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东方社会交通运输的整体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第三 从社会生活来看 在东方社会 由于科学技术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还没有出现作为社会分工特定部门的劳动者——科技人员；而东方社会的所谓专职人员只不过是江湖郎中、占星士和神职人员这些依附于传统社会机体的“方士”。称做“卡比拉吉”的土著医生 按照古方配制药丸，带着自己的布袋走街串巷 每个村里都有称做“阿查尔吉”的占星术士 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做出解释以预言吉凶祸福，其中一部分占星术士为富裕家庭的重大的礼仪活动绘制水彩画进行装饰，尽管平面上所图画的线条和颜色都很好 但他们“完全不讲透视”^② 这其实也反应了整个社会科技水平的低下。而神职人员的职责更是游离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外的，所谓高度发达的精神生活同落后的物质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此外，社会分工的其他情况是，“卓基达尔——村社守夜人或警察；理发师和洗衣师同样都是重要的人物 木匠、陶工、织工、渔人也是一样 雅卡瓦拉——有权利捕

^{①②}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402、378 页。

鱼的人 还有土工等等’^①。这些所谓的专职人员不是以发现和发明为自己活动的目标的，这些行当还不可能成为专门的产业领域。事实上，这种分工不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种体现。凡此种情况说明，基于简单经验基础上的东方社会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发展。

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 之所以会形成东方社会从属于、依附于西方社会的局面 除了殖民主义的因素外 关键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建立起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东方社会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中，而大工业是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具有农业社会根本不可能比拟的强大的力量。归根到底 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在于 大工业是一个科学技术的自觉和广泛的应用过程，而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经验的建立和扩散的过程。因此，东方社会要摆脱依附状态、贫困状态，就必须使自己的生产方式向知识化的方向发展，应该在知识化的过程中来推进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因为这样，运用科学技术为发展中国家谋取福利和发展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三 东方社会建立知识化生产方式对策的选择

东方社会要建立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关键的问题是应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来武装自己的产业技术结构、提高自己的产业技术水平，真正使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变成一个自觉的、广泛的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显然，在东方社会内部，不存在着这样现成的能够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而东方社会现有的基础又决定了由自己独立地进行发现和发明，必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重复他人劳动的过程中还会使本来稀缺的资源更为紧张；这样，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379页。

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 就要求东方社会应该采用科学技术移植的方式来实现生产方式的知识化。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这种跨越既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跨越，也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的跨越 为了使这种跨越成为可能 东方社会在进行生产力移植的同时，还必须要进行科学技术的移植。只有将生产力移植和科学技术移植统一起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才能奠定东方社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东方社会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就揭示了东方社会采用科学技术移植的方式对于实现跨越式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 那末 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 至少在我看来 是毫无疑问的。可是 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 国家 同时 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 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 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收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 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 而不必加以破坏”^①。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性成果 既包括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也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其他东方社会国家，因为大工业和对外贸易将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到‘世界历史’的全球性的潮流中来了。从马克思晚年的论述来看，东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以跨越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就在于它处在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有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44 页。

环境中，不必经过技术上的重复就可以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应用到自己的生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提高生产和经济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的同时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摆脱后发的状态，跨入发展和发达的行列。

凭借科学技术移植而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进而实现现代化，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重要模式，例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崛起，就在于大胆地采用了科学技术移植的方式，在战后迅速地再度实现了现代化（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此，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对科学技术移植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一般都是给予了肯定。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提出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并不是步发达国家的后尘的命题。他援用了“借用技术（技术移植）的概念，认为后发国家无须自己建立技术，而可以利用借用技术，这样，它们就应当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并赶上发达国家。在他看来，许多后发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是因为缺少资源或缺少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的制度条件等障碍，而且不能克服这些障碍。这样，后发国家就有必要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后发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丰富，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为达到初步产业化所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都是很少的，这就构成了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如果后发国家能够采用技术移植的方式，成功地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最尖端、最有效的技术，那么，让发达国家的技术长处在本国再生，就可以克服工业化的障碍。这在于，技术是劳动的节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参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14—115 页。

但是，正像生产力的移植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样，科学技术的移植更为艰难。后发国家在科学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就应该处理好一系列的重大关系，以便建立起知识化的生产方式。具体来讲：

首先，要处理好技术移植和技术选择的关系，为科学技术的移植提供一个适宜的社会结构。

尽管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会按照自身所固有的规律进行传播和扩散，但是，科学技术只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运行要受到社会系统整体和其他子系统的制约。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在社会结构提供的框架中进行运行和发展的，在不同的框架中，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后果是大为不同的，因此，要使科学技术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就必须为它提供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结构和科学技术匹配起来。在科学技术的移植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马克思晚年在提出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时候，就十分强调要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矛盾，要求在进行跨越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东方社会的实际，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在科学技术移植过程中的体现，就是要求在科学技术移植的同时必须要进行技术选择。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移植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而应该是有所选择的。这种选择的过程首先应该是为科学技术的移植提供一种适宜的社会结构。假如在技术移植的过程中不注意技术选择，那么，技术移植是不会成功的。一般来讲，“技术选择应包括更多的社会参与，建立包括社会需要的新准则，发展科学教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42页。

提高设计者选择技术的能力 改善决策过程 以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技术抉择问题。”^① 具体到科学技术的移植来看，技术选择应该按照如下的原则进行：

第一 社会性原则。科学技术的移植过程 同时是一个同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阻力进行斗争的过程，在东方社会尤其是这样。这在于 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推进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 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它必然会对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造成严重的冲击 而东方社会的结构又是以孤立性、滞后性和专制性为特点的 它在本质上是与科学技术相抵触的。这样看来 尽管从根本上来讲 移植进来的科学技术总要向社会阻力小的方向发展 也会在冲破社会阻力后在一个新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生存和发展，但是，不对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甚至是改革和革命，移植进来的科学技术就不会完全扎根的。其中，社会主体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在移植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即使再先进的科学技术 假如没有社会主体的认同、接受和掌握 它都是对社会发展无能为力的。因此，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高度科技文化素质的主体 就成为了科学技术移植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当然 这不是在时间安排上的一种先后顺序的选择，而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科学技术移植之所以在日本获得了成功，就在于日本很重视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在摆脱了旧的社会结构之后，日本就开始用许多方式在国民中传播知识 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的 10 年中，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这一工作，主要有：大规模地从国外聘请专家 作为短期合同的教师 促进本国国民到国外进行多次的教育旅行 建立许多机构 其主要任务是从西方吸

参见 [英] P. 伊金斯：《生存经济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38 页。

收知识并加以传播。

第二，经济性原则。科学技术移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更好的劳动产品以满足国民的需要；而生产和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是双重的，既要提高产品的数量，也要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决定了在科学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必须要对科学技术进行选择，因为彼处有效的科技成果在此处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没有相应的社会结构的支持，可能新技术是毫无用处的。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对于东方社会来说，可能最为需要的是“适用技术”。例如，淡水不足是导致庄稼歉收、粮食短缺、饥馑蔓延的重要原因，这是广大的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尽管大型水库凝结了先进的科技成果，但是，在后发国家修建大型水库的方法却是不可取的，这在于，一是修建大型水库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而后发国家不一定具备这种投入的条件；二是修建大型水库的周期很长，难以解决后发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燃眉之急。这就是说，大型水库在后发国家是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蓄水 10—100000 加仑的小型水库更为适用，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廉价的小水泵把水排向任何需要水的地方。有的水泵太陈旧了，人们就发明了一种称做“地下水车”的水泵，即在水中安置管道，利用河流的自然转弯处水流本身的自然压力来排水；这种经过技术选择的小型水泵具有价格便宜、制作方便、能量可观的特点，很适宜于在后发国家中使用。据测算，直径为 3 码的地下水管的压力相当于过去直径为 60 码的水轮机的压力。^①

第三，生态性原则。尽管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和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但是，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又要

参见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7 页。

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科学技术的移植应该考虑到移植国的自然生态特点，不能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更应该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凭借的技术一般具有高投入、高污染的特征，一方面依赖于大量地消耗资源和能源，另一方面在生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又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在当时，它们有条件进行这种高投入而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这些后发国家一般具有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的特点 况且 它们也难以承担解决环境污染所需要的经济负担。这样，东方社会在进行科学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选择那些与自己固有的资金缺乏、劳动力过剩、资源有限环境脆弱的国情相适应的科技成果进行移植。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倡导的“中间技术”就是这样的科学技术形式 这种技术“由于利用最好的现代知识和经验，因而易于分解，适应生态学的规律，缓和地使用稀少资源，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他之所以将这种技术称为“中间技术”是“以表示大大超过以往年代的原始技术，同时又比富国的超级技术简单得多，便宜得多 自由得多”^①。在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就应该选择这样的科技成果进行移植。

第四，匹配性原则。科学技术是一个系统，在其运行的过程中，每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形式和科技成果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考虑到科技系统的层次性和整体性。在科学技术的移植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一是在整个科技系统中，各个层次的科学技术形式的运行应该相匹配，一个层次的科学技术目的的实

参见 [英] E.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第 104 页。

现要依赖于下一个层次的科技手段的支持，而这一层次的科技手段又是更下一层次科技的目的，通过各个层次的科学技术在功能和目的上的匹配，移植进来的科学技术才能发挥作用。二是在整个科技系统中各个不同的子系统在功能和目的上也应该匹配不能顾此失彼。三是要考虑到新旧科学技术之间的衔接，新技术只能在旧技术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同时随着科技发展应该逐步地淘汰旧技术在新旧技术之间应该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巴西在发展核电事业方面就有沉痛的教训。巴西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前西德引进技术大规模地发展核电事业但是由于国内缺乏相应的核能技术基础历经 10 年、耗资 40 亿美元而一无所获，结果不得不草草收场。

总之在科学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应该从社会、经济、生态和科技自身等方面对科技成果进行选择，为科学技术的移植提供一种适宜的社会结构这样移植才可能成功。今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进行计划时的优先考虑事项及其经济及社会目标既决定了对技术的选择也为技术所决定。一个国家只有能够吸收并且改造它所得到的技术并且能够提供一种‘迎接的结构’把新技术与旧社会联接起来它才能从更多的技术中得到好处。”

其次，要处理好技术移植和技术创新的关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适宜的科学技术支柱系统

东方社会进行技术移植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模仿移植的对象，而应该以移植为契机，在移植的过程中进行创新性的学习，以提高自己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单纯的移植不能有效地提高后发

国家的科技能力，后发国家只有增强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总体上提高自己国家的科技实力，最终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强大的支柱系统。在以封闭性、滞后性和专制性为特征的东方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有形的、现成的科学技术，而是发展科学技术所最必需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缺乏历史创举性已经成为了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已经揭示出了东方社会存在的这一严重问题。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三稿中他指出：“公社受到的诅咒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这又该怎么办呢？这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①。因此技术创新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技术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这位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在其《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就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只有引入到生产体系中的发现和发明，并对原有的生产体系造成了震荡性的效应，才能称做创新。他认为：“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的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发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法之中。（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51 页。

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①技术创新是整个创新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应该按照如下原则进行：

第一，支持性的原则。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形势、战争和政府的指导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从技术创新的本性来看，它不能按照单纯市场经济的法则运行，政府必须给予大力的支持这在于，“技术创新并不完全是一种市场现象。随着经济和生产技术变得复杂和成熟，技术愈益依赖于作为其来源的基础科学的现状。基础科学产生的许多技术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领先时间很长、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巨大、商业获利性方面风险大以及成功的收益难以估价。因此、技术创新的进程依赖于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②。从技术创新的实际经验来看，影响技术创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 R&D“研究和发展”方面经费的投入。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尽管在发达国家中，“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投入呈多元的态势，但是政府投入是主要的，凭借强大的财政后盾，它们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直领先，从而保持了自己的发达地位而“研究和发展”方面经费的奇缺则是影响和制约后发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瓶颈”现在，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投入占 GDP 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目前基本稳定在 2.8% 左右，欧盟国家大致在 2% 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很低，如印度大约在 0.8% 左右，而中国在 0.7% 左右。在这种

①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73—74 页。

② [美]V. 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 1992 年版 第 10—11 页。

情况下，后发国家就应该在想方设法将 GNP 这块蛋糕做大的同时增加 R&D 方面的经费投入。此外，国家还应该提供其他方面的政策性的支持。

第二，主体性的原则。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依赖于两个方面的人力资源优势，一是要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是应该要有一定数量的从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专职技术人员。没有一定数量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技术创新就失去了主体。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美国在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是 3732 人，日本是 5677 人，而印度是 151 人，巴西是 165 人，中国是 537 人。这样，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后发国家就应该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增加从事 R&D 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二是要有能够十分熟练地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高效率生产的产业工人队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只有转化为产品之后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产业工人就是从技术创新到技术产品的中介，没有一定数量的熟练的技术工人来使技术创新成果产品化，技术创新同样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蓝领工人”，到 21 世纪初，“知识工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将达到 1/3。而中低收入国家男女文盲的比率分别却高达 21% 和 39%。这样，就将开发人力资源、增强人力资本实力的问题突现了出来。为了有效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后发国家就应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第三，工艺性原则。技术创新必须要考虑新发现、新发明在生产工艺方面是否还有未突破的科技难点，这种突破同时可以促进科技体系自身的突破，使科技系统获得新的结构和功能。技术创新是科技系统本身的创新，它既包括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化，使得

一项科学技术在结构和功能上出现最优化的趋势 同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体系化,使得一项科学技术同其他科学技术能够协调起来。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完善化 还是体系化 都是围绕着产品、工艺、设备和原材料等工艺学方面的因素展开的 所以 产品、工艺、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的创新都是技术创新过程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①,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 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来,在这种形式下 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①。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做出一种新的理解 技术创新是为了商品、服务、信息的生产、分配、利用、消费 而有意识、有目的地加以利用的新科学知识 特别是与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原料和新结构有关的一切新知识。

第四 市场化原则。技术创新开始于技术构思 终于它在产业上的首次应用。在这一过程中 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 就使一项科技成果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产品成功地打入市场的同时 就能实现其经济效益 最终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价值。这就是说 技术创新是与市场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产品是新发现、新发明的物化,它必须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技术创新的生命力就在于新产品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经受住竞争力的检验,而这又取决于商品的质量、性能、成本和社会的需求状况。这样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就应注意技术转移的问题“,技术转移是指一定的新技术的赢利情况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市场是生产者所处的物理和生物环境。一种新技术的有效使用可能会给 A 地区的生产者增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689 页。

10%的利润 但却可能给 B地区的生产者只带来 2%的利润增加。因为 同样的技术由于 A地与 B地的土壤气候等生产条件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技术由 A地转向 B地 就只能获得较低的转移效果。”^① 这样，对于技术创新的主体来说，就应该有风险意识，应该选择那些效率高、效益好的市场化方式。而对于社会来说，一方面应该为技术创新提供适宜的保险服务；另一方面应该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的杠杆作用来调节新技术的产业化。美国在这方面的基本经验就是，通过建立规范的市场来间接地组织多元化的科研格局，例如，大学和工业企业之间的研究分工、80年代以来的合作趋向的加强，基本上是借助于市场的力量促成的。

总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东方社会在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注意技术创新问题，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最后，要处理好技术移植和制度创新的关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一种合适的制度结构。

技术移植要求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发展，又进一步要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而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并不仅仅是或者甚至基本上不是市场现象”^②。当然，对制度创新的重要性需要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就是，为了实现增长和发展，为了推动生产方式在结构上的变化，避免丧失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实现发展的公正性，

[美]G. 拉尼斯等：《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进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276 页。

② [美]V. 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 商务印书 1992年版 第 11 页。

都必须要求制度创新。这样，就要求东方社会在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同样应该进行制度创新。为了能够使科学技术移植获得成功，东方社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制度创新：

第一 努力摆脱依附状态 实现民族的独立 为科学技术的移植提供一种适宜的国际环境。在殖民地制度下，东方社会根本不可能获得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成为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 东西方社会之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大为不同的，殖民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消除，反而形成了全球性的发达与依附的矛盾。在这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会向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转让技术，并不是要提高东方社会的发展水平 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率。一般来看，一般利润率会由于投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殖民地贸易上的资本具有比较高的利润率而提高“，因为在那里 由于发展程度较低 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①。即使在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凭借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成本低下的优势而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的，将东亚国家和地区作为它们加工电子元件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转让的代价就是为发达国家提供比较高的利润率，而牺牲了后发国家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技术转让的幌子下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转嫁‘公害’的场所 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从中获益，而且会破坏自己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就成为了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生态受害者。这是造成东方社会不发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非欧地区迅速崛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265 页。

“日本迅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它从未被殖民化，这使它能自主地决定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可以从欧洲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教育体制中进行选择从每种体制中汲取它认为最优秀的东西。”^①当然，战后美国占领和租用日本军事基地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社会在进行科学技术移植的时候，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现存的科学技术并非都是可转让的，所有可转让的科学技术并非是毫无保留的，所有转让的技术并非都是有益的。这一切同时都取决于技术输出国的既得利益，保护主义是科学技术移植的一个重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就应该努力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为自己的科学技术移植提供一种适宜的国际环境。即变革不适宜的国际环境、摆脱依附、争取独立，是东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第二，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科学技术的移植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上的保障。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科学技术的社会性质和作用是大为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使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变成了一个自觉、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科技进步成了榨取工人血汗技巧的提高过程，成了掠夺和压榨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血汗技术的一种“进步”。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这种社会制度成为一种腐朽过时的社会制度。东方社会在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将这种制度也移植到自己国家中来，应该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波折和曲折。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在提出跨越式社会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1 页。

道路时始终强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移植进来的科学技术真正发挥作用，东方社会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当然，这种过渡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在讲到巴黎公社革命对于农民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①。这也同样适用于广大的东方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不同于一般制度创新理论的本质的地方。一般制度创新理论只是将制度创新限制在社会的具体体制上，讨论的是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对于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没有看到或有意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社会制度对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限制。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和技术上的必然性，而不是人为地、主观地设定的。在晚年的一篇重要的科学文献——《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马克思对之做了这样的揭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正在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这是关于所有权的任何言论都阻挡不了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照样进行，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 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04、127页

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在完成了社会制度上的这种过渡后“，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技术创新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但是，要使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就必须进行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在经济科技文化不发达的东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急躁冒进。前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汲取。变革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东方社会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第三，要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一种适宜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高质量的产品是由高素质的人生产出来的，而高质量的人是由高效率的组织和高艺术的管理而调动、组织起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弥补落后的组织和管理，但是，先进的组织和管理却可以弥补落后的科技水平的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和管理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源泉，正如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的那样，有效的管理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源，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源。这样看来，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过程也就是技术创新的过程。没有组织和管理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技术和经济的创新；正是由于组织和管理上的创新，才能使生产过程中技术的各个组成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优化。在这个层次上，制定恰当而有效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推进技术创新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这已为世界上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所证实。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范围内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在 1918 年 4 月拟定了《科学技术工

作计划草稿》。在这个草稿中，列宁给科学院确定的基本任务是，改造工业 发展经济 保证燃料和原材料的供给 合理安排生产 促进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电气化。1920 年，通过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在一个饱经内忧外患的新生国家，似乎领导者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迅速获得能够带来实际效益的实用科学技术，但是，列宁却清醒地意识到，新社会的建立不能没有基础科学的积极参与，只有基础科学才能为实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他竭尽全力动员所有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引导他们去发展基础科学和建立宏大的现代科学研究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列宁提出了一个科技发展战略的总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① 正因为这样，苏联才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列宁的这一经典公式是对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式社会发展道路的最好诠释和最有成效的实践。而美国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强大的推进作用，主要归功于其自由放任的多元体制，政府直接组织和领导那些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从而增强了国家的整体科技实力；而其他方面的问题则交给了市场，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社会的需要和企业的发展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之所以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科技实力，也在于国家十分重视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在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将发展科学技术确定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使科技发展战略得以完善化。根据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实际出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采用移植和嫁接相结合的策略，使技术移植同自己的国情统一起来，从而来提高自己国家

产业的技术水平。二是要采用适合技术的策略，发展中国家在移植和创新的规模上应该适度，不能给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否则，欲速则不达。三是采用中间技术，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科学技术向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过程中，应该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四是采用高科技产业化的政策，加快对新科技革命成果的吸收和采用，以此来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为实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又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五是采用国际分工的策略，在采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技术“空心化”的状态来形成本国的技术结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封闭和孤立无异于自杀，因此，问题就在于在保持民族独立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地奉行“拿来主义”。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的移植才能获得成功。

当然，要建立知识化的生产方式，涉及到一系列的复杂的问题，科学技术的移植只是建立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只要广大的后发国家将技术移植和技术选择统一起来、将技术移植和技术创新统一起来、将技术移植和制度创新统一起来，那么，他们就会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化生产方式，从而就会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强大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支持。

总之：“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

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面对生产方式的这种知识化的转型，东方社会别无选择，只能不遗余力地发展科学技术，尽快地将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东方社会向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特征。经济增长是不同于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是指更多的产出，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而且也包括单位投入而生产的产品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要广泛一些，它既包括更多的产出，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经济增长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结果。在追求剩余价值目的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方面大量地节约资本以减少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资本又将自然资源、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教育以及管理等因素合并到了生产过程中，这样，就迅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使用价值）。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根本不同于那种低投入、低产出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社会就取代农业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现代化由此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广大的东方社会之所以处在了后发或欠发达的困境中，也是由于自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低效率的生产方式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

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提高，匮乏的物质财富不能保证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普遍的贫穷致使自己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国际经济的循环中去。因此，为了尽快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东方社会也应该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化的方向上来。

（一）现代化是一个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化方向的过程

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影响和制约生产发展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不仅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生产发展的要素，而且科学技术、教育和管理也是生产发展的要素。因此，如何使这些因素合理地配置起来、高效率地发挥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某一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天赋和存量是不同的，由此决定了它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各异的。由于选择或偏好于其中的某一因素，就使生产方式形成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等等的区分。对这些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利用方式：一种是粗放型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生产要素在量上的扩张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其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形成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集约型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其特点是少投入、低消耗、高质量、高产出，形成了由增长促发展、由发展保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局面。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就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而所谓的增长方式就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整体功效和水平。

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社会所依赖的主

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的产出量和土地、劳动力的投入量是不成比例的，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工业社会所依靠的主要的经济资源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其中资本的作用开始日益突出出来，是一种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相统一的生产方式。在西方现代化的发生阶段，由于遇到了国内资源匮乏和紧张的问题，因此，它们就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将殖民地的大量的经济资源掠夺了过来，从而解决了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问题，为工业化提供了可能和保障。由于它们是以这种野蛮的方式获得经济资源的，因此，一般就以粗放的方式来组织和利用这些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的低下，这样就造成了经济资源总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影响到了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就将经济增长方式开始逐步转变到集约化的方向上来了。由于资本成为大工业过程中的主导性的生产要素，而它又是资本家个人占有的财产，因此，尽量减少资本的投入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是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趋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的一般方式是，尽量地减少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用资本将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教育和管理等一切“不费资本分文”的力量合并到生产过程中来，正像存在着外部的不经济性一样，所谓的不费资本分文的力量是指外部的经济性，使它们变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并入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劳动力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①。这样，就可以提高资本的利用效

率。其中，从外延方面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是指生产对象和场所的扩大；从内含方面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①。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大体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注重于数量和速度；而内含扩大再生产，大体上就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注重于质量和效益。尽管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节约资本，但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②。这种扩张的过程就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不仅如此，大工业还将科学技术、教育和管理并入到了生产过程中了，使生产变成了一个自觉的、广泛的利用科技成果的过程。由于科学技术是按照加速度、指数增长的方式发展的，因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程度大大提高。这样，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节约资本、提高其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中，就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它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超过了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

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和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有：

第一，提高自然条件的利用效率可以节约资本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自然条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自然界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3页。

是生产力的对象因素 又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场所 它对生产力构成了一种天然的限制。大工业将自然条件合并到了资本当中,节约了资本的投入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 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 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 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 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 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 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 而无需追加货币资本’^①。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大工业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对自然条件的外延式的利用 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污染 形成了粗放型的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是对自然条件的内含式的利用 发现了自然物质的新性质和新用途、开辟了自然物质利用的新方式和新范围,这样 就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形成了集约型的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大工业的初期 是前一种方式占主导地位 在大工业的后期发展过程中 后一种方式成为了主导性的方式 因为环境污染这种外部的不经济性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第二 扩大生产资料的规模、提高生产资料的效能 也可以起到节约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中介系统 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么样进行生产。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普遍地采用了大机器的生产方法 这样 大机器就成为了主要的生产工具。大机器的采用可以极大地缩短劳动期间“,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 收割机、脱粒机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术的改良 提高了船速 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②。这样 通过对劳动时间的节约 采用大机器生产资料就为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394、262 页。

第三，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系统，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在大工业的发展初期，经济增长是通过工人的残酷掠夺而实现的。为了产出更多的产品，资本家迫使工人不得超过其正常的身体极限进行繁重的劳动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基本投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卫生和健康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工人也只是简单地从事体力劳动和部分经验性的脑力劳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重要形式的教育还没有提上日常进程。但是，单纯地依靠这种生产方式不能最终持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存在一个极限，而社会道德也不容许无限期地延长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就被迫放弃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而转向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这样，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提高就成为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样一来，“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第四，通过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决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参与生产过程的。如何合理、有效地将劳动者组织和结合起来，也是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要素。在农业社会中，劳动者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进行生产的，生产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此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低下。而大工业形成了生产专门化和高度集中化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将分工和协作相统一的问题突出出来了，通过提高分工和协作的水平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大批工人，并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①。在分工和协作缩短劳动期间的过程中，就可以大大节约劳动时间，从而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五，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程度和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和出路。科学技术最初是作为生产力的渗透性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但是，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展、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资料的更新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这样，科技因素就逐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产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应用程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经济和生产的过程成为了一个自觉、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这样，“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旧形

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①。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资本将一切的生产要素都合并到了自身中，使资本的投入和产出的比率在不断地提高 最终就使现代化成为了可能。

凭借着上述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使工业经济增长的过程转向了集约型的方向，而且也使得农业经济的增长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随着大机器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和大规模的应用 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就大大提高了，“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 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 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 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 总之 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②。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营所需要的费用大大降低了，二是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数目大大减少了 三是生产的产出大大提高了 形成了财富的积累 这样“一方面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耕作更加集约化 投在土地机器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 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 另一方面 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③。撇开其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那么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恰好就是一种典型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效应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扩展，就使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从而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 不断增大 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 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664、742、743 页。

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地增加而且相对增加的事实，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①。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就不会有经济现代化，而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正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经济特征和要求。

（二）东方社会向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在西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凭借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了发达国家，而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普遍存在着高投入（主要是指对土地的粗放经营、劳动力的大量花费）低产出，只能维持简单的温饱的矛盾，最终使自己沦落到了后发的境地。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了影响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因素。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及其投资——教育的状况。东方社会落后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制度，使它难以将人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人力资本，这样，它也就不能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提高自己的经济增长水平。

尽管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但是，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仅成为了生产力，而且成为了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可以大量地节约生产要素，提高它们的使用效率，最终保障劳动生产率能够持续地提高；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9页。

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 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 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① 但是，科学技术总是通过生产的主体进入生产过程的。只有通过转化为劳动者的内在素质或技能和技巧的环节，科学技术才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发生作用。这样 劳动者能否合理、有效地把握科技成果 将之转化为经济增长之源，就成为了经济增长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关键。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实现的一切生产要素的节省 都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最终会实现集约化。这样“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 是劳动条件作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 或作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惟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 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 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 才能发现并且指出 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 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 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 等等’②。这就是说，不仅在一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具有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在转向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这样，最终就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问题突现了出来。

只有劳动者的素质得到了全面和普遍的提高 科学技术所发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 第 21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119—120 页。

和发明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水平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得以应用，只有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获得了一定的科技文化知识，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那么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制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教育就是培养和造就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本的机制和方式；“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①。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保存者、生产者和创新者的教育，首先是劳动力的生产者，这在于人力资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人口）还不是现实的劳动力，只有经过教育或培训，对人力资源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后，他们才能获得从事生产所需要的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这样，人力资源才能转化为人力资本，成为现实的劳动力。而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后天获得的人口质量的特质”^②。同样，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也要依赖于教育或培训。在一般的意义上，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增强人力资本实力的基础行业部门，可以生产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动力储备，甚至是提供现实的直接的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增长方式的不同就在于劳动者整个素质结构的不同，在于劳动者是否经过了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能否在教育 and 培训的过程中将劳动者的生产力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在现代的、西方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大工业是一个将科学技术自觉应用于生产的过程，因此，它对劳动者的各方面的素质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的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195 页

[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8 页

高就成为了经济增长之源 为此 就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 使之能够获得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可见 对人力资源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方式的主体是经过较为系统或系统教育和培训的 他们获得了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一系列的素质 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真正成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革命性的力量。而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教育、技术教育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者的生产力的一种基本的方式。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西方教育的普及和发达 当然 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会造成人的异化，产生出“单面人”)教育不仅是每一个公民应享有的不可剥夺的人权 而且成为他们健康发展、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教育上的这种保障，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传统的、东方的经济形态重视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本 忽视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由于东方社会是一种基于农业生产之上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劳动者的日常经验成为了生产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教育是与整个生产劳动相脱节的 成为了权贵们博取个人功名的一种手段，成为了他们光宗耀祖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来 东方社会的教育就处于一种停滞的、落后的实质上是萎缩的状态。这种状态进一步反作用于劳动者的主体素质中，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这从马克思晚年在‘菲尔笔记’中对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的教育的考察中可以窥出一斑 。

参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75—376 页。

一是从教学内容来看，村社中的教育还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除了识字、读写、算数这些基本的教育外，宗教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生要长年抄写枯燥无味的宗教经卷。这就是说，这种教育基本上是排除科学教育的，学生不能从中获得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是游离于劳动生产过程之外的，不能形成人力资本，不能形成集约化的经济增长。

二是从教师队伍的构成来看，村社中的学校的教师还没有作为社会分工中一个特定的分工领域出现，本来只有婆罗门和其他再生阶级。再生是指婆罗门教徒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再生阶级是指印度四大种姓中的前三个上等种姓，可以教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其他阶级也可以从事这种职业。例如，杂货商在经营的同时还可以教孩子们读写本地文字和做算术。这就是说，在东方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存在着专门从事教育的专职教师，这其实反映出教育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迫切需要。

三是从教育的运行机制来看，它是靠教徒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运转的，教育对村社中的成员是免费的。教育之所以是免费的，是由宗教的传统决定的。教师不能从学生手中直接接受钱物，而必须靠自己的化缘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和起码的教育经费。这就是说，教育还没有成为国家的一种职能，国家还没有将教育作为生产人力资本的公共产品来对待。

四是从教育的设施来看，它是十分简陋的。孩子们在露天的或半露天的学校中接受教育，他们只能在芭蕉叶或棕榈叶上学习写字，或者在一块破碎的外国石板上练习演算，或者干脆就在自己的面前一块弄平的地上写字、演算。高级学校中的学习课本也不过是手抄的梵文手稿。这种情况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整个东方社会不发达状况的真实写照，说明教育还没有作为社会的一种专门的建制而存在。

总之，在东方社会，教育是隶属于宗教社会或宗法社会的，它是排斥综合的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的，学生不可能从中获得基本的生产经验、技术和技能，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没有成为劳动者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基本的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教育的落后造成了整个东方社会经济的不发达。

可见，作为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基本方式的教育，在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对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投资，能够改进其质量。因此它具有与增加人数相同的甚至更大的影响。正规学校教育、职业和岗位培训计划以及成人和其他类型的‘非正规’教育也许都能更有效地增加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源，就像直接投资于建筑物、设备和物质材料一样。高级的和训练有素的教师以及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也许使既定的劳动力在质量、领导才能和生产率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对人力资源投资的概念类似于通过战略性的投资改进现存土地资源的质量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概念”^①。这样看来，东方社会要从农业社会跃迁到工业社会，必须要使教育独立出来，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进行发展，使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在东方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于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东方社会向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的选择

东方社会要将自己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的方向上来，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从而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率，而在由发达和不发达矛盾所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东

[美] 迈克尔·P. 托达罗等：《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88—89 页。

方社会已经不能向资源要效益 也不可能向资本要效益 而应该向结构优化要效益 向规模经济要效益 向科技进步要效益 向科学管理要效益。而这一切的最终实现就是要提高自己国家的人力资本的实力 为此 就必须将教育确定为优先发展的领域 应该向教育要效益。

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条件，东方社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选择适当的要素，以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作为经济增长的起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 其中包括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① 由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的本底、存量情况是大为不同的 因此 就应该根据经济资源的状况适当地选择自己的增长方式，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就应该选择资源密集型的方式，资本实力雄厚的国家和地区就应该选择资本密集型的方式，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就应该选择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 应该逐步转向科技密集型的方式。从一般的趋向来看 经济增长是沿着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方向发展的。显然 在广大的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起飞过程中，不存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那样的经济资源优势，只能选择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起点。这在于：

一是从自然资源的情况来看 在西方现代化的启始阶段 尽管也遇到了自然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它们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的自然财富变成了资本，通过资源密集型的方式 实现了经济发展。而在它们实现发展的同时 却造成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53 页。

殖民地的不发达“，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踪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①。这样，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就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匮乏，东方社会在现代化的一开始阶段就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自然资源紧张问题，因此，一般不宜采用资源密集型的方式，否则的话，会进一步加剧资源匮乏的问题，丧失经济发展的持续的保障。即使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也应该注意可持续发展问题，使得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永续的利用。

二是从资本的情况来看，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大量的资本在资本家手中得以积聚，资本将土地和劳动力合并到了生产过程中，这样，他们通过资本密集型的方式就实现了工业化；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扩展市场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而东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不能采用这种方式。这在于，一是本国不存在这样的资本实力，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资本匮乏型的国家。同时，也不能采用原始积累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否则的话，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正的程度，从而会使本来不稳定的社会局面更为混乱；二是不可能凭借资本的大量输入来实现现代化，后发国家举债过高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很可能还会引发金融风暴，最终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三是从科技方面的情况来看，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19 页。

源，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凭借科技革命成果在生产中的自觉和广泛的应用，迅速实现了现代化；随着生产和经济中科技含量水平的提高，它们逐步建立了科技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使得现代化的水平再度得以提高，开始向“后现代”阶段过渡。尽管东方社会属于经验型的社会，还没有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但是，由于它们处在了“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凭借科学技术移植的方式来提高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这是其“后发”优势的一个基本的体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宜直接建立科技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因为后发国家不具备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基础，落后的教育致使科技成果难以迅速、广泛地转化为生产力。这样，解决问题的出路还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

四是从人力资源方面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一般都是人口小国，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由于它们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注重对有限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在普遍、全面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同时，智力移植也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促进性因素。尽管广大的东方社会普遍缺乏资源、资金和科技等“死”经济资源，但是，它们却具有丰富的“活”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一般都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它们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个普遍性的优势。上述一系列的情况在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正如有的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事实是，当代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状况在许多重要方面明显不同于现在发达国家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状况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初始条件有八个重要差别。这些差别需要我们对增长前景和现代经济发展所需条件的分析进行大量修正。1. 拥有的资源。2. 人均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水平。3. 气候 4. 人口规模、分布和增长。5. 国际人口迁移的历史作用。

6. 国际贸易利益。7. 基础科学、技术与开发能力。8. 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① 世界上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充分说明，注重人力资源积累的增长方式的成效要优于注重物质资源积累的增长方式。例如，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拉美国家采取的是注重物质资源积累的方式，最后形成了物质资源相对充裕而人力资源比较短缺的经济结构；而东南亚“四小龙”采取的是注重人力资源积累的方式，形成了限制物质资源方面的投资而注重人力资源投资的经济结构。结果表明，后一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前一种方式。以 1960—1978 年为例，采用人力资源密集型的东南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4.68% 而采用物质资源密集型的拉美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只有 3.86%。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就不能采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那种通过使农业劳动力“空洞化”来减少农业人口、从而实现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而应该将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起飞点。

可见，从东方社会、发展中国的实际出发，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起飞点。

在东方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要采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劳动力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样可以实现集约化。在各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对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等诸种方式都可以采用粗放和集约两种不同的利用方法，例如，既存在着粗放化的资源密

① [美] 迈克尔·P. 托达罗等：《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01 页

集型方式（如对资源的高度开采和利用），也存在着集约化的资源密集型的方式（如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生态工业和清洁生产，环保产业，等等）。同样，对待劳动力密集型方式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假如只注重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那么，便形成了粗放化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结构；假如注重劳动力素质的全面和普遍的提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那么，便可形成集约化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在传统的东方社会中，大都采用的是前一种方式，而东南亚“四小龙”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面对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局面，“四小龙”从自己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出发，注重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发展了电子元件加工和组装等高科技加工方面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产业，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使自己迅速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就是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问题不在于是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而是在于发展中国家在什么样的水平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配置和使用劳动力资源。正如一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节省资本的技术进步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世界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在这些发达国家中，授权进行研究的是劳动节约的，而不是资本节约的。可是在劳动力充裕、资本缺乏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本节约的技术进步是最需要的。这类技术进步会导致更有效的（即低成本、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例如小型农用的手工或旋动力锄草机和脱粒机、脚踏风箱式抽水机和机械洒水机）的采用。不发达国家本地发展成本低、高效率、劳动密集、资本节约型的生产技术是任何长期就业发展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① 在这种

^① [美] 迈克尔·P. 托达罗等：《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92 页。

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国力的强弱，社会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人多就一定好办事，关键的问题是有什么样的人，人的综合素质水平如何。这就是说 现存的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人力资源还不等于现实的人力资本，只有经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才能使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

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东方社会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以便形成和加强人力资本实力，而教育就是开发和投资人力资源、形成和加强人力资本实力的一种基本的方式。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人口数量庞大、综合素质较低，这样。能否把沉重的人口包袱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人力资本实力，就成为它们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尽管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毋庸置疑的是，离开教育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增强人力资本实力，“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不是由于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扩散到民间，而是由于劳动者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结果，它们同其他人力投资结合在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①可见教育是开发和投资人力资源、形成和加强人力资本实力的一种基本的形式。不仅如此，教育还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而且回报率比较高。例如，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 43% 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 108% 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 300%。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按照其

〔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25 页。

人力资本学说，认为高等教育经费的收益率是可以在数学上准确计算出来的，他给出的公式是：

$$\text{高等教育经费的收益率} = (\text{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 - (\text{中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 \div \text{高等教育经费}$$

按照这种方法，日本对本国从 1930—1955 年这段时间教育投资的收益进行过计算，发现在日本国民收入的总增长部分中，约有 25% 是由于增加教育资本而获得的。其实，教育不仅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直接的贡献，而且在总体上是一种高产出的产业，其社会收益率也很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在 1960—1995 年间年均社会收益率至少在 10% 以上。这种社会收益率可以使经济的外部环境具备经济性，进而带来了社会价值在总体上的增殖。可见，“教育远非是一种消费行为，在此意义上，上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满足或效用。相反，公共和个人用于教育的费用意在获得生产性‘存量’。这种‘存量’包含在人体中，将来能提供各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未来的收益，未来自己经营的能力以及家庭活动的能力，未来消费的满足作为一项投资，教育明显地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储蓄”^①。相比之下，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文盲和半文盲在整个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庞大的人口数量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致使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后发”的状态。除了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外，后发国家教育的不发达是制约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今天，马克思晚年在“非尔笔记”中所揭露

^① 美 西奥多 W 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 页

出的东方社会教育制度的弊端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消除，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趋向面对日益严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为了尽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摆脱后发的困境，东方社会必须要将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大力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

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进行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千方百计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投资体制是教育体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于：“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①

在这个问题上，更能说明东西方社会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投入的不足已经成为了严重制约东方社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一是教育投入的总量水平要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 1970 年用于教育的开支每年平均达到 1490 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却只有 120 亿美元。从整个全球的范围来看，落后国家的学生人数要占到全世界学生人数的一半，但用在这么多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却不到世界教育总经费的 8%；二是教育投入占 GNP 的比例要小于发达国家。全世界 1985 年的平均水平为 5.8%，发达国家一般为 7%—8%，而发展中国家却只有 3%—4%。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增加了一倍，而人口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经费反倒减少了 1/4；三是人均占有的教育经费也少于发达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达国家人均占有的教育经费是 284 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却只有 27 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切实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

教育投资体制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主要应该注意的是：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必须要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政府拨款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主渠道。解决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教育事业推向社会和市场，更不能靠买卖文凭、回学生高额收费来维持教育单位的运转。这首先是由教育所具有的事业性质决定的。教育首先是一种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提高，制约着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政府拨款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主渠道，尤其是必须确保政府对教育中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部分的投入。同时，这也是由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的特定的作用决定的，一是从教育产出的人力资本和知识产品的价值实现和增殖的时间机制来看，人力资本和知识产品的价值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其收益也不可能像其他产品那样在一次性的交换过程中实现；但是，它们最终必然要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重大的贡献，最大的甚至是惟一的最终利益获得者只能是社会。因此，这种时间上的价值补偿机制只能由政府来实现，政府拨款理应成为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二是从教育产出的人力资本和知识产品的价值实现和增殖的空间机制来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固然首先可以给它们所属的企业和私人带来收益，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局部性的行为，但实质上，它们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最终要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贡献；即使收益者仅仅是个别的企业和私人，但是，通过税收的方式，社会还是最终的收益者。而教育所产出的人力资本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和现实的劳动力。最大的和惟一最终的收益者还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个别的企业或私人将这种局部和总体的机制联系起来看，政府拨款理应成为教育投入的主渠道

总之，由于教育事业的特殊性，教育的经济回报不可能简单地采取企业那样的形式，而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增加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这也就是要政府从宏观管理和调控的角度来实现和补偿教育的经济价值，改革和完善政府的教育投入机制。

另外，还应该对教育体制的其他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主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应该使教学内容乡土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人们往往把获得文凭和学位与直接承担生产工作的能力直接联系起来，没有充分注意二者之间的中介环节，不大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不注重提高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实际的科技文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目标进行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彻底扭转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增强有关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二是应该使教育体系开放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把扩大正规的学校教育知识的传播等同了起来，没有正视二者之间的差别，忽视了非正规教育在传播知识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在注重常规教育的同时，要加强非常规的职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建构面向全体国民的终生教育体系。三是应该使教育方法现代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学的方法仍然是十分落后的，还停留在黑板加粉笔的阶段，甚至还在使用更为原始的手段，最终致使教学效果十分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要注意改进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应该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电视教育等现代教学方法，以便为更广大的民众提供更为普遍的教育服务。四是应该使用人制度合理化。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只是出于为了在现代城市谋得一份职业的想法而接受教育，使学生的抱负被大大地扭曲了，

不仅在国内的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出现了人才空洞化的问题,而且在整个国际的范围内出现了人才向发达国家转移和流动的问题,使得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源更为稀缺。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制定和完善符合本国和本地区实际的用人机制,防范人才外流,避免人才空洞化的出现,以便更好地节约有限的教育资源。

总之,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积累和加强的基本途径之一。其中教育投资的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优劣和高低、人力资本的强弱,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效益和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不仅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在此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这样,就可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四、发展中国家必须回应知识经济的挑战

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生产方式的知识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而且将知识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独立地位突现出来了。在形成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同时,很有可能将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经济的显露,使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同时也给后发国家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今天,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积极回应知识经济的挑战。

(一) 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含义

科学技术和教育向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而知识经济就是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它必将对技术经济形态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正在面临的新技术革命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这次技术革命的科学技术基础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科技门类，而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它是一次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通信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一系的技术领域的革命。新技术革命有这么几个辉煌性的标志：1942 年原子核反应堆点火，1945 年原子弹研制成功，1954 年第一座核电站建成，这些成就就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原子能时代”；1946 年电子计算机诞生，1958 年集成电路建成，随着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在 1993 年宣布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些成果就预示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信息时代”；1957 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了天空，1961 年人类乘载宇宙飞船第一次进入太空，1969 年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了月球。这样，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配合下，空间技术就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太空时代”的水平。这次技术革命使劳动生产方式提高到了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水平，带动了一系列朝阳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的结构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改组和调整。

在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信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强大的生产力，从而对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讲，一是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从粗放型向效益型转变。例如，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获得的，技术和知识的增长已经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 80%。依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 2007 年，美国生产率将比现在提高 20%—40%。二是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使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开始下降，而第

三产业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开始“唱主角”。例如，近一二十年以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的趋势，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下降，美国已经达到了 21% 左右；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60%—70%，其中美国信息产业又占服务业的 50% 左右。三是新科技革命促使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正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 1500 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每 10 个信息技术职位就有 1 个空缺。到 21 世纪初，美国平均每年需要 9.5 万名信息技术人员。现在，美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全局就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大。到 21 世纪时，“知识工人”将占全部劳动力的 1/3 以上。四是新科技革命对国际贸易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在贸易中的位置在下降，而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开始在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经合组织国家技术产品出口在出口额中的份额翻了一番多，达到 20%—25%，其中美国出口额中高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由 25.9% 增加到了 37.3%，其他国家的比重也有大幅度的提高。可见，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使知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济形态。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概念来反映这种变化的趋势。1996 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发表的报告《1996 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展望》中，对“知识经济”给出了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

（二）知识经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同

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机遇方面来看，知识经济的出现很有可能会导致新的发展方式的出现，这样，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不必单纯地模仿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在跨越式的问题上，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然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制约性的作用会进一步下降。在传统的经济形态中，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自然资源的匮乏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在不合理的国家经济分工的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只是充当了发达国家‘资源库’的角色。由于技术条件和装备的落后，粗放型的开发和利用方式致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存量大为降低，从而使资源问题也成为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瓶颈”。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绕过这个问题，充分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优势来发展自然资源消耗低的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二是知识经济为跨越式社会发展方式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基础设施的落后长期以来都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难题，在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形态中，发展中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难以解决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而现在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技术上的可能。例如，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通讯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要等待几十年的时间，现在，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绕过西方的通讯技术路线（它是沿着铜缆线、模拟系统到光缆线、数字系统的方向发展的），而直接采用技术成熟、成本较低的光缆线和数字系统。这样，它就可以与发达国家一同进入“信息社会”。三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可以大大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投资的费用，为它们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在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的低下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而发展中国家又不具备发展教育所需要的人财物等

一系列的投入条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现代通讯技术手段就可以以简单、便捷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公民提供科技文化知识。这样就会大大地降低教育费用，极大地增加普通公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最终提高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的整体实力。

但是，知识经济的出现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为了抢占 21 世纪的制高点，世界各国展开了一轮新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具体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而无论要增强哪一个方面的实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人才和教育成为了综合国力竞争的热点。因此，世界各国都争相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抢占 21 世纪制高点的优先考虑的领域和关键问题。例如，1998 年 2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科技优势是全美国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加强教育工作，使美国的教育成为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教育。1997 年 7 月，欧盟发表了《2000 年议程》，提出“将知识化摆在优先的位置”。该年年底，欧盟又发表了《走向知识化的欧洲》的报告，强调要加强科技和教育工作。战后，日本奉行的是“技术立国”的战略。在总结东南亚金融风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它们也改变了自己的对策，提出要加大科技预算，强化人才培训和加强独创性基础研究的新措施，这表明日本开始确立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而科学、技术、知识、人才和教育又恰好是发展中国家的弱项，尤其是在存在发展水平势差的情况下，人才外流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外流成为了制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普遍的顽症。这样，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进一步成为了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就被大大地减弱了。

知识经济提供的机遇和挑战的互动，就构成了 21 世纪社会发

展的新特征。

（三）发展中国家回应知识经济挑战的对策的选择

在知识经济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局面的面前，发展中国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而应该做出积极的应对。

一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现有的产业结构的实际出发，在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三重变奏的过程中，来发展自己的知识经济。新技术革命实质上是一次信息革命。它将技术操作的客体和生产加工的对象深入到了信息的层次，从而彻底改变了技术方式和生产方式。信息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处理和加工的对象，也成为了其他技术和产业要处理和加工的对象。以信息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就可以减少材料和能源的消耗，还可以为实现资源和能源的替代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样，新技术革命就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优化组合，使现代经济实质上成为“信息经济”。面对信息经济，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就绝不能按照西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模式进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丧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也应该看到自己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整体实力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主要的问题是，在人口构成中农民占绝对的比例，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很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在知识经济的冲击下，又面临着实现信息化的问题。这样，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过程中，就应该将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起来，大力运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来武装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大力推进工业化的步伐，同时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从自己科技文化落后

的实际出发，大力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新技术革命实质上是一次知识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不仅可以解决庞大复杂的数学计算的问题，而且作为人的脑力的扩展和延伸，直接进入了生产、生活、科研过程，代替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检查、调试、控制和管理的工作，从而使生产更为自动化，并大大提高了信息化的水平，从而使人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人在智力方面的一次大解放。同时，知识因素对国民经济贡献的份额越来越大，由技术创新引发的新知识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热点，由此导致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这样，人的素质问题就进一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思想文化素质又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因为文盲和半文盲在这些国家中还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必须要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摆在优先的位置，知识创新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创新，应将科教立国的战略和发展知识经济统一起来。

三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从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出发，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总量很大，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就不能发展那些高物耗和高能耗的产业，而必须发展低物耗、低能耗的产业，而信息产业恰好具有这些特征。新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彻底的革命。从物质的构成形态上来看，物料（材料）、能量（燃料和动力）和信息是物质的三种存在形态或层次。以往的技术革命发生在材料、燃料和动力等层次上，实质上是物料、能源方面的革命，它们利用煤炭、机械力、蒸汽、石油、电力来减轻人的体力劳动，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解放了出来，由它所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地消耗不可再生资源 and 能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与此不同，新技术革命发生在信息的层次，实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信息变

换，是凭借信息和知识的革命，它将信息和知识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和资本，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这样，信息产业就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点。同时，知识经济是在信息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要发展知识经济首先必须发展信息经济。

只要发展中国家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发展知识经济，那么，知识经济必将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的“发动机”和“驱动器”。

第六章 生态化和持续化：建构 社会发展保障系统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①

——马克思

如何科学而合理地处理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题。从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状况来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26—927 页。

广义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形式上“有机发展”为第一个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生产力的低度发展相呼应，人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和谐状态，将自然资源的永久存在和持续利用作为了人类生产和生活不断延续下去的基础。

“机械发展”为第二个阶段。在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对剩余价值的绝对追求，资本主义力图在无限地控制、支配人和自然的过程中来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忽视了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违背了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的规律，结果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异化”——在极大地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一旦形成，就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对人类整体进行着“报复”和“惩罚”，这就反过来制约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代价。

在解决机械发展弊病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日益意识到了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样，社会发展就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生态发展”。现在，由于人类对“机械发展”的弊病和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深刻的体认和反思，而对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把握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这样，人们就将社会发展定位在了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的基础上，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原则，力求使社会发展的过程成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步的过程。因此，也可以将这种发展形式称为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东方社会的现代化也应该走一条跨越式的道路，即在保持“有机发展”价值的基础上，通过采用对整个社会结构生态化的方式，跨越“机械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一、社会生态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的‘生态结构’的概念，但是根据马克思的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和现代化的实际经验，我们必须确立自然生态系统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的专门地位。这在于在人类劳动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日益成为人化自然，进入了社会系统，成为了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定的层次——自然生态系统；而无论是广义的社会发展还是狭义的社会发展，都是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保障作用的。没有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原料、能源和信息，就不可能发生物质变换——劳动，而劳动一旦停止，社会也必将终结，社会发展更无从谈起。同时，全球性问题从反面昭示着将生态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定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一）社会的生态结构的含义和机制

所谓的社会的生态结构是指在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特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中，自然生态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为社会系统提供原料、能源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使作为社会结构基础层次的生产方式成为了可能，因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这样，在社会结构中就形成了一个为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的层次——社会的生态结构。那么，自然生态系统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呢？

第一，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影响。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从结构上来看，它可以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政治体制等具体的层次 社会发展只有在这几个方面的协调过程中才是可能的。从根本上来看，社会结构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但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制约性影响。这在于“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 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 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 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①当然 社会关系在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也具有重大的制约性作用，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的发展，它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两类关系形成的必要张力中 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②。这样 通过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 生产方式)自然生态系统就进入了社会系统中，并对社会结构的各个具体的层次产生了重大的制约性的影响 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品位、生态环境的优劣都对最初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之带上了强烈的地域特征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就专门考察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制约性的影响。这正如摩尔根指出的那样“东半球和西半球处于同一个阶段的文化无疑地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在于两个大陆的自然资源有所不同”^③。

第二，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社会进化进程的制约性影响。人类社会决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39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25 页。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第 15 页。

过程中的历史进程。随着社会利用自然的深度的加深、广度的扩展、高度的提高，社会自身就表现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产、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进化的程度是由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的。随着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和方法的提高，人类社会就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只局限于原料的一个特定的层次——土地资源上，这样，社会发展就处在农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水平上，而一旦这种变换深入到了能量的层次，并且在原料和能量两个方面全面展开，社会发展就进入了工业社会的形态。随着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进一步深入到了信息的层次，工业社会就开始将自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信息社会。正是由于社会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全面的物质变换关系，因而，才使社会进化成为可能。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范围、性质和程度在不断地扩展，要求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断全面化。

第三，自然生态系统对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影响。东西方社会之间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存在着众多的差异，除了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影响外，是受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约的。东方社会特有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方面的制约性影响的一种社会表现形式，“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 这种要求在西方 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 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 但是在东方 由于文明程度太低 幅员太大 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① 尽管由此得出东方社会是治水社会的结论是不对的，但是，认为自然状况制约东方社会政治结构的看法是符合东方社会的实际的。同样地，正是由于俄罗斯的土地的天然的地势使得它采用大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成为了可能，这样，在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俄罗斯就可以采用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方式。正如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村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②

自然生态系统是如何进入社会系统并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定的层次呢？马克思用“物质变换”这个科学的术语揭示了社会的生态结构形成的机制，“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9页。

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这里的物质变换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学的科学概念，指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但是，社会和自然的生态关联决不同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命活动，而前者是通过人的劳动实现的，包括着广泛而深刻的内容。这样，“物质变换”的概念就指明了物质的有机发展同无机发展的内在关联，指明了社会发展同自然演化的辩证统一，表明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根本性特征在于为个人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服务，并且包含有保持和改善人的自然生存条件的内容。于是，社会的生态结构的形成机制就被科学地揭示出来了。

可见，强调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影响，决不是要倒向“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只是突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联。正因为这样，任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污染和破坏都是对人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污染和破坏。在这种相互制约的过程中，自然生态系统就在进入社会系统的过程中，成为了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定的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生态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和趋向。

（二）自然生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又是与自然生态因素密不可分的。没有适宜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保障作用，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自然生态因素对现代化构成了一种先在性的限制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201—202 页。

用，对现代化的性质和进程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由于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进行生产力所必需的原料、能源和信息，对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有效地利用自然生态因素提供的便利条件和突破自然生态因素造成的不利限制的过程。

第一，从现代化的发生来看，现代化首先是在温带成为可能的。生产力布局和剩余劳动量是现代化成为可能的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布局和剩余劳动量往往与其自然生态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当然，自然生态系统不能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生产力布局和剩余劳动量。现代化首先在西方成为可能和现实，是由西欧所处的温带条件促成的。温带地区的自然条件的明显的差异，由此造成的自然产品的种类的繁多，成为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生产力的格局，一方面促使劳动者的需要、能力多样化，另一方面是促使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的劳动方式的条件下，资本的兴起和发展就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①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情况就断言最肥沃的土壤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因为过于富饶的自然条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儿童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561 页。

第二 从现代化的扩展过程来看 西方社会是凭借着便利的自然生态环境向外扩展自己的生产方式的。资本本身具有一种扩张的能力 要求突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 不过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 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 还是作为生产资料 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 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而西方社会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资本的这种扩张提供了可能。从世界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进程来看,不仅那些在地理环境上位于沿海、水路发达地区的国家首先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而且这些国家也是凭借天然优越的生态环境开展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这在于 优越、便利的地理环境 提供了适宜的交通运输条件 这样 既可以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向外扩展,又可以从外引入国内缺乏的经济资源,同时也为接受外界的信息和文明以补充自己的不足提供了可能。同样 在生态环境上也具有这样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能更为迅速地引入、接受现代文明和生产力的成就 从而可以尽快地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如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而那些远离海洋的国家和地区却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没有迅速地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中,如德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内地 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393 页。

中于远离海洋的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维亚山脉而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绝，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惟一反动的河流的流域之内。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们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将它们和更加粗野的地区连接了起来”^①。因为这些自然地理环境正是奥地利的野蛮和奥地利君主国赖以存在的基础。当然 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蓝色文明”优越于“黄色文明”的结论 更不能由此倒向“地理环境决定论”。我们只是说 在现代化的扩展过程中，便利的海上交通运输条件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生态方面的支持。

第三，从现代化中心的转移来看，美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英国成为现代化的新的中心，也是由美国的自然生态因素促成的。地理大发现为现代化中心的转移提供了可能，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代英国并将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就在于美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具体来看：一是美国具有丰富的工业化所必需的原料 其煤、铁、天然气、钾矿和磷矿的储量占世界第一位；二是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石油矿藏，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发现和开采加利福尼亚黄金的价值超过了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 三是森林覆盖面积广、水力资源充沛 西部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等待着开垦，可以吸纳迅速增长的人口；四是地域宽广，在移民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形成了广阔的市场潜力；五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地处西半球，邻国多为弱小国家，它不仅不会受到入侵的威胁，而且具有可以任意支配其他美洲国家的条件，同时，也不必担心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正是凭借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在移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迅速地取代

英国成为了现代化的中心。当然，没有社会方面因素的最终促成和配合，美国成为现代化的中心也是不可能的。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国棉花和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所以，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末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或者是采用“保护关税”的办法。美国正是凭借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条件，不仅没有被卷入两次世界大战而饱受战争之苦，反到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而大发战争横财，最终成为了现代化的新的“排头兵”。

在看到自然生态条件对现代化的限制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同时要看到工业化在形成、促进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而，尽管技术和工艺可能是造成生态破坏性的根源，但是，没有必要的技术和工艺的支持和支撑，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就是不可能的。

（三）跨越“机械发展”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获得了雄厚的物质支撑，于是轻视自然、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等等信念成了社会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8页。

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人们惯于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来衡量发展，发展被简化为增长。经过近代哲学的总结和概括，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上升成为近代一种特有的发展观——“机械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势必会造成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东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克服“机械发展”，这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题中应有之意。

机械发展观的形成具有自己的历史必然性，它得益于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三个基本而强大的事实。一是以牛顿机械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这时，科学研究从搜集资料的阶段过渡到了系统整理资料的阶段，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的发展，实现了以力学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的第一次大综合，带来了一场科学革命。把有机的整体的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统一的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解为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基本范式，也是它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这种做法也容易给人们留下一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思考问题的习惯。二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代表的产业革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发展工业生产力成为了近代社会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从 18 世纪的后 30 年起，在西欧国家开始了一场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1784 年瓦特试制成功实用的联动式蒸汽机，很快引起了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革新。这次产业革命在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三是作为近代特有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确立。牛顿力学和产业革命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一种思维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不是把它们

作为运动着的东西 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 不是把它们看做是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 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 不是把它们看做是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是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洛克移植到哲学中后，就形成了近代特有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们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为弘扬人的主体性、为提高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它也带来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就这样，在这三种力量的互动下，形成了近代特有的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发展观——机械发展观。

从其正面来看，机械发展观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全球的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使现代化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从其负面来看，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切问题和危机都是与机械发展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机械发展观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增长成为了发展的轴心，单纯的经济指标成了衡量发展的准绳。事实上，“增长”和“发展”存在着质的差异。只以单纯的经济指标为目标的增长，很难使一个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这在于，像 GNP 和 GDP 这样的经济指标很难反映出—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不仅会引发经济危机，而且还会引发其他问题。二是片面的增长是不关

心人自身的，带来了人的异化。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解决人的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且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国际的范围内，一方面是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广大的东方国家按照机械发展观的模式进行发展，不仅没有使自己摆脱贫困，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破坏了发展的宝贵基础——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也没有真正达到整体的发展，相对贫困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比例在陡增，同时人的精神异化日趋严重。三是片面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关心自然的，由此造成了生态异化，生态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表现和结果。盲目的增长不仅超出了地球的可能限度，而且加剧了资源储量的下降和环境的污染，使一系列的问题联结、放大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加重不仅显示出了机械发展观的弊病，而且预示着机械发展观的彻底破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现代文明史上对机械发展观的弊病最早进行批评的思想家，如何协调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他们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规定“异化劳动”的概念时，就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所造成的生态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化自然”等具有重大生态发展观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体制中，资本家对工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生态条件的剥夺。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在生产中应用的社会条件、技术的生态破坏力和对工人的剥削的内在关联。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的生态破坏力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提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时，他设想化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实现废物再利

用的工艺生态化的设想。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造成生态破坏的思想认识根源进行了揭示 提出了有名的“报复”说和“惩罚”说 阐述了辩证思维在协调人和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晚年在《评阿·瓦格纳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 揭示出了社会和自然的整体关联 将这种关联区分为价值、理论和实践三种类型来认识。另外，由于机械发展观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以污染和破坏为其特征的 加剧了技术和发展的生态破坏性 因而 马克思对机械发展观生态破坏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性的批判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了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失调的社会原因。这样，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就超越了机械发展观 是“辩证发展观”这种辩证发展观同时也就是生态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因为它始终如一地强调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协同演化，并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和趋向。

这样 马克思晚年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的问题，其中就应该包括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灾难”或“生态异化”的问题。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在吸收“机械发展”肯定成果的同时 必须要避免其负效应。

二、东方社会迈向生态发展的对策

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采用了机械发展的方式 结果破坏了自然 造成了生态异化 因此 东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要避免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 按照生态发展的要求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一）生态发展的含义和要求

在物质进化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社会生态运动规律”这是指“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社会生态运动不是在自然运动和社会发展之上的或之外的一种运动规律，而是反映出自然运动和社会发展在物质运动过程中通过物质系统的递阶秩序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或相关的状况，它是由于人类劳动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统一的一种表现。那么，社会生态运动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一，社会和自然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使社会和自然构成了一个复合系统。尽管自然界是先存在的，但是，社会在自然面前绝不是消极被动的，通过劳动的环节，不仅使社会发展（广义）从一般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分离了出来而且使它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自然进化的特征，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体的能动的选择和创造的过程，“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①这样，在劳动的强制性的作用下，自然生态系统就被整合到了社会系统中。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弘扬是存在着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是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先决条件，“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②。这样，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的地位不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56—57页。

没有被消除，而且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限制。即使是劳动力本身，它“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①，是自然物质发挥作用的一种过程这样一来，社会和自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关联。因此，假如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变换中忽视自然规律的存在，那么，只能导致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因为这时的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了系统中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了。

第二，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劳动过程和物质变换过程的统一。在社会发展的发生学阶段，劳动过程和物质变换还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只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二者才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劳动过程是物质变换的实现，离开了劳动，物质变换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②。因而，对于社会发展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只能是劳动。只有劳动才是社会和自然之间联系的桥梁。同时，随着劳动的发展和进化，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会在性质、范围、方式和方法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延伸，这样，就会使物质变换呈现出一种进化的面貌，“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③。这也同时推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就是说，劳动过程、物质变换和社会发展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统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42、208—20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99 页。

一的过程，三者之间存在着系统发生、协同进化的关系。

由于社会发展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它必须以社会生态运动规律作为自己发展方式的蓝图，这就是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必须遵循的生态化的要求和原则，实现生态发展。所谓的生态发展，也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化——力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①。生态化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和要求。

（二 东方社会迈向生态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决定性作用，再加上机械发展观的影响和制约，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以失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异化”成了现代全球性问题的滥觞。因此，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避免生态破坏造成的灾难。

第一，东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避免生态破坏性的产业原因。

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以及人的异化。

所谓的“大工业”其实就是机械发展观在产业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顾生产的生态后果而盲目追求增长的发展观首先在工业中得到确立，然后又扩展到了农业等产业部

门，机械发展观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观。一是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是与对工人的污染和破坏交织在一起的。正像资本家使工人遭受剥削和掠夺一样，它们对自然的关系是通过污染和破坏来表明其特征的，“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

这样，作为机械发展观在产业中应用的工厂制度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态破坏力，追逐剩余价值成为了一切的轴心，什么自然的存在和工人的生存，对于资本家来说都是与自己漠不相关的。尽管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是不断进步的，有可能节约资源和能源，但是，“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①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大工厂产生的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没有经过处理就被排放到环境中，大大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了环境污染；同时，大工业的无限制的发展，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掠夺，造成了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著名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生态恶果的典型表现。全球性问题就是以此为契机而出现的。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片面地看待城市化的问题，破坏了社会和自然的正常的生态平衡。资本主义之所以破坏了社会同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除了其阶级本性外，就在于它将机械发展观发展到了极点，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片面地发展城市，认为城市的规模愈大，增长的速率就愈高，这样，城市化必然带来人口在城市中的高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466、467 页。

度集中，使问题愈来愈严重。“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①这样一来，由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高度积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性就不仅成了机械发展观的必然结果，而且成为了使机械发展观进一步膨胀的加速器。三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也是以污染和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为特征的，资本家掠夺土壤的肥力、滥伐森林、破坏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对自然界人为的、有害的、贪婪的、鲁莽的改变导致了预料之外的结果。“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②。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由于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土地被大面积开垦而没有注意环境保护，1934年在美国本土发生了席卷大片国土的大尘暴，使大量的有机质流失，破坏了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而化肥和农药等大工业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和无限制地使用，又造成了食物链的短缺、物种的减少、土地的板结等生态恶果，最终形成了如美国现代女生态学家卡逊所说的“寂静的春天”的可怕景象。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的生态破坏性和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其实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问题愈来愈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552、552—553 页。

重，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这就是说，机械发展观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的各个产业部门，通过产业的方式展示出了其生态破坏力。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异化、生态异化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必然会同时发生。

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也得到了回应，一些学者批评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生态异化，建议发展中国家在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工业化的生态代价，使工业化和生态化统一起来。正如舒马赫指出的那样：“大规模机械化与大量化学化所造成的（并且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农业社会结构，使人与现实的自然界不可能保持真正的接触，其实这种农业社会结构支持暴力、敌意与环境破坏等一切最危险的现代倾向”^①。以此为鉴，东方社会在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就应该力求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结果，使整个产业结构向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应该避免生态破坏性的理论原因。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确立形而上学（机械）思维方式的过程，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以割裂并肢解社会和自然的统一为特征的，成为了造成生态异化的认识论根源。

资本主义工业化之所以加剧了生态破坏性，就在于它将机械

① [英]E.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第 76 页

发展观确立为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人们的言行都成了受形而上学支配的东西。一是在形而上学的视野中，自然界的多样性的价值被机械地消解了，它只被看做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由此导致了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事实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它又具有多重的价值，是社会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对象和表征。但是，在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自然界只被简单地作为人类改造、征服的对象。这样，“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①可见，在所谓的主体性面前，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先在性就被抹煞了。这样，人对自然的行为必然具有了破坏性。二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是将自然界看做是一个活的机体，而是将它看做是一个个的孤立的现象，人们在孤立地对待自然的过程中，就会造成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事实上，“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而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由于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妨碍了我们的自然研究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②。面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然有机体，人们必须按照有机论的方式来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只是按照机械论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界，割裂了自然界的整体关联。生态异化问题正是这种顾此失彼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的恶果。三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能意识到人类作用于自然界行为后果的滞后性，忽视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行为的长远影响和后果，因此，眼前的暂时的成就是以长远的永久的生态破坏性为代价换来的。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作用于自然的行为后果在很大的程度上要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沉湎于对自然的征服和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意识到自然界的滞后性，为了眼前的利益，一味地改造和征服自然，这种盲目性的行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自然界就将之释放了出来，反作用于人类，对人进行着报复和惩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这样，最终是牺牲了人类自己的长远利益。可见，生态异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实践结果的负效应。

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在全球性问题形成中的作用，要求摒弃这种思维方式。例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从这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行揭露和批评的。他指出：“人的意愿事先就把一切 虽尚不能遍览一切 逼人它的领域之内 一切都自始且在今后要为此种意愿而无可遏止地变成贯彻意图的制造的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材料。把世界有意地制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无条件的贯彻意图的活动，被无条件地安排到人的命令的状态中去，这是从技术的隐蔽的本质中出现的。这种情形只到现代才开始作为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83 页。

者整体的真理的命运展现出来，虽然在者整体的真理的零星现象与尝试一向始终散见于文化与文明的广泛领域之内”^①。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社会就应该学会辩证思维，按照系统性的原则来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和自然的矛盾。

第三，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应该避免生态破坏性的社会制度原因。

机械发展观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观，机械论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就在于它们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行为和思维准则导致了生态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全球性问题的罪魁祸首。

生态异化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一种体现。从资本主义生产来看，出于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对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也成了资本家的职能的表现。这在于，由于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方面是在疯狂地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这样，资本就表现为双重的趋势，一方面是对活劳动的节约，另一方面是对死劳动的节约。资本的第一种趋势，就是在使用活劳动的时候，缩减生产的必要劳动，并且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这样，它就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活劳动。这样，劳动条件的经济的也就是合理而节约的使用，对于活劳动的承担者即工人来说，是一种异化的和毫不相干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资本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第 377 页。

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它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①。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存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中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建筑物的节约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任何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或对于像采矿业这样的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②同时，它还有一种趋势，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最低限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资料的节约但是由于工人是游离于生产资料之外的因此这种提高对工人来说也是一种异化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它只与资本家有关。“当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率时社会劳动的这种普遍联系就表现为某种和工人完全相异化的东西事实上它也只和资本家有关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购买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至于他不过是用本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购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因此他只有无偿地占有了本部门工人的产品才能支配其他部门工人的产品那末这是一种被流通过程等等幸运地掩盖起来的联系”^③。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来说，“如果他不是被迫节约这种财产那末浪费一点对他来说毫无关系”^④。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就成为了一种异化劳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

^{①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2、102、101、101 页。

卑劣行为的奴隶。”^①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必然会反作用于自然，必然会造成生态异化。

因此，与其说是机械发展观和思维方式造成了生态问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现代全球性问题不正是以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八大公害事件”为契机才形成的吗？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生态异化比社会异化更为重要。而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往往是脱离社会制度的因素来看待包括生态异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成因的，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法，不能将之作为东方社会现代化的方法论。这样看来，在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应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灾难，在社会制度上做出理性的选择。

（三 东方社会迈向生态发展的对策的选择

东方社会在自己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生态异化，摆脱全球性问题的纠缠，就必须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规范下，将生态化和现代化统一起来，将生态发展作为自己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离开现代化的生态化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没有生态化的现代化也是不能最终获得成功的

第一，通过技术进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生产和产业生态化。

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实践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晚年在《评阿·瓦格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 第 4 页。

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 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 也就是说 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 而是积极地活动 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 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 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①。在这个过程中 物质变换才得以实现。因此 在实现生态发展的过程中 人们也应该首先从实践着手来解决问题 尤其是应该从生产领域的生态化入手来实现整个社会发展领域的生态化。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是生态异化的实践成因 但是在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实现生态发展,不是要放弃这种产业结构 而是应该使整个产业结构向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按照生态学的规律和要求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生态化,也就是要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运用科学技术特别是以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 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 实现产业化 推动清洁生产的发展 提高产品质量 使工交产业尽快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② 这是人们在现代水平上对生态发展的理解 其实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就已经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了。我们下面只考察一下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对工业进行生态化改造的设想。

尽管工业化造成了生态异化 但是 东方社会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将工业化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没有工业化,东方社会就难以进入现代化的行列。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西方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05 页。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88 页。

一些人往往借口于生态化的要求，力图阻止东方社会的工业化，其实，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要阻止东方社会的现代化，以便使东方社会永远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因此，在东方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单纯的生态主义是要不得的，“生态主义者一味地否定先进技术和大工厂，结果不能不连薄钢板和平玻璃本身都否定了。把世界单一化为农业社会，必然会造成生态法西斯主义。”^①在这个问题上，可取的做法是将工业化和生态化统一起来。其实，早在马克思那里就提出了使工业生产生态化的设想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和工艺是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②因此随着科技进步人们会进一步合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将建立起完整的物质循环体系、废物资源化和减量化体系。“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③。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进入生产体系中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一方面是要不断地发现物质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不仅使自然资源能够在生产中得到复合的多重的利用，而且要进一步发现那些按照惯常的看法不能利用的物质的可利用方面，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是使废物资源化，不仅在生产的过程中就要将废物问题

〔日〕星野芳郎：《未来文明的原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41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117 页。

解决掉，而且要发现废物的其他用途，使废物和垃圾减少到最小化。就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废物的资源化 and 减量化的问题。具体来看：

一是通过废物的资源化的方式可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减轻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废物的循环利用可以实现废物的资源化，最终可以节约经济资源。废物的资源化是由废物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的，“所谓的废物，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①。这在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废物，废物只不过是一种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关键的问题是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废物。在当时“，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②通过这种循环利用的方式，所谓的废物就变成了资源。而这一切只能通过技术进步的途径来取得。这就是说，“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③这里所强调的建立完整的物质循环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的问题，其实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来促进工业生态化的问题，这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运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是通过废物排放减量化的方式，在减轻环境污染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原料和辅助材料，从而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117、11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664 页。

可以减少资源的利用量，最终起到节约资源的作用。马克思要求将废物的资源化和减量化区分开来，因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为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①在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废物的减量化是一种通过控制废物的排放数量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应该采用减量化的方式，是由环境的容量（环境容纳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和废物的数量特征（废物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决定的。而废物的减量化也只能通过科技进步的方式才能达到，“废物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而无论是机器和工具质量的提高，还是原料质量的提高，都只能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取得，生态化的方向要求科学技术能够在生态学规律的指导下来提高机器、工具和原料的质量。这里所强调的废物减量化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来促进工业生态化的问题，这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运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

这里“生态化”和“可持续性”也就是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

考虑生态学规律，应该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统一起来，除此之外，它们不可能具有其他含义。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新科技革命正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变成现实。这就是“清洁生产”的问题。“所谓清洁生产，是指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其实质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或消灭于生产过程之中。同时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的绿色产品的生产亦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生产的主导方向。^①清洁生产应该成为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这在于清洁生产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清洁生产是生态合理型的生产清洁生产是为了克服“末端治理”所造成的经济上的不可行性和生态上的再污染性而提出的一种治理工业污染的办法，它从生产的始端开始，对生产整个过程进行控制因而又可称为“全程控制”。它在生态上具有低消耗、少污染和无公害的特征，这就要求：一是在生产原料的选用上，要改革原料路线，选择使用清洁的纯原料或低污染原料，如有害杂质少的铁精矿、洗精煤等，并且要降低物耗，从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始端）上就堵住污染之源。二是在生产动力的选用上，要尽可能采用可更新能源（如太阳能）和低污染能源（如电能）并且要降低能耗。三是在生产方式的选用上，要综合利用二次物料和能源，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建立闭合生产圈。可见，清洁生产既要在工业整体上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又要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工业生产中，例如，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来生产精细化学品、原料和燃料等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92 页。

其二，清洁生产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以实现节能、降耗、减污、无害为目标的清洁生产，必然会带动和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更新落后的能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工艺和设备，采用新工艺和新设备，并且要将其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中，这就是“在设计阶段使用了预先考虑产品由废弃物到再生过程的‘环境负荷减少设计技术’，在生产阶段使用了减少生产废弃物的‘减少废弃物加工技术’在产品解体阶段采用了使解体作业简单化的采用‘自动解体系统技术’。在再生阶段采用了使再生物的品质尽可能接近原产品的‘高品位、高效率材料再生技术’”^①。同时，清洁生产还要求将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进一步产业化，例如，将计算机用于生产控制中，制定合理的资源和能源投入量，监视生产过程以免出现污染。而生物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清洁生产，人们可以在分子生物学等生物技术的帮助下开发植物的光合作用，用植物生产出大量的燃料，这样的燃料是一种清洁的燃料。

其三，清洁生产是效益齐全型的生产。从生态效益上来看，清洁生产可以起到节能、降耗、减污、无害的作用，避免或减少末端治理可能产生的风险，如污水处理产生的二次污染、焚烧垃圾产生的有害气体、填埋核废料造成的泄漏等。从经济效益上来看，实行清洁生产可以避免或减轻末端处理给企业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大大降低企业用于环保建设的投资和运行费用，这样就可以增加企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机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社会效益上来看，实行清洁生产可以改善职工生产环境和操作条件，减轻污染对职工健康造成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提高职工的生态意识，改善企业的整体形象。

^① [日] 明日香寿川等：《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4 页。

可见，清洁生产是工业产业领域中的生态化的成果，是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在工业领域中的体现。

这样，尽管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构成了东方社会的一个发展难题，但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生态异化作为借鉴，按照生态化（清洁生产）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却成为了东方社会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的一种后发优势。这就是说，东方社会可以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这样，就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可以从工业化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灾难，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

第二，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确立生态学思维。

尽管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实践关系，但是，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反映和被反映、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晚年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人们是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①。这就是说，这种关系是人和自然、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基本的形式。这样看来，正确的思想认识是处理与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的一种重要的途径。

马克思看到，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指导的人类行为必然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带来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实践化”的过程中，造成了生态异化。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也得到了回应，例如，以研究全球性问题而著称于世的罗马俱乐部就认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形成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当前的很多危机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往往起源于人们最美好的愿望。今天，正是那些构成人类社会所有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基本准则最终导致了許多麻烦。在最近三个世纪中，人类进步往往可以用‘人类征服自然’这个术语来表述。人类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以至于‘人定胜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大自然并没有被征服，但它确实是退却了。对那些大自然暂时还不肯退出的阵地，人们认为最终攻克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人类又遇到了新的危机，证据表明，这次人类的对手还是大自然。大自然并未被征服，而是更加难以捉摸，更加难以对付，这是人们未曾想到过的。”^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们必须要向辩证思维复归，应该学会按照辩证思维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具体来看：

一是要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并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依据。观察的客观性是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构成要素，在对待自然界的问题上，也应该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尽管马克思认为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从而突出了实践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在承认“人本学自然”的同时，往往是以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先在性和制

^① [美]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人类处在转折点》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7—18 页。

约性为前提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①这样，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就应该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办事。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将建立大型水电站以便为工业化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作为发展的优先领域。但是由于受机械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缺乏这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结果在贪大贪快的过程中违背了自然规律，最终影响到了水电站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还带来了其他的一系列问题。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也已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有的论者指出：“大多数大坝的建造是为了给工业输送大量电力。它们是由工程师设计的，虽然开始时也曾注意到诸如水库扩建后被淹土地上农民的迁移、对下游渔业的影响和当地新的小气候变化等问题，但关于新的水利工程对互相依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却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生态学研究。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工程师和设计人员没有享受过关于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方面的训练。”^②

二是应该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做出辩证的把握，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关联，要注意到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把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向。面对包括生态异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人们应该明白：“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第 541 页

② [美] 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燃料化工出版社 1974 年版 第 204 页。

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①。这就是要求人们应该认识到，人和自然、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其实是处在系统关联之中的，从而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巨生态系统，因此，人们绝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这种整体性和关联性。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这种辩证关系，学会按照辩证思维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要考虑到人类自己行为的长远的生态后果和可能对自然界造成的危害，将隐患消灭于未然状态之中。

由此来看，辩证思维其实就包含有生态思维的科学内容，或者说，生态学思维就是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体化的辩证思维。尽管生态学是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关系的科学，但是，生态学的思维对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体系都是有效的，它已经成为人类管理自然生态系统、协调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论。这在于，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已经成为新科技革命和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在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使辩证法得到深化，另一方面将新科技革命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都吸收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了。具体来看：

其一，生态学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基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已出现了一系列生态学化的新学科，这是通过以下几个阶段而形成的，一是作为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物学分支的生态学的客体在不断扩展，在生物结构层次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系统生态学。在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旱地生态学、草地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湖沼生态学、海洋生态学等学科。二是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发展成为生物学中的一种基本观念和方法，从而在生物学领域中产生了微生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类生态学、遗传生态学、进化生态学等学科。三是生态学从生物学扩展到了其他自然科学，开始与其他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出现了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地质生态学、气象生态学等学科。四是生态学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产生了生态经济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人口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学科；生态学还与这些学科中的分支学科结合了起来，例如，生态经济学已成为一类或一组学科的总称，它包括农业生态经济学、草原生态经济学、森林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经济学、工业生态经济学等学科。五是生态学和横断科学发生了交叉和渗透，产生了数学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信息生态学等学科。六是在生态学的支撑和牵引下，出现了像环境科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可见，生态学的发展是按细胞分裂的方式进行的，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和方向，成为科学技术和知识发展的“前卫”学科。

其二，生态学已经成为现代思维方式的一种集约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克服以简单的态度对待事物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既同改造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也同根本改造具体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生产工艺有关。这种改造的成果在生态学中得到了集约的表现。正是在生态学中，现代思维方式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都得到了集中而明确的表现和有效的运用。这些趋势和成果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对研究的客体 and 对象及其发展开始

做辩证的探讨，从而突出了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对研究客体的把握开始从单因素分析过渡到多因素分析，已经考虑吸收这种研究综合体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和必要性；三是接近研究客体的辩证性质，突出了知识的概率——统计性质；四是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基本方向，要求自然科学的人道主义化和社会学化，从而突出了马克思强调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问题。这样一来，生态学就成为了人类对生命和自然界基本态度的决定性的东西。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不仅要确立生态学思维的科学地位，而且应该看到生态学思维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在新科技革命及其生态学后果影响之下的具有细微差别的（具体化了的）辩证思维。

正像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一样，没有生态学思维就不会有生态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应该通过大量普及生态学知识的方式来引导社会大众和领导者、决策者确立生态学思维，按照生态学思维的要求和原则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力求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有必要增进和加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参加建立和应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成果。增进科技能力有许多办法。最重要的一些办法有：科技培育和培训；协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研究和发展的基础设施，使科学家的工作更有成效；制订鼓励措施，提倡研究和发展的成果；以及在经济生产部门更广泛地利用其成果。这种能力建设还将形成提高公众意识和普及科学的基础。需特别强调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强本身的能力，研究本国资源基础和生态系

参见乌克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恩格斯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70 页。

统进行更妥善的管理 以便应付国家、区域和全球的挑战'^①。

第三 变革社会制度、在社会发展的总体的历史过程中解决生态问题。

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 绝不简单地是物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这样 生命的生产 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 就立即表现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 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 则是无关紧要的。”^② 这样，对生态异化和全球性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自然的领域来认识，而必须放在社会的领域中来解决，尤其是应该将生态异化和全球性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来认识。

机械发展观的生态危害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才展示出来的 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破坏性的罪魁祸首。因此 要真正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阐述了这种协调的社会机制，为解决生态失调问题指明了方向。他们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统一起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

① 《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 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85页。

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协调进行，因为那时的劳动在彻底摆脱了异化状态之后，将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但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 劳动具有社会性；(2) 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的自然力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② 这就是说 生态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即，人们只有将自己从人和社会关系的方面提升出来以后，人才真正可能将自己从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提升出来。只有劳动真正成为自由劳动的时候，只有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作为人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价值统一起来的时候，社会生态运动规律的有序发展才是真正可能的，从而，人才能真正自觉有效地掌握和运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这便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统一。

在现代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只是意识到了政治体制对于解决生态异化问题的制约性，要求人们在中央集权体制和分权的自给自足体制之间做出选择，而对社会制度问题讳莫如深，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异化的罪魁祸首。例如，罗马俱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26—92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 第 113 页。

部的创始人就认为，阶级斗争正在导致巨大的浪费而毫无成效，要求人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应该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所谓的“新人道主义”。他们声称：“处于斗争双方的当今的男人和女人都幸运地发现同他们的阶级斗争相比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那些笼罩着整个人类大家庭之上的威胁”^①。因此，他们将建立世界体系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抉择。显然，这种观点有其阶级的局限性，我们是不能苟同的。这样，发展中国家要真正从生态异化中摆脱出来，首先应该是从政治异化中解放出来，只有在社会制度的问题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向社会主义过渡，才能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总之，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协调，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应该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问题来处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三、东方社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抉择

今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包括生态异化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问题都已经被放大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已经构成了对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从全球性问题中摆脱出来的问题。经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现在，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综合方案，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全球性的认同。因此，原来的东方社会、现在的发展中国家

[意]奥雷利奥·佩西：《人的素质》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69 页。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如何在实现生态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和构成

得到大家公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受联合国委托成立于 1983 年 12 月的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来的。为了有效地应对环发问题，联合国委托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环发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在对环发问题进行了三年的研究之后，在于 1987 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该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他们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环境与发展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的。他们看到，无法控制环境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生存，而环境与发展决不是两种孤立的挑战，它们是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讲，一是各种环境压力是相互连接的，对于不同的问题应该同时治理，解决一个问题的成功，可能意味着解决其他问题的成功。二是环境压力和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学不仅仅在于生产财富，生态学也不仅仅在于保护自然，二者必须完全统一到决策和立法过程中，不仅要保护环境，而且也要促进和保护发展。三是环境与经济问题又是同社会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中权利和不公正的分配是大多数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关键。四是这些问题不仅在一国范围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起作用，生态系统并不尊重国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因此，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资源基础为条件，如果以破坏环境作为代价，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构成。布伦特兰委员会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

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 这一定义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需要”的概念，尤其是应该特别优先考虑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二是“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的能力具有限制性。可持续发展不仅意味着代际公平，而且意味着代内公平，即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平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它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平的关注。可持续发展又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开发、技术发展的方向、机构的变化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会增强人类目前和将来满足需要和愿望的潜力。

第三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将破坏性的增长和发展过程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一是恢复增长。为了消除贫困，必须恢复增长；二是改变增长的质量。要改变增长的内涵、降低原料和能源的密集度以及更公平地分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三是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是生产活动的目的，必须将之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四是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可持续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动态是密切相关的，但这不只是一个全球性的人口数量问题；五是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保护自然不仅仅仅为了发展的目标，而且也是我们对其他生物和子孙后代的义务；六是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发展应运用无害于环境的技术，以降低危险；七是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可持续性要求对决策的后果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要求对法律和机构进行改革，以强调共同的利益。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2 页。

第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为了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保证公民有效地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二是在自力更生和持久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剩余物资和技术知识的经济体系；三是为不和谐发展的紧张局面提供解决方法的社会体系；四是尊重、保护发展的生态基础的义务的生产体系；五是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技术体系；六是促进可持续性方式的贸易和金融的国际体系；七是具有自身调整能力的管理体系。这些要求更多地体现在目标的性质上，应该在国家级别和国际级别的发展行动中加以强调，重要的是追求这些目标时的真诚性和纠正偏离目标时的有效性。

这一新的发展观提出后，尤其是经过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努力，成为了一种全球性认同的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

可见，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区分在于，生态发展强调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人和自然、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协调；即，要处理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而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在对待自然生态系统的问题上，应该突出代际公平的原则，即每一代人在拥有、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财富的问题上应该具有同等的机遇；即，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丰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将机械发展观确立为自己的主导性的发展观，将形而上学确立为自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思维方式，从而加剧了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种剥削制度，机械发展观和形而上学迎合了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在资本家看来，只要生产能为自己带来剩余价值，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忽

略不计的。什么工人的持久健康，什么环境的持续清洁，什么资源的永久存在，都是不需要自己花费分文的，都不会对价值的形成产生任何影响。“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惟一的动力。”^①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会从根本上去考虑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的问题，更不会去考虑生产的生态后果了，单纯的经济效益已经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淹没和抹煞了。同时，“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②可见，资本家是用牺牲整体利益换得个人利益的，是用牺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85、386页。

长远利益换得眼前利益的，正是资本家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才造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性，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带上了污染和破坏的特征。这样，马克思在提出生态发展设想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设想。在马克思那里，生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由于马克思是在批判机械发展观的生态破坏性的过程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因此，马克思在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河。

这样，东方社会就应该放弃增长而转向发展。发展是一个广泛、整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基本的协调状态领域就存在于人自身之内。人的生活除了有数量要求外，还必须要有质量上的保证，清洁的空气、舒适的环境、美妙的景观都是人类生活的内在要求，因而，保护环境和资源及其技术的要求都是这种均衡、协调状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可以超越和克服机械发展观，为建构和实施一种新的发展观铺平道路。

（二）发展中国家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今天，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决定的。现在，发展中国家在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程中的同时，也被卷入到了全球性问题的灾难中，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了它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的障碍。

第一，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生态灾难的牺牲品。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也有明显而集中的体现。主要的问题是：一是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产地。为了换取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用出口替代的战

略成了发达国家的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产地。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用了粗放的资源开采战略,这样,超负荷的开采就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例如 目前占世界人口 25%的发达国家消耗全球 70%的资源 而发展中国家仅仅为了偿还债务 从 1983 年起,每年出口资源不少于 500 亿美元。这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从而损害了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是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转嫁公害的牺牲品。在西方社会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它们采用了以邻为壑的战略 大量的资源投入多、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肮脏’的产业和设备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这样 发展中国家为了自己的工业化不得不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不仅加剧了资源和能源紧张的局面,而且致使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公司在本国冶金和有色冶金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占其投资总额的 14.8% 而在国外的企业仅占 3.7%;1981—1985 年 美国危害生态的工业的国外总投资中 第三世界国家占 35%;由美国投资兴建于 1969 年的印度博帕尔农药厂 在 1984 年 12 月发生了严重的农药泄漏事故 造成了 2800 人死亡,20 多万人中毒。三是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生态牺牲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发达国家不惜穷兵黩武 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到处挑起战端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将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运用到了战争中 大打‘化学战’、‘生物战’、‘生态战’、‘环境战’和‘信息战’。这种高科技的战争方式,不仅造成了深重的生态灾难,而且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前南地区战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投下的除莠剂严重地毁坏了越南的森林资源,恢复这些植被大约需要 20—30 年的时间 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除莠剂破坏了人体的遗传基因 致使越南出现了大量的残疾人。事实说明,“现代战

争本身就可以制造大规模的国际性环境危害”^①。

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不足，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不足，难以保障大众的正常生活，结果在大众谋生的过程中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日益膨胀的人口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负荷。从 20 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在全球的范围内出现了人口爆炸的问题，而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集中了世界上 75% 的人口。这样，无控制的人口增长就导致了粮食的短缺和紧张，非洲从 60 年代开始变成粮食短缺地区，拉丁美洲在 70 年代也成为了粮食短缺的地区，而亚洲在历史上就是粮食进口的大户为了多生产粮食，人们不得不采用了粗放的生产方式，滥砍乱伐，这样，就致使资源和能源日益短缺、环境负担加重。而土地的沙漠化就是这种粗放的开发方式结出的恶果。现在全世界有 99 个国家受到了沙漠化的危害，有 9 亿多人口受到影响。而已经沙化的土地 1/2 在非洲，1/3 在亚洲。二是采用了急于求成的工业化的战略，致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而对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又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以污染和破坏自然为特征的，在忽视农业生产、导致土地资源大量流失的同时，环境污染的程度甚至开始超过工业发达的国家。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推诿全球性问题责任的一个借口。三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分配制度加剧了贫困问题。贫困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顽症。例如在非洲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社会公正问题，使绝对贫

困人口愈来愈多。据有关方面估计，现在全世界有 13 亿贫困人口，而非洲就占 1/2。这些贫困人口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营养不良，食不果腹，不得不背井离乡，最终不少人沦落为了难民。非洲的难民总数大约占世界的 65%；更为严重的是，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 48 个国家中，非洲就占了 33 个。而贫困问题反过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压力，这就是贫困人口为了维持简单的生存，不得不采用滥砍乱伐的粗放型的资源开发方式；同时，贫困还成为了战争和内乱的根源，导致了整个社会系统的不稳定，非洲部族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由此引发的。

第三，全球性问题的危险是针对整个人类的，而发展中国家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地球村”的特定时代条件下，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问题都被放大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在生态环境的层次上，目前人类面临的主要的全球性问题有：一是臭氧层耗竭的问题。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可以吸收来自于太阳的紫外线，从而降低了它对生物和人类的危害。但是，由于工业化以来氟利昂等物品的大量使用，致使臭氧层出现了空洞，于是，大量的紫外线就会直射到地球上，破坏了正常的食物链循环，这样，就会造成渔业和农业的大量减产。同时，臭氧层变薄还会增加对人类皮肤、眼睛和免疫系统的损害。据估计，臭氧减少 1%，皮肤癌患者就会增加 2% 左右。二是温室效应的问题。这是指由于工业化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气体增多，增加了大气的多种吸热性能，使来自太阳的长波辐射被阻留在地表和大气下层，进而导致地表和大气层的温度增高，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温室的效应。温室效应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使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极地冰雪融化，最终会在使海平面上升的同时淹没沿海地区。据估计，如果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按照目前的排放速率进行，那么到 21 世纪中叶，全球气温将升高 1.5—4.5 摄氏度，海平面将上升 25—100 厘米。三是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问题。生物多样性是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的有机体及其结构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总称。由于人类的不适当的活动在 20 世纪初 每天有 1 个物种灭绝 现在 每 6 小时就有 1 个物种消失 到 21 世纪，可能有上百万个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导致地球上生命维持系统的损害，从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尽管全球性问题的形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旦它形成，其威胁就是针对整个人类的，而占世界上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全球性问题的包围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除了将社会发展定位在生态化上外，还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舍此没有其他的出路。

（三）发展中国家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尽管可持续发展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光明的前景，但是，要真正将可持续发展变成现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关键的问题是，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又是各不相同的。发达国家在诠释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附加了许多条件，有意或无意地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维护和巩固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霸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诠释。发展中国家在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主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人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应该动员广大公众的积极性，促进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应该

将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发达国家一方面以人权卫道士自居，攻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侵犯了人权，以此为借口，大加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另一方面，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它们将生态和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要求人们应该尊重生物的权利、生态的权利，将生物的权利和生态的权利看做是比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权利更为重要和基本的权利。这样，它们事实上就抹煞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用“兽道主义”牺牲了人道主义。因此，发达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这种理解不仅是虚伪的，而且其用心也是险恶的，这就是以保护生态为幌子，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显然，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发达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诠释。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将人的生存和发展确立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就是说，人类处于普遍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有权过上健康而又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不能牺牲人的利益来侈谈所谓的生物的权利、生态的利益。在南北问题的国际格局中，要真正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贯彻和实施，还是应该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首先应该保障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过，这种生活同时又是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进行的。这在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

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 离开自然的支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围绕着人的发展来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前，按照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契合情况，在发展中国家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主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必须加大反贫困的力度消除贫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现在，贫困问题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已经达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因此，可持续发展不仅应该关注贫困问题，而且应该将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缩小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消除贫困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二是必须实行适当的人口政策人口的适度增长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人口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贫困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现在 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失控，加重了生态环境和社会的负担，致使贫困问题愈来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人民都能过上具有较高素质的生活，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并且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 这样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显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依赖于广大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公众获得必要的信息和数据，并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应该推进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尤其是妇女、青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对于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调动他们的创造性、理想和勇气，培养全球伙伴精神，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保证人人有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7 页。

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同时，应该承认和尊重土著人及其文化的价值，使之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此外，应该保护受压迫、统治和占领地人民的环境和自然资源。

总之，可持续发展其实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第二，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发展中国家应该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力求按照可持续性的要求来发展经济，同时应该加强环境管理工作。

可持续发展是由环境和发展构成的一个系统。在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环境和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可持续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可持续发展是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集于一身的一种发展模式。可是，由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在具体的发展进程中，可以有所侧重。也就是说，根据每个国家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或偏重于可持续性（环境），或偏重于发展。但是，发达国家撇开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差异不谈，抽象地认为工业化是促使环境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在它们看来，所谓的“可持续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可持续性问题而发展是隶属于可持续性的它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的工业化对环境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显然发达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诠释，同样是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通过限制它们的工业化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它们置于永久的落后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可持续性和发展的关系做出符合自己国家国情和人民群众需要的解释。

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任务相当艰巨因此对可持续发展更应该做出全面、准确的把握，以便为自己的发展寻求适宜的智

力支持和价值导向。主要应该注意的问题有：一是为了自身整体的和长远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处理环境和发展、可持续性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也应该将环境和发展的协调作为发展的理想状态，必须大力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在于：“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这就是说，环境和发展、可持续性和发展在总体上是不能分割的。二是在上述总方向的规范下，发展中国家还应该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才是当务之急。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假如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没有极大地提高工业化的水平，人民群众的基本的生存和需要就难以得到保障；而在人的基本的生存和需要都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发展就无从谈起。这样，再优美的环境、再丰富的资源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三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发展进程中来考虑，应该将环境保护看做是发展进程的一个内在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个整体或这个进程来单独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没有充裕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的支持，发展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力求避免重蹈西方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当然 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还是应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发展经济，不能因为经济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反过来限制经济的发展。在此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环境管理和规划工作，应该将环境管理和环境规划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建设。具体来说，一是在科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运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6 页。

科学技术来加强和提高自己国家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人们通过科学交流来提高科学认识，增强各种技术的开发（包括新技术和革新性技术）。二是在立法方面 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本国的环境立法工作，环境标准、管理目标和优先次序应该反映它们适用的范围，应该明确污染和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法律规定。三是在经济方面，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该承担治理污染费用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并且要适当照顾公众利益，同时不能歪曲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有关规定。四是在管理方面，应该对于拟议中的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发展中国家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管理的手段确定下来。

总之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是先生存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使环境和发展协调起来。

第三，在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国际社会的良好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情况下，才能参与这种进程。

在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地处理全人类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世界历史”的格局 这样 全人类利益的出现就具有了可能性。这在于，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①。也就是说 所谓的全人类的利益是对“世界历史”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反映、概括和总结。现在，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日益严重，全人类利益的问题又再次被突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14页。

了出来，不过，这次是以负面的方式突现出来的，全球性问题已经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是地球的存在构成严重的威胁，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全球性问题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必须要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转向可持续发展。而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需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全人类利益和全球伙伴关系是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的。但是，在现有的世界格局中，在民族国家仍然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全人类利益是不可能完全超脱民族利益的。我们不能将环境与发展的问題同和平与发展的问題割裂开来，应该看到和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全人类利益的保障、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贯彻和实施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但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性，将全人类利益看做是高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的东西，要求将全人类利益作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准则。这样，它们在事实上就是企图用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方式来换取所谓的全人类利益，最终在实现生态霸权的过程中来控制世界的发展。但是，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又必须也只能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解释。

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强调建立新型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并不是要否认和否定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而是以承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为前提的。在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有关精神确保各国拥有按照自己国家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每一个国家在这一前提下应该确保承担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或在自己的控制下的活动，不至于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责任，应该将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问题、跨国界的环

境退化问题及时通知有关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以便采取必要的对策，不能转嫁公害。在此前提下，各国在环发问题上不能采取国家本位主义，而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采取适用的预防措施，遇有严重的或不可逆的危害时，不能以无充分的科学根据为由而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由此，考虑到导致环境退化的各种复杂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如下的原则立场：各国应该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应放在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国际社会应该向它们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处理环境问题，各国应该进行合作促进一个可持续性的和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应该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环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政策不应该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任意或无理歧视的手段或伪装的限制，应该避免在进口国家管理管辖范围以外单方面采取对付环境挑战的行动。为了保证建立这种新型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还必须加强国际环境法的建设，以明确有关问题的国际法责任。战争是一种重要的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必须阻止这种破坏力的发展，各国应该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有关规定，并按必要情况进行合作以便促进发展。同时，遇有环境争端时，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和平和谈判的方式解决，决不能诉诸于武力。

总之，在如何处理全人类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对策。

四、可持续发展与南北问题

尽管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但是它并不是无懈可

击的。关键的问题是，它对代际公平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对代内公平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代内公平的问题上，它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将可持续发展与解决一国范围内的贫困问题联系起来；二是没有将可持续发展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统一起来。前者忽视了一国范围内的代内公平问题，后者忽视了国际范围内的代内公平问题。就后者来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可持续发展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将解决南北问题和解决环发问题统一起来。

（一）从南北问题看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将国际公平排斥在可持续发展之外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将这种不完善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符合国际公平原则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

第一，不结盟运动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针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已经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1989年9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召开了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第9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给出了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这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满足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提高生活的质量。显然，这一定义超越了布伦特兰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把不能危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纳入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范围中，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南北问题的高度上来认识等意义。

第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为解决南北

双方对可持续发展理解上的分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1989 年通过和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这个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而且决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意思。具体来讲：一是要达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国内均等和国际合作，包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以及发展的目的进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二是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有一种支援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对于良好的环境管理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三是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且提高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以及经济的增长。四是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这是经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据理力争，并经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成员国的协议同意的可持续发展概念。

通过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全球性问题，只能在有效地解决南北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得以彻底的根除。这就是说，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对外捍卫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对内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产物。显然，这是一个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和先进成就而避免其灾难的建立新发展模式的过程。一句话，这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历史创造性的过程。

（二 第三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西方文化的产物，事实上，它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凝结了发展中国家的智慧和心血。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多年努力，1989年 第 44 届联大通过 44/228 号决议 决定于 1992 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这样 如何在全球的范围内建构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就摆在了国际社会的面前。可持续发展这只看不见得手，就要开始操纵人类社会的发展了。

为了开好联合国环发大会，国际社会进行了各种努力和多方准备 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显示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 大家经过协商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和声明，表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从而保证了大会的顺利举行和取得预期的创造性成果。主要的活动有：一是 1990 年 4 月，印度政府发起并主办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环境问题新德里会议 中国、巴西、阿根廷等 18 个发展中国家应邀出席了会议。虽然会议参加者的范围有限，并且只达成了一个“主席的总结报告”但它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内的磋商开了一个好头。二是 1991 年 6 月“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三是 1991 年，非洲和拉丁美洲分别举行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部长级的会议，发表了反映他们的立场和所关心问题的文件。四是 1992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 马来西亚政府在吉隆坡举行了“第二届发展中国家部长级环境与发展会议”，55 个国家的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吉隆坡宣言》以求在 6 月的环发大会召开前形成共同的立场。尤其是《北京宣言》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1 年 6 月，由中国发起并在北京主办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41 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发表了反映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立场的《北京宣言》^①。该宣言由引言、总则、各领域问题、跨

见《迈向 21 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68—173 页。

领域问题、关于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六个部分组成。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这次大会和《北京宣言》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在环发领域中的协调与合作，以及为环发大会的筹备进程做出了积极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北京宣言》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强调日益恶化的全球性问题是由于难以持续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人们应该将环境问题和 development 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北京宣言》指出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 环境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的贫困，由于这些国家使用了发达国家提供的过时的、有害环境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从而加剧了环境的退化，进而又破坏了发展的进程，因而，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改变这种贫困与环境恶化以及加强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的能力的出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它们不能采用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而过度消耗了世界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环境造成了损害，发展中国家受害更为严重，因而，它们对全球性的环境退化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总之，需要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

第二，要有效地解决环发问题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 尤其在跨领域问题上更应如此 但是 这种合作又是在责任有别的基础上进行的。《北京宣言》强调 环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应以主权国家的平等原则为基础，不应以保护环境为由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不应借此提出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发展资金的附加条件，也不应设置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和贸易的壁垒。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不遗余力地参加环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做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现实的回应，

从而形成一个适合于全球性合作的气氛，发展中国家就能和发达国家一道，共同为自己和后代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三，必须突出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在解决环发问题中的重大作用。为了有效地解决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那些长期存在而且迅速恶化的环境问题，《北京宣言》提议设立一项“绿色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充足的资金援助用以解决各种环境问题。该项基金还应该包括转让环境无害化技术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能力所需要的费用。《宣言》强调科学技术在解决环发问题中的重要性，重申需要采取措施确保以优先的、最有利的、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无害化技术，应该将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这类技术看做是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贡献。

总之，《北京宣言》强调人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有效的行动，并为全球性合作创造机会和条件。出于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强烈关注，人类应该在责任有别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可见，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发达国家“贵族化”的“浪漫主义情结”，更是发展中国家“平民化”的充满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的产物，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问题做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

（三）可持续发展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由于南北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内在的构成部分，而南北问题又是与全球性问题中的其他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是纠缠在一起的，这样，要在全球性的范围内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不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来处理，而必须将之与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联系起来考虑。

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持有的基本立场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必须将解决全球性问题、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来考虑。具体来讲：一是所有国家都有参与国际环境保护与发展事务的平等权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不论国家的大小和贫富，它们都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也应该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决杜绝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二是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战略，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生物物种享有永久主权。在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发展的民族性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该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务。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避免以可持续发展为借口而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现象的发生。三是应该兼顾处于不同自然条件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利益，在国际环境立法中充分反映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必须具有公正性，首要的问题是应该保障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的利益。四是应该明确造成目前环境恶化和现实的主要责任，同时体现公平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由于全球性问题是首先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形成的，而现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又是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的援助。五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同时国际社会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与发展合作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条件下，应该增强自己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能一味地坐享其成，而应该积极地发挥自己的历史创

造性。总之，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问题，这就是应该坚决反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霸权主义”。

在坚决反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霸权主义”的前提下，为了真正建立起全球伙伴关系，认真推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还必须加强可持续发展事宜上的国际合作。积极开展下述活动：一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国际组织和其他团体、个人参与可持续发展和优先项目计划的实施，以及有关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活动。二是继续进行有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三是加强同国际社会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交流与合作，争取国际社会以优惠的、非商业性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生产技术和其他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四是通过国际之间的磋商和对话，寻求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保证现有发展援助资金，同时寻求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保护全球环境的国际行动和补偿因履行全球环境义务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五是促进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公平、稳固、非歧视和可以预见的并考虑包括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贸易制度，制止和扭转贸易保护主义，使世界贸易在与环境相辅相成的前提下进一步自由发展，使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促进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结构，通过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六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行动，在温室气体控制、臭氧层损耗物质的替代品和替代技术开发利用、防止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废物污染与越境转移、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扩大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七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发展方面的信息交流，吸取国际先进经验，完善国内的法规、政策和管理体系。

总之 只有将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南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才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持续的保障机制。

第七章 人道化和合理化：建构 社会发展的目标系统

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马克思

社会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过程，脱离人的发展的社会发展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应该把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作为一个感性存在物的人具有多方面的需要，其中最为基本的是物质性的需要和精神性的需要，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应该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来满足人的物质性的需要，而且也应该通过包括精神生产的发展在内的其他一系列的环节来满足人的精神性的需要。通过物质生产来满足人的物质性需要的过程就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主要通过精神生产来满足人的精神性需要的过程就构成了社会的文化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专门现象，二者是处在辩证的互动之中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亦塑造人；文化是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体现，文

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而现代化就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生态、科教和文化因素在内的整体的全方位的社会进步过程。这样，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物质生产的领域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而必须将发展的触角伸向文化领域，通过文化的现代化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因此，东方社会应该将社会的文化结构和人的发展联系起来，以确定社会发展的目标系统。当然，只有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人才可能真正得到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

一、社会文化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现象和文化生活是人所特有的，文化活动最能体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因此 文化反过来对社会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得益于文化的推动，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而东方社会特有的文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其现代化的一种障碍 这样 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将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来建设 力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一）社会文化结构的含义和机制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科教等一系列的因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的巨系统。社会的文化结构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特定的层次，不包含文化结构的社会结构是不完整的。

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现象的文化具有十分宽泛的含义，它是指

人类在自己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习知和习得的一切能力、活动和成果的总称。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文化，一是物质文化为第一个层次上的文化。这是人类在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性需要的过程中所形成和造就的物质生产的能力及由之创造的物质成果，物质文化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界标。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所概括的那样：“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①。进而在文明社会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二是制度文化为第二个层次上的文化。这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为了保障物质生产的有序、顺利进行，而在将人组织起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活动的能力和社会建制的总称，这是一种固定化和程式化的人类行为。最早的社会建制是婚姻制度和家族制度，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揭示了制度文化的产生和演化的辩证过程：“氏族必然从杂交集团中产生；一旦在这个集团内部开始排除兄弟和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就会从这种集团里面生长出来，而不会更早。氏族的前提条件是兄弟和姊妹（嫡系的和旁系的）已经从其他血亲中区分出来。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的变化”^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是精神文化为第三个层次上的文化。这是人类在通过精神生产来满足自己的精神性需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生产的能力及由之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第499页。

的精神产品的总称。它包含了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因素，可以涵盖社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在一定的意义上，精神文化是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反映，同时，精神文化一旦形成就按照自己的运行方式对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产生反作用。可见，这里的文化是在与自然相对的意义所讲的“人化”的东西和事物，是最广义上的文化。而第三个层次上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在广义文化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所谓的社会的文化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过程中由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层次。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过程中，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经济基础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 and 思想上层建筑则分别成为了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主干，文化结构具体就是指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它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理论支持和价值导引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社会的基本结构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而生态结构和科技结构是在社会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从其他结构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因而，在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区分开来，应该在充分肯定经济结构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在社会系统中准确地给文化结构定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 这样，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诸种形式，即法律思想、政治思想、宗教、艺术、道德和哲学，以及语言、科学和教育，就成为精神文化中最本质性的构成部分，不仅充分地体现了与自然相对的人化的方面的属性和功能，而且是社会存在的自觉反映并且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作为社会结构特定层次的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主体性的特征。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主体性是其一个本质性的特征。文化是人类劳动成果的积淀，同时也塑造着人的主体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② 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充分体现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人看做是文化存在物。二是客观性的特征。尽管文化是一种高度人化的产物，但是，文化的客体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文化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外壳具有物质的形式，文化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对文化的客观性特征的揭示是马克思对文化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这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分析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三是社会性的特征。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2页。

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 或者说只有在劳动作为社会的劳动的时候“，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① 这样，文化就通过劳动而依靠社会、通过社会并且同社会一起保存和发展起来了。而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文化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那么 它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由于每一个民族的社会实践各具特色，这样，文化的社会性就在民族社会的交往中表现为民族性，大的民族文化就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圈。四是系统性的特征。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整体 其各个构成因素是不能分割的 在各个构成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文化获得了系统性的特征。这种系统性表现在 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它们在功能上具有匹配性；社会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也是不可分割的 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 而意识形态又对社会心理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不可分割的 三者总体上存在着整体的关联 作为意识形态诸形式的法律思想、政治思想、宗教、艺术、道德和哲学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它们与语言、科学和教育一起 都指向了真善美的统一——自由。五是历史性的特征。由于文化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 文化必然也要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 这不仅表现在发明的数量上 而且也表现在由这些发明造成的财产的种类和总额上”，财产的增长是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个文化时期的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增多以及社会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99页。

关系的”^①。当然 文化的进化也得益于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我们具有和以往时代在野蛮人及蒙昧人头颅中从事活动的同样的大脑 由遗传而保存下来这副脑子传到今天 已经充满了和浸透了它在各中间时代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渴望和激情。它还是那副大脑，不过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而变得更加老练和更大了”^②。这就是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样 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以工业革命为界 就有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分野 即文化有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差别。当然，文化的进化不可能按照单纯的线性方式进行，传统和现代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六是能动性的特征。由于文化积淀了一切人化实践活动的成果，是人的能动性的集中和体现，一旦文化固定化和程式化 它就不仅可以成为塑造人的力量 同时也可以成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生的强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文化的进步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 思想和文化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 其缘由就在这里。在这个层次上 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就统一了起来。

总之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的概念 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中，尤其是在马克思晚年的专门研究一般文化问题的著作——“人类学笔记”中 文化结构的独特、专门的地位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在科学的基础上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形式是在作为社会的文化结构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这样 文化就成为了打开人的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文化意指由社会产生并世代相传的传统的全体 亦即指规范、价值及人类行为的准则 它包括每个社会排定世界秩序并使之可理解的独特的方式。正如所言 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 但文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378、405 页。

化也给我们提供实在的定义。文化是我们产生的母腹，是我们每个人及其命运经受锻打的铁砧。对人类文化及其运行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勇敢地进入社会领域探索我们自己。”

（二 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文化推动力

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成为经济变革的先导。这一历史进程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是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统治西欧千年之久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创立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导致了科学和文化的全面复兴。接着，这种思潮渗入到了基督教神学体系和宗教体系中，引发了遍及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宗教理性精神。最后，在由近代科学革命形成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宗教理性精神的影响下，在启蒙运动中最终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思想文化。这样，正是在反对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使人获得解放的同时，成为现代化的文化推动力。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全面而系统地考察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马克思晚年主要是在《历史学笔记》的第三册中考察了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发轫于13世纪的意大利，后扩展到欧洲许多国家、延续至17世纪初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那时的意大利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城市国家，它们在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欧洲市民社会的典型代表。这种新兴生产力的代表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方式表达了

[美] 罗伯特·F. 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页。

自己与封建社会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要求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世俗文化反对神学文化，力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序、全面的发展鸣锣开道，严重地冲击了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便悄然兴起。人文主义思想的要旨是：一是要求以人为中心。他们揭露和批判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指出宗教的反人性、非人道的本质；认为人不是上帝的附属品，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来世和天国，而人自身的现实生活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人才是世界的中心。二是赞颂人的力量。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神权和封建等级制度，摒弃以人的出生门第来衡量人的价值的陈规陋习；充分肯定人的权力和尊严，肯定了人生的价值，突出人自身的才能、智慧和品德的重要性。三是提倡人性。他们批判神性和蒙昧主义，揭露基督教禁欲主义的虚伪性和荒谬性；肯定人的现实生活和尘世享受的合理性，提倡人的个性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鼓励人们追求尘世的幸福生活。四是崇尚科学、教育和知识。他们以宗教的蒙昧主义和教会的愚民政策为批判的对象，主张重新搜集、翻译、整理、注释古代文献，以各种古典人文科学的研究来代替对基督教教义的教条主义的诠释和宣传，要求将科学、教育和知识从教会中剥离出来，让它们成为造福人类的武器，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人的才能，发展人的个性。尽管文艺复兴只是在情感文化的层面上展开了自己人文主义的主张，并未系统建立和践履人文主义，但是，它带来了思想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由之而兴起的人文主义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在使人获得解放的同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认为文艺复兴“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

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人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 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 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 有人用舌和笔 有人用剑 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①。

第二，宗教改革运动与新教伦理精神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发生在 16 世纪的欧洲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当时，“王权反对威尼斯所代表的资本实力的这场斗争发生的时间，正赶上一些崭新的因素开始起作用（美洲……金矿和银矿的发现 殖民地等等 国内需要钱供养常备军等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服资本即资产阶级的祸患 制服这个产生于封建国家 还带有封建痕迹的君主国。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教廷和宗教改革的斗争。”^②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发动了这场反对封建王权和教会的斗争，其表现形式是对西欧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发动猛烈的冲击。1517 年 罗马教庭派人在德意志大势兜售‘赎罪券’以便为自己敛财 神学教授 马丁·路德（1483—1536）发布了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0 年 5 月 路德发表了著名的《告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贵族》 号召人们推翻教士的压迫 宗教改革运动从此迅速展开。1524 年德国爆发了农民战争，以托马斯·闵采尔（1493—1525）为代表的下层教士积极参加，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受到了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这样，在德国和北欧各国就产生了一个脱离天主教的新宗派——路德宗。接着，宗教改革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迅猛发展。1541 年，以法国人约翰·加尔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61—262 页。

②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 3 册 红旗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60 页。

(1509—1564) 为首的宗教改革激进派 经过长期的斗争 在日内瓦“创立了加尔文教和日内瓦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制度”^①。路德只反对教皇和教庭而不反对封建的王权 与之比较起来 加尔文的改革更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 他蔑视教会和世俗的一切权威。于是 由加尔文创立的新教的一个新派别——加尔文宗(清教)就成为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等地共和党人的旗帜。在这个过程中 加尔文提出了一种“新教伦理”。在他看来 凡是内心信仰上帝的信徒都是上帝的“选民” 信徒必须排除一切障碍 过勤俭严肃的生活, 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教徒通过艰苦奋斗来发财致富就是完成上帝交给的荣耀的“天职”。在这种情况下 既大力地去发财致富, 又奉行禁欲主义的精神 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的推动力。而英国的宗教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16世纪30年代 英国在都铎王朝的领导下建立了英国国教 产生了新教的另一个重要的派别——圣公会, 并用法律的形式保证了圣公会的国教地位 英国在1582年宣布:“凡劝说新教徒改宗天主教或出席其改宗仪式者 均属叛国罪 此外 利用警察和刑事手段 责成人人都到圣公会教堂去做礼拜 刑法规定, ‘recusancy’ 也就是说不去新建的新教堂做礼拜, 都要罚款。这种罚款制度足以使所有的天主教徒因‘recusancy’ {不遵守国教} 而破产。用天主教仪式做弥撒 参加弥撒, 忏悔 布道或聆听布道”^②; 都算是弥天大罪”。清教最早传入英国时遭到了抵制和镇压, 但到了16世纪60年代, 清教开始作为国教的一个派别而出现, 主张按照加尔文教来“纯洁”国教 清教徒人数在16世纪70、80年代陡增 开始脱离国教 建立了独立的宗教组织 同时 由于他们逐渐执掌了英国

^②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3册 红旗出版社 1992年版 第149、238页。

的工商业，也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席位。这样，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首先崛起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贡献在于：一是将《圣经》作为信仰的惟一源泉，使宗教改革成为了基督教中的“人的发现”。在新教看来，人的灵魂能否得救，关键不在于教会的帮助，不在于教会的善功、赎罪和各种宗教仪式，惟一的条件是看他自己是否真心信仰上帝，而个人这种信仰的取得的惟一途径就在于个人直接对《圣经》的阅读。例如，当时的一位人士在一封信中指出：“如今的德国已今非昔比，艺术科学繁荣昌盛，黎民百姓也希望学会写作，因此，如果教皇只凭教权行事，否决路德所提的条件而拒不审查其教义，如果不从圣经中引用各种根据和充分理由，很可能就会发生强劲有力的运动，这对教皇毫无裨益”^①。可见，这种教义的实质是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原则在宗教中的体现，以宗教的形式肯定了人的地位和个人的自由选择。二是否定了教皇和教士的特权，主张信徒人人平等。宗教改革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教会的等级制，路德认为教皇和教士就是反对上帝的敌人——敌基督，指出“圣经中所写的敌基督的专制行为其实就是指这种教皇的权力”^②，从而引导人们举起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大旗。而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一些人宣称“一切宗教和教派都无分轩轻，还说人人都有基督的品质”^③。这样，就肯定了大家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性。加尔文教则更进了一步，它完全废除了教阶制，在教会组织形式上实行了政教合一、民主共和的体制，作为教会管理人员的长老和牧师都由教徒选举产生，教徒的代表会议成为了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宣布主教没有世俗权力，宣布日内瓦为独立的共和国”^④。这一组织

^② ^④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3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4、109、149页。

形式后来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三是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神圣化，用宗教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伦理准则。在新教看来，人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需要以上帝的恩宠为证据，而上帝的恩宠就表现在事业的成功上，一个人聚敛的财富越多，就越能证明上帝的恩宠。这样，当一个人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践履天职去发财致富时，他的发财致富的欲望就是合理的，就是符合上帝的伦理道德标准的。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将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新教伦理精神的感召下，“更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巨大的财富的结合，导致了资本的过度积累”^①。四是扫除了基督教的陈规陋习，使之更为接近普通的民众。新教各派都削减了大量的宗教繁文缛节，废除了善功和各种宗教捐纳。例如，“日内瓦人按照法国新教教会的教规……改革了祈祷仪式和各个学校”^②。而英国在1576年宣布：“祈祷仪式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完全自由，新教徒可以担任各种职务，法院的成员半数为新教教徒，半数为天主教徒”^③。这样，他们就建立了适应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廉价的宗教”。

可见，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继文艺复兴之后再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

②③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3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216页。

度重新发现了人 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保障作用。

第三，法国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启蒙运动是一场发生在 18 世纪法国的反对神学蒙昧主义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从而使 18 世纪成为了“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结和升华，确立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基本的思想文化框架和价值观念准则 标志着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胜利。其基本特征是：一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 大力宣扬理性和科学。他们鞭挞了封建制度和基督教教会造成的宗教迷信和愚昧状态 要求用理性和科学之光来驱除黑暗 照亮人们的心灵。他们宣称 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 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 神学、基督教道德都是这样的东西，因此应该被统统打倒。他们还主张用理性和科学来教育民众、开启民智，认为以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科学能够使我们正确认识自然 增长知识 破除迷信 从而会增进人的福利。二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大力宣扬民主与法制。他们认为 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扼杀了自由 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愚昧 因此 他们大力宣扬“天赋人权” 主张人民大众参与政治，以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以结束使人陷于罪恶的专制制度的局面 同时 应该确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此外 他们还论证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三是积极投身于思想文化的创造实践，带来了哲学、政治学和其他一系列领域的繁荣。启蒙时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大丰收的季节，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获得了全面、长足的发展 在哲学方面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取得了 对基督教神学的胜利 在政治学领域 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和霍布斯的国家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卢梭的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奠

定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政治思想基础 此外 在法学、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没有能够超出自己时代的限制，其观点和理论形式也是不尽一致的，但是，他们提出的理性主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普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 同时 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和人权的思想成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这些原则的实践过程。这一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 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

可见 正是在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思潮的互动中 才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文化的现代化才推动了经济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人道主义、适合时宜性 以及改善今世而非来世的人类生活条件的必要性，构成了现代化文化观的标志”^②。这样 资产阶级就以文化的方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从而在扫清现代化的障碍的同时 为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东方社会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正因为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变迁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19 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3 页。

程 因此 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 文化滞后同样已经成为了东方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障碍 因为‘迷信、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是东方社会的基本特征^① 这样 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 同样应该实现文化上的现代化 以便为现代化提供一种适宜的文化导引机制 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开辟道路。具体来讲：

第一 在东方社会 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守旧、怀旧的情绪 而这是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向前看的、革新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从传统的经济结构来看 东方社会普遍实行的是农村公社制度 人们的物质生产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进行的，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 人们普遍具有对这种田园风光无限依恋的情结 孤立和封闭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情绪；而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种情绪，进而这种情绪就成为专制主义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 因此 普遍缺乏历史的创造性、社会发展水平的停滞性就成为了这种文化的外化和表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②。尽管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输入在一定的程度上瓦解了这种文化，可是 由于文化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运行的 尤其是社会心理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因而 虽然东方社会被卷入到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中 但是 它们对之普遍存在着一种畏惧和抵触的情绪 更加地对过去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怀念。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对由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691、765 页。

民主义造成的血雨腥风的残酷现实的一种消极的抵制和抗争。而更为可怕的是，怀有这种心理的人们对殖民主义的入侵麻木不仁，成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驯服的奴隶，“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①。而在现代社会中，尽管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人们绝对不会做传统的奴隶，并且敢于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现代化的东西。这样，文化上的或者说人们心理上的这种守旧、怀旧与向前、革新的矛盾和冲突，就构成了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文化阻力。

第二，在东方社会，世系门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决定性的东西，这种门第制度成为实行经济、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的工具，这样，就导致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奋发向上的进取心，而这是与现代化过程中所倡导和形成的个人奋斗、积极进取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的门阀制度就是这样的东西。在东方社会中，由于血缘宗法制过于强大，一个人在门第中的地位也就是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了他所属的家庭、民族或部落的地位，由于这一切都是先定的、被赐予的，不是凭借个人的奋斗和业绩而获得的，这样，在东方社会“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从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难以形成现代化所需要的主体性意识的确立和弘扬，而且使萎靡、堕落、不思进取成了东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而在现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5、766 页。

代社会中，人们在地理上的流动导致了家庭纽带的松弛，世系门第在社会生活中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工作和高度的进取心获得的，这样，个人奋斗、积极向上就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价值观念。这样，文化上或人们心理上的这种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对立、不思进取和奋发向上的对立，就成为了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另一种重大的文化阻力。

第三，在东方社会，人们一般是用迷信和宿命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对一切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而这是与现代化进程中所确立和倡导的理性、科学的态度大相径庭的。尽管在东方社会的宗教中也出现了“宣扬纯净、反省和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教派和种姓”的主张及其教派^①，但是，这种主张和宗派始终都没有占居主导地位。普遍的趋势是，与落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相适应，东方社会对超自然的力量都抱着崇敬的态度，致使宗教本身成为了迷信的东西，“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②。人们把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一切都交给了天命。同时，在东方的宗教中，在僧侣中也出现了经商致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是“为了修道团而不是为了众僧侣”^③，更不是出于宗教的伦理精神的目的。同样，东方社会也会出现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但是，它们都带有宗教的色彩，只是单纯地改朝换代，并没有推动科学和理性的发展，并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而在现代化的

①③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91、39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5—766 页。

过程中，人们却充满了勇往直前和富有革新的精神，他们随时准备去克服障碍，表现出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的态度。这样，文化上或者说人们心理上的这种迷信与理性的对立、蒙昧与科学的对立，就构成了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三种文化阻力。

总之，东方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结构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大的障碍，成了维护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顽固的力量。为了有效地推进自己的现代化，东方社会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进行革新，关键的问题是应该确立科学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推动力中不可缺少的双翼或双轮，只有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为现代化提供一种适宜的文化机制和文化环境。假如没有文化上的这种变革，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二、东方社会确立科学人文主义的抉择

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在东方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将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作为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方向。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含义和要求

在东方社会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以人道化为方向。所谓的文化人道化就是指，要以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发展作为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建构起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以便扫除阻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等制约现代化的文化阻力。这里的人文主义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人文主义，也就是在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基础上所确立的人文主义，即在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一定的阶级关系中通过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来谋求人的解放（人的发展）。

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发展是一个科学、有机的整体，它包含自由、全面、充分与和谐四个环节。或者说人的发展是由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充分发展和人的和谐发展构成的。具体来讲：

第一，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从自主性上所讲的人的发展，它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自愿和自主的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的发展，是为了人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社会进步的发展。这是由人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主体地位决定的。在史前社会中，尽管人们严重地受制于外界的必然性，但是，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展开的。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人尤其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成了奴役和剥削的对象，毫无自由可言。在东方社会中，由于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过于强大，个体被虚幻的群体吞没了，人丧失了自由。尽管主体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了高扬，但是由于异化劳动的普遍的存在，造成了如下的矛盾局面：一方面，只有资本才拥有独立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工人是处在全面的异化关系中的，没有任何的自由、独立和个性。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工的片面性和强迫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认为只有在打破了旧式分工、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人的自由发展才是可能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当然，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又是处在辩证的关联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中的 不能将它们看做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广度性上所讲的人的发展 是指人的各种需要、各种素质、各种能力、各种活动和各种关系的整体发展，也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的展示过程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示和充实的过程 从而成为了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在史前社会中，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原始的全面性 因而 人性也相应获得了原始的丰富性。当然 这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但是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 人的个性日益变得单一、抽象和贫乏。在东方社会中 由于社会生产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进行的 加上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 个性是绝然不容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受异化劳动的影响，一方面是资本家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 抛弃了新教伦理精神 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处在了贫困的位置上 被固定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生产的机器 这样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都成为了“单面人”。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 由于个人自身能够驾驭外部世界对个人各种才能发展发挥作用的各种推动力，这样 多样性的需要、综合性的素质、多面手的能力、丰富的活动和普遍的关系，就最终成为了人的个性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总之，“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 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①。

第三，人的充分发展。人的充分发展是从程度性上所讲的人的发展 是指人不受外在的和内在的各种盲目力量的束缚 使自己的各种需要、各种能力、各种活动和各种关系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在史前社会中 由于生产和分工具具有混融性 每一个人都要承担不同的角色 面对险恶的环境 人们使自己的潜在在当时的条件

下得以充分地展示了出来。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统治阶级不仅从外在的物质条件上极大地限制了人的发展，而且通过精神控制的方式来阻止人的可能的发展。在东方社会中，个性只能在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许可的范围内发展。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的束缚下，人的个性其实被降到了最低的极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成了资本家追求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工具，工人的发展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超出这个范围，工人的发展就会受到资本家的限制。同时，由于‘三大差别’的存在，也限制了人的各种才能的可能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每个人的充分发展成为了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尺度。同时，由于共产主义“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①。

第四，人的和谐发展。人的和谐发展是从方向性上所讲的人的发展。是指人的各种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谐与协调。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其他人以及个性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在史前社会中，人的各方面的关系处在天然的和谐状态中。这种状态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产物，另一方面保障了人类在险恶的环境中的基本的生存。而私有制打破了这种天然的和谐，使人的各种关系处于极度的不协调状态中。在东方社会中，强大而神秘的自然力、虚幻的共同体都使人成了匍匐在外界力量面前的奴隶，人的和谐发展成了非主流文化和非官方文化的一种虚幻的理想。而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的条件下，由于人和自己的劳动是相异化的，这样，就使人的各种关系都成了一种异化的关系。而当扬弃了异化劳动真正代之以自由劳动的时候，当人从自

然和社会的双重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人的各种关系就处在了和谐的发展状态中 这就是共产主义“事实上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 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①，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真正的自由王国 就开始了’^①。

这样，马克思在科学地揭示和论证人的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就确立了人文主义的科学地位。这就是，以扬弃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为中介，共产主义将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了起来，从而超越了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 因此 尽管我们不能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上升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层次，但是，它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共识，这样，我们就应该确立人文主义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26—92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第 120 页。

文化现代化应该将人的发展作为基本的方向和目的。当然，这种人文主义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以便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 东方社会确立科学人文主义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现代化的问题。没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性格、心理和素质等方面向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东方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是难以产生具有现代性的人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更是给东方社会的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灾难和不幸。这样，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现代化，确立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就成为东方社会实现自己的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当务之急。

第一，从东方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精神低下和缺乏历史创造性是东方社会成员的一种传统、普遍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而且成为了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种严重的文化心理障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东方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国民的文化心理问题，应该着力塑造“现代人”。

与东方社会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相适应，在自然经济、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精神低下、缺乏历史创造性成为了东方社会成员的一种普遍的心态，被凝固成为了东方社会的心理和文化结构。这是马克思在揭示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反复提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印度、俄罗斯和中国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一是从印度的情况来看，种姓制度不仅不能使人产生开明、进步，反而产生了一种野性的、盲目的破坏力。马克思在谈到殖民主义对印度传统社会结构的冲

击和瓦解时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①二是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缺乏历史创造性是俄罗斯村社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与公社的孤立性、封闭性和专制性相一致，停滞性也成为了俄罗斯村社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缺乏历史创造性就被积淀成为了俄罗斯村社的一种社会结构。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三稿中，马克思指出：“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②三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不仅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是停滞不前的，而且作为社会变革动力的革命也毫无建设性可言。例如，太平天国就是这样，“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③。显然，根本不能依靠这种力量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上述这种情况是由东方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是东方社会僵死、凝固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反映，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时，它反过来又成为了维护东方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顽固力量。

在全球化浪潮澎湃汹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东方社会的上述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而且进一步被强化成为了其传统的心理和文化结构，这已经成为今天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征程中的一种极其严重的阻力。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马克利兰等人于 1964 年在印度的卡其那达进行了一次短期的实地实验，他们动员政府向渔民资助了大量的机动船和尼龙网，以便在那里能够运用现代化的捕鱼技术，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来提高捕鱼量和增加渔民的收入。但是，事与愿违。有一些渔民捕足了鱼就去休息，而不愿增加产量，满足于既有的状况。另一些人则把新增加的收入统统花掉，而没有想到用于扩大再生产。可见，这种技术移植和援助不仅没有促进该地区的现代化，反倒进一步助长了其民众的惰性和奢侈，这与当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现代化浪潮是背道而驰的。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尽管现在反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扶贫资金，但是，扶贫的结果不是导致了脱贫，而是出现了越扶越贫的“怪圈”。问题的症结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没有确立起主体意识，在精神文化上仍然处于贫乏的境地，没有彻底“断奶”，将扶贫资金只是用于简单的日常生活，甚至用于吃喝嫖赌。种种情况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现代化国家的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于全部课程内容体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

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①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如何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那么，什么是现代人？什么是人的现代化呢？

现代人是相对于传统人而言的。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来考察一下传统人的特征。按照英格尔斯的说法，传统人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害怕和恐惧革新和社会变革；2. 不信任乃至敌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思想观念；3. 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4. 盲目服从和信赖传统的权威；5. 缺乏效率和个人成就感；6. 具有顺从谦卑的道德，缺乏突破陈旧方式的创造性想象和行为；7. 头脑狭窄，对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都严加防范和迫害；8. 凡事总要以古人、圣人和传统的尺度来衡量评断，一旦与传统不符，便加以防范、反对和诋毁；9. 对待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隔绝于世，妄自尊大；10. 凡属与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学术研究都不加重视或予以蔑视甚至是排斥。可见，传统人主要是指具有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人，而与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衣着扮相、文凭等等外在性的东西是无关的。显然，尽管不发达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状态的表达，但是，它又是与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它其实就是传统人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主要、主导地位情况的一种标志。由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这样，为了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让现代人取代传统人，使人具备现代性的特征。

这种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过程，就构成了人的现代化的主要的内容。按照英格尔斯的说法，人的现代化或现代人起码应该包括身体素质的现代化和文化素质的现代化两个不可分割的方

① [美]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4 页。

面。英格尔斯将现代化的指标加以了具体的量化，认为只要具备了以下指标，就可以达到现代化的水平：1. 经济高速发展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在 3000 美元以上；2. 农业地位下降，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2%—15% 以下；3. 服务业地位上升，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45% 以上；4. 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 70% 以上；5. 文化普及 人口的识字率在 80% 以上；6. 教育水平提高，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在 10%—15% 以上；7. 医疗卫生水平提高，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 1000 以下；8. 由于生活水平上升 平均预期人的寿命在 70 岁以上；9. 城市化高度发展，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50% 以上；10. 人的自然增长率在 1% 以下 以便优生优育。在这 10 项指标中 除了第 5、6 项指标是说明人的文化素质提高的情况外，其他指标都可以用来说明人的身体素质提高的情况。

除此之外，英格尔斯还进一步从人的文化素质方面描述了现代人的基本特征。这就是：1. 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受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2. 准备接受社会的改观和变化；3. 思路广阔 头脑开放 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4. 注重现在和未来，守时和惜时；5. 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6. 在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趋于制定长期计划；7. 尊重科学和知识，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勇于探索未知领域；8. 信赖人类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社会；9. 重视专门技术，有意愿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10. 乐于让本人和自己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同时，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11. 在人际关系上 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12. 不是消极被动地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而是希望积极而又有成效地了解本职工作和与此相关的生产过程和原理，表现出个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能力的

兴趣。

由此来看，人的身体素质的提高过程，就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而人的精神素质的提高过程，就是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将它们结合起来看，人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这样，英格尔斯就以自己的方式，证实并量化了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和谐发展的思想。当然，英格尔斯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制度对人的现代化的制约问题。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第二从“世界历史”的现实来看，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展示了东方社会的未来景象，但是，东方社会还是应该注意资本主义造成的“灾难”和“波折”等反人性、不人道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应该将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着力去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在东方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自己的危机。不仅这种制度是靠“吃人”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且最终造成了人的全面的异化，这样，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灾难和波折，东方社会的发展就必须采用人道化的方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中，资产阶级是凭借极端的反人性、不人道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一部资本原始积累史就是一部血与火、刀与剑的历史。一是从国内的情况离开，为了榨取超额利润，资本家充分地暴露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无所不用其极，将各种卑鄙的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

级的必要供给。’^①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二是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为了霸占资源和扩展市场，资产阶级采用了令人不齿的殖民手段，在将东方社会大量的财宝据为己有的同时，也将东方社会的人民推进到了水深火热之中。“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②这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仅将本国的劳动人民推到了不幸的境地，而且也将东方社会的劳动人民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的苦难之中，殖民史展示出了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的图画。可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这样，就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内在的社会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过程中，资产阶级还造成了严重的人的全面的异化，从而走向了人文主义的反面。例如，就拿生产资料的节约来看，就是这样。生产资料的节约，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约化的性质；但是，由于它是与工人无关的，因此，就成为一个异化的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一种方法。“这种看法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事实的外观是和它相符的，因为当资本关系使工人处于和他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相外化和相异化的状况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把内在联系隐藏在这种状况中了。”^④具体来讲，一是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生产资料，只代表资本家的货币，并且只和资本家有关，而与工人是无关的。二是只要这些生产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01、822、82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100 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时是劳动剥削的手段，这些剥削手段的相对贵或贱也是同工人无关的。三是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的目的的结合，看成是一种和自己相异化的权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造成或不造成浪费，都是与工人无关的。最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将工人推向了非人的境地，“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① 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成为了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被推向了全面的异化的悲惨境地。同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种异化也被推向了殖民地的东方社会。总之，在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那里，所谓的人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的人道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人道主义成为了一种极其不人道的东西。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 东方社会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就不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进行，就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了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② 这样，东方社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4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43 页。

式实现现代化，就会将人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就会使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就会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就会阻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出于对人的价值和命运尤其是东方社会人民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注，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注这一主题，力求从“物的尺度”（生产力标准）和“人的尺度”（价值标准）相统一的高度对社会历史进行评价，马克思首先考虑的是东方社会怎么样“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的问题。^① 然后才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实现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是围绕着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来的，为了使劳动人民避免资本主义的“苦难”、“灾难”和“波折”就成为了这一设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而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将这两个尺度统一起来。“‘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② 这种回复不是对不发达的生产力的回复，而是对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回复，当然，这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回复。

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它的社会改革步伐就会越来越快，当现代性深入到大多数国民性格中去时，现代的态度、舆论、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巨大的内在推动力，这对于国家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40、769页。

发展的任何计划的全面成功，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① 其实，人的现代化问题、文化现代化的问题、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隶属于“两个必然性”的统一历史整体进程中的问题了。由于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前面已经做过探讨，因此，我们这里将人的现代化问题就简化为一个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三 东方社会确立科学人文主义的对策的选择

确立人文主义思想的科学地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入手来进行这一工作，没有社会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等一系列条件的支持和保障人文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思想文化说教，就不能成为现代化的航标。这样，确立人文主义的科学地位就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其实就是要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这就是说 只有在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发展的要求的过程中 才能真正确立人文主义在东方社会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关键是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在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该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丰富物质财富，在消除贫困和失业的过程中，逐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这应该是人文主义关注的首要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的条件。人的发展无疑是以人的生命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而人首先是一个感性存在物，具有吃喝住穿等一系列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81 页。

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假如这些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的发展问题就无从谈起，“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穿住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①。而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在于，人不可能在自身中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孤立的生命的存在不仅会永远处于匮乏状态中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自然界所固有的性质、属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但是，自然界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会自动地去满足人的需要；而只有生产力才在人的需要和自然界的性质（属性）之间架起了桥梁，因为生产力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在实现人的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首先从生产出发，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创造物质条件，从而为实现人的发展奠定现实的基础。这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②

其实，生产力不仅是满足人的生存性需要的基本方式，而且对于人的发展具有多重性的价值。生产力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③。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第 36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0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331 页。

样，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生产力和人的发展是相互生成的，它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在于：一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构成了人的生理发展的基础。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改变外界的自然物，同时也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因为劳动力首先是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构成了人的体质新进化的新动力。二是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的源泉。人在生产的过程中是身心并用的，因此在生产的过程中，人会炼出新的品质，形成新的语言，产生新的观念；这些就构成了人的精神新进化的新动力。三是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人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而生产力只能是人的活动，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发展。总之，“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①。这样看来，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不可能有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

将人的发展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的科学特色。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没有注意人的发展背后的物质动力，不能从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的高度来入手认识人的发展，从而使其人文主义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劳动人民的需要，成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来规定和看待人的发展的，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它始终不渝关注的头等大事。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又总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角度来看待生产力的发展的，将人的发展看为一个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要求突破私有制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 第 318 页。

人的发展的限制。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就内在地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文主义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①。于是，人文主义就获得了客观的实际内容，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和发展的一面旗帜

将人文主义关注的首要问题定位在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上，也就是要将反贫困作为弘扬人文主义的当务之急，因为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的发展的严重的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再加上社会不公正的加剧，贫困一直是威胁东方社会人民群众日常生存的重大问题，甚至出现了普遍的贫穷的问题。例如，马克思晚年在“菲尔笔记”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当时的孟加拉农民租用住宅周围的小块土地进行耕种，农具是简单的木制犁，很少有耕牛（尽管购买两条耕牛只要 20 卢比）农民的房屋通常是用泥土、草席和竹子建造的，很少有砖房，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具也不过是一些为数不多的陶制盆盆罐罐，可见，“村民的家产加在一起也是如此的微薄，甚至为这些东西还往往欠了马赫金的债”^②；马赫金 = 商人、放债者，这种人在村里的职业就是把钱和粮食借给农民以收成作抵押”^③；孟加拉印度最富庶的地区！绝大多数居民即居民主体的极端贫穷的状况，英国人是不怎么真正了解的”^④。在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体系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贫困已经成为极其严重地阻碍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发展和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15 页

②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73 页。

的重大问题。据世界银行测算，全世界大约有 10.7 亿人得不到必要的营养，也就是说，全球每 5 个人中就有 1 个处在饥饿的包围之中。以至于在全球性的范围内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矛盾局面。例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 倍，而贫困人口增加了 1 个多亿，拉美的贫困人口在 1970 年代为 1.36 亿，80 年代 1.83 亿，90 年代 2 亿。这样，贫困人口由占总人口的 41% 上升到了 46%，而社会总收入的 50% 已经由总人口 10% 的富人占有集中到由 5% 的富人占有，社会不公正问题显得极其严重。在非洲、南亚等不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而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寿命只有 50 岁，而日本已经接近 80 岁。南亚地区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超过了 170‰，而瑞典则低于 10‰。第三世界国家总共有 1.1 亿以上的儿童没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而在发达国家不实行普及教育被看做是无法接受的。其实，这就是南北差距的进一步的体现，是发展过程中“马太效应”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反贫困已经成为全球性关注的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使过去的东方社会、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困扰呢？在发展社会学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到底什么是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呢？基本需求战略不主张把重点放在经济的日益增长上，因为这种增长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来衡量的，它把社会的千百万不幸者抛进绝望的深渊。基本需求战略主张做两件事情：(1) 通过对陷入绝境的人不断进行援助，以求尽快消除绝对贫困的现象；(2) 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如吃、穿、住、烧，也有人提出还要满足某些社会需求，如教育、人权以及通过就业与政府活动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所谓“参与”。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希望社会公正和人人康乐，这种公正与康乐是以社会物质资源在全民中更加平等地分配为基础的；社会的一切

财富和资源，包括公共产品（政府兴办的服务设施如医院和学校）以及工农业投入的资本 都应平等地分配。对农村地区来说 这一战略强调实行土地改革 使耕者有其田 并且向农户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① 显然，按照这种战略是根本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的。尽管它注意到了人民大众的基本需要、突出了社会的公正性 但是 它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予充分的注意 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首先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首先是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一种社会结果。只有在将发展和公正结合起来的同时突出生产力的作用，才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可能。

在我们看来 反贫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因素外 发展和公正两个基本的因素 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国际社会反贫困的实践表明 对两个方面都履行了的国家 取得的进展最大。通过促进劳动力用于生产性的活动 这些国家为穷人提供了谋生机会 对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投资 使穷人有能力去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机会”^② 但是 公正必须建立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而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没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所谓的公正的分配只能是对贫困的“公平”的分配，使大家都处于贫困的境地。这在于 公正性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消费和分配的问题上 而在社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6页。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问题·社会发展指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版 第3页。

会生产中 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其中，生产的环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晚年就批评过那种将消费和分配看成是不依赖于生产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 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①实际上 在一定的程度上 贫困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而造成的就业的不足造成的，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想方设法地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贫困者能够在充分就业的过程中通过劳动来自救。

这样，是否将发展生产力放在人的发展的基础位置，是否对人民群众的贫困和失业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是否注重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来摆脱贫困并满足人的物质性的需要，就成为科学的人文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入道主义）和抽象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根本分野。因此，东方社会不仅应该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且应该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将发展生产力摆在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

第二，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和大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统一起来，以便实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 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奠定另一种物质基础。这应该是人文主义关注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

人自身的生产是影响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另一种重大的物质性、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指人的生命的生产或人类的生殖、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06 页。

繁衍。人自身的生产的思想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以人类学的史实提供的，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哲学的方式明确概括出来的。马克思晚年通过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人自身的生产的思想，为我们认识和推进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人要生存和发展，物质生产要实现，就必须进行经常性的人自身的生产。这种生产的基本机制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性本能是人自身的生产的人类学基础和内在的驱动力，这两种本能不仅使这种生产成为必要，而且是它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但是，人自身的生产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生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者说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另一种基本的物质力量。这在于，人自身的生产的进行和发展，要依赖于社会提供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同时，发展这种生产的要求，又推动着人们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时对社会的生产也具有重大的影响），改变着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和方式“，这样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而人自身的生产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生产过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人类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样，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素质两个方面），就成为一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0 页。

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人自身的生产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这里的质是指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能力、思维活动能力、评价活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所谓的量就是指一定时期的人口的数量的增长及其模式。这两个方面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物质生产力发展低下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史前社会中就是这样；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国力的强弱，综合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可见“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①其实从“世界历史”的现实状况来看这种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今天在“世界体系”中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它们对人自身的生产的要求也是不尽相同的；而人自身生产的状况的差异，又决定着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一般来讲适度的人口规模、高度的人口素质是实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要求。这样如何使人口规模适度、如何提高人口素质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主义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

但是，人口数量膨胀、人口质量较低一直是困扰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的重大的问题。在自然经济的状况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692页。

水平的低下相适应，多子多福不仅成了东方社会传统的人口生育模式，而且成了东方社会的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生育模式和价值观念可能有助于当时的人的生存和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因为相对充裕的劳动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弥补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不足从而为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低度发展的生产力是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的，这样，过多的人口可能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 50 年代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他们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在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①。人口问题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就在于“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②。从人口素质尤其是精神文化素质方面来看，作为东方社会成员的一种普遍心态、社会的心理和文化结构的精神低下、缺乏历史创造性等问题，同时也是东方社会的国民素质低下的一种写照，成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惰性的力量。这样，在东方社会就形成了一种人口数量膨胀和人口质量低下并存的局面。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东方社会陷入贫困和落后境地的重要原因。

今天，这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关键的问题是在人口膨胀的同时，造成了人口素质的更为低下，从而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在，人口爆炸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公元初期，世界各地仅散居着 2 亿—3 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 第 26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 第 104 页。

人而 1999 年 全球人口就达到了 60 亿 其中 人口压力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1.7%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不到 1% (其中美国为 0.7% ,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则为 2% 左右。从 1960 年以来, 发展中国家新增加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例如, 在 1965—1970 年间, 全非洲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2.63% 而到了 1985—1990 年间, 这一比率就达到了 3% 在高增长率的带动下 使非洲的人口迅速膨胀 到 21 世纪初 非洲的人口可能会达到 8.5 亿人。而与此同时, 非洲的经济增长却在日益下滑。由于人口的规模存在着一个极限, 要受到一系列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制约 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 ‘一定地区的人口数量 要受该地区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的限制。’^① 这样 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一是人口的膨胀严重地影响了其经济的增长, 从而对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构成了限制。衡量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 不能只单纯地考察经济总量, 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考虑人均占有的情况。而过多的人口可以抵消经济增长 有时甚至会使经济出现负增长 会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例如 据世界银行《1988/99 年世界发展报告》 高收入国家人均 GNP 为 25700 美元 而低收入国家只是 350 美元 高收入国家人均私人消费增长率为 2.4% 而低收入国家为 0.9% 。二是人口膨胀还成为许多国家政府频繁更替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其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据人口危机委员会的报告 在所研究的 120 个国家中 由于人口因素引起的社会动荡的国家就有 101 个。另外 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中高增长率造成了人口的低龄化 有 60% 的人口在 20 岁以下 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413 页。

50%的人口在 15 岁以下，而人口的低龄化就意味着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处在情绪高涨的状态中，而这可能会成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三是人口膨胀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压力，从而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本来就很低，环境又十分恶劣。现在，由于受到人口膨胀的冲击，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吃饭问题，不得不采用粗放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四是人口膨胀加重了社会负担，影响到了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国民经济中新增长的部分被新增长的人口抵消，而社会又无力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的科教事业受到严重的影响，最终导致人口的素质在不断地下滑。例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在 1989 年的调查，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该年的小学的入学率是 71%，中学为 20%，大学为 2.4%；而 15 岁以上的成人的文盲率就高达 50%，而高成人文盲率就意味着低劳动力素质。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应该采取计划生育和提高素质双管齐下的方式，将人自身的生产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建设。目前，应该着力抓好以下问题：一是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实现人口的适度增长。人口增长的规模是要受到生态、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的，一旦人口的规模超出了这个限制，那么就会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就会加剧社会的各种负担，这样就必须对人的生育行为进行自觉自愿的调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应该采取这样的对策。这在于“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

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①。可见，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对策，应由其特殊的国情和固有的国力来决定，这不仅没有对所谓的“人权”造成了侵害，反倒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人权的一项可行的措施。要把人口的增长同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将人口的规模限制在社会经济许可的范围内，以保障人口的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从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人口过剩同普遍贫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正相关的态势。在经济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将高度增长的人口本身看成是一种有力抵制贫穷的手段，“在社会经济条件未改善之前，第三世界贫穷的父母显然把子女当成一种财富。孩子可以帮助父母干农活；如果父母无耕地，孩子可到城市里找工作，挣钱补贴家用。在无退休金制度和无社会保障的国家，儿女是老年父母的支柱。此外，家庭多生孩子也是对婴幼儿死亡率高的一种补偿”总之，“在无保障与贫困的情况下，大家庭乃是一种明智的而非愚蠢的选择”^②。而事实上，却出现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这样，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将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统一起来考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在摆脱贫困的同时，第三世界才可能使人口的增长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三是应该大力普及、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以便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高人口增长率同低人口素质也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态势，或者说，人口增长同人口素质是呈负相关态势的。一般来讲，高人口增长率存在于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当中，而科技文化素质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5—106页。

②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69页。

高的人群则保持着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在那些贫穷的地区 由于人们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而大众传媒等基础设施又十分落后 这样 在人们缺乏必要的关于人口生育以及有关的科技文化知识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认识到人口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即使有一些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由于没有掌握必要的技术措施,而社会也无力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援助。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有效地推进适合国情的人口政策 就必须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尤其是应该提高育龄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 就将大力发展科技文化事业、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是应该进一步突出教育的作用 这在于“,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①。四是加大社会改革的力度 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为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其实,高人口增长率、低人口素质是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社会制度的缺陷和不完善 反映了国际社会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 这样 就必须将人口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处理。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 在充分体现社会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保障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 在国际上摆脱依附的过程中 为国内的公正的发展提供一种适宜的外部环境。此外,应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放在“两个必然性”的历史过程中来解决 这在于“,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 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 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 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 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 而且

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

从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实现人自身生产的良性发展，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统一起来，以保障人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力，这是将科学的人文主义应用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东方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人自身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来侈谈人道主义。

第三，在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大力促进社会的变革，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 为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这是在确立科学的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关注的最终问题。

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保证和实现人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在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正是在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去参加社会活动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而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又总是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样，人们就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发展。脱离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单纯“鲁宾逊式”的人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晚年在批评瓦格纳时指出的那样：“‘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 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 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 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

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人性质。^①这就是说，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成为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将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进行，生产劳动才能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才能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一旦产生又总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总是人的一种自由而自觉的活动，维持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就成为生产劳动持续不断发展的动力和目标。这样“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 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②在这种情况下，在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就成为了人的发展的一种标尺。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就决定了人的发展也只能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这里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指，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的，尤其是受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制约的。问题的关键是把人的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还是将单纯的财富积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异化劳动的普遍存在，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从而限制了人的发展。工人之所以成为了“单面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质，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04—4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第 102 页。

不是为了工人的生存，更不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而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这样看来，“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①。当然，史前社会将人作为生产的目标，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造成的，是保证社会生产力得以顺利进行的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但是，我们不能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来实现人的发展。否则，就会在所谓的人道性的幌子下，使人的发展丧失了自己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就成为了一种逆历史潮流的“浪漫主义”。同样，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还是应该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波折和不幸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复活史前社会固有的那些人道性的价值目标。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

爱的复活 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① 这里的“更高级”就是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样，我们就与老子和卢梭划清了界限。可见，只有在将人的发展重新确立为生产力发展的目的的时候，劳动异化才能被彻底消除，社会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

人的发展同时还是一个人的自由而自觉的选择过程，这就是要在实现“两个必然性”的过程中，自觉地去消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使人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还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而只有在同时对社会关系进行彻底变革的条件下，在使人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社会发展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那时人的发展才是真正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成为了一个以人为目的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内在的组成部分。而这这就要求要进行社会革命，把人的发展放在“两个必然性”的实现过程中来实现。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剥削制度是人的发展的重大的障碍，只有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才能为人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晚年在批判梅恩的唯心史观的国家观时指出的：“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398 页。

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部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①。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在重新确立公有制，也就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过程中，人的发展最终就成为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具有自己的人道主义目标，这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晚年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庄重地表明：“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②。因此，没有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实现，就不可能有人的发展。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最终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来实现。

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高度来看待人的发展，把人的发展放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来认识，要求消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就成为科学人文主义的一个本质性的规定。东方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应该将之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总之，从表面上来看，确立人文主义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在实质上，这又是一个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全面、充分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确立科学人文主义的过程，既是一个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更是一个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的发展的过程，应该将人文主义定位在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来，应该将三者统一起来。这就是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6—6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们所理解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三、东方社会确立理性主义的抉择

尽管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潮流的理性主义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一同发展起来的，但是，理性却是人类固有的东西，尤其是理性主义是作为与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相对立的东西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的主体性的一种确证，是人类在精神文化上获得解放的一种标志。因而，它是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推动力。因此，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将合理化作为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一）理性主义的含义和要求

所谓将合理化作为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要确立理性主义的科学地位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全面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那么，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理性主义呢？

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和文化特征。它是指人类的思想行为自觉地符合逻辑规则和经验知识，在这种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一切目的都是前后一致和彼此相契的，并且能够运用最适合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人不仅有理性因素，还有欲望、情感、直觉、灵感、意志、顿悟等非理性的因素。尽管如此，人决不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混合物。就其主导性的方面来看，人没有把非理性的因素变成独立的、不受理性约束的本能活动而是在理性的支配和约束下去合理地实现非理性的东西；“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最终目的，那么，

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①。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此。这样，人类的实践不仅使理性和非理性统一了起来，而且使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可能。正是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的这种自由而自觉活动的反思，通过对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才形成了逻辑规则、经验知识等程式化和固定化的普遍性的反映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在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避免失误、增强行为的预期性就成为了可能。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②。可见，在实质上，理性其实就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人看做是理性存在物。

理性主义是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而出现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的。在与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相斗争的过程中，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们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理性和理性的价值。这种肯定理性、赞美理性，把理性作为反对封建主义、蒙昧主义武器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就是理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主义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反对封建主义、蒙昧主义的过程中，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帮助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并借助于科学宣扬了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在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定的意义上，这种社会思想文化思潮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来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当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了这种理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将实践和规律引入到了对理性的理解中。在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那里，理性编好了剧本，而人仅仅是演员。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客观规律是内在于人的活动尤其是实践过程中的，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目的的规律，人类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活动的成败取决于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情况，这样，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一身兼具编剧和演员的双重角色。而韦伯将合理性的概念广泛地运用在了现代化的问题上，用来解释现代化的文化成因，从社会学的特定的层次上推进了理性主义及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理解。韦伯将人的行动划分为目的理性型（在行动中正确选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价值理性型（行动是符合自觉的价值标准的）、感情型和传统型四种类型，认为后两种是偏离理性行动的。韦伯对合理性概念的运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这一概念的通常的组成要素（如运用逻辑、调整手段以适应目的，对价值观念的自觉遵从）纳入到这一概念中；二是认为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是合理性的，而不用考虑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此外，韦伯还将这一概念运用在社会的制度化方面，并且将它与以相信个人的特殊品质为基础的权威相对比，认为对社会生活严格控制、在经济生活中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19 页。

打细算、在生产活动中运用科学方法都是合理性的表现。上述的合理性都是形式上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它们与实质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或对人类需求的满足是发生冲突的。前者是资本主义特征,后者属于前资本主义文明。这样,韦伯就将资本主义看做是合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区分出了理性资本主义的方面。当然,韦伯只是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待理性问题的。总之,尽管理性主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相同的精神。这就是: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勇于批判、探索和创新;尊重知识,追求真理;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崇尚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和蒙昧;对社会和人生抱有现实主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态度等等。一般来讲,经济生活中的伦理精神、政治生活中的平等精神(狭义)文化生活中的科学精神都是理性主义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可见,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理性(合理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体现,就是提出了合理化的要求。这就是:一是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应该将伦理原则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抛弃欺诈、巧取豪夺、投机等非理性的短期行为,通过合理的途径和精打细算来追求最大的效率,将合理的价值增殖作为最高的目的。这就是韦伯所讲的宗教世俗化的过程,即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动力的新教伦理。我们将之称为经济伦理或理性经济。二是在政治生活领域,应该促使政教分离,从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过渡,必须在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律的正当要求的基础上行使权威的作用。同时,科层制、专业化、议会民主等应合理化为现代的政治模式。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我们将之称为平等精神。三是在文化生活领域,应该用理性克制、统率人的欲望和情感,按照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工作和思考,同时,应该大力倡导和实行实事求是、大胆创新的精神。这样,就可以使思想明确

化、系统化和完整化。我们将之称为科学精神。由此来看，合理化就是指一切按照理性方式进行的思维和活动，这是一种从文化结构波及到整个社会结构的过程。

尽管理性和理性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崛起而崛起的，它们反过来又成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动力。但是，理性和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独有的东西，在任何一种社会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要有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导引和支持。很难设想一个没有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社会和国家能够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中，同时也难以设想理性和理性主义会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而衰退。总之，在一般的意义上，理性和理性主义是与现代化共生的现象，二者是相辅相成、协同进化的。

（二）东方社会确立理性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缺乏理性和理性主义，但是却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起理性的权威地位，也没有形成系统的、世俗的、理论化的理性主义。这样，东方社会的文化结构就内在地具有一种对现代化的抗拒力。因此，为了推进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东方社会必须要真正确立起理性主义。

在东方社会中，并不缺乏作为理性主义精神因素的致富、平等和理智等因素，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但是，随着村社结构从史前社会向农业公社的过渡，这些精神就逐渐被消解了，只是以残存的形态存在着，并影响着社会生活。马克思晚年就指出，随着动产的出现，就破坏了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其他有害要素的影响不说，仅仅是个别家庭手中的动产，例如他们的牲畜，有时甚至是奴隶或农奴这样的财富的逐步增长，这种私人积累，从长远来看足以破坏原始的经济

平等和社会平等，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公共的耕地财产，最后扩展到森林、牧场和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公共财产”^①。而在事实上，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总体上是缺乏甚至是抵制理性主义的。东西方之间社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理性主义在东西方具有不同的命运，从而致使东西方的社会发展的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一个进入了现代社会，一个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具体来看：

第一，在经济结构上，东方社会特有的小农经济妨碍了像西方那样的新教伦理的产生。在东方社会，小农经济是占主导性地位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自己的特征的，缺乏效益最大化和扩大再生产的观念，这样，在这种经济的土壤中，就不可能产生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伦理精神。例如，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都是由军事要塞和王侯住地发展而来的，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但是，西方的城市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目的是为了交换，这样，它就成为了享有政治自主权的市民自治城市；而中国的城市没有突破血缘联系，商业和手工业是作为满足王公贵族骄奢淫逸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因此，在东方社会就没有产生市民社会。再如，在东方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精打细算、辛勤劳作的现象，但是，东方社会的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心态，商业欺诈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也往往容易知足，对发财致富缺乏不竭的追求的动力。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将“富民”作为了治国的一项基本的主张，但是，它只是把物质福利作为终极的目的，同时，“在儒教及其像基督教一样根深蒂固的伦理与市民的生活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71页。

之间 缺乏一个中间环节。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最最重要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 尽管殖民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带入到东方社会中来了 但是由于没有在实质上触及整个东方社会的传统的社会结构 因而在东方社会不仅仍然缺乏像新教伦理那样的经济伦理 甚至缺乏必要的市场需求 在殖民主义的过程中“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 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②。总之，尽管理性主义推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但是它本身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的产物 而在东方社会就缺乏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产生作为推进现代化动力的经济伦理精神

第二 从政治结构上来看 东方社会特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体制妨碍了像西方那样的平等精神的产生。在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在东方社会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 这样 在东方社会 专制主义不仅扼杀了政治上的平等精神的产生，而且使得东方社会的城市成为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中心 而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真正成为经济上的中心。由此 专制制度就成为了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结构“，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 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 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 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 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

[德] 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6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57 页。

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① 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制度就决定了官员的培养和任用，根本不可能采用像西方那样的专业化和科层制的方式，世系门第决定了一切，于是，世系门第就成为这种制度运行的重要机制。这样，蒙昧主义就成为了专制主义的帮凶。例如，中国的科举制就是这样，“以古老的中国方式教育出来的中国高级官吏，会毫不迟疑地虔诚地崇拜任何一种乏味的奇迹”^②；居于领导地位的分子阶层——官吏与候补官员——把维护巫术的传统，尤其是维护泛灵论的对祖先的孝敬，看做一种绝对的要求，目的在于彻底维护官僚体制的权威，压制所有由救赎宗教所引起的社会动荡’^②。这些情况的结合，在东方社会就出现了有实质法 伦理法 而无形式法 工具法 的状态 从而限制了法制化的历史进程，最后就导致了权大于法、人治高于法治的局面。

第三，从文化结构来看，东方社会特有的蒙昧主义和伦理文化限制了像西方社会那样的科学精神的产生。与小农经济、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适应，东方社会的统治者大力倡导愚民政策，结果导致了蒙昧主义的盛行，使蒙昧主义成为东方社会的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方社会，在蒙昧主义的控制下，人们不仅臣服于外界的社会力量，成为了专制主义的奴隶；而且屈从于外界的自然力量，成为了盲目必然性的奴隶；这样，人的主体性就根本不能得到弘扬。东方社会“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6 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59 页。

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①。同时，由于血缘宗法制的关系，作为人伦孝道的祖先崇拜在东方社会也很盛行。这种泛灵论的流行进一步成为了维护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顽固的力量。当然，不是说理性主义在东方社会荡然无存。事实上，在东方社会也存在着理性主义，不过这种理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它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这种实践理性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伦理化的知识在东方社会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这种实践理性主义的支配下，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 没有理性的技艺训练 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而这种伦理，只有在顾及到氏族内部的传统势力时，以及在对鬼神的信仰中，才会受到限制。”^② 这样，在东方社会，人们在对外界物的探求过程中就放弃了实验和逻辑，而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于是，就使曾经在科技上一度领先于世界的东方社会，在近代大大落伍了，造成了科技知识的贫乏和科学精神的匮乏。与此相应，东方社会的宗教也是不同于基督教的，缺乏世俗化的进程，甚至是社会革命也带有宗教的色彩，例如，太平天国就是这样，“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③ 甚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富有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参加表 7—1）没有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反倒成为了现代化的阻力。

其实，把问题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东方社会的人们的能力和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66 页。

② [德] 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7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 第 545 页

质，东方社会的国民的惰性导致了理性的缺乏和理性主义的流产。

“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①。这样，能否确立、如何确立理性主义的问题，就又回到了人的发展或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上了。这就是说，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确立过程，和现代人的形成是统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不能脱离人的现代化来确立理性主义。

表 7—1 儒教与新教伦理的比较

儒教	新教伦理
信仰非人化的宇宙秩序；容忍巫术	信仰超现世的上帝；拒斥巫术
适应现世以维护天人合一；追求维护秩序的理想	恪尽职守地履行上帝赋予的“使命”而控制现世；追求进步性变革的理想
为了维护面子、身份以及自我完善而警觉地自我克制	为了遏止人邪恶的本性，遵从上帝的意志而警觉地自我控制
没有弘扬与不可违反的传统相对的宗教；相信如果人按照礼乐行事，就可以避免神灵的惩罚	认定传统和现状是不完善的；人不可能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完善
人伦孝道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原则和基础	使一切人性关系服从于上帝
血缘亲属关系是商务、民事、法律和政治管理的基础	理性发展和契约是商务、民事、法律和政治管理的基础
不相信家庭和家族之外的任何人	只要拥有共同的信仰，信任一切人
财产是地位、身份和自我完善的基础	财产是诱惑物，是有德行的人的生活的无意的附属物

（根据韦伯《儒教与道教》第 256—278 页编制）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15 页。

（三）东方社会确立理性主义的对策的选择

根据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经验和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为了有效地推进包括文化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确立理性主义作为东方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方向。而理性主义的确立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从确立理性主义的经济、理性主义的政治和理性主义的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入手来弘扬理性主义，一句话，应该使社会发展的主体成为“理性人”。确立和弘扬理性主义，同样是人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第一，在东方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确立理性主义的应有位置，大力弘扬经济伦理精神，从而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一种持续、强大的文化上的推动力。

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仅仅是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角度是难以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应该确保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按照理性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必须软硬件并重，既要为现代化提供必要而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又要为现代化提供准确而合理的价值导向。经济现代化的软件建设就是要确立理性主义在经济结构中的应有的位置，使整个经济结构按照理性的方式进行运行。在经济结构中确立理性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要倡导经济伦理，即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文化上的推动力。所谓的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结构中形成的需求的最大化（公平）和效益的最优化（效益）的统一。是将经济效益包容在人的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伦理就是理性经济。这里的“经济理性”和“理性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理性关心的是利润的最大化问题，即如何以尽量少的投入获得尽量多的产出，它是按照单纯的经济效益

法则运行的。这在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中都是存在的。而理性经济不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追求在最大的程度上来满足人的需求。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按照经济效益法则运行的，而且更为遵循价值效益法则，力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和谐与协调。在一定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运行的，但是，它没有将三个效益很好地统一起来。

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应该大力发展理性经济、弘扬经济伦理，是由东方社会固有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冲突决定的。作为现代化的文化推动力的经济伦理在东方社会的基础极为薄弱，无论是印度的贪婪还是中国的节俭，都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因为它们没有成为现代化的利益驱动机制，没有促进东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在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投机、欺诈、蒙骗和盘剥等现象，则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它们只能导致经济的混乱。这些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不仅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力，反而会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障碍。今天，这种非理性的经济已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例如，盲目追求经济项目规模的大型工程，造成了外债的膨胀，不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的紧张，而且成了引发金融风暴的导火索；而其他的短期经济行为，更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的失调和混乱。例如，巴西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大量的举债来建设大型的经济项目的，希望以此来迅速地实现现代化其中巴西水火电项目的规模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为此，在 1974—1984 年间，巴西花掉了 480 亿美元，大约为其全国公共投资的 40% 和国家全部投资的 10%；由此，国营巴西电力公司受到了严重的财政崩溃的威胁。在巴西电力公司的保护下经营的公共企业集团到 1985 年所欠的外债大约为 200 亿美元 相当于巴西外债的 1/5。巴西电力公司集团

支付的外债利息到 1985 年相当于其投资总额的 2 倍 而 1975 年外债利息仅仅为其投资的 20% 由于无力偿还债务和利息 巴西电力公司在 1987 年就损失了 30 亿美元。这样, 就要求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要建构起经济伦理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而经济伦理的构建应该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在马克思看来 经济运行是一个包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在内的整体性的过程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① 只有在这四个环节的协调过程中, 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才是可能的。这样, 确立理性主义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也就是要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者都合理化 按照理性的方式运行。或者说, 经济伦理是包括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在内的一个整体 要求人们要确立勤劳致富的生产观、诚信无欺的交换观、共同富裕的分配观和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具体来看:

一是要确立勤劳致富的生产观。生产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基础 决定着一定社会中的分配、交换和消费 社会的生产是怎么样 的 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就是怎么样的。只有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基础上 才可能为公正而合理的分配、交换和消费提供可能。因而, 在要求经济合理化的过程中, 应该首先从生产的合理化着眼。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 在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点。而生产的合理化就是要使人们正当的要求成为生产发展的推动力 通过将欲望合理化的环节 使生产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05 页。

身成为体现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的一种自由而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应该将人的发展作为生产的目的是，通过生产来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不能将欲望本身作为生产的目的是。在东方社会，尽管也存在着发财致富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没有合理化，只是单纯的欲望的一种实现形式。例如，马克思晚年在“菲尔笔记”中就指出，东方社会的神职人员进行的经营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没有形成像新教那样的宗教伦理。这一切正如韦伯指出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①这样 就要求人们应该使自己的行为动机合理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更不能为了满足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的穷奢极欲而追求盲目的现代化，而应该将满足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的需要作为生产的目的是。这其实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给现代化准确定位。而在现实中，这正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陷入绝境的根本原因，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不是为了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甚至是直接脱离人民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在给现代化准确定位的情况下，必须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这一目的，也就是说，应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发财致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政府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和法律规范的方式来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勤劳致富的生产观应该成为经济伦理的首要的规定性和要求。

[德]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8 页。

二是要确立诚信无欺的交换观。交换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可以起到互通有无、调余补缺的作用,这就突现了商业和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而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因为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①也就是说,从纯粹的学理性的角度来看,交换本身应该是合理的,或者说合理性的要求在交换的环节上最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自然经济的特别强大和商品经济的极度不发达,在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按照这种诚信无欺的方式进行交换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的是大量的欺诈性和短期性的行为,例如制假、贩假和卖假就是这些国家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甚至积淀成为国民的一种心态。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且成为了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顽疾。这样,就必须确立诚信无欺的交换观。这就是要做到不遗余力地去打假,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对不正当的竞争,杜绝价格垄断和价格竞争,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经营。这样,诚信无欺的交换观就成为了经济伦理的第二个规定性和要求。

三是要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观。分配是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的环节,而不公正的分配已经成了制约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的障碍。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财富和贫穷在两极的积累,加剧了马太效应,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更为举步维艰。例如,马克思晚年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就指出,随着动产私有化的出现,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04页。

印度公社的解体的过程中，导致了社会生活中不平等现象的出现；而英国殖民当局实行的马德拉斯制度，使高利贷大为盛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进程；这样，公社的发展就处于水深火热的过程中。而在今天，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观，而且更为严重。例如，在非洲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好处被少数富人攫取、而广大的贫困阶层根本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的后果。在坦桑尼亚，社会中的最低收入的 20% 人口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是 2.4% 而最高收入的 10% 人口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竟然达到了 46.5% ；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这一比例。这样，为了保证分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合理地调整现有的分配关系，尽量缩小分配上的差距，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充分保障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能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同时，又不能仅仅在分配的环节上做文章，而应该着眼于从社会制度上来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这在于，不公正分配的根源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分配制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且更在于这些国家的整个社会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病。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 这样，就要求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将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作为实现公正而合理的分配的制度上的保障。首先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调整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然后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这正像马克思晚年所预言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

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① 这样，共同富裕的分配观就成为了经济伦理的第三个规定性和要求。

四是要确立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尽管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但消费也直接是生产，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②。这样，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具有重大的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应该使消费和生产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关系。一方面，消费不能滞后于生产的发展，否则，光有积累而无新的需要，就会引发生产的萎缩甚至是停滞，最终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费也不能超前于生产的发展，否则会导致坐吃山空的现象的发生，最终会引发经济的坍塌，限制甚至是阻碍人的发展。而这两种情况在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勤俭节约是东方社会的传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这当然体现了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优秀美德，也保证了社会机体在低度发展的生产力条件下的正常运行，但是，这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也严重地制约了其社会发展的水平，因为生产的发展丧失了必要的刺激和动力。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考察中国的贸易时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5—30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9 页。

性，认为缺乏需要和对传统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偏爱 是东方社会的一个特点，“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①而随着“世界历史”历史进程的发展，一些国家在经济还没有发展上去的情况下，就简单地仿效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进行攀比性的“高消费”，豪华奢侈比富斗阔等等“要面子”的消费不仅超越了这些国家的国情，而且成为了败坏社会风气、导致消极腐败的重要的根源，因为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上去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才可以进行高消费。同时，一些国家的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就是由于这种高消费的方式造成的。这样，适度消费本身就成为理性经济的一个内在的要求。这样，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应该做到：通过大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这样，国家就必须学会管理经济，保障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确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积极拉大内需；要加大消费体制的改革，把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并运用到消费领域中来。总之，适度消费的消费观是经济伦理的第四个规定性和要求

可见 每一个人都需要经济伦理 对理性经济的追求主宰着人们的一切行动，最终也会主宰着社会发展的命运。因而，没有理性的经济，就不会有经济的合理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大经济伦理的建设。当然，在经济伦理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从经济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次方面来入手确立理性经济的地位。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25 页。

管怎么样 经济伦理的建设过程 同样是一个人的主体性得以提升的过程 是一个实现人的发展的过程。

第二 在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该大力弘扬政治平等精神, 确保民主政治的发展, 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一种文化上的保证。

政治上的平等精神既是理性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和本质要求, 也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现代化之所以能够首先在西方社会成为了可能,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政治观念上的平等精神、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政治为现代化提供了保障。这就是 在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 洛克将这些市民革命加以了系统化和理论化, 形成了平等主义的精神思想体系。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双重的保障下, 西方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在东方社会 由于专制制度过于强大 以至于扼杀了东方社会的发展活力 这样 东方社会就不仅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中 而且处在了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境地。可见 政治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没有政治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体的现代化 而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要确立政治平等精神 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制化, 也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这里的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其实是一回事。这在于, 一是从作为阶级统治形式的民主的含义来看, 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 “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①。二是从民主的形式来看, 民主就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和参政的权利。民主从其实质来看 是一种阶级统治 但是 从其形式来看,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12页。

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①。

从平等和民主的含义和实质可以看出，弘扬平等精神、确立民主政治是同人的发展或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发展。这在于，民主政治是作为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限制甚至是扼杀人的发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专制制度是建立在维护社会上的极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②；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 哪里的人就占少数 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③。因此，在推翻专制制度的过程中，由于民主政治是要实现广大人民的当家作主，是要实现公民治理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因而，平等和民主就成为了实现人的发展或人的解放的一种必要的形式。正是在伴随着政治革命而确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人们才从传统的依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才变成了独立的人，变成了公民和法人。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和民主是衡量人的发展或人的解放的一把尺子。

从平等和民主的含义、实质和作用来看，所谓的弘扬政治平等精神、确立民主政治，也就是要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将理性主义的原则和要求贯彻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到东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来说，主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比较起来，在东方社会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政治民主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这在于，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由于经济结构和生态结构的特殊性，在东方社会的国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集

《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411页。

权的现象，以至于专制制度成为东方社会一种传统而牢固的政治结构，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政治结构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家族本位和官本位的政治价值取向将大众从政治领域中驱逐了出去，不仅彻底剥夺了广大公众参与和管理国家的权利，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知情权”都没有。这种制度扼杀了社会主体的历史创造性，是导致东方社会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世界历史”的现实情况来看，随着非殖民化历史进程的结束，一系列的亚非拉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之后，或多或少都进行了一些民主化的改革，但是，由于没有彻底根除旧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在外部势力介入的情况下，出现了军人参政的现象，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新的独裁者，这样，不仅没有使旧有的专制制度销声匿迹，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已经成为了导致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不稳定和混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推进东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必须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以便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那么，在东方社会如何实现民主化的进程呢？马克思晚年在谈到俄罗斯村社的发展前景时指出，“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①。这就是说，代议制可能成为实现民主的一种可能的方式。但是，在现实的“世界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66页。

史”进程中，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民主化的实现既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暴力的方式。一般来讲，民主化的方式大致存在着三种形式：一是“自我转变型”。这是一种通过执政者的自我改革而实现民主化的方式。二是“取而代之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对派或社会革命力量推翻现有的专制政权而实现民主化的方式。三是“合作转换型”。这是一种由政府 and 反对派合作而推行民主化的方式。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究竟采用哪一种方式来实现民主化，取决于自己国家的国情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不能超出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侈谈民主。

在科学地确定实现民主化的方式的同时，还必须要从政治改革的总体上来推进民主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过程，涉及到一系列问题，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确保大众的政治“知情权”。专制制度是一种封闭性的政治，靠政治神秘主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的政治，应该通过政治的公开性来保障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这就是说，除了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外，民主政治应该保证大众的政治“知情权”，应该通过各种途径让大众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以便能够将国家的政治意图转化为大众的行为，最终实现国家和民众的政治沟通。二是要确保大众的政治“参与权”。在专制制度中，治理和管理国家成为了社会上极小一部分人的特权；而民主政治应该确保大众的当家做主权，应该鼓励大众积极地参政和议政。这就是说，除了极个别的专门领域外，大众都有治理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三是要确保大众的政治“决策权”。专制制度是一种少数人说了算的政治，不仅剥夺了广大的民众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而且决策是根本不考虑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一种多数人说了算的政治，不仅应该在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应该将确保人民群众的整体、长远和重

大的利益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就是说，在决策科学化的过程中，还应该使决策民主化，应该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统一起来。

事实上，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或形式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还必须要将实现民主政治和转变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民主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绝没有超阶级的民主。因此，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任何一种民主都可以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关键的问题是要看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实现民主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所实行的民主，只能是剥削阶级的民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①当然，这种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与专制制度比起来，还是一种很大的历史进步。因而，民族国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对于那些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有这种民主就是远远不够的了。应该看到，只有在消灭阶级差别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起普遍的、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正如马克思晚年所说的那样：“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②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一种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第一次伟大尝试的巴黎公社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这样的典范。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有机统一体。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12、311页。

二是要肃清政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政治腐败是威胁到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和蔓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与东方社会的停滞性和腐朽性相适应，腐败是与贫穷、落后一起生长起来的，在专制制度中，官方的腐败与民众的贫穷将东方社会置于了落后的境地。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西方殖民者利用东方社会官僚的贪欲来推行自己的殖民化，结果使得东方社会的腐败问题愈来愈甚。马克思在 1858 年考察鸦片贸易的情况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腐败这种极端非理性的行为就成了东方社会的一个致命的弊端，导致了整个政权的软化。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制制度，在传统力量的左右下，腐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什么贪污、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美色交易等等社会丑恶现象都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领导者公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侵吞国家的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人民的贫穷。据英国 1996 年 10 月 14—20 日的《西非》周刊报道，有的非洲国家的元首在欧洲的不动产投资和银行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16—717 页。

户总价值达 50 亿美元，相当于其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另据有的国外学者估计，如果把非洲少数当权者在外国银行的非法所得带回国内，非洲不仅可以付清其外债，而且可以还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国内的发展。总之，统治者对权力运用的疯狂性和随意性、对个人贪欲满足的无度性和广泛性、对金钱追求的贪婪性和奢侈性等非理性的行为，已经成了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阻碍发展的顽症，将整个社会都推进到了覆亡的边缘。正如国外的一些论者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不光彩的联姻，通过这种联姻，金钱买到影响力，权势吸引金钱。另一个是经济学家古纳尔·米尔达尔所说的国家的‘软弱性’，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①

为了根除社会腐败，在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加强廉政建设。主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其一，要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建立一个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腐败现象之所以在一些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滋生蔓延，就在于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样，政府机构改革就成为制约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关键的问题有：一是应该区分清楚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将不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交给社会去办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正像市场存在着‘失效’的问题一样，政府也存在着‘失效’的现象，不能将政府看做是无所不能的。二是应该按照因事设岗的原则，确立政府机构的部门和职数，这样才能避免机构膨胀和文牍

[英] 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43 页。

主义。三是要按照专业化的要求合理划分各部门的分工范围，同时，又要注意跨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这样才能避免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其二，要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建立起一套适宜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录用、聘任、奖惩、升迁、解聘制度。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是直接由公务人员低下的素质造成的，尤其是裙带关系是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任用公务人员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式的但强大的主导性的原则，这种原则成为导致腐败的重大根源。这样，应该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按照专业化的要求配置国家公务人员队伍，国家公务人员应该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二是必须采用严格的回避制度，实行能力本位的用人原则；这样，才能避免任人唯亲现象的发生，杜绝裙带关系对公务员队伍的侵蚀。三是应该大力加强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制的建设，公务员不仅应该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也应该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法制修养水平；这样，对公务员的约束才是真正可能的。这就是要建立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三，要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和制度，同时，要加大监察的力度，将反腐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来建设。由于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实质性的制度进行行政管理的，这样，这种管理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结果使这种制度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就应注意：一是要按照形式化的原则来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使管理工作能够在这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框架中运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管理的随意性。二是应该建立和健全监督的机制，使公务员在社会和政府的双重监督中来履行自己的职能；这样，就可以防范公务员的违规行为。三是必须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反腐败工作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合理、有效地进行，不能成为动乱之源。只有这样，反腐败不仅可以保障政府的廉洁和高效的运行，同时还可以真正取

信于民。在这个问题上，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当权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任腐败滋生蔓延只能亡党亡国，而反腐败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失序和混乱。

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马克思肯定和赞扬的巴黎公社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应该成为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经验，而不能一味地仿效西方的文官制度。巴黎公社取得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的、措施。主要有：废除了旧的行政和司法的官僚政治，建立了一整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行政机构，废除反革命军队，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武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各级领导人大多数由普选产生，公职人员对选民负责，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让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方面得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宣布政教分离，取消公职人员的高薪制，领取与工人同等的工资，采取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对工厂实行民主管理，甚至把政府的重要职务委任给数千工人。因此，那些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已经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将民主政治尤其是廉政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三是要破除人治陋习，实行依法治国。尽管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法律制度，但是，这种法律制度不像西方那样是一种形式法，而是一种实质性的法律，正是这种非形式化的法律导致了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这不仅是造成政治非理性的重要根源，而且也成了腐败的保护伞。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法律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性的公正，而不是形式上的公正。它将伦理导向的实质性原则作为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将人情原则带进了法律中，这样，就使政治权力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官僚对法律的干涉在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由

于法律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实质性的法律就很难对人们的行为造成约束。这样，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关系就只能存在于家族中，最终使政治腐败成了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种顽疾。而在西方社会，法律制度是一种形式化的制度，它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形式主义，由一整套形式化的、意义明确的法律条文组成的，它只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做出惟一性的解释和判定，而将法律之外的政治、伦理、经济的实质性的公正原则和宗教礼仪、情感和巫术的因素都拒斥在了法律之外，这样，就杜绝了权大于法的现象的发生；同时，这种形式化的法律将每个诉讼人都以形式上的法人对待，并确保他们在法律形式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这种法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真正起到理性和公正的约束作用，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马克思晚年在批判那种认为先有法后有交易的观点时，就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指明了这种形式化法律的重大意义，“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而是相反”^① 这种形式化的法律就构成了一种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环境——普遍信用的环境。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因此，在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彻底根除人治的陋习，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来进行法制建设。关键的问题是要突破实质性法律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23 页。

系的束缚，真正建立起形式化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主要应该注意的问题有：一是要使法律体系完善化。法律的不完善和不配套，是影响依法治国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法律体系的完善化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这就是，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建立起自己的法律，真正使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有法可依，按照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二是要确保对法律解释的规范化。法律解释的模糊化和随意性，是影响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法律解释的规范化是理性法律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这就是，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的形式化的法律解释准则，制定适合于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法律解释准则，关键的问题是立法本身也应该具有形式化的特征。三是要使司法过程程序化。司法程序的任意性和人为性，也是影响理性法律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司法过程的程序化是理性法律对司法提出的基本要求。这就是，整个司法过程必须要有严格的程序。一切司法行为都必须按照固有的程序进行，这样，才能避免外来的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实行。四是要确保法律执行的强制化。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是干扰正常的法律程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法律执行的强制化是理性法律对执法过程提出的基本要求。这就是，杜绝权力对执法的影响和干扰，真正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五是要确保法律修订和改变的权威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新的矛盾的暴露和法制建设的深入，法律本身必须做出相应的修订和调整。法律的这种修订和调整不能按照长官的意志进行，而只能按照同样具有合理合法性的程序进行，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六是要确保法律教育的系统性和全民性。只有使广大的公众真正掌握了法律武器，才能使他们按照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或

正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发展的国家来说，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总是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工具，总是统治阶级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建立起了完善的形式化的法律体系，但是，这种法律本身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的形式化的法律，而必须注入自己的内容。

只有这样，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才能确保理性法律的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政治现代化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

由上可见，“政治现代化 首先是对王权专制的否定 但王权专制来源于父权家长制，否定这两者，才是市民社会理论即民主化理论的中心命题，而否定它的根据，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给向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社会变迁以动机的，就是平等主义的精神。而且这也是西方人最先发明的，并由西方人最先发动了这一运动，是现代化的本质要素之一。尽管今天它已为全世界的人们所共有”^①

第三，在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确保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为思想文化自身的现代化寻求一种内在的支持。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光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要有科学精神的支持，只有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科学精神的大力弘扬统一起来，现代化才是真正可能的。这在于，“从科学革命到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是西方人发明并承担现代化、产业化的本质要素之一。可以说，它得以实现的动力，

[日]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92—193 页。

就在于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可以说是靠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思考，对无止境的进步探求不止的精神^①。而东方社会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在于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人们在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的过程中，往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而对科学精神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制度，竭力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根本剥夺了劳动人民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最终使蒙昧主义成为东方社会主导性的思想意识倾向。在实用理性和蒙昧主义两种力量的影响下，在东方社会就不可能形成作为理性精神构成因素和基本要求的科学精神。这样，近代以来，曾经一度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东方社会，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而且使整个社会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的形态中。

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弘扬科学精神更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这在于，尽管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但是，种种愚昧和腐朽的思想文化仍然严重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邪教已经成为了危害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例如 据香港《东方日报》的报道 在非洲，一年中总有数以百计的人因为“教主”的身份败露，而死于非命。在 1982—1984 年之间，非洲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波及到了 35 个国家，有半数非洲人受灾，数百万人死亡，邪教便由此应厄运而生。当时非洲南部盛行一种恐怖宗教，把部族祖先和“神”混合而成神授教，经常进行一种古怪的崇拜仪式，用男人的尸体和妇女的血做成饼分给信徒；数以百计的儿童成为了 邪教举行求雨仪式的祭品 而当被选为“祭品”的儿童的家长肯献出家庭的全部财产时，

① [日]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91 页。

他们就可以免于死。该邪教组织森严，分为十多个阶层，全盛时信徒竟然达到了 600 万人。另外，非洲一些国家的部族冲突和国内战争，都与邪教组织有一定的关系。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科学精神的缺乏和贫乏，是造成邪教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原因。这样，没有作为理性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张扬，科学技术就难以对现代化产生什么影响和作用，因为科学技术只有在被人们掌握之后，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对现代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当务之急与其说是向公众普及科学，倒不如说是应该让公众理解科学。因此，弘扬科学精神也是人的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可见，愚昧和贫困一样可怕。正像贫困可以导致混乱一样，愚昧同样可以导致混乱；正像贫困不是现代化一样，愚昧同样不是现代化。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举起科学精神的大旗，大力弘扬科学精神。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所谓的科学精神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一种为大家认可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样是作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重要的体现，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从科学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其发生来看，科学精神是贯穿于整个科学过程中以及全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为科学家一致认同的一些传统、规范、指导思想、价值取向，这是维系科学共同体的正常存在、保持科学机体正常运转的精神机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科学精神就从科学共同体中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广大公众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对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可以产生重大的推

动作用。科学精神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内涵很丰富、很广泛。一般来讲，它包括实事求是的精神、理性批判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包容协作的精神和人文关照的精神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具体来看：

一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精神首先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以此来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它来不得一星半点的虚假，而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通过一番严密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达彼的过程，发现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最后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这种精神就是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要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相信自然规律是可以为人类认识和掌握的，也就是要承认真理的客观性。正如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其实，社会现象、社会科学也是这样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科学理性的集中体现，要求人们的行动必须要符合客观规律，人们的思维必须按照逻辑规则进行。而在法制社会中的集中体现就是，一切法律活动都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样，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什么超验的神灵鬼神的存在，就不应该让世界末日之类的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蛊惑人心。

二是理性批判的精神。在发现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的是批判怀疑的精神，凡事都要刨根问底，不盲从教条和权威。可以说，没有批判的精神，就不会有科技进步，没有对“地球中心论”的怀疑和批判，就不会有科学的“日心说”的诞生，没有对牛顿物理学的超越，就不会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说：“怀疑—批判”的头脑是科学家的另一个“主要的仪器”。一般来讲，科学发展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 4 个步骤：(1)科学从问

题开始，没有问题就没有科学，即从怀疑开始；(2)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各种大胆的假设——理论；(3)各种假设和理论都要经受实验、逻辑的检验，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4)新理论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突破而被证伪，从而产生新的问题。科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但是，科学的这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不是无原则的怀疑和批判，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在理性基础上的怀疑和批判。它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和旧有的合理的理论认同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精神实质上是辩证法的精神，因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我们就不应该盲从所谓的大师，就不应该相信所谓的绝对真理。

三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作为精神生产一种特定方式的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创新性。它不能重复前人、他人和自己的老成果，而必须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创造新产品，从而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如果只是一味地抄袭前人、他人，重复自己过去的成就，那么，科学的生命也就终止了。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他还认为，创造性思维的实质就在于使思维元素的心理实体“随意地”再现并结合。一部科学史也就是一部创新史，创新是科学的灵魂，没有创新也就谈不上科学，例如，没有头脑实验这样一种创造性思维，就不会有相对论。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精神其实就是理性批判精神的深化。这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

具体体现。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就不应该固步自封，认为自己就是绝对真理的体现，是法力无边的至高至善者。

四是包容协作的精神。科学技术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业，尤其是在大科学时代，个人只有在融入科学共同体中，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是在对待前人和他人的问题上，一定要有一种虚怀若谷的包容精神，要在继承前人有价值的成果、借鉴他人有意义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离开了包容的怀疑批判和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学大师牛顿曾说：“如果我见到的比笛卡尔要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而爱因斯坦认为自己的相对论受到了马赫思想的影响。二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一定要发扬协作攻关的精神。科学家之间一定要相互尊重，切不可文人相轻、学科相轻、学派相轻。提倡和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并不是要限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必要的良性的竞争，而恰好是以必要的良性的竞争为前提和补充的，只有将竞争和协作统一起来，才可能使科学技术得到有效的发展。因为竞争能够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包容协作的精神也就是科学活动过程中的谦虚的道德风范和集体主义的精神。相比之下，那些自命为发现了绝对真理、以救世主自居的小丑们，显得是那么可笑。

五是人文关照的精神。科学技术是人类获得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必要手段，它应该而且能够造福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但是，由于人类操作的失误，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像全球性问题那样的负效应；如果它落在反动派和剥削制度的手中，甚至可能会成为毁灭良知、人类和地球的罪恶手段。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科学技术上，因此，一个有作为的、有良知的科学家必须要思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要考虑由谁来掌握科技成果，科技成果是用来为谁服务的。也就是说，科学家不能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而必须同时具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使科学技术为增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应该具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力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这种精神其实就是科学技术的社会责任感的的问题。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才可能真正造福人类和社会。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①。因此那些自称能够在世界末日来临时渡人“圆满”的说教，其歪理邪说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精神的这几个方面具有内在的关联，实事求是精神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前提，是科学研究的实质；理性批判精神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开拓创新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是科学成果价值的最终体现；包容协作的精神是科学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的环境，是一切有作为的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心态；人文关照精神是一切科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可见，科学精神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突现了理性主义的作用

在目前，要使科学精神真正得到张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必须对科学精神做出认同，让科学家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公众，科学技术和科学家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二是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尊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加大对邪教的打击力度。三是在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同时，必须要让公众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精神转化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04页。

总之 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理性批判、开拓创新、包容协作、人文关照等精神 不仅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需要的 而且也是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只有在这些精神转化成为全社会成员的普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情况下 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获得一种持续的文化上的推动力。

理性主义的确立和张扬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伦理、政治平等和科学精神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把传统的束缚看做非合理的东西时 就可以把从中的解放标志为合理主义。实际上可以认为 这种合理主义的精神 已把科学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平等主义精神都作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包含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文化方面未必能独立于其他三个方面之外。因此 在其他三种精神都未充分发达的非西方社会 合理主义精神也没有充分发达。”^① 这里的合理主义就是理性主义。

四、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新的对策的选择

在发展中国家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应该确立和高扬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保证人的发展之外 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建构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结构。而建构现代化的文化结构不可能采用单纯的修修补补的方式，而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正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样，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创新 现代化的创新体系应该是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谓的文化创新是一个不断地更新文化的要素 扩充和丰富文化的特质 赋予文化体系以新的内容

[日]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93 页。

和形式，以促进文化不断发展和保持活力的过程。今天，文化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的尺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矛盾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来实现自己的文化创新。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因此，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接起来

这里的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东方社会在被卷入“世界历史”之前所形成的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它是在东方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文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是存在着不适应性的，二者是难以对接的。但是，现代化的发展又不能脱离既有的历史基础，文化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又是可对接的。现代化的文化结构就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这种可对接与不可对接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中形成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注意两种片面的倾向：

一是必须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都是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并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离开了经济基础来讨论文化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关系的讨论，应该置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来，而不能脱离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抽象地谈论文化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步的过程，现代化要求的文化应该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工业化、市场化、知识化和集约化、生态化和持续化、人道化和合理化、

自主化和革命化相一致的文化。显然 在这个层次上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是难以对接的，或者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但是 文化复古主义夸大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 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可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的 可以在现代的情况下得到新生 这样 他们就否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不相适应性。而事实上 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为维护东方社会的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服务的，是以蒙昧主义为自己的特征的。这种文化及其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如固步自封、盲目崇拜、听天由命等等 都是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显然，在这种文化的土壤上，难以产生出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欲图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实现现代化只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复古主义，是根本不可取的，更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是应该力求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现代化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它必须凭借既有的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成果才能使自身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在于，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累积性。因此 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要区分清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性的内容和超时代性的内容，因为文化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冲突和消解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形成的 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情况 具有自己的时代性，一般来讲 这些内容不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 文化又以自己的形式积淀了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肯定性的成果，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些远离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东西 都是可以传承的 具有超时代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 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思维方式上的有机论倾向、行为方式上的可持续意识、价值观念中的整体主义的取向等等因素 都可以用于文化现代化的建设。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论者忽视文化

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将传统文化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欲图在彻底否定传统的基础上来实现现代化，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事实上，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就会使东方社会丧失自己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晚年就肯定了古代社会和未来社会之间的这种传承性，认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 in a superior form 的复活 (a revival)’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①。因此，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根本不可取的。

总之，在包括文化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采取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应该根据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要求，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接起来，抛弃传统文化中糟粕性的东西，吸收其精华。

（二）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包容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本来是平行发展的，从而在世界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但是，随着普遍交往的发展，这种狭隘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局限性正在被“世界历史”打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超越地域和民族狭隘性的全球文化。这样，在东方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

所谓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自己全部的文化的总称，既包括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文化生活和文化现象。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全球文化是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超越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

化。从它们形成的利益机制来看，民族文化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服务的，而全球文化是为了维护全球性的利益服务的；而民族利益和全球性利益存在着既包容又不相容的矛盾，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民族文化和全球维护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在现实的南北问题的格局中，二者又是存在冲突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注意两种片面的倾向：

一是必须坚决反对文化帝国主义。随着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加剧，逐渐形成了一些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谓的全人类的利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突现了出来的（如，解决全球性问题就需要全人类做出共同努力），这样，反映全球化历史进程和要求的全球文化便应运而生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文化对于形成普世价值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扩展世界市场和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总会带有一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这样，所谓的全球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为了西方社会向东方社会推行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幌子，可以起到殖民主义和武装侵略起不到的作用。今天，那种凭借全球化而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思想和做法就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它不仅消解着东方社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志，而且成为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种严重的障碍。当然，对于西方文化也应该进行辩证的分析，一方面，它带有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东方社会决不能接受这种文化。另一方面，正像东方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一样，西方文化也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同性的东西，如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管理经验等，因而，东方社会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另外，在世界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民族利

益，各种民族利益必然存在着自己的特殊的要求，因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民族性不能完全让位于全球性。总之，在东方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为了全球性而抛弃民族性，必须坚决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以便维护民族的自主性和尊严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晚年对殖民主义所持的批判态度。

二是应该力求避免民族虚妄主义。尽管民族文化目前仍然是占主导性地位的文化，但是，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全球文化的形成同样是不可阻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这里的“世界的文学”就是指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出现的背景下，正像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实行闭关锁国会导致落后一样，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实行闭关锁国则会导致愚昧。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全球化的现实，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应该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的生产力成就，而且也应该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积极地对外开放，加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交流，在文化上实行拿来主义。因此，当外来文化汹涌而至的时候，不能大加指责，借民族保护的口号而实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甚至闭眼不看世界发展的实际，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外来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陷入民族虚妄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应该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文化上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建立在维护民族自主性和民族尊严性的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76页。

础上的，文化移植应该符合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有助于自己国家的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移植的目的不是去消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为民族文化的新生提供新鲜的血液。这样一来，全球性和民族性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可以包容的。总之，文化上的对外开放是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可见，在实现包括文化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采用民族性和全球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应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统一起来，也就是说，真正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文化同时也就是全球性的文化，而真正全球性的文化同样应该具有民族的气派。

（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融合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原本不存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区分，二者之间的对立更无从谈起。科学和人文的区分是在大工业生产方式和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条件下日趋明显的，甚至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上的危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对这两种文化进行合理分工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过程中，同时应该避免西方社会现代化造成的文化危机问题，力求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融合起来，以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

所谓的人文文化是将人自身作为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的文化，它关心的是人的整体和全面的发展，关心的是人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问题，是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中一切与人相关的东西。而科学文化是将探求外部世界的规律作为终极目的的文化，同时包括一切约束和支配科学家的思想和行为

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它是围绕着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的总称。这两种文化的不同只是分工上的不同，而不是实质上的不同，不能张扬其中的一个而压抑另外的一个，而应该使它们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防止两种片面的倾向：

一是不能陷入人文中心论而拒斥科学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人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尤其是将人置于了异化的境地，于是，就将异化的形成归咎于科学文化的张扬，认为正是在拔高科学文化而忽视人文文化的过程中，才造成了异化。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在大力弘扬人文文化的过程中，拒斥见物不见人的科学文化，才能拯救人类，甚至将人文文化看做是惟一的文化。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人文中心论。一切文化复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成了联盟，他们欲图消解科学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实，异化本身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即使在文化的层面上，问题也不在于科学文化本身，而在于人们是如何运用这种文化的。归结到一点，这在于社会制度，正是现存的剥削制度对科学文化的片面运用，才造成了人的异化；而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科学文化本身也会成为人的发展的有效的工具和方式。正如马克思晚年指出的那样：“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①；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①因此，应该拒斥的不是科学文化，而是将人文文化片面夸大的人文中心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122页。

二是不能陷入科学中心论而贬低人文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人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无所不能的，可以解决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一切问题，甚至将人的发展问题简化为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这样，人就在科学技术面前被消解和吞并了。这种观点还将科学技术作为评价文化的惟一的或最高的尺度，按照还原论的方式来对待人文文化，贬低了人文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本来具有合理性的科学文化就可能被变成贬斥人文文化的科学中心论，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合理性。其实，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两翼，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撇开科学文化对于人文文化的意义不说，人文文化对于科学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其一，人文文化可以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适宜的思维方式，没有人文文化所具有的整体的、有机的思维方式的帮助，现代文化就不可能走出机械论思维方式的藩篱；二是人文文化可以为科学文化提供适当的行为方式，没有人文文化所倡导的集体和协作的价值，就不可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的科学共同体，科学技术可能仍然是一种小作坊式的活动；三是人文文化可以为科学文化提供适中的价值观念，没有人文文化所追求的真善美的价值，科学技术就是与人无关的死东西，正是真善美观念的注入，才使科学文化具有了活力，才可以对自身的社会功能进行深刻的反思。

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采用人文和科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而应该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门科学。”

另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或正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发展的国家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不在文化结构中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位置，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创新。这在于，马克思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惟一具有科学形态的文化，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整体现代化（包括文化现代化）的科学，它代表了东方社会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这样，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确定马克思主义位置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显然，综合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的方式，但是，这种综合创新又必须是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综合创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这就是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总之，为了有效地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便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切不可一手软，一手硬，而应该软硬兼施，使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第八章 自主化和革命化 建构 社会发展的控制系统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

政治结构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层次，所谓的政治就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结构发挥着控制的作用，正是由于政治对

利益格局进行着调控，从而才保证了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结构的调整和变革为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上的保证，新兴资产阶级凭借政治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有的封建贵族的统治，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中，政治在适应经济变革的同时，反过来又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和推动。因此，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仅仅在经济上趋向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上趋向现代化。当然，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东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要走一条根本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这就是，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摆脱殖民主义对自己的控制（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化）；二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灾难和不幸（革命化）。这样，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所谓的政治现代化意味着要完成民主化、自主化和革命化的三重使命。由于前面对民主化已经进行过一些涉及，这里，我们根据马克思晚年的有关论述，仅就自主化和革命化两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一下东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问题。

一、社会政治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社会结构的政治结构既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成为了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政治发展成为了社会发展综合动力系统的基本的构成部分之一。

（一）社会政治结构的含义和机制

所谓的社会政治结构就是指社会系统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形成的国家机器，它构成了社会系统中的上层建筑。正如列宁指出

的那样：“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 给国家定方向 确定国家的活动方式、任务和内容”^①。马克思晚年通过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揭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发展和作用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而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含义和机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史前社会中只存在着社会组织——氏族制度，只是到了野蛮阶段的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了阶级和私有制，这样，便导致了氏族制度的瓦解，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的国家才应运而生。摩尔根已经意识到在氏族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国家，因为氏族是一种社会组织，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前者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后者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指出，是财产因素主要是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了维护私有制的工具。具体说来，国家产生的基本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一是随着动产的出现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家庭的财产差别愈来愈大；二是由于父权制的作用，原本由民主选举的氏族领导职务开始由儿子继承，出现了世袭制；三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争夺土地和财富的战争日益增多，在这个过程中，由战俘充当奴隶的制度逐渐被公认；四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业、航海、移住促使了人员的流动，突破了氏族的限制。可见，“在存在国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地方，国家决不是第一性的；它不过看来如此”^②。也就是说，国家是社会经济的产物。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对国家的把握就应该注意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21 卷 第 4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645 页。

到：“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

第二，从国家的本质来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在考察国家的起源问题时，还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从氏族解体向国家过渡中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采纳了摩尔根关于军事民主制的观点，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学者们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君主，而实际上，巴赛勒斯在希腊荷马时代（存在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条件下，只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摩尔根的限制性，并在这个过程中揭示出了国家的实质。虽然摩尔根在雅典国家的形成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因素，但他在说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阶级分化的作用之后，没有从国家的萌芽中看出，国家是阶级矛盾日益增长的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统治的工具。而事实上，国家是适应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需要而出现的，国家的本质就是政权的阶级性，或哪个阶级的专政，即由哪一个阶级来管理和统治社会。即一个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权要靠政治上的统治权来维持和巩固，国家就是履行这种职能的。总之，“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

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①这就是说，超阶级的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国家总是要代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

第三，从国家的演化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对立的消失，国家总有一天必然会走向消亡。马克思根据摩尔根提供的材料考察了从原始社会的管理机构到国家的演化过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财产关系的发展，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产生了执掌民政的部落联盟的酋长会议和与之并列的执掌军务的最高军事酋长，前者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奴隶社会的最高行政长官，后者就成为了国王，国家就是这样产生的。在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替，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在为时较短的文明时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的财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专制政体、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阶级，最后带来了代议制的民主制”^②。马克思在批判将国家看成是道德影响的结果的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揭示出了国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梅恩不了解国家产生的经济必然性，将它看成是道德影响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道德和国家一样都是第二性的，它不能成为国家产生的原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必然会趋于灭亡。“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旦社会达到迄今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558 页。

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 是它的前提’^①。

第四，从国家的作用来看，国家是协调和解决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重要的机制，对经济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尽管国家总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私人利益之间、统治阶级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严重的冲突，假如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 那么 社会机体就不可能正常运行 甚至会出现动乱 直至会造成社会的解体。这样，国家就以整体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②。但是，由于国家本身总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以社会的整体和公共利益代表而出现的国家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共同体的形式”^③。不管怎么样，由于国家能够化解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这样，它就能在协调和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而“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646—647 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32、84 页。

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①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障国家对经济的反作用维持在第一个方向上。

总之，政治结构是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对经济结构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面。

（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政治推动力

现代化不仅是产业革命的产儿，而且也是政治革命的产物。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使得资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之后，迅速推动了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而使现代化成为可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对于最终确立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晚年在《历史学笔记》中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追溯了资产阶级革命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重点是考察了蔷薇战争、三十年战争的社会影响，评价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

第一，蔷薇战争与资本主义的萌芽。蔷薇战争（1455—1485）是英国的两大家族为了争夺王位而展开的一场具有前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战争，其中一派是以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大贵族为依靠力量的兰开斯特家族（以红蔷薇为族徽），另一派是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封建主以及新贵族和市民为依靠对象的约克家族（以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蔷薇为族徽)。正是在他们争夺王权的战争过程中，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在英国萌发并发展了起来。在战争进行到第 16 年的时候 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史称爱德华四世）才真正掌握了政权，社会变革也才真正开始；爱德华的政策引起了新的社会矛盾，又导致了兰开斯特家族的争斗；1485 年，爱德华的王位被推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史称亨利七世）上台，亨利七世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也奉行了推行社会改革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改革的措施使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萌发。其最终的社会结果是：一是各地的财富和工厂都有所增长，工场手工业的雏形也反映在爱德华四世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许多保护性的法令中；二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英国的商船出现在波罗的海；三是实业阶级的人数得到了扩充，尤其是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不定居的工人的数目越来越多。通过对这场战争的考察，马克思晚年指出了其社会影响：“有人说，在内战时期，几乎有五分之一土地逐渐归国王所有。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是自从爱德华一世以后两个最有权势的国王，不仅如此，他们比所有的先辈，从亨利二世算起，都更富有。因此，他们放眼外界，其实打仗是要花钱的，他们巧施各种手腕来充实金库。爱德华四世迅速地——以各种关税供国王终生享用的方法——开辟了财源，这就使他几乎完全摆脱了议会。然后，他通过没收和大笔生意而积聚了财富，他的满载着铅块、羊毛和呢绒的船只，使这位做生意的国王的名字在意大利和希腊各个港口尽人皆知。亨利七世也是这样，他亲自把那笔因西部各郡企图造反而从那里征收的钱记入了账簿。”

第二，三十年战争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在法国的宗教战争之后，由西欧、中欧和北欧的主要国家

几乎全部先后卷入而进行的一场洲际战争。这场战争最初是由德国内部新旧教之间的斗争引起的，很快就演变为各国争权夺利的战争。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呼吁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政治上提出了民主的口号，在经济上提出了自由贸易的要求；这一斗争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极大的恐慌，他们以维护天主教的权威为借口，试图镇压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天主教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较量。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以天主教同盟（西班牙、意大利）镇压了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新教政权而告终，新教徒被驱逐。1622年，天主教同盟在肃清了德国东部的的新教势力之后，开始对德国北部、波罗的海的新教势力展开了攻势，新教同盟英国、荷兰和丹麦介入了战争，战争第二阶段由此开始。在1629年之后，双方一直保持着战略相持的局面。直到1648年，交战双方签署了“威斯特伐里亚条约”，才标志着战争的结束。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承认了新教国家的独立，划分了法国与德国、瑞典与德国之间的边界，欧洲近代的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奠定。二是承认了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具体包括：（1）宗教改革派同路德派权利平等；（2）新教徒和改宗的天主教徒失去了宗教收入；（3）各国政府都不应该容许不信仰该国国教的公民住在国内，但应给予他们三年的迁移时间；（4）帝国高等法院应由24名新教徒和26名天主教徒组成。当案件涉及到宗教利益时，帝国会议无论何时都不应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三是关于德意志帝国宪法方面的，包括：（1）在帝国议会有争论的充分自由；（2）原来只有发言权的帝国城市，开始取得了表决权；（3）帝国参议院在作出自己的决议时必须遵循帝国高等法院的规定；（4）德意志公爵们被容许彼此结成联盟、与外国结成联盟，但这种联盟不能对皇帝和帝国造成

一丝一毫的威胁。^①可见，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欧洲各国的宗教问题，结束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新教获得了与天主教同等的权利，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而且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最终掌权提供了可能，尽管战争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得到了确认和保护；这样，它最终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假如蔷薇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热身赛’的话，那么，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大革命就使资产阶级最终站到了政治发展的前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保证了大工业的迅速运行，从而使现代化成为了可能。尤其是法国的大革命更为突出。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做出的那样：“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阻碍。”^②这样，政治革命就成为产业革命的推动力。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仍然采用政治的方式来维持、巩固和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掌握了政权

① 参见《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 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第187—1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2页。

的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发展殖民制度，开展商业战争 建立保护关税制度 扩大圈地运动 改革土地制度 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其实，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了可能，不仅得益于资产阶级自身的政治革命，而且也受益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确立和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产物，也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就能奏效的，它也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通过多种多样的阶段 斗争形式才得以实现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没有在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提出增加人权法案的斗争 没有 19 世纪中期打碎黑人奴隶制的南北战争 没有 19 世纪后期的平民党运动 没有 20 世纪初期的反托拉斯运动，没有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强大的工人运动，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黑人运动，美国就不可能建立起现在的宪政制度，美国公众就不可能享有今天这样的民主权利，一句话，美国的现代化就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这一切说明，不仅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而且政治革命也成为了产业革命的重要的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在政治领域 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疆域的日益扩展，尤其是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之强化。其次，它还表现为潜在的权力不断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内扩展，直至它最终落入所有成年公民之手，从而使社会形成一个和谐的道德秩序。第三，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其特征是，以社会的外在力量（如神、理性）来使统治者合法化的传统在衰弱，而统治者对那些被认为持有潜在政治权力的被统治者，则负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通常也是制

度化的责任。”

（三 东方社会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由于东方社会自身的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使得东方社会严重地遭受着专制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灾难的折磨，将东方社会置于了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东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摆脱专制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民主化、自主化和革命化的三重任务，否则，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不可能的。

第一，从东方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来看，与小农经济、血缘宗法制相呼应，在东方社会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这是东方社会长期贫穷和落后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原因。马克思认为，兴修水利工程和灌溉的需要就促进了东方社会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形成，而血缘关系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宗法制度是维系东方社会君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结构，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在一定的程度上瓦解了这种专制主义的的政治结构，但是，专制主义在东方社会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今天，家长制、一言堂等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由此导致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严重障碍，阻碍和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而在俄国，由于它的孤立性和封闭性，沙皇的淫威依然如故，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指出，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不仅如此，沙皇还将这种专制制度向外延伸，充当着世界宪兵的角色，

① [以]S.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4页。

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指出的：“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① 一个统治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也是不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社会必须要像西方社会那样进行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去推翻专制主义，为现代化扫清政治结构上的阻碍。

第二从“世界历史”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将东方社会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东方社会的政治结构变得更为畸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国际性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的过程中，对外扩张成为了原始积累的一种基本的方式；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② 在这个过程中，在殖民主义的刀与火的威逼下，广大的东方社会先后沦落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这些殖民强盗所霸占的殖民地的面积远远超过了其本土的面积（参见表 8—1）。正是在东方社会的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才成为可能。据统计，仅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葡萄牙从非洲运走的黄金就达 27.6 万千克，截止到 18 世纪末，西班牙在 300 年的殖民统治中，从拉美掠走黄金 250 万千克、白银 1 亿千克；而葡萄牙仅从巴西就运走 6 亿美元的黄金、3 亿美元的金刚石。英国在 1757—1815 年间从印度榨取的财富就高达 10 亿英镑。可见，资本主义随着殖民主义一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19 页。

渗入到了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起给东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灾难，这就是“世界历史”对东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因此，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摆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控制，走自主化和革命化的社会发展之路。

表 8—1 1895 年列强殖民地面积概况 面积单位：万平方公里

国别	殖民地面积	宗主国本土面积	殖民地面积相当于宗主国本土面积的倍数
英国	3051.9	24.4	125
俄国	1740	540	3.2
法国	839.7	55.1	15.2
德国	265.7	35.6	7.5
葡萄牙	242.5	8.9	27.2
比利时	235.5	3	78.5
荷兰	202	4.1	49.3
西班牙	31.5	50.4	0.6

（本表根据日本大盐龟雄所著《最新世界殖民史》一书附录累计估算 转引自陈安：《列宁对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三联书店 1981 年版，第 5 页）

可见，实现政治的民主化、自主化和革命化是东方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向，而摆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控制，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东方社会面临的政治现代化的任务更具有艰巨性和紧迫性。

二、东方社会实现自主化的抉择

近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是现代化得以成为可能的一个基本

的政治前提。而在殖民主义的控制下，东方社会成为了西方社会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在丧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因此，东方社会就难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因此，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同样要确保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主权性，但是，这已经不是一个像西方社会那样的民族国家挣脱封建势力的束缚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如何摆脱殖民主义控制的问题。这样，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就成为东方社会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即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其政治现代化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自主化的含义和要求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和民族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基本的趋势。对于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关键的问题不是什么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民族化的问题，这就是要实现自主性的发展。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化发展，不仅是东方社会自身或发展中国家自身取得发展的前提性的条件，也是解决作为目前的全球性发展问题的南北问题的前提性的条件。

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在争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的。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发展，这是自文明社会产生以来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位的问题。同样，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证了经济上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实现了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不可能的。假如英国不是作

为一个主权国家存在，那么，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最后，英国的产业革命也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工人阶级构筑堡垒和流血牺牲，造就了资产阶级民族统治的政治成果。而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正是由在 1775—1783 年进行的独立战争开启的。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美国发起了反对英国压迫的北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美国取得独立之后，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美国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存在着社会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而且使民族问题放大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过程中，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统一了起来，从而将东方民族卷入了资本主义的灾难当中，最终将自主化发展问题突现了出来。资产阶级一旦自己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剥夺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独立和主权作为维持自己发展的前提性条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累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在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①但是，资产阶级决不是为了殖民地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22 页。

福去赚钱的，而是为了自己赚钱而进行殖民活动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成了压迫民族，而东方社会成了被压迫民族。这种压迫固然也使西方民族成了不自由的民族，但是，东方民族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样，实现东方社会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就成为一个比西方社会取得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更为重要的问题。

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所谓的自主化就是指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在政治上获得自主性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上的自主性发展。在这里，不能将自主化或民族化的问题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同样应该看到，自主性的经济发展是自主性政治发展的直接要求和基本保证。

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过程中，假如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性的发展，那么，政治上的自主性发展就会丧失必要的基础和支持，最终会再度成为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当然，这里的殖民主义已经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即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济上却成了发达国家的卫星国，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而在畸形、片面的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主性经济发展也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经济，走一条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广大的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的特点，那么，不仅会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覆辙，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当中，从而会拖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发展的道路上越来越成为靠后的民族；而且会被西方社会牵着鼻子走，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再度成为“殖民地”，永远难以屹立于世界独立民族之林，更无从跨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这样，自主化的发展也就是要求东方社会必须将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作为自己社会发展的前提性条件，与殖民主义进行彻底的决裂 同时 要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

（二 东方社会实现自主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双重的效应 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 既破坏了东方社会旧有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东方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又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带入了东方社会，为东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殖民主义是在刀与火、血与泪的过程中 无意地进行着这一历史进程的 况且 东方社会为这种“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将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区分开来，必须要将行为的效果和行为的动机甄别清楚。从西方社会在东方社会实行殖民统治的动机来看，他们决不是为了东方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本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①。因此，东方社会必须要挣脱西方社会的殖民统治 实现自主性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殖民主义问题产生的客观历史进程和社会阶级根源，科学地阐明了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现象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关联，愤怒声讨了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进行的种种殖民暴行，揭露了殖民主义的贪婪、伪善和残忍，借以教育和动员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被压迫民族为反对一切殖民主义而团结战斗。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更是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给东方社会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要求东方社会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例如，马克思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 第 167 页。

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二稿中指出“至于譬如说东印度”^①，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①。这样，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是认识自主性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首先，东方社会之所以应该走自主化的发展道路，是由于殖民主义给东方社会造成的灾难和不幸决定的。不在政治上摆脱西方社会的殖民统治，东方社会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殖民主义造成的灾难和不幸是罄竹难书的，择其要者，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践踏主权，霸占领土。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西方殖民主义无所不用其极，肆意践踏东方社会的主权，将大片的东方国家的领土据为己有，从而使东方社会沦为殖民地，以至于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参见表 8—1）。即使在一些半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也遭到了肆意的践踏。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就呈现出了一幅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衰亡景象。不仅割地而且丧权。中国的税务、铁路和矿山被外国殖民者控制。据 1904 年的中国《外交报》记载，当时“一、全国税务属于英人。二、东清铁路属于俄人。三、关内外铁路属于英人。四、芦汉铁路属于英人。五、津镇铁路属于英人。七、正太铁路属于俄人。八、山东铁路属于德人。九、粤汉铁路属于美人。十、江宁上海杭州间铁路属于英人。十一、江宁汉口至重庆间铁路将属于英人。十二、云南铁道将属于英人法人。十三、京口及福建铁道将属于美人。十四、满洲之矿属于俄人。十五、河南北境及山西之矿属于英人意人。十六、山东之矿属于德人。十七、浙江之矿属于意人。十八、安徽之矿属于英人日人。十九、四川之矿属于法人。二十、云南之矿属于英人二十一、福建之矿属于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8 页。

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贩卖奴隶,侵犯人权。奴隶贸易给西方殖民者带来了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利润(将一个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的利润竟然高达 600%)因此西方殖民者用非常残忍的方法从事奴隶贸易,极大地侵犯了东方国家民众的人权。据大略估计,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 300 多年的时间中,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了 1 亿人口,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的劳动力和经济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西方强盗同样采用连骗带劫的方法,弄走了数以百万计的“契约华工”当做“猪仔”被转卖到秘鲁、古巴等海外矿山、种植园,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被迫惨死异国他乡。而殖民主义对此讳莫如深,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揭露过这种瞒天过海的卑鄙虚伪的行为,“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

第三,横征暴敛,搜刮财物。殖民主义还采用不平等的贸易的形式,将东方社会大量的珍宝、财物源源不断地运入自己的国家,更有甚者,西方殖民者竟然采用了种毒贩毒的卑鄙行径,大量地攫取暴利。当时,英国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大约为 250 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 1210—1600 卢比。马克思就揭露过鸦片贸易的实质:“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

底就是垄断。^①同时，更为严重地是，鸦片贸易戕害了东方社会民众的机体和精神，致使东方社会的民众更为萎靡不振，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国格。

第四 穷兵黩武，杀人越货。西方社会是凭借刀与火开拓殖民主义的历史的，在武装入侵、杀人放火的过程中，大肆劫掠东方社会的财物，中饱私囊；他们还通过刀剑威逼的方式来与东方社会制定不平等的条约，面对西方社会的船坚炮利，东方社会不得不蒙受羞辱，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例如，当中国政府采取了禁烟的措施之后，英国殖民者惟恐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竟悍然出兵，挑起了鸦片战争在战争的过程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马克思指出过，“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②。在烧杀抢劫之余，‘约翰牛’还要收取所谓的‘手续费’以“水陆军费”的名义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单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勒索战争赔款 2100 万银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 1/3。马克思嘲笑这种蛮横之极、无耻之尤的行径，‘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③。

第五，灭绝文化，控制精神。西方列强在推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还惨无人道地进行种族大屠杀，对民族文化采取灭绝性的政策，强行推行文化殖民主义。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大屠杀，沙俄屠杀我国东北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社会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珍贵的文物被西方列强抢回自己的国内。例如，1860 年英法联军闯进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19—720、704、726 页

我国北京的圆明园，对清王朝搜刮民脂民膏而惨淡经营了 150 多年的豪华别宫进行大肆抢劫和掠夺，最后又付之一炬，最终使这座以收藏着数千年的历史珍奇和文物典籍而闻名于世、无与伦比的宏伟宝库和园林艺术典范毁于一旦。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离奇的悲剧题材。此外，西方殖民主义还通过传教的方式，对东方社会的思想文化进行控制。除了基督教之外，还企图控制东方社会的其他宗教。例如，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就划分了宗教控制的范围 据 1904 年的中国《外交报》当时的中国宗教都被分别划入了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内“；二十二、天主教徒属法人保护。二十三、耶稣教徒属英人美人保护。二十四、佛教徒将属日本保护。二十五、回教徒将属土人保护。”同时 培植洋奴 也是殖民主义进行政治和文化控制的重要方式

可见，西方殖民主义根本不会使东方社会向前发展，而只能使东方社会进一步落后，遭受殖民主义的蹂躏。蒙受羞辱 因此 东方社会必须要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走自主性发展的道路。

可能有的论者会认为，上述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再谈非殖民化的问题就成为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其实，殖民化的问题在今天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这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依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加具有隐蔽性。

按照“依附论”的观点，今天的依附的主要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市场的依附。由于国际市场主要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只能处于依附的地位。例如，在被调查的 102 个发展中国家中 原料出口占出口比重在 85% 以上的有 76 个国家 不到 50% 的只有 7 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主要依靠发达国家，这种对

外贸易的巨大反差，充分表现了前者对后者的依附。二是资金的依附。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加速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但又受到经济实力的制约，因而不得不在起飞阶段向发达国家求助资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 1000 亿美元上到了 1993 年的 16290 亿美元，金融风暴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这样一来，客观上又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三是技术的依附。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自身的科技发展。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 因而 只好从发达国家不断引进技术 不过所引进的也只能是相对过时、低水平的技术 最终成为了发达国家藏污纳垢的牺牲品。

依附导致的结果不是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而是重新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包围之中。一是依附致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问题仍然是困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二是经济上的依附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依附，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就在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存在着依附。由此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总之，新老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是致使其发展不足的关键性问题 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 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将实现自主性发展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 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民族化的问题 只不过是 要在全 球化背景中进行自主性的选择和发展。

（三 东方社会实现自主化的对策的选择

由于东方社会是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进行自主化发展的，因此，这种发展是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这样一来，东方社会的自主化的发展就必须辨明彻底解决殖民和依附问题的根本道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推进自身的自主化发展。具体来看：

第一，东方社会在实现自主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解放的运动，将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作为实现自主性发展的头等大事。

一部殖民掠夺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抗殖民的斗争历史。在西方列强推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侵略、反殖民、反掠夺、反压迫、反剥削、反奴役的斗争，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尤其是一系列亚非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独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形成了东西南北的世界格局。但是，独立和主权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究其原因来看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是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彻底奏效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因此，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过程中，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自觉地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以增强自己行为的预期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广大的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和解放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出发，要求应严格地区分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动的民族运动，坚决地支持前者，无情地揭露后者；他们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的一边，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了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奴役、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认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仅会带来自己的解放，而且必将对宗主国的革命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在反对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反动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

迫民族是宗主国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军。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方向和前景等一系列的问题，成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由此来看，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区分清楚革命的民族运动和反动的民族运动。民族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它总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的反映，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总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的而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民族问题又是与其他国际性问题纠缠在一起的。这样来看，民族运动也不是孤立自在和至高无上的运动，它总是有进步和反动的区分。因此，我们必须对民族运动进行具体分析，切不可认为凡是民族运动总是进步的在这个问题上，判断一种民族运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否是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在现代社会中还要看它是否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是否有利于世界上整个被压迫民族的整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一些民族运动是直接为某个反动的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行径效劳和服务的，对于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民族运动，我们就应该彻底地加以抵制。如 18 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成为了沙俄扩展自己疆域的一种手段，而捷克等受异民族压迫的小民族以“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民族运动的旗帜，就成为了沙俄的帮凶。在现在东西南北的世界格局中，一些超级大国为了控制世界的形势，也假借民族运动之手来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以“人权”为幌子对一些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大加干涉，从而将民族运动引向了歧途。这样来看，民族运动也存在着一个如何自主性发展的问题，存在着一个如何将自主性发展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的问题。

二是要进一步明确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在‘世界历史’的发

展过程中，形成了世界性的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落后民族从属于先进民族的现象，这样，所谓的民族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族问题了，而是一个从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转化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和世界性的资产阶级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仅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民族问题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而且它自身就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最大的障碍和阻力。而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彻底推翻阶级压迫的同时，才能真正推翻民族压迫，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就必须将自己的运动看成是隶属于社会主义的一种解放运动，要认清自己只有一个惟一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政党。例如，1875年1月23日在纪念波兰1863年1月22日起义的会议上马克思发表了演说，高度赞扬了波兰这个“世界性的革命战士”的功绩。他和恩格斯的演说由恩格斯录写成文章，以《支持波兰》为题发表在了3月24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在这篇演说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波兰解放与欧洲革命的整体关联，认为“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在他看来，只有波兰重新争得自己的独立之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后，波兰的内部正常发展才会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社会的改造。而“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①。这样一来，就必须建立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保障，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条件下，民族解放运动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1页。

面 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条件之一 只有在民族问题激化之后和民族解放运动深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大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例如，1875年12月3日拉甫罗夫请求马克思在由符卢勃列夫斯基主持的定于12月4日举行的波兰大会上发表演说，马克思由于健康的原因婉言谢绝了这一请求，但他同时强调指出自己 and 以前一样，认为“波兰的解放是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①。总之，只有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互动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民族问题才能彻底获得解决。

三是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和团结。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孤立、封闭的历史已经结束，民族之间的交往成为了普遍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上所有的被压迫民族成为一个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就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应该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这样，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就成为了制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充分肯定过这种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例如，1857年，中国、波斯、伊朗和印度几乎同时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牵掣了英国的殖民主义行为，使英国疲于应付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次斗争，最终打乱了英国的侵略部署，削弱了英国的实力，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反殖民的斗争。面对这种大好形势，马克思充满喜悦地断定：“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6页。

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①。再如，1880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和列斯纳联名给11月2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国际大会寄去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认为：“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战士”，当看到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争取波兰解放的斗争蓬勃开展时，马克思希望这种斗争“和我们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来”^②。在战后的今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就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通过南南合作的方式来推进这种联合，南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与北方进行对话，促使国际格局朝着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向发展。因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地参与不结盟运动，使77国集团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发挥作用。

只有这样，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实现自主性的发展。

第二，东方社会在实现自主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独立自主地实现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寻求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内源性发展作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

现在，发展中国家在从政治上摆脱了依附之后，之所以还仍然没有彻底实现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现代化目标，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而没有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说，没有在经济上彻底摆脱殖民和依附，在政治上要想真正摆脱殖民和依附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的诱惑，广大的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普遍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做自己的社会发展坐标系，在仿效他们的过程中，普遍追求片面的“三化”但是，由于没有在经济上彻底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脐带”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新的依附当中。具体来看，一是在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上，片面追求西方化。有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国情，或舍弃自己国家固有的传统，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这样，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却毫无成效。例如，伊朗巴列维的改革就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二是在社会发展结构的调整上，片面追求工业化。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为此他们先后采用了“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两种战略，但均未奏效。例如，许多国家的农业投资很低，一般只占总投资的10%左右，而且为了出口又偏重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忽视了粮食生产。这样一来，在农业还没有实现产业化的前提下去进行工业化，工业化只能成为失败的举措。三是在社会发展的运作方式上，片面追求高速化。为了迅速发展自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制定了超出国力的庞大的发展计划，结果导致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当中。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了发展危机和新的依附当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发展观上仍然没有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对自己的小农经济和殖民地的历史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发展本身的多样性问题。而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为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晚年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在发展观上提

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可能性问题。针对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将东方古老国家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看成是与西欧封建化同样的过程的做法，马克思根据事实材料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认为这些地区的土地所有制瓦解的过程不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化，不能将二者做简单的类比。在欧洲封建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地逐级分封制、领主庄园制和分级割据状况的现象，同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特殊社会结构，不能做简单的类比。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它们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可能是雷同的，这样来看，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肯定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

将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和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提出的内源性发展战略^①统一起来，我们认为，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自主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从战略上高度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在社会发展的目标的确定上，应该奉行满足基本需要的战略，积极动员人民大众参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需要为目标，但是这里的需要应该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全面的需要，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性的需要。不能将基本需要仅仅理解为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而是指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和谐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需要；同时，这里的需要不仅仅是物质性的需要，而且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需要。尤其是应该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样，就应该重新确定与各级政府的沟通手段，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显然，理想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应该由人民群众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

二是在经济结构的选择上，应该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采用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第182—187页。

综合开发利用自己国家资源的战略。发展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国家的自然生态因素，依此来确定适宜的经济结构，这样，就必须采用综合开发利用资源的对策，而不能使经济结构单一化。当人们考虑到要摆脱殖民和依附的情况下，综合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殖民和依附关系是造成不公正的基本的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国内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国际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严重的南北差距。而采用这一战略可以提高生活条件尚未改善的社会各阶层的民众的生活水平。只有使消费合理化和综合开发利用资源，才能克服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的障碍。

三是在社会发展的运作方式上 依靠自己的力量 独立、全面、完整、有序地发展经济，应该保留自己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每个国家都应该依靠开发自己国家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实现发展，而不能采用超越自己国家的国情的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反对根据列强的意愿而制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必须注重保护自己的民族传统尤其是有价值的东西，丧失了民族的优秀传统，就难以实现自主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采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只有在东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实现了自主性的发展之后，才能使政治上的自主性发展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的保证，自主性的政治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东方社会实现革命化的抉择

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东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东方社会可以

在不过作为完整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当然，这种过渡只是一种社会发展方式上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还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发展情况，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发展提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的条件，尤其是取决于能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的生产力成就纳入到这种过渡的进程中来。这就是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革命化的基本含义。

（一 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多样性

尽管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这类矛盾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运行的，要在社会结构提供的一定的框架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情况十分复杂，这样一来，不论是广义的社会发展还是狭义的社会发展，总是体现为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实现现代化的，而东方社会不一定非要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实现现代化。这是由东方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 是由东方 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

第一，从东方社会内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来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一系列的二重性矛盾，这就预示着东方社会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的选择的可能性。小农经济、血缘宗法制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只是对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种简单化的抽象，事实上，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从而反映出了东方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特殊性。一是从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东方社会存在着低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和高度膨胀的人自身的生产的矛盾。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尽管物质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

文明，但是，东方社会的生产力只是一种简单的农业生产力，而且几千年来基本上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性；但是，这种低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之所以没有导致社会机体的坍塌，就在于有强大的人自身的生产的维系；这样一来，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就不是物质生产力，而是人自身的生产。二是从生产关系的情况来看，在东方社会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矛盾。从其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来看，土地公有制是东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但是，私有制的因素在东方社会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像俄罗斯那样的村社，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动产的私有化，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另一种情况是像印度那样的村社，随着西方殖民者强行推行土地的私有化（如马德拉斯制度），也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这样一来，东方社会就处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严重的冲突之中。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在东方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停滞性和潜在的变革性的矛盾。在低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和强大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东方社会就维持了自己的超稳定性的运转，使自己不能在技术生产力的形态上实现实质性的飞跃；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并存局面，又决定了东方社会处在了社会变革的前夜，必须在所有制的形态上进行一次新的选择；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东方社会就以这种特殊的形态表现了出来，使东方社会的发展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

第二 从“世界历史”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来看，东方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又以内外交织的二重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二重性也决定了东方社会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的选择的可能性。尽管东方社会具有孤立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但是，随着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东方社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卷入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而加剧了自身的社会矛盾。一是从生产力的情况来看，

在东方社会固有的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工业的生产力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被引入或移植到了东方社会中，从而在东方社会形成了一种技术不同形态的两种生产力并存的矛盾。二是从生产关系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渗入到东方社会之后，开始与东方社会传统的公有制发生了冲突。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进程中形成的，而东方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正在经历着危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解体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同时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而东方社会的公有制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培养未来公有制的土壤。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 在内外因素的互动中 东方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在了严重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在总体上形成了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东方社会落后的血缘关系的矛盾，要求从整体上突破东方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作为历史暂时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作为未来公有制同构 但不同质 的史前公有制的矛盾 这就要求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保留和重塑既有的公有制的过程中来确立未来的公有制 因此 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可见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 东方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的二重性，就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具有了二重性。或者说 要在下述两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一是按照渐进式的社会发展方式 沿着私有制的路径演化 走资本主义道路 经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 二是按照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方式 在吸取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使自身内部的公有制因素和人道性因素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走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 在‘世界历史’的时代 东方社会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中，在谋求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着两种选择，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尽管东方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多样性的前景，但是，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要大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东方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景，不是主观人为设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地位和实际作用决定的。具体来看：

第一，东西方社会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是不同的。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来看，所有制的形态经历了一个从史前公有制到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两种公有制之间的过渡形态是各具特色的。即使是史前社会的公有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随着公社的解体，代之而起的就是私有制，而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态。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情况就断言，资本主义也应该成为东方社会的发展前景。这在于，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具体来说，西方公社的解体是在“民族历史或地域历史”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东方社会的村社的解体是发生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的，而作为“世界历史”开辟者的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①即在西方社会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42 页。

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有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问题，而要让俄国进而包括整个东方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第二，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品格的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态，而资本主义本身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以神奇的力量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又是不相容的。这在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同社会化的大生产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①。于是，资本主义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当中，从而“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②。在大家都在崇拜资本主义，力求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经历危机的欧美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却正在力求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以合作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样看来，既然资本主义都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它都要向公社的最高类型复归，那么，包括俄国农村公社在内的东方社会又何必画蛇添足呢？

第三，东方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改革并没有使东方社会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内部的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第443页。

革也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 这种改革并不能保证东方社会的正常发展。例如 俄国自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来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可是 正是从所谓的农民解放的时候起 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了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下 并且从那时候起 国家借助于集中在其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因为国家在改革的一开始就决定尽量地给地主多一些，尽量地给农民少一些。由于国家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 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盘剥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瓦解过程。与此同时，国家靠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部门 它们丝毫不发展生产力 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的窃取它的果实。可见“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不是理论 而是国家的压迫 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①。正由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因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揭示也同样适用于俄国 这就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②。

第四，西方资本主义给东方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不幸。资本主义的输入不仅不可能解决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给东方社会造成了新的灾难。例如，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政治和财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第 4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41 页。

的考虑 任意歪曲公社的性质 蓄意破坏公社土地所有制 英国在印度执行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进行土地的重新登记 (即所谓的永久性土地管理办法)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 导致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主要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被破坏了 结果使外来分子侵入了公社,与农村毫无关系的城市高利贷者成了土地的主人 致使高利贷在农村大为盛行 高利贷者还极尽挑拨之能事,在公社成员中造成新的纠纷和矛盾,而自己直接从中坐收渔利。另一方面是把公社土地按区分割,削弱了公社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而这正是关系到氏族团体生命的原则。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和破坏,是在许多自古以来除了公社土地所有制以外不知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村社中,终于确立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农民都被迫成为了依附于地主的佃户阶级。由此来看,“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 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土地所有制”,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 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 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这样,“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①。可见,殖民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荒年更加频繁,灾情更为严重 也破坏了当地尚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 使人民无所适从。

总之,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是由其内在的矛盾决定的。在揭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说明了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假如俄国的农村公社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获得西欧在几个世纪获得的经济成果 那么 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就是必然的。但是 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同于西方的原始公社 它不仅在全

国的范围内将土地的公有制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而且它处在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形成的“世界历史”的体系中。因此，俄国就可以大胆地吸收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成果，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改造为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样，俄国的社会发展就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造成的“世界历史”形成了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落后民族从属于先进民族的局面，才使得全球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农业的、东方的、落后的民族才可能在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共时性存在中，超越局部的历时性的结构，最终实现整体的协同进化。因此，这种发展方式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东方国家。这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三 东方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对策

尽管在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要使这种可能性真正成为现实性，还必须具备一系列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将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①假如东方社会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跨越的，那么，这种跨越就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具体来看：

第一，东方社会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经济上必须要有这种改造的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但是，要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社会发展产生实际的促进作用，必须要有经济上的

需要。超越经济需要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从东方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东方社会的发展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需要。具体到俄国的经济来看，只要求有土地和利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对农民的压迫已耗尽了农民土地的肥力，土地已贫瘠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而不是单纯地增加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种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的农民，绝不会因为耕地增加了十倍就会改善自己的状况。因此，“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①这就是说，在东方社会实现社会制度上的变革，必须要立足于东方社会经济实际，生产关系的变革只能在生产力提供的可能性的范围中发挥作用，即这种变革必须是内发的，而不是外生的。

第二，东方社会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物质上必须要有这种改造的条件。显然，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坐等时机的自然成熟，等到自身机体中的生产力发展起来后才去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这样的话，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东方社会不同于史前社会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这就是“它处在了‘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可以通过生产力移植的方式来吸收同处于‘世界历史’环境中的已取得高度发达生产力成就的西方社会的成果。这就是说，在选择社

会主义的过程中，东方社会跨越的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要跨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取得的物质生产力的成就。正如马克思所说：“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 到哪里去找呢 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 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 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 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① 这就是说，在跨越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决定性的作用仍然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这种作用的方式是灵活的 生产力移植是发挥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第三，东方社会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社会发展动力上要有这种改造的保证。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选择问题之关键是应发挥社会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革命就是这种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体现。俄国公社正在遭受沙皇政府的人为破坏的灾难 几乎把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自由发展，那么 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 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② 这在于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69、773页。

同时 还必须从整个“世界历史”格局的大范围内来理解革命 这就是东西方革命的“互补性”问题。在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全世界都成为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俄国和美国一样，既向欧洲提供原料又成了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参与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若再考虑到西欧资本主义危机的话，那么，俄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就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阶段；这样，通过互补性的革命，它就可以实现过渡；“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否则，东方革命就始终不会摆脱它的狭隘性。

只有上述三个方面产生了一种“合力”，才能结束东方社会的史前状态，促使整个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只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变革。这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异常繁重复杂的，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能够真正保证东方社会的发展，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东方社会还必须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尤其是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东方社会在实现了跨越以后，还不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首先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才能最终为跨越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巴黎公社的经验说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这个过渡阶段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1 页。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①}这就说明，在两种典型的社会形态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一个渐进过程的中断。这样 马克思就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东方社会要进行巨大的革命的社会改造 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二 东方社会在选择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 应该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这样 才能为最终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提供经济基础。共产主义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自身要经历低级阶段 社会主义 和高级阶段 共产主义 两个阶段。在马克思看来 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是能靠发号施令就一举建成的；共产主义的建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的改造过程。共产主义之所以分为两个阶段发展，这是由其自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 虽然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但还没有能力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切需要，因此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这时 它只能在第一个阶段发展 只有在生产力获得持续 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只有在将劳动作为生活中头等重要的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出现的时候，才具备了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先决条件。这样来看，发展生产力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

第三 东方社会在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后 必须要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 共产主义不是脱离资本主义而产生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发展而来的，因此 它还带有它脱胎而来的那个社会的特征“，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 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

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在对方社会，这带有东方社会的痕迹。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种差别的存在，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资产阶级的权利”是仍然存在的，尽管这种权利存在着弊端，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不仅不能放弃这一权利，而且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这样，马克思就提醒人们对社会主义应抱着一种现实的态度，不能陷入空想主义。正因为这样，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还不会消亡，但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正在走向消亡的国家。

第四，东方社会在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仍然要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随着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变化，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创造的乐趣的源泉，按需分配将成为可能。这时，共产主义就会发展到自己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在其自身基础上产生的结果，是物质生产和文化的巨大发展，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社会。在这一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思想觉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这里没有空想的东西，而只是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它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5页。

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① 这里，马克思强调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方面，马克思还十分重视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的两个不同方面。

只有以这样辩证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能为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真正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对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是，以小农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急躁冒进，而不注意科学地把握自己所处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阶段。

同时，尽管和平与发展成为了现时代的主题，但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依然存在的，东西南北问题仍然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对于那些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必须要高度注意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问题。

四、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在从经济、科教、生态、文化和政治等方面考察了马克思晚年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指导意义之后，我们还必须注意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社会发展理论价值。这就是，马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05—306页。

恩晚年思想向我们揭示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特点，从而为我们促进社会发展、建设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选择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之初，由于当时的急迫任务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因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强调得要多一些，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就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避难所中驱逐了出去，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必须服从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使如此，社会发展规律绝不是自然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简单重复，它无不打上主体的印记和特征，成为主体的一种自由、自觉活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在看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同时，必须承认社会发展规律所具有的选择性的特征，选择是主体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在我们看来，承认和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突出和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因为主体的选择性是以承认客观规律为前提和条件的，“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①。在唯物史观的视野内，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选择性是相统一的。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为了回击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攻击，为了正确引导方兴未艾的东方革命，马克思就将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性这一点突出了出来。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性成为马克思晚年思索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他也探讨了社会历史主体的选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5页。

展规律的选择性特点的时候，是很注重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就俄国社会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在充分分析了俄国公社的性质的基础上断定了这种选择性的存在。他指出，俄国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事实上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听任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按自发的方式发生作用，俄国社会在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向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二是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加速俄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马克思更倾向于第二种方式。这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呢？不，根本不是。因为马克思在提出跨越设想时是充分考虑到了这种跨越的限制性的。他认为东方社会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可见，强调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就是突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性，而强调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性就是突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这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使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选择性相统一的辩证特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是第一位的，构成了选择性的前提和条件；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性是客观性得以实现和产生作用的中介和场所，是主体自觉把握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式；客观性和选择性是社会发展规律共生的两种特征。

（二）社会发展规律的渐进性和跨越性

在作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初，当时的急迫任务是要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因此，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注重的是铁的经济必然性对社会发展的强制性，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这确实是突出了社会发展规律所具有的渐进性的特征。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是反对将之凝固化为社会发展规律渐进性的一般特征的，他认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事实也正如此。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私有制社会的具体阶段都被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超越过。例如，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越过了封建社会而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则跨越了作为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甚至是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同时，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复辟。例如，美国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却带来了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因而，“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惟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②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渐进性和跨越性作一整体系统的把握，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充满了不可跨越性和跨越性的矛盾冲突过程，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东方社会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这种矛盾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43页。

现在第一从所有制形式来看 东方社会的发展是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历史学笔记》)的实证研究再度证明 所有制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三个阶段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公有制是对私有制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是在新的基础上向原始公有制的“复归”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是原始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之间的过渡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私有制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暂时现象,而资本主义制度更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瞬间而已,“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①;况且作为与农业公社并存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它已丧失了历史必然性 正处在危机之中;“在俄国公社面前 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 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而未来社会发展 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②。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的东方社会的农业公社,一方面保留了原始公有制的某些特征 是原始公社的次生形态 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未来公有制的某些特征 成为了未来公有制的‘原生形态’这就是土地公有制及其建立在之上的集体劳动。总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暂时性和危机性以及原始公有制、农业公社和未来公有制之间的传承性就决定了,东方社会的农业公社可能会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新生支点 东方社会是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层次来看,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是不能越过资本主义文明的。抽掉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传承关系,人类社会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67、763页。

这个大厦就会塌陷。而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共产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而农业公社的生产力却是滞后的，由此造成了东方社会相对停滞、循环不前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社会是不能越过资本主义文明的。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农业公社大胆吸收资本主义生产力成就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性。第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东方社会是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但这要以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为前提和补充。正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和灭亡一样；在世界历史的格局内，东方社会与资本主义并存所具有的所有制上的可跨越性和生产力水平上的不可跨越性的矛盾就决定了，东方社会可以在农业公社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成就，最终走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迈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之路。马克思由此提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 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

来呢?’^① 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了渐进性和跨越性的矛盾过程。可见 这里跨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成就 不可跨越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非资本主义的腐朽的社会制度。

这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使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渐进性和跨越性相统一的辩证特点：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不同阶段构成的过程 渐进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不存在渐进性也就无所谓跨越性 跨越只能是对具体阶段的超越 它是渐进性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渐进性和跨越性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伴生的两种现象。

（三）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为了有效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尤为关注的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这在于，社会发展规律除了在少数甚至是个别民族、国家中才能够得到较为典型的表现外 几乎在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中未必都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因此 必须超越多种多样的社会发展形式和方式 从各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相互作用的抽象中（统一性）才能发现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由此 马克思认为 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东方社会迟早要走西方社会所走过的路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景象”^②。但是，即使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76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8页。

这样 马克思也没有忽视社会发展规律的多样性 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多样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单就作为‘未来景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 也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 作为形成资本主义全部过程基础的原始积累就“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①。马克思总是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统一过程中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

为了更好地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东方革命，马克思晚年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出发，在肯定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前提下，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多样性的诸多表现形式。主要有：第一，原始社会的多样化的社会发展。原始社会是所有民族最先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原始社会都是按照同一模式建立起来的 它们不仅在社会结构上是各各不同的 而且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存在着差异。例如，一般来讲 氏族的发展会产生部落。摩尔根就是在考察了氏族之后考察胞族、部落和联盟的。而马克思则看到了氏族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氏族原则加征服这样的方式 不会使氏族逐渐形成为等级吗 在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禁止在不同氏族之间通婚的禁令，与禁止在同一氏族内通婚的古老规则完全相反”通常来讲“血缘纽带不容产生任何形式完备的贵族”而“一旦在氏族的血缘亲属之间产生等级之分 这就同氏族原则发生冲突，而氏族就会僵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等级”^②。即，在氏族的基础上产生出与氏族相对的等级是氏族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样 马克思在考察史前社会的发展时 就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第二，私有制社会产生形式的多样性。原始公社解体之后便产生了私有制，这是社会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7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第 471 页。

常规 但是 私有制的产生却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在南欧产生的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 在此以北的日耳曼人则发展起了一种部落型的社会 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更为复杂了。第三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多样性。西欧社会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 但是 原始积累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 由于历史环境不同 极为相似的事变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古罗马 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之后 蕴含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的形成过程，这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的情况颇为相似 但其结局完全相异“；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 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 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①。第四，东方农业公社发展的多样性。农业公社是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形式 但是 它们的社会结构存在着差异，它们的进化也必然是不同的。而俄国公社所具有的二重性又决定了它具有多向的发展方式和结局。主要是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私有制原则战胜集体原则 存在着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②；二是在公社解体的过程中，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走向共产主义“，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③。

那么，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否意味着否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呢？不 根本不是。这在于 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发展具体形式的多样性时，都是以承认这种形式在整个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一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42、340、775 页。

般地位为前提条件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多样性有了这种具体深入的把握，从而才为他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提供了可能。统一性是寓于多样性之中的，不能离开多样性来侈谈统一性。同样，马克思也总是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来把握东方社会的社会发展的。尽管他指出了东方社会具有多向的发展方式和结局，但是，他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承认条件性也就是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由此来看，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过程，只能是一个在服从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统一性）和探索自身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多样性）之间寻求“必要张力”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个自觉把握和应用社会发展规律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辩证特点的过程。这一点已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做出了雄辩、有力的证明。

这样，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就使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辩证特点：社会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统一性只有通过多样性才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对多样性的一种抽象和表述，统一性和多样性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是并行不悖的。

总之，我们要从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中找到东方社会发展的现成答案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探寻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却不会迷失方向，因为马克思给我们展示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特点，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的辩证图景。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最突出和最伟大的贡献，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3. 马克思：《资本论》
4.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5.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7.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8.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9.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10.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11. 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通信和札记”（《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发展的札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共产党宣言 俄文第二版序言》）
12.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13. 恩格斯：《马尔克》
14.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15.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16.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导言、序和跋
1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人民出版社,1997年。

[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著作]

1. [德] 梅林:《马克思传》 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苏] 费多谢耶夫:《卡尔·马克思》 三联书店,1980年。
3. 魏小萍、张云飞:《马克思传》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4. 陈先达等:《被肢解的马克思》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5. 孙伯暌:《西方“马克思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北京出版社,1995年。
7.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杨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10. 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 [英]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重庆出版社,1989年。
12.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历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 江丹林:《马克思晚年的反思》 北京出版社,1992年。
15. [英] 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华夏出版社,1988年。
16.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 商务印书馆,1993年。
17.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

- 丛》(第 11 辑)商务印书馆,1988 年
18. 鲁越、孙麾、江丹林:《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9. 黄凤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 [澳]伊恩·卡明斯:《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1. 王炳煜、王力:《马克思主义民族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22.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 年。
 23. 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24. 靳辉明、荣剑:《超越与趋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
 25. 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26. 吴泽:《东方社会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7. 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 年。
 28. 朱坚劲:《东方社会往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
 29. 江丹林:《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
 30. 赵家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
 31. 贾高建:《当代社会形态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
 32. 孙承叔、王东:《对 资本论 历史观的沉思》学林出版社,1988 年。
 33. 冯景源:《新视野—— 资本论 哲学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0 年。

[社会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

1. [苏] 马拉霍夫 :《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 ,1990 年。
3. [德]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4. [德] 夏瑞春编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5. [美]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6. [美]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等 :《经济发展》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
7. [美] 迈克尔·P. 托达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
8. [美] 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9.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10. [美] 西奥多·W. 舒尔茨 :《人力投资》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
11. [澳] 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12. [法] 弗朗索瓦·佩鲁 :《新发展观》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
13. [英] 安德鲁·韦伯斯特 :《发展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内源发展战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5. [美]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 :《现代化理论研究》 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16. [以]S.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17.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18. [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1990年。
21. [巴西]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2. [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23. 李秀林、李淮春、陈宴清、郭湛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 人民出版社,1990年。
2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 肖前、陈志良、杨耕主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 杨敬年编:《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27. 高括:《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28. 谷源洋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9. 张雷声:《寻求独立、平等与发展——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1. 谈世中:《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2. 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
 33.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 严强:《社会发展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5. 王义祥:《发展社会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6. 张华金、王淼洋主编:《社会发展论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37. 丰子义:《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北京出版社,1999年。
 38.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
 39.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40.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后 记

1996年，笔者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有幸留校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来所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生讲授研究方向课“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本课题就是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陈先达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暎教授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指导。在此，笔者和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岳勇，对二位师长的谆谆教诲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课题的申报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庄福龄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欣然担当了课题申报的推荐人，在此，笔者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课题的申报过程中，笔者惟恐自己的能力有限而难以完成课题，就邀请三位好友加盟。他们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岳勇（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彭永捷（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亢宽盈（现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课题的申报过程中，岳勇君进行了必要的联络工作，彭永捷君为笔者提供了国内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方面讨论的情况，亢宽盈君为笔者提供了有关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咨询。在课题进展的过程中，由于彭永捷、亢宽盈二君从事的专业离本课题的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

距离 再加上他们或出国或工作调动 因此 就没有直接参加书稿的撰写。但是 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还是启发了笔者的思路。没有他们三位的鼎力相助 课题是难以成功的 在此 笔者对大家的精诚合作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 笔者大量地参考了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 没有前人和同仁的这些成果提供的基础 笔者也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本课题 对此 笔者对自己所有阅读、参考过的文献的作者, 也要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些情况在书后的参考文献中有所交待 但是 由于篇幅的限制 笔者没有将参考的论文列出 由于课题拖延的时间过长, 笔者也可能遗忘了一些重要的文献, 因此 即使书目也不一定完全 因此 如果有什么“知识侵权”的嫌疑的话 笔者也要表示真挚的歉意!

本课题于 2000 年 6 月完成。具体的分工情况是这样的 除第 8 章初稿由岳勇按照笔者提供的大纲独立撰写完成外, 其余章节全部都由笔者一人独立撰写完成, 并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2000 年 9 月, 本课题通过了由以下五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的鉴定 赵凤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赵家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光明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郇中建 (人民出版社马列·国际编辑室主任 副编审) 特向五位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的能力和学识都十分有限 加上时间又很匆忙 书中肯定漏洞百出, 希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张 云飞

2001 年 2 月 20 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